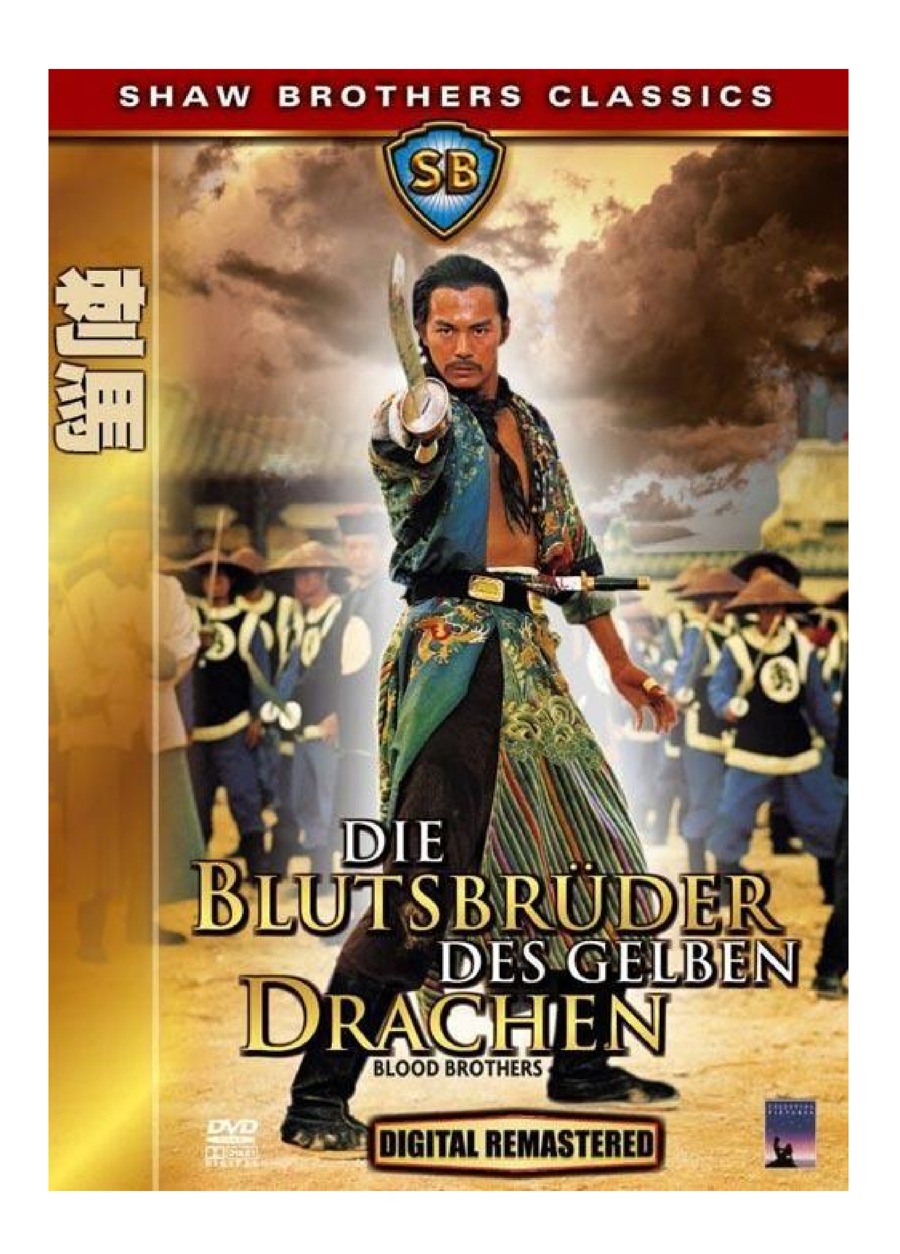
刺马



学习编辑组 汇编

内部材料 供批判用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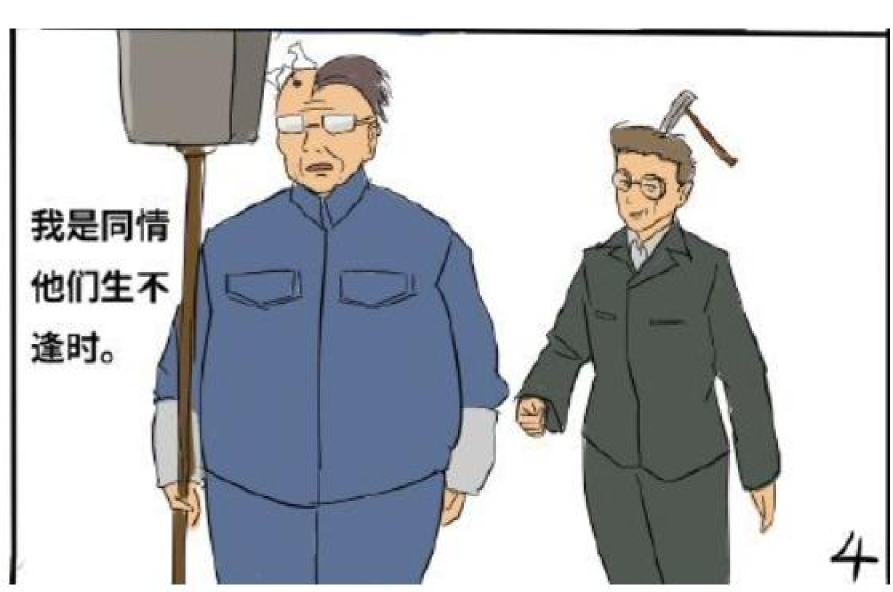
马前卒是中文互联网自媒体中有较大名气与争议的人物，早年混迹于所谓“左圈”，虽然日后加入国家主义右翼立场的《观察者网》集团，仍然因其言论“客观中立”、与陈平-张维为等风格迥异而受到许多所谓“左翼”追捧。因能力有限，本刊无法理清少年中国评论这一“泛左翼”松散集团从整合走向分裂及其与马前卒的恩怨，也不对“工业党人”进行完整细致的评述，仅能一窥马前卒其人。在马前卒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希望读者及所谓“左翼”丢掉对马前卒的幻想，脚踏实地。

生不逢时






不过马监工我不明白，您这么同情
工人，怎么还是工业党？在您理想
社会中的工人不就是这个命运吗？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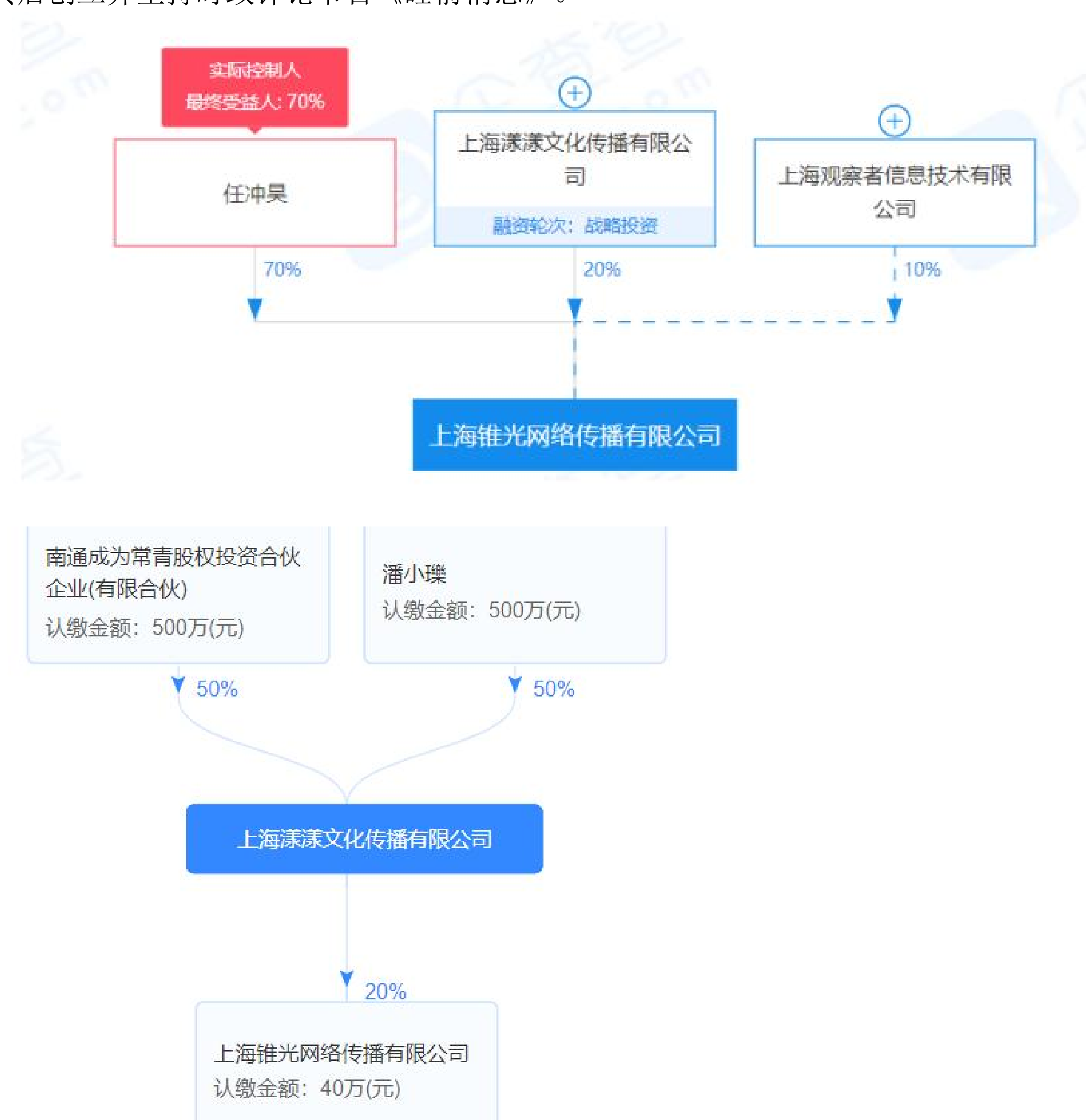

我是同情
他们生不
逢时。
4

回忆马前卒

任冲昊，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地区平泉县（现平泉市）。2002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任苏州市交通设计研究院（后改称中铁建苏州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负责道路桥梁设计工作。2007 年 9 月，任苏州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负责人。2009 年 11 月，任西安同大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前卒长期活跃在天涯社区、西西河论坛、龙的天空等各类专业网络论坛，以撰写经济战略类文章而知名。同时，马前卒亦曾参与小说《临高启明》的策划和初期编写等工作，该小说主角之一、澳宋国务卿马千瞩即化用自其“马前卒”的笔名。

2011 年时，曾为新华社《瞭望东方》杂志社筹备部编辑。2012 年观察者网成立后，任观察者网新闻总编辑、微信公众号负责人。2012 年 7 月，他与王巍、周小路、白熊合著《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2018 年 4 月，马前卒创办上海锥光网络传播有限公司（马前卒工作室），自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后创立并主持时政评论节目《睡前消息》。



怀念一下老河友马前卒

2022-02-26 真理

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到西西河的时候，除了陈经的《官办经济》，最受震撼的就是马前卒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当时第一次认识到政治课本还能这么解读。不过很可惜这个连载后来太监了，马前卒也就得了个马督工的诨号。为什么这本书写不下去了？如今看来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应该是他的信仰瓦解了一次。这是我个人依据他在河里、知乎、还有微博上发言做的一个推测。对不对不能保证，欢迎大家补充或者反驳。

马前卒出身于河北建设与计划经济年代的某工业小城镇，在他上大学的那几年，正好是大下岗。这类型的小地方肯定极受冲击。下岗工人的惨状，当年河里讨论的不少。我记得也不知道是不是马前卒说过的，大学放假回家，看见中学女同学在卖淫……。经历了这种生活变迁的人不太可能对那时候的朝廷有好感，所以我记得他说过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反贼圈子里混。经常在网上看人骂朝廷“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线下能见到什么老干部出来和学生们一起怀念毛主席。

由于马前卒小地方的出身，他应该也不太可能喜欢以大城市为根据地的全盘西化派。很显然，正是后者鼓吹的改革造成了大下岗。因此我记得马前卒说过，当年他就喜欢键政，喜欢在天涯之类的论坛里和自由派掐架。那时候的马前卒应该是作为左派的一员为计划经济做辩护，所以他参与了《刷盘子还是读书》的写作，自己也写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束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我还记得他在河里为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做辩护，认为必须把知青打发下乡，和农村青年平等竞争就业机会，才能维持城市工业体系的利润。后来知青大返城之后，国企开始流行父子接班。管理就越来越差了。由此可见，因为和自由派的辩论，那时候的马前卒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一些术语，并且用市场经济的框架给前三十年做了辩护，可以说相当的有水准。

但遗憾的是时代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大约 20 年前他和人合写了一本书，叫《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的作者钟庆网名愚蠢小猪，十几年前在河里和陈经还论战过一回。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但是不知道为啥马前卒没署名，尽管后来他明确说自己也是作者。细节我也就不清楚了。在这本书里面，钟庆和他当年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进口替代政策+计划经济，认为中国把自己的市场封闭起来可以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自行“读书”获得提高。而开放市场则是给洋人打下手，是“刷盘子”，永远不可能产业升级。马前卒还写过一个伪造版的张春桥法庭发言，里面说看到“独立的工业体系被拆毁”。这应该是他当年的真心话。

他们的思路并不罕见，当年反对入市的左派经济学家都是这么想的，报纸上也有公开的讨论。可以说当年的他们这一代左派都是中国崩溃论者，认为市场经济会让中国崩溃。然而入世不到十年，结果就证明他们完全错误。所以后来，乌有之类的论坛就渐渐地转型搞什么反转基因，而马前卒大约十年前也脱离了乌有，还

在河里发文章说《20 世纪结束了，中国要习惯帝国主义》，意指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然后他就去了观察者这个保守主义论坛。再后来他谈经济，就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了。也没再见他谈人民公社之类的事情。就是他跑路去观察者的那个时候，我在河里问过他，什么体制最适合工业化？他说是美国的体制。与此相对应的，写到了苏联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一书也就彻底断更了。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完成了一次信仰的突变。

后来根据他在微博和知乎上的言论，我觉得马前卒后来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以下几点：

1. 文化上的工业党

早期的工业党应该是倾向于计划经济的。马前卒早就放弃了计划经济，但他如今依然喜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工业的意义。比如说论证螺蛳粉之类的小吃怎么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流行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希望说服读者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这应该是他的招牌。

2. 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

关于这个的证据我能想起不少，例如他一向鄙视全民发福利的国家，说委内瑞拉是“资本主义大锅饭”，这次哈萨克斯坦出乱子，他也出来踩了一脚。应该说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另一个能想起来的例子是他支持茅于轼，认为廉租房不修厕所确实可以降低房价。他还主张房地产税应该一刀切，对所有房子收同样比例的税收，反对累进制收税。这个和李稻葵一样。此外还有个重要例子是 2018 年贸易战初期，他在知乎上主张让房地产崩盘，再放开粮食市场，从而让川普满意。他这应该是吸纳了熊彼得关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以及英国 19 世纪取消谷物税的意义。这里说他的这些观点并不是说他都是错的或者对的，仅仅是描述。

3. 他依然喜欢铁腕政策。

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鼓吹“社会化抚养”。我记得他的主张是在城郊建立大型儿童中心，让孩子脱离父母统一养到那里面去。为了防止走失还要带上自动跟踪的脚环。这种做法可能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取消家庭的说法一致，也可能是看到了西方社会传统家庭日益解体的趋势。目的是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为市场经济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之所以能想到这种主意，大概还是得益于当年为人民公社、上山下乡辩护的经验。

4. 他依然向往革命。

马前卒是文革的拥护者。但是他眼里的文革，绝不是什么唱红歌，反腐打黑之类的举动。薄熙来当年在重庆这样做，他在河里指出“唱红打黑”更像是墨索里尼的做法。应该说当时他就在这个问题上和乌有之乡划清了界限。马前卒眼里的文革，当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应该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大量的自发刊物”

来推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有大量的 NGO 和媒体，就像颜色革命那样。此外马前卒从事媒体行业，他显然希望媒体的自由，这和他对文革的理解一致。

马前卒也注意到了社会组织的动机问题。所以他主张从钱的角度来管理社会团体，例如让所有的 NGO、宗教组织什么的都必须实行注册会员制，活动的时候必须公布经费来源，而且只要有过半人数同意就可以解散并且平分会产。我个人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显然不仅朝廷不乐意，美帝也不乐意采取这个制度。

不过抛开具体措施不谈，马前卒也依然向往革命。例如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就得到了他的称赞，让他认定民进党是左派。当时的自干五嘲讽太阳花运动是文革，这和他不谋而合。唯一的区别在于马前卒支持文革，因此他更得支持太阳花运动。同样的逻辑我想也适用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所以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支持乌克兰，反对保守主义的代表普京。

5. 马前卒支持“民主”政治。

马前卒表露对民主的支持，起源于若干年前某些城市群众因为环保的原因上街，不让城市建设化工厂。对此，自干五、工业党痛心疾首，公知们说朝廷没有公信力，而马前卒则认为这是由于缺乏民主。其逻辑大概是由于政府官员并非选举产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因此面对少数人的反对就退缩了。后来川普上任一年之后，我记得马前卒就说川普一上台“就做了这么多事”，当时应该是在赞叹民主的效率。由此可见他对美国的态度。

6. 马前卒的目标是什么？

马前卒若干年前和另外三个人合写了一本《大目标》的书，河里人应该多少看过。书里的大意是主张中国输出基建产能，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过上工业化的生活，从而让以西方为首的帝国主义无法再盘剥第三世界。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批评他们这是在宣传帝国主义。这种观点据马前卒的一位合作者周小路讲是在冤枉他们，因为他们明明主张输出工业，让世界真正变平，这是在打倒帝国主义才对。而且该书着重强调了工业党的思维，但是反对军备竞赛，认为与美国庞大的武器存量搞军备竞赛毫无胜算。不如认真搞工业和技术升级。

马前卒本人也对与美国军事对抗的观点嗤之以鼻，著名知乎网友山高县在发布了自己”入关学“的观点以后，有人问马前卒什么看法，他说”看都不看“。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具体解释过自己的想法。不过和《大目标》联系起来看，他应该是觉得军事对抗、军备竞赛显然都是帝国主义的做法，他当然不认同。而且据说《大目标》一书还有一部分稿子未能出版，里面是讲与工业党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为此他还得到了前四人帮集团朱 X 老同志的接见。我猜这部分内容应该是说在输出工业的同时输出工业党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输出革命，建立新世界的主张。这种内容显然过不了审。

此外最重要的是，他显然不认为本朝是那个有能力输出革命的政权。我记得他自己说过，要输出革命，那就得自己先信。你不可能输出自己没有的东西。至于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特色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因此，符合工业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他最期望传播的东西。他的思想和"入关学"主张的"不辩经"可谓争锋相对。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马前卒的一些印象。他的这几个观点串起来，应该是这样一种理念：

工业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所在 （1），而市场经济是工业化的唯一法门（2），为了维持市场经济有效平稳运行，必须由强力的政府实行大刀阔斧的政策，比如说"社会化抚养"（3）。为了建立强力的政府，就必须由群众自由参加的革命实现民主 （4，5）。革命不能停留在一国之内，因为一国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对外输出革命，同时输出工业化，彻底终结帝国主义时代（6）。

所以说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马前卒依然是那个从小地方来的热血青年，是那个向往着新世界的革命爱好者。但是我个人觉得马前卒的思路有若干自相矛盾之处。首先，他和过去左派思想的主要差别在于，他强调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这问题不大，因为其实列宁他们的"新经济政策"当年也是这么搞的。当时托洛茨基还对美国资本家说，苏维埃欢迎他们的投资并将保障他们的私有产权，即便革命在其他国家爆发了并且没收了他们的其余财产，在苏联他们的私有产权依然可以得到保障。可这种理念的问题是当年马前卒因为计划经济被放弃而对朝廷不满，说朝廷"不要社会主义了"，而如今他自己推行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东西。

第二，他认为民主的美国是实现工业化的最佳制度，但是他所谓的民主，也就是那种代表大多数人铁腕政权，更像是是毛太祖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在美国人的字典里应该是叫做"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民粹主义"。他这种思路恰恰和美国强调制衡的"三权分立构成了冲突。我感觉马前卒对美国的称赞应该是拍到马腿上去了。

第三，马前卒自居共产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普京侵略乌克兰他不能忍。但是自从中国有了互联网以来，美国侵略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一系列国家，制造了无数惨案，我也从来没见过马前卒像今天一样义愤填膺。这可以用他的工业党思维来解释。我记得他说过，工业化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在一次节目里，他还把印加文明的居民比做某种大型野兽，被西班牙帝国的数千士兵消灭了。所以说马前卒的应该是觉得伊拉克等国全是非工业国，其国民不是工业人口因此不值一提，但是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国，是工业国（前），是必须要予以同情的。美国侵略伊拉克等国，他大概觉得美国是在传播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是对落后国家的启蒙，对落后国家有大功，尤其阿富汗，他还在节目里面说过人口增加了上千万。

第三点则纯属我的揣测。我认为马前卒设想的革命似乎应该是从中国开始的，这依据的很可能是列宁"帝国主义脆弱一环"论。我不确定他是否如今还这么设想，又或者他考虑没考虑过那个脆弱链条出现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可能性。

总之，马前卒算是离开西西河已久了，我写这么一篇怀念文章，看能不能把他吸

引回来。

网友评论

马督公其实是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描述：

>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
>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
>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
>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
>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业党”的大部分主张无非如此。

马前卒是谁？

秋七月 2018 冬十月 2020

YCA 分裂后，正统派说道："本站不认为马前卒是修正主义，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也不认自己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何来修正一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话，马前卒上网以来，从来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自称共产主义者），却多年谈论马克思主义话题乃至自领修正主义帽子，可谓诡异。

我认为马前卒值得注意的三篇文章是：《良师原来在敌营》（2005 年）、《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 CCTV 的狗血连续剧》（2011 年）、《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2016 年），至于《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大目标》、《给"00 后"的唯物主义人类简史》，实在太长了，错误太多，阅读并不划算，而后来的《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同志是凡人》之类，更长，提炼观点更难。

下面讨论几个问题。

一、不再是自由主义者后的马前卒是谁。

秋火写道，《良师原来在敌营》"对中国当代史的评述，完全就是毛左的政治逻辑"，使用"官僚社会主义"这一香港托派发明词，怎么就毛左了呢？实际上马前卒这套叙述完全和托派兼容，而和传统毛派不一致。他后来认为"中苏过去那套的确走不通"，GPCR 呢？后来被马前卒发明为构造"工业社会制度"的运动。总的说来，在《大目标》之前，马前卒的政治面貌是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左派。

二、"大目标是一本反动读物"。

三、工业党。马前卒对西经和马经皆不感冒，大概是因为参与编写《刷盘子还是读书》的缘故，比较信服陈庆那套逻辑。这套逻辑发展下来，就是所谓工业党，有人界定工业党的核心主张是"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卢南峰），我认为是准确的，是工业党的出发点。至于马前卒后来的自我界定"我这个工业党，主要谈的不是工业技术发展，而是上层建筑应该主动去配合、去促进社会硬件的发展"则有避开生产关系变革的嫌疑。

四、马前卒是唯生产力论者吗？答：马前卒实质认为中苏道路失败是因为没搞出一个好的制度（"适合工业社会的制度"），你还不如说他是唯制度论者。（顺便还可以批判一下《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这篇马前卒自称扯淡文章里的制度竞争论。）

五、先锋队问题。有人说："先锋队集权或曰先锋队专政，是马前卒这一派在理

论高度上的共识”（白头豕）。非常正确（其中“先锋队”不一定指列宁式政党）。但马前卒及马派 YCA（虽然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以马前卒为名的 YCA）的意思其实是，当年大家就是这么干的。我很想知道说中苏“single-party dictatorship”有何问题，不过从未见人解释过。但是呢，哪怕“single-party dictatorship”这一概念不妥，曾运行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都是一党领导下的专政。

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马前卒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极度模糊，马派 YCA 是认为要搞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估计马前卒的真实观点与此相近，但明面上马前卒讲一些“社会主义未必不能兼容市场经济”之类的话。

七、《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的根本思想是，马列毛无用，准确说来，是他认为“马列毛的 GM 方式不适用于今天”。马前卒给我的总体印象是，马前卒早就如此想了吧，从他接触老造、老左，混在左圈开始。

八、马前卒的阶级背景及立场。马前卒 1981 年生于河北承德，2002 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是工程师、小生意人、新闻编辑。从前马前卒位于无产阶级上游，未来前途如何还需再看。通常，左翼认为工业党叙事是在通三统，更有人认为马前卒由此搞出的一系列观点是法西斯主义（我并未看得很懂）。不过，在写这个答案时，马前卒的知乎账号据说因为得罪佛棍挂了，看来其人还没这么重大的意义。至于工业党学说，目前也前途不明。

九、如何对待马前卒。答：看看睡前消息和时评。不要过分严肃地阅读他的各种瞎扯长文和哗众取宠的言论。

马前卒吧，从前是混左圈的。那天我们聚餐的时候，马前卒就讲到，有一天他去参加老左们的聚会，那些老造有的是刚从提篮桥出来的，老左们看见马前卒的反应是“嘿，来了一个年轻人”，这话令我印象深刻，也就是说，马前卒（至少曾经）是改开催生的新一代左派。
马前卒也是中国第一代网民，当时在网络上和李宪源、萧武等是同路的，现在只能看到斑斑点点，几行残迹。然后是 YCA 的创办，当年的雄心壮志（社科方面的果壳网）如今也已消耗殆尽了吧。
在这些昔日友人中，马前卒脱颖而出，混成了知名媒体人。然后呢，马前卒的理想呢？问就是工会是封建主义的抵抗方式、也许不需要列宁式政党、也许也不需要暴力 GM，问他有什么新办法，然则啥也说不出来，这样在左圈怎么能风评好呢。
老办法是会撞得头破血流，还是大获成功，希望我们能看到那一天。

良师原来在敌营——左派评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

马前卒 2005-08-30 乌有之乡

良师原来在敌营
——向坚守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介绍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兼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

九月初，当代中国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作者钟庆。此书约 23 万字，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认真读的话，一天即可读完，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 1978 年以来掌握中国政治经济权力的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

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社会主义相继崩溃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集团迅速向新出现的生存空间扩张，试图接管整个世界；同时，中国、苏联、东欧的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资本集团也组织起来，利用本土优势抢夺利益。在剩余的空间和资源被瓜分干净以前，西方帝国主义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目标是一致的——消灭社会主义残余、压制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新共产主义者的反思，尽可能掠夺旧体制的遗产。但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旧体制的力量和遗产被消灭殆尽，天生有无限扩张趋势的资本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争夺空间与资源的冲突，摩擦逐步升级。

中国官僚资本集团脱胎于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精英阶层，从 40 年代到 70 年代末，精英们一直受到体制中社会主义因素和少数理想主义化领导人的压制，并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沉重打击；直到 70 年代末彻底掌握政权，这个集团从未有机会公开讨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计划，一旦它们发现自己控制了这个国家，根本不知所措，因此，混乱之余才有“摸石头过河”的荒谬国策。在这种思想真空中，西方浮在表面上的一些政治经济思想、其他第三世界小国做买办的历程、旧农业社会的残余统治经验.....一并被官僚集团拿来应急，这种大杂烩就是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统治集团的思想基础。至于民间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后，完全要从零开始发展，发展历程酷似 400 年前的西方同行，其模糊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接近于西方体系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然而，无论是官僚集团的杂烩还是民间资本的亚当斯密式梦想都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去甚远，在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始终不变的只有追逐利润、无限扩张这一个本性，具体运行规律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如今只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层遮羞布，或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发挥作用。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由于发展受阻碍，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把发展方向从对内掠夺向对外竞争转移，不再甘心做发达国家的附庸，试图利用旧体制留下的遗产为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博得更有利的地位。这时，他们才发现现实的世界远不如想象中美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先发垄断优势，大肆欺压边缘国家的资本集团，当落后国家努力赶上，规则对自己不利时，发达国家又会随时根

据自己的利益修改游戏规则。从纺织品壁垒到经济危机后的趁火打劫，再到被强迫修改汇率，残酷的现实和屡次碰壁让中国资产阶级学到了两条教训：一、理想中的世界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规则就是没有任何规则，弱肉强食是永恒的规律。二、大工业时代要求资本集团内部实行严密的组织，在核心产业中尤其需要压制个人或单个企业的自由竞争，以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号令应对世界市场的风浪。

很显然，由于此前二十年的“主流经济学”与实实在在的教训存在严重冲突，社会产生了对新经济理论的需求。如果说张五常的名誉破产和顾雏军的入狱、张维迎被媒体围攻标志着虚浮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者被资产阶级无情抛弃，《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的出版则代表着新的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开始走向前台。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关心并了解并这一重要事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本书共分 12 章，少数内容是为了顺利出版而添加的应景颂世之作，与主题明显不符，读者当可轻易发现，大可忽略不读，还有一些内容属于应书商的炒作需要而添加的噱头；除此之外，内容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者从一个工程师的个人视角对中国经济的描述与分析。在一至三章中，作者抛弃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和语言体系，直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中日经济的对比，并由此得出初步的结论——是否能坚持以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建设基干产业，是决定后发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自由贸易和对比较优势原理的推崇只会给后发国家带来灾难。与其他几部分相比，这一部分相对粗浅，事例和逻辑结合的并不严密。因为这几章基本是 BBS 辩论的原文，是作者写作全书的来由。但阅读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思想历程，从而更容易理解后面的主要内容。从绝对信奉自由市场的年轻学生到冷眼旁观的思考者，社会用强烈的对比和沧桑世事教给了作者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第二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在第五章中，作者从感性归于理性，对第一部分的粗浅描述做了详细、量化的解释。作者为“重工业体系”、“发达国家”、“基干产业”等主要概念作出了了确切定义，详细介绍了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威力、结构、运行规律，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出现后新的经济规律。第六章以近代主要强国从工业革命到二战的历史为研究样本，找出导致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分别取得今天历史地位的原因，总结了各国在工业革命到来时，各种国策的经验教训。第七章是前两章的总结与提高，从最基础的物理因素开始分析，为工业革命对经济规律的冲击做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找出了了西方经济学的致命问题所在，随后作者转向战后社会，用前面总结的现代工业经济规律解释了今天的经济现实，并指出今天落后国家很难通过合作和贸易来改变自身的被剥削地位，只有相对脱离世界贸易体系，才有可能通过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方式取得和西方平等贸易的地位。不过，即便是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的中、苏两国，也因为各种新的阻力而最终失败，今后试图打破现有不平等经济体系，免遭西方垄断集团剥削的国家必须认真吸取这里所给出的中苏两国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完整自恰的理论体系与对现实的详细阐述在这一部分精确的结合，无论读者对本书的观点持何种态度，都应对这一部分，尤其是第七章中所总结的规律、经验、教训

给予最大的重视。

本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是第三部分，内容分别是中日比较、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以及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部分重点在于通过对三个不同样本（中、日、东南亚）现状的详细比较，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开了一个剖面，向读者展现了核心发达国家与受剥削、提供简单劳动力与资源的边缘地区之间的鲜明对比。其中第十章对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介绍颇有意思，将包裹在日本垄断集团外面那层民主、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的外衣剥的干干净净，让读者清楚的看到发达国家的深层运行规律，破除了目前主流人群对日本的错误认识。而通过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介绍，我们倒可以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里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市场和私有产权等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制度与结构。这种鲜明对比为第二部分中对现行“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提供了最好的论据。

在第二部分，作者给出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近代分道扬镳的原因——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大工业体系的建立。在最后一部分中，作者不满足于这一结论，继续追溯历史，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近代社会条件决定了大工业的建立？”、以及“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成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作者给出了圆满的解答，非常有新意，为此前史学界所未见。在回答了这个历史问题以后，作者在第十二章提出了更现实的问题：“如何摆脱这种历史宿命？”这一章的第一节通过对工业革命后历史规律的分析首先论证了认识和改变历史方向的可能性，然后依据前几部分的推理与事实，为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今天的惯性方向大为不同的道路——尊重事实，不盲目崇拜经济利润，放弃部分眼前利益，培养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民族精神，集中资源建设自主的基干产业，以国家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面对世界竞争。作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开出的药方是否正确，读者可自行判断，这里不再赘述。

全书内容大致如此，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此书最关键的地方有三处。

首先是产权问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相对分散且联系不紧密，在效率的压力下，资本直接选择了资本家作为自己的代表。这个时代的资本家既在法律上拥有自己的企业，又直接控制企业的运行，在广阔的外部扩张空间中奉行最有效率的自由竞争制度，各自向外扩张。强调清晰的私有产权会刺激效率，减少浪费，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的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要求各个企业之间密切协作、一致对外，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率和利润。企业不断合并、扩大，庞大的企业集团拥有可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规模和实力，垄断时代就此到来。在掌握经济霸权的大型垄断集团中，不管股权如何分配，是集中于少数老板还是分散到职工乃至全民，真正的经济控制权已归于经理、工程师、律师、投资顾问等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壁垒控制着企业的实际运行，还可以随意的用互相控股、滥发高薪、提高福利等方式消费企业的利润，乃至直接用配股、期权等方式将企业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归于自身，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或者说真实的统治集团。在日本这种因后发而特征明显的国家里，早就在核心产业中消灭了私人产权的作用，企业和关联的银行互相高比例持股，最后还有大比例的国家股份，没有人能说清楚三菱、三井等大集团是属于谁的，最后一个私人大型企业

西武铁道已于去年被勒令退市。技术官僚集团实际上拥有一切。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唯一统治者是资本，人类只是利润的附庸，资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当代表，只取决于利润。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大型经济组织的内部成本还不能压倒因垄断、合并、纪律所节省的资源。那么，由垄断集团或国家机关中的技术官僚作为资本的人化代表就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由垄断集团制定的经济计划也将在核心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领域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复杂化程度不同，资本所选择的组织方式也不同。石油产业、信息产业多是世界规模垄断集团，毛绒玩具厂或袜子车间却适合几十人的小公司，只是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将能创造最大利润的产业集中于本国，留下低水平产业给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集团才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双重剥削——既剥削劳动力，又要在穷国资产阶级的身上另外剥下一层皮。这就是落后国家反而要比发达国家要更“市场化”，更强调清晰产权与加强个人竞争的缘故。作者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呼吁改造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为新时代的计划经济思想张目，思考堪称深入。

其次是作者认识到了各种产业之间的利润是不一样的。按常理来说，各种产业部门之间本无高低之分，人类要用电脑，也必须吃饭穿衣，在一个各种产业都按照人类需求充分发展的世界上，同样的资金，投入不同的部门，从长期来看回报率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无限大的，对于那些进入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后来者很难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赢得一席之地，这就造成了某些产业的相对稀缺，各种产业部门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很显然，无论用哪个学派的经济学知识来推断，自由竞争与不平衡的产业结构相结合，自然会带来利润率的不一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占据了那些相对稀缺的高利润行业，并用包括军事讨伐在内的各种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的同行，以保持相对更高的利润率。如果落后国家坚持信奉自由市场的效率原理，坚持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永远也不会有摆脱现有地位的机会。作者在亲身体验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后，终于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产业不平衡问题，矛头直指正风行于中国，让国人以出卖土地、资源和简单劳动力为荣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信正在试图摆脱附庸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会欣赏这种清醒的认识。

最后，作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缓和国内矛盾的手法。相对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竞争压力要小的多，这并不表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压榨本国的下层阶级，而是由于革命的现实威胁和历史记忆，他们更愿意把矛盾转移到国外。在国内维系一定的福利水平固然要减少利润，但为了避免革命，为了保证稳定的长期利润，他们愿意稍微降低一点利润率。
在发达国家，除了那些高利润产业所必须的劳动力，大部分劳动力还是在工业、服务业、农业中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劳动效率和技术水平与第三世界的同行并无本质差异，如果开放国界，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自由竞争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会迅速的把这些发达国家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拉平到世界平均值，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就必须直接面对第三世界常见的革命、暴乱、恶劣的治安，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断用媒体、世界银行、导弹等各种方式强迫别国开放市场，“遵循市场规律”，却绝对不允许劳动力这

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也不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产品“自由”的进入本国市场，这样就保证了本国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超出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工资福利。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可以对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二级剥削，然后再从剥削利润中分出一部分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资本集团还继续需要国家这层外壳，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是相关的，这也正是民族主义的基础。作者作为一个准民族主义者，极力号召中国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不要把目光局限于国内，不要把国内民众压榨的太过分，认为从国外的无产阶级身上获得剥削收入才是最稳妥的经营之道。这种思考，无论如何要比许多鼠目寸光的土财主要强的多。

本书其实是一本网文合集，又经蹩脚编辑滥加增删，在逻辑推理和考据上还有不少细节问题，但瑕不掩瑜，作者发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旧指导理论的要害，又以帝国主义的发展经验为蓝本，为中国资产阶级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发达之路，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够资格成为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短期内，这本书可能不会受欢迎，也可能被禁，但从长期来看，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对本书的内容不感冒的读者可以把书留起来，十年以后再读，一定会有新的认识。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把某个资本集团的利润或效率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混为一谈。具体到这本书，前面指出的三处关键点其实都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

在产权问题上，作者认识到法律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不再代表未来资本主义的方向，但技术官僚的统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因为发达国家能够从整个世界掠取资源，才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但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并没有外星殖民地可剥削，资本主义终有碰到扩张边界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完全交给技术官僚，中苏两国官僚社会主义解体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接下来的事情。

关于不同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作者已经能用各个产业部门的不平衡分布来完美的解释。但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全球经济危机所致，而且无法避免，这是楼主不可能看到的角度。无论资本选择哪一种组织结构来完成自身的无限扩张，都是以剥夺无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为代价的，结果就是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社会消费能力。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产业部门不平衡带来的的生产力浪费正好缓和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想要通过创造稀缺生产部门来分享超额利润，正好加深了这个矛盾，阻力大的难以想象，与西方争夺因经济危机而狭小的市场空间的结果可能就是下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作者提出的第三个要点——民族主义，国内共荣，充分的说明了本书的阶级定位，也为前两点的问题做了解释。作者并不真正关心人类社会的未来，也不去考虑资本主义体系的前途，作者真正关心的只是中国企业的繁荣，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象今天美、欧、日的垄断集团一样痛快的斩杀它国企业，同时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在发达以后用一部分利润来缓和国内矛盾，以保证利润的稳定可靠。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但现实是否能让作者如愿呢？

从今天的世界局势和国内资产阶级的状态来看，恐怕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为中国

资产阶级指出的道路是很难走通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拟订的计划无非是两个步骤：1 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及与之相配合的文化。2 开门大掠，从国外掠夺资源以缓和国内矛盾。最终目标则是让中国资本集团取代老牌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至少是分享世界霸权和利润。这条道路与历史上美、德、日等国的崛起道路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历史上强国的崛起是历史沉淀与时势结合的客观结果，作者在今天却试图说服中国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有意识的创造一次崛起。

既然楼主给中国设定的目标是创造帝国主义霸权，那么，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中国与现存的帝国主义强权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作者能看到的问题，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会有人看到；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很清楚，即便帮助中国打破现有秩序，唯一的改变只是统治集团的名称，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必须独自去挑战整个现有秩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指望不上的。再看外部因素，今天的发达国家内部已经不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唯一相对独立的日本因没有独立军备而听命于美国；以前的后发国家都能够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得到工业资源和生存空间，今天的中国资本集团稍有动作却要受到西方的一致追打，举步维艰。

外部条件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阻碍作者梦想成真的最大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资产阶级可以细分为官僚资本集团和民间新兴资本集团。前者得到了遗产中较大的一份，尤其是继承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配套的人力资源控制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因为发家容易，缺乏锐气和长远眼光，而且形成已久，在多年的腐败堕落中丧失了全部的名誉，还要背负 20 年来所有失败政策的责任，很有可能在下一场革命中被迅速地打成碎片。即便少数被称为“太子党”的少壮派试图励精图治，也无法改变整个集团的下滑惯性，即便官僚集团有幸生存下去，估计至少还要一代人扭转这种趋势，但到那个时候，估计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已经所剩无几，世界局势也更没有任何突破机会了。

民间新兴资本集团白手起家，即使分得了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也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盗窃到手，因此这个一直在积极扩张的集团不缺斗志和信心。遗憾的是这个集团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以充当强势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外国资本）的附庸为荣，虽有积极扩张的欲望，但暂时缺乏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能力，对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眼下也不具备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复兴核心的能力。另外，在外资 20 多年的渗透下，两个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官僚集团大修开发区，贱卖土地；民间资本组织廉价劳动力进行外贸生产，替外资在中国开拓市场打前锋。表面上看中外利润互相依存，但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下，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这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

随着西方压力的渐渐增加，我们可以预计将有更多的资产阶级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转向作帝国主义的尝试，作者的理论也会越来越受欢迎，但无论如何，自身能力和现实条件已经基本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一方面中国逐步沦为西方的附庸，另一方面中国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遗产的国家，合格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无人可比，中国未来的最大可能是成为介于发达国家与纯粹的边缘地区、资源产地（如南美、非洲、中东）之间的一个中间层次，通过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来维系大部分劳动者的生计、少数买办的奢侈生活。同时有一部分优质资本融入西方体系，登入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层，但这无关大局。

退一步讲，即便中国资产阶级按作者的设计走上了帝国之路，顺利的取得世界霸权，同时对内缓和矛盾。中国人也不可能过上今天西方那种幸福生活，因为光是

中国的 13 亿人口就远远超过了现在发达国家的总和，整个世界背不起这样庞大的霸主。如果中国真的以西方模式取得了世界霸权，那么，我们可以庆祝全球革命的同时爆发。因此，虽然作者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依然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真正的转机。

本书是一本符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作品，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左大培就亲自为此书作序，但与以前连篇累牍的“主流经济学”作品相比，它显然更接近现实社会，对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和当代帝国主义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揭露。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清楚的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到自己敌人的思想动向非常有必要，因此我向共产主义者推荐此书。另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许多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于今天的现实多有不合，比如以单纯的法律归属权作为划分阶级的做法在今天就与社会现实有很大的冲突；资产阶级的许多著作在维护阶级利益之余，也揭示了一些客观规律，共产主义者应该去了解它们，充实自己的理论。最后，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留下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教训，如计划经济理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方式等，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于一个执著于自己的事业的人而言，最狡猾的敌人往往也是最好的老师，本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修订工作，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具有阶级属性的是完整的经济思想本身，而不是作者或我这样的个人。整个世界每天都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但只有那些符合社会需求且自恰的理论才会受到重视，才有出版传播的机会。对部分客观规律认识的一致导致了我和作者的合作，我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思考深度也在这个过程中得益非浅，在此我向作者表示感谢，同时也明确表示对他完整观点的敌视。

说明：我现在没有这本书的最终电子版本，另外，由于版权问题，我也无法立刻将手头拥有的资料公布于网上。在书出版一个月以后，我将把我参与的部分全部上传，请各位耐心等待。

我的祖国，谁的祖国？

2011-1-31 马前卒

元旦那几天，陈经发了个贺年贴，说为 2010 的中国喝彩，大家一起叫好，得花数百，真是太平气象。唯有马前卒不知趣，非要出来说怪话——其实马前卒自己没说什么，只是转载了一个陈经半年前的帖子

“大家不要再说本田罢工的事了，被坏人利用了 [陈经] 于:2010-06-03 19:45:08 主题帖
有国际组织来搅事，斗争复杂。我们不能中计，只要是别有居心搞乱中国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境外组织才不会真关心中国劳工，只是想捣乱。
我们不要再说这事了，容易上当。不管工人们的要求合不合理，只要有坏人来利用，我们就得小心。”

然后呢，然后有人说马前卒你是何居心？有人说马前卒你凭啥代表人民？有人说马前卒说的好像也对，然后就有人说马前卒你用马甲出来搅混水。再往后，西西河里就战起来了。

在这里，我懒得为自己的说法辩解。我只想讲两个笑话：

斯大林和朱可夫讨论问题。讨论完后，朱可夫在走出办公室大门时，说：“可恶的小胡子！”。
正巧被另一个高级将官听到，便将此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叫朱可夫来，问：“朱可夫同志，刚才您说的可恶的小胡子是在指谁？”“当然是指希特勒了！还能指谁呢？斯大林同志？”
这时斯大林又把脸转向那个打报告的军官问道：“那么，您认为指的又是谁呢？”

另一个笑话可能是从这个笑话衍生来的，当然反过来也可能。说是拿破仑如日中天的时候，有个报纸登了一首诗，咒骂盘踞在巴黎的恶魔。有人拿这首诗给拿破仑看，说这首诗用影射笔法讽刺皇帝，建议皇帝严惩这首诗的作者。拿破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是谁第一个说拿破仑像巴黎恶魔呢？我该先惩罚谁呢？”

这两个笑话的共同点是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此，我也向我的反对者求教一下——马前卒在陈经的帖子里转载陈经的发言，为何会招来这么多的批判呢？是谁觉得这个发言很碍眼？是马前卒么？

微笑，感谢各位支持者和批评者心中的正义评判。

当然了，也有人说，陈经自己其实不反对罢工，无非是因为外国势力介入，才反对了。说这话的人，大概忘了本田是哪国势力。不过这倒不是马前卒的最初想法。也许是马前卒太邪恶吧，看到这个回复首先想到的是：日后如果我开个厂子，有人罢工的话，我第一件事是拿一点小钱扔到国外去，让国外某个狗屁组织支持工

人一下，发个声明。然后自然就有人跳出来说："不管工人们的要求合不合理，只要有坏人来利用，我们就得小心"，这点小钱就雇来了高级文化打手，实在便宜 。归根结底，这是个文化不自信的问题，一切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走。敌人指东你就往东，那固然是脑残，但敌人指东你就必须往西，那也是有病，起码是种有害的低级条件反射。

不错，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但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的用，就像毛主席那句"感谢日本侵略"一样无聊。毛主席的原话是：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 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毛主席的意思是，"无使亲痛仇快"，如果你能证明你是"亲人"，那么的确我们可以团结你。如果不是亲人，就不要抱怨我们下手狠了。和敌人站对立面的前提是阵营分明，是本国的人不搞摩擦，拿自己的同胞当亲人。而不是打日本的时候要别人拿统治者当同胞，为国效力，等到分配经济利益时就视本国人民为敌人，剥夺的一干二净，就连壮丁的最后一个铜板也要拿走。这话古为今用的话，我首先要问：本田的资本家如果证明自己是工人的亲人，工人们会罢工不？2010 年还有一件大事，佛山工人罢工，黄色工会（此非形容词，他们自己很自觉的戴黄帽子出马）出面镇压。这个黄色工会是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地方黑社会共同豢养的走狗，他们是亲人不？地方党委和政府呢？下大棋的呢？

还有另外一种为陈经的辩护方法——我在这里先不管这种辩护方法对不对，我首先建议这种辩护方法的持有者和前面那种辩护者辩一辩，因为不太可能两者都对。这种说法是说陈经听到了风声，再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封西西河了，所以警告大家莫要继续讨论。

"觉得你曲解原意 [wooxiao] 于:2011-01-22 06:20:11 复:3255692
他只是说西西河不要讨论了，因为这样会导致西西会被封掉。还有你能不能说下你对"内部"的定义？还有"攘外"，这个"外"是指什么？
最后西西河是不是被封了？ [wooxiao] 于:2011-01-22 14:30:55 复:3256379"
他说的大家是谁？还不是在西西河的各位!!
最后西西河是不是被封了？

坦率的说，我看不出陈经的帖子有警示西西河网友的意思。如果真有这个意思，多说一句西西河可能被关，是否会增加西西河的风险？我不知道。邓小平说的好，"不争论"。大家可以说马前卒错了。只是，如果陈经真的是这个意思，我就更奇怪了。我转陈经这个帖子，为啥大伙都说我攻击陈经呢？大伙没看出来陈经只是说西西河危险了么？大家都和马前卒一样蠢？起码马前卒不敢这么公开藐视

网友。

刚刚上了一下西西河，观点时事区第一页一共 18 个帖子，有 4 个在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祖国帝国之争就是说革命，说阶层固化的，第二页还有另外 4 个。4/18=22%，就是说，在元旦到春节之间，这次争论占用了本区网友五分之一还多的精力。在此，我无意为占用大家的时间道歉，也不会因为打搅了大家喝彩的心情道歉。因为这的确是这个社会应该讨论的问题。

之所以讨论的这么热闹，是因为中修帝国的拥护者最近有两件事大有面子。一个是四代机，中国在美国的量产型战斗机列装 6 年之后就试飞了自己的同一代试验机。在航空工业这个尖端产业上，中国过去和美国的差距一直是 30 年左右，即一代以上。现在有某个重要项目的差距拉到了 13-15 年，当然可喜可贺。马前卒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转载陈经的回复，简直是在别人的婚礼上放哀乐(虽然哀乐不是自己写的)。虽然马前卒不在乎打搅别人的兴致，但说话也要实事求是，俺回陈经那个帖子的时候，四代机还没飞呢，我没有那么高的预测能力，能够准确地把冷水泼到民族主义的火苗上。您甭捧我未卜先知，我瞎猫碰死耗子而已。

另一件事，就是胡锦涛会奥巴马，朗朗在宴会上奏了一曲“我的祖国”，国人觉得因此大涨面子。不过，这事儿其实和朗朗没啥关系，我首先不认为朗朗弹这个曲子弹的好，其次不认为他弹的好坏和面子大小有啥关系，只要让别人听出来是“我的祖国”，这事儿就算成了。当然了，为了避嫌，我得声明，虽然我 YY 刘亦菲，我也不会因为刘亦菲欣赏朗朗就贬他，我只是和大家的看法一样。即这个面子既不是胡主席给的，也不是朗朗弹出来的，而是志愿军打出来的。没有上甘岭的血战，再雄壮的旋律也没法异域争光。“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话有了志愿军的战绩，就是豪言壮语，没有的话只能算是说大话，谁知道你有枪敢不敢冲着人家的大炮打呢？

既然面子来自志愿军，我就很有兴趣考虑一个问题。即志愿军们如果加入今天 bbs 上的讨论，他们站哪边？或者反过来说，以下言论敢发给当年的志愿军看么？

中国看来接下来也只有这样了，先用物质“腐蚀”老百姓。这肯定解决不了“阶层固化”的问题，但能够稳定体系。而老百姓的愤怒，会跟着物质条件的变化慢慢转变其形式，不变的是对“固化”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可以进一步设想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以后，人都没法靠物质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了，就会有比较理想的社会状态。这是中国努力的方向。——陈经

德斯蒙
乐善:50
声望:334
2011-01-28 03:39:23
3263517 复 3259634 历史上经常被人当作祖国的，基本都是帝国 9
比如中国人认汉唐作祖国，欧洲人会提到罗马、神圣罗马等等。

老实说我不太清楚所谓的“帝国”派和“祖国”派在争些什么？这两者之间又没

什么不兼容。帝国无非是种对外的态度，祖国则是对本国的一种认同感。因为对外掠夺（如果非要这样定义的话）而指责自己的国家和同胞，那只是脑残的优越感罢了。
至于所谓的贫富不均、阶层固化之类的，原本就不是帝国的特质，尤其在上升期的帝国，贫富分化大倒是常见，但出头的机会并不少见。

理性繁荣
乐善:89
声望:1621
2011-01-29 04:21:11
3264742 复 3263755
首先，是满足新兴资本家一定的政治诉求，"比如说入党，政协"，辅以赶走等策略.(这一步除了 TG，谁也做不了，资本的本性贪婪，官僚资本根本割不下相对大块肉来分给新兴资本).其次，走到集会那一步，千万不能让要钱不要命的流氓无产者卷进来，集会的小资可以不用去管他，遇上打砸抢的，不管是点车，还是点楼要立既处理，需要开枪的时候迅速开枪.

hhjing
乐善:109
声望:588
2011-01-21 12:51:40
3255496 复 3242178
至于你，扣帽子很厉害。在中国人均 GDP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只有欧美日本的 1/10 的现在这个阶段，除非你证明阶级斗争为纲能够更快的弥补这个差距——否则，就别鼓吹你的阶级斗争了。过二十年再来阶级斗争吧！

强大的心
乐善:28
声望:50
2010-11-07 22:21:50
3157475 复 3156094 你是教条主义
这个国家的法权是党定的，个人的所有财产都是这个法权体系所定义的，资本家有再多财产，只要这些财产还在这个国家，那么就等于已经把自己的资产交给了国家。想当年党还没有掌权的时候，还有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把实际的党产在名义上委托给党员个人的，这些财产的管理还不是主要凭着党员自身的觉悟。要我说，所有共产党员的资产都是这个党的资产，只不过党没有把这些资产集中起来管理，而是由党员自己凭觉悟去管理，事实证明这样的管理体制并不天然的劣于集中管理体制。所以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力去质疑党员拥有个人资产这个现象本身，只要他取得这些资产是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哪位河友一边享受着当年志愿军给的面子，一边告诉我：“俺觉得这个言论给志愿军看，他们很高兴”。那好，你赢了，因为讨论的前提是一定的共识，没有共识，我没法不认输。毕竟我不能把你传送到 60 年前的朝鲜战场去验证一下，没法问问志愿军想要的中国是否就是帝国主义者想要的中国，是否就是那个阶层

固化合理，资本家可以入党的中国。所以还是邓小平那句话："不争论"。

但是呢，我知道，不少志愿军，比如攻克汉城的 50 军，原来根本就是国军，他们没少在国军那边见过阶层固化，没少听过蒋介石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只是他们听归听，咋也不觉得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所以战绩也就是那个样子。等到共产党接手这些国军，鼓吹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斗争旧军官，按时发军饷，这些国军就立刻变成了所向披靡的战士。区别在哪呢？区别在共产党比国军更讲民族主义？区别在共产党告诉他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我看不是。要知道，50 军的前身是 60 军，去朝鲜并不是第一次出国，他们也去过越南受降的，那时他们的"帝国范"在哪？帝国的荣耀在哪？

不用各位说，我也知道，思想要有时代性。今天的思想当然不能和 60 年前一样。志愿军看不惯今天的现实，看不惯这个 bbs 上帝国主义者享用"我的祖国"带来的面子，也不等于志愿军不拿他们当同胞。但是，就算放在今天，帝国主义思想，阶层固化的自辩就合适么？前几天我倒是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链接如下
http://www.talkcc.com/thread/3151428

当前阶段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支持 TG 的领导
写这个帖子是源于一个回帖链接出处，那个回帖越写越长超出了应回的范围，但却意犹未尽。本想写个主贴，怕被人骂五毛，犹豫再三。今天见有人宝推了，信心倍增，决定把观点写出来，算是抛个砖，希望能收点玉回来。

很多人认为 tg 现在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持统治，我想那是低估了 tg 的集体智商。因为 tg 现在既不是独裁又不是家天下，这个判断缺乏动机。

我认为现在 tg 正在做的，是试图创造出一个能解决问题，并能随着时代变化做出适应性变革的全新的体制。

闲话少叙，说说 tg 这个正在进行创新的体制的优缺点，尽量简短截说，免得被人当成八股文不去细看。

先说优点：

第一个，是集体领导。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加上权力互相制衡，不容易出错。这个好理解，就不赘述。

第二个，是一党执政。

这个肯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一是因为这能够消除多党之间的推诿扯皮，使得各种问题有个明确的责任主体。通俗的说就是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行和你不干谁干。二是因为这有助于破除阻碍，锐意改革创新，并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国策的实施。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众议院共和党获胜，扬言

要搁置医改；日本小泉当政时为了推动邮政民营化改革闹的不亦乐乎。而这些跟中国的正在进行的改革相比只不过是小儿科，要把 tg 现在干的这些事儿放到他们那儿肯定歇菜。

第三个，是先进的理论。

Tg 理论太多，目前还没抓住重点，相信将来会去芜存真的。我觉得重点是“为人民服务”和“公仆论”。前者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后者是一切行动的纲领。

第四个，是对体制有不断完善的动力。

西方体制自有一套消解民怨的办法，而 tg 体制没有，只能死扛民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体制，而且也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认为普选和多党轮替那其实是一种消除民怨的狡猾的手段，是赵本山手中的拐棍，还是让智商高如范伟者来用吧。

第五个，是税收外的巨额收入。

这个主要是国企利润和土地收入。现在很多国家的全民福利都有点因为缺钱搞不下去的趋势，我看将来只有削减福利这一招了，没了福利，社会动荡神码的不会再是浮云了。中国现在正在为实行全民福利进行各项改革，加上老龄化的忧虑，资金的缺乏是必然的，仅仅靠延长退休年龄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巨额的税收外收入，应该也能够引导到解决实施全民福利的资金缺口上来。所以，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要好好把握这个尺度，并不是民进国退就一定好。

再来说缺点：

第一个，是舆论控制。

因为在很多多人眼里，tg 被妖魔化了，而西方绵竹挚友那一套又被神话了。Tg 现在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也没有先例说服大家，只有打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大旗，来控制舆论，不然被颜色了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现在只有把这个体制创新搞到底，搞成功，大家看到了新体制的优越性，也就没有舆论控制的必要了。当然如果这个创新的体制最终失败了，再把西方那一套成熟的办法拿来用也不晚。

其实在 tg 的四个原则里面，只有坚持 tg 领导才是底线，其他都是浮云，包括名称。如果大家能够尽早认可这个底线，放手让 tg 去搞体制创新，舆论其实现在就不用控制。tg 正在进行的体制创新，最需要的就是舆论监督，tg 事实上已经放开了在政府问题和社会问题层面的舆论控制，南方系媒体和网络言论已经在很卖力的监督政府了。

为了尽早放开舆论控制，我带头喊个口号：当前阶段我们应该旗帜鲜明的支持 TG 的领导！不是标题党哈~

第二个，是腐败。
这个并不是现有体制的必然，这个有新加坡的正面例子和印度等的反面例子证明了。在改革现有体制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大力度整治腐败，而且在舆论监督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第三个，是官僚体制。

这个是一定要精简的，政出多门和人浮于事的现象还是很多的。政府要把钱省下来给老百姓搞福利。

除了以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不过都是这个体制可以兼容的，是这个体制尚不成熟的表现，是可以解决的。演化出一套成熟的高层领导的产生机制是这个体制成败的关键，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最后说说意义：

如果 tg 体制创新成功，意义也是很大的。往大了说，给世界人民提供一个更好至少是另一种的选择，并为此树立一个成功和可以效仿的先例。其他国家学全有点悬，学点精髓应该可以。往小了说，一个更高效更团结的中华民族是可以预期的，找回一下昔日荣光应该不难。

而对于广大酱油党更是好消息，平日终于可以安心的打酱油了，只在路见不平的时候一声吼，该骂 tg 骂 tg 就行了。（节选）

内容大家自己去看，总之作者在赞美眼前的社会，赞美今天的共产党经营的好，思想进步，是世界典范，将来可为普世价值。暂且不说民族主义当普世价值荒谬不荒谬，我直接反问了作者。链接如下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152257
切记 共产党不需要你反对，但也绝不需要你支持
标题里的劝告，切记 切记

我见过好多例子，大部分民族主义和大棋党都是国保大队上门之后才悟出这个道理的，到时候大家面子都不好看。不信楼主你上街宣讲这套道理试试。

ps 为啥我需要翻墙来看楼主这套言论呢？

统治集团需要的是平民精英滚出政治，平民要么作为乌合之众来参与政治——其实说聆听政治更合适；要么去爬一个大多数情况下被假定没有玻璃天花板的阶梯，爬 30 年再在另一个立场上谈政治。

许多当年第一代民族主义的头领，现在表现自己政治的参与感，主要方式是向新加入游行队伍的小姑娘炫耀“老子每逢 918，要去吃公安局买单的宴席呢”，淫荡一点的还会说，晚上找小姐都是政府买单呢。

这就是他们的参与方式。

除了以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不过都是这个体制可以兼容的，是这个体制尚不成熟的表现，是可以解决的。演化出一套成熟的高层领导的产生机制是这个体制成败的关键，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我比楼主还乐观，我认为贵族寡头制已经很成熟了。只是与我何干？

这个并不是现有体制的必然，这个有新加坡的正面例子和印度等的反面例子证明了。在改革现有体制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大力度整治腐败，而且在舆论监督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你是在说淡马锡么？

我问的是：你要旗帜鲜明的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很好，你敢上街讲这一番道理么？共产党允许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在一个主站被屏蔽的网站上才能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有几位兄弟不服，我在那个帖子里宣布，任何人如果能把楼主的言论发在国内合法报刊上，我双倍报销版面费。这笔钱我都准备好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没人来领这个版面费。

类似的，那些认定阶层辩护合理的兄弟们，认定中国要搞帝国主义的兄弟们，认定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必须靠太子党或者职业官僚执政，认定中国不需要民主选举的兄弟们。我的承诺继续有效，如果你能把这些 bbs 上的言论，比如说共产党不受民主牵制的集体领导好，比如说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阶层固化合理，比如说中国要搞帝国主义，必须扔掉社会主义的皮云云，这些言论如果能像在西西河上一样，原封不动地发在国内（当然限大陆）合法报刊上，俺也一样出版面费。

估计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刁难人么？谁不知道宣传的事情和实际的事情不一样？

对了，为啥宣传的事情和实际的事情不一样？是怕外交问题么？怕外国人说我们扩张？须知外交上的事情不是靠嘴说的。嘴说了人家也不信。美国信誓旦旦说不图谋进攻中国，但是打到了鸭绿江边，东北工业基地边上，志愿军就必须去朝鲜打仗。可见大国之间，从来不在乎别国是否叫嚣着要威胁自己，只在乎对方是否有能力威胁自己。所以国内的报刊不登帝国主义言论，不公开说太子党和技术官僚专政好，不是因为外国人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政权还披着共产主义的皮，装着社会主义的相，所以不能赤裸裸的谈阶层固化，谈帝国主义。但这个相是装给谁的呢？为啥谈帝国主义，谈少数人统治必要性的说法不够“政治正确”呢？ 很显然，是装给普通人看的。在此慷慨激昂帝国荣耀的小资们啊，共产党这个官僚大资本统治集团还是要沉稳的多，他们知道你们这套磕拿出去给老百姓听，要出大乱子的，所以不给你们上报纸的机会。各位要理解，要感激，要旗帜鲜明的支持党的决策，继续在这个主站被封的西西河上表达对现有社会的赞美吧。帝国的荣耀必须藏在党的夹袋里。

当然了，我认识的几个兄弟就对我说过。你这样说以为你就赢了？你这无非是拿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外国也这样，现实一点好不好？

没错，美国也这样，英国更是这样，说一套，做一套。精英专政，资本独裁，配上一个民主选举的壳。精英们在小圈子里讨论统治经验，顺便叫几个小资来出谋划策当参谋，人民只不过是在私营媒体和选举机器下的一个合法性工具。这就是西方政治的实际情况。

但是，我中国果真要和美国比烂么？美国是 3 亿人口，用金融+军事+技术优势吸纳了国外近 10 亿人口的资源，才能在统治集团吃饱喝足的同时维持 3 亿中产。我们重建一个美国，谁来当中产？谁当殖民地？13 亿人都能过好日子？

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就是要比烂，在比烂中营造我们的帝国——同时不告诉老百姓这个帝国的实质，依然用人大代表制，用社会主义宪法和共产党的名字来获取政治正确性，来应付老百姓的民意。我不得不问一句，你们都这么想了，还凭啥说你和 13 亿老百姓是同一个祖国啊？凭啥说你的民族主义是给所有人的福祉啊？

我记得这场争论的开始，是因为马前卒质疑陈经的祖国是不是所有人的祖国。现在绕个圈子回来，原来是一群自认智商高的小资在谈民族主义，谈帝国，谈阶层，而且不打算和老百姓开诚布公的谈这些问题，只能被党憋在一个主站被封锁的 bbs 上谈这些问题。这样的玩法，能怪马前卒不识时务？

不管你咋说马前卒拿大帽子压人，我还是要说，宪法第一条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我之所以批判这个社会，之所以批判一个日趋封闭的执政集团，之所以在帝国之路蒸蒸日上的时候说怪话，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毛主席带着人民建立的国家，爱这个宪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看不得这个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更看不得它遮遮掩掩地走向帝国主义。我有责任，有义务，有主动意愿和一切违宪行为和言论战斗。不管这些行为和言论来自哪个集团或是哪个网站。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将来还可能领导世界走向新时代。这样的国家不该比烂，不该自甘堕落，不该走帝国主义的老路。我认为，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不该是太子党和技术官僚的贵族共和集团，不该是阶层固化的受益者，不该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共产党。我是如此的看得起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所以愿意掏出宪法和党章来看，拿这个批判社会。诸位，你们是否也看得上这个国家，这个党呢？是否认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应该配得上宪法和党章呢？

我觉得吧，作人，做中国人，还是应该格调高一点的。

说了这么多不讨人喜欢的话，我也有自知自明，不指望能得到多少鲜花和掌声。我也知道，在帝国主义的上升期谈这些话，本身就是自讨没趣。但是，总要有人坚守原则，总要有人说实话——哪怕不好听。共产主义者和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

人，颇有些人耐不住寂寞，大谈民族主义，大唱帝国赞歌，为太子党当前驱走狗，比如张宏良。我呢，没有那个能耐，但坐得起冷板凳，不怕被人叫乌鸦嘴。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千万无产阶级去填壕沟之前，也有不少乌鸦嘴。当然了，哪个时代也不缺帝国主义者，今天也有人为帝国主义战争唱赞歌。
【原创】没有帝国，何来祖国（一） [德斯蒙] 于:2011-01-29 06:17:51 主题帖
一次大战时各国工人（那时候可是总动员+义务兵役制，工人是军队的主要来源）在壕沟里为了本国的生存空间浴血奋战，互相之间杀得天昏地暗；就算苏联成立后，俄罗斯无产阶级和波兰无产阶级、芬兰无产阶级、德国无产阶级、日本无产阶级之间也完全没有友谊可言。血的事实表明，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就被吃的连渣也不剩了。

当时的无产阶级更是在社民党（当时的左派 当时的张宏良）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走向大屠杀，直到 1917 年，列宁才出面收拾这个屠杀场。列宁要是当初也跟着社民党图个热闹，1917 年他还有资格说革命么？

这几天也有人劝我，说你马前卒这个 id 好歹在各个 bbs 都脸熟了，何必当个网络板砖手，和人飞砖吵架？这个，我谢谢各位好意。我马前卒之所以 10 年来写文章略有人看，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 bbs 上摸爬滚打，学习长进。没有 bbs 灌水吵架，我马前卒啥也不是。所以我必须继续这种生活，拍人也被拍，在经验教训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至于我今天在这里惹大伙不高兴，我绝不指望你说我好，也不指望你将来说我好。打了这么多字，只要过个几十年，有个人说，："当年有个马前卒，不会说话，很惹人烦，到现在我也认为他是个混蛋。但是，他的某些看法现在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这个乌鸦嘴当的就很有意义。

最后，总结一下，马前卒在前面啰嗦了几千字，无非就是提了几个问题。

1 为啥马前卒在陈经的贺岁贴里转他自己的发言，被大伙认定别有居心？让大伙很不痛快？

2 帝国主义者觉得朗朗弹奏的"我的祖国"很有面子。但你们这些有面子的言论敢拿给当年的志愿军看么？说你们是不是为此而战？

3 为啥各位必须在一个经常被封的网站上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党？支持这个社会？支持帝国主义道路？各位的和谐言论能上合法报刊么？为啥党报不这么说？

4 如果你认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合理，认定必须用政治正确的外套包住帝国主义，阶层固化的里子。认定这一套的确不能对老百姓明说，那么凭啥说你们和老百姓是一个祖国？

5 各位对宪法和党章怎么看？打算用这个东西去评价党和国家么？

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能想到两个常见通行的反驳方案——不和马前卒这个乌鸦嘴

讲逻辑，用事实砸倒你。比如说，有人会说，前 30 年讲阶级斗争，讲共产主义，为啥过的不如讲得少的后 30 年？

关于这个问题，我懒得再把工业积累，国际形势，工业社会发展规律那些废话翻来覆去的说了。说了七八年，连帝国主义者，连张宏良和本 bbs 的极右派都用上这些话了。我这里换个说法，先贴一段数字：
1952 0.360617
1953 0.363358
1954 0.362261
1955 0.363264
1956 0.366365
1957 0.36767
1958 0.403067
1959 0.389439
1960 0.390895
1961 0.388557
1962 0.385021
1963 0.385127
1964 0.393424
1965 0.395241
1966 0.399842
1967 0.403494
1968 0.406384
1969 0.411858
1970 0.414883
1971 0.417933
1972 0.411278
1973 0.410846
1974 0.411286
1975 0.412984
1976 0.414375
1977 0.414608
1978 0.417125
1979 0.420578
1980 0.429168
1981 0.436935
1982 0.44558
1983 0.4508
1984 0.461847
1985 0.471162
1986 0.477011
1987 0.482919
1988 0.489381
1989 0.490923

1990 0.566319
1991 0.56544
1992 0.564577
1993 0.5637
1994 0.562829
1995 0.561959
1996 0.563368
1997 0.564768
1998 0.566179
1999 0.567583
2000 0.568749
2001 0.572175
2002 0.574062
2003 0.575979
2004 0.578515
前面是年份，后面是全国的劳动力/总人口。1990 年，统计口径略有变化，所以后面的数字要略修正，但总体上是不差的。2010 年，中国 8.3 亿劳动力，人口 13.7 亿。这个比例基本上是 0.605。

这个表说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 60 年来从 30 多增加到 70 多，大部分人有机会当 40 年劳动力，所以劳动力比率不断上升。但是前 30 年增加慢，后 30 年增加快。

建国前 30 年，比起解放前，出生率缓慢下降，但死亡率下降更快，尤其是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快。所以人口暴增，但增加的大多是没到劳动年龄的青少年。所以劳动力比率增加缓慢。我们的父辈因此拥有最多的兄弟姐妹，比上一代多，比下一代也多。等到我们的父辈参加工作，中国的劳动力比率就开始迅速上升。同时出现的还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于是在劳动力数量急剧上升的同时，被供养的子女却少的多。所以劳动力比率急剧升高，在我们的父辈开始大批退休之前会一直升高——目前看来顶峰多半就是 2010 年 的 0.6。这就是 30 年来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吃到了上一代人的人口红利，同时通过计划生育，通过过度严厉的计划生育预支了下一代人的人口红利。这就是俺对事实的回答。还略有新意吧。

30 年来的高速增长，帝国之路的光辉灿烂，随着还欠账时代的到来，已经逐渐显现了。欢呼的同时，我们最好要为将来多打算一下。毕竟，殷鉴不远，一个个帝国主义衰落的标本就在眼前。甚至马上美国就要用自己展示帝国主义衰落的悲剧。我们中国一定要走进这条路么？中国手握世界第一的工业实力，难道没有点更上层次的想法？

算了，要过年了，不说那么多了。鲁迅都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马上要过年了，马前卒也就说这么多讨人嫌的话。马上要吃年夜饭了，我这里贴一个链接，算是全文的真正结尾吧：
http://www.talkcc.com/article/3242022

我可以为国家祝酒，但不是谁举杯我都给面子的
2010 年是个大坎

80 年代吃老本的狂欢 90 年代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这 20 年的脏屁股终于有人擦了。

事实证明，中国才是冷战的胜利者，中国站在哪一边，冷战的天平就倒向哪一侧。50 年代中国在苏联支持下在朝鲜顶住美国，70 年代中国支持越南打疼美帝，80 年代，美国打破原则，让西方资本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不能随便进驻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90 年代，死掉的苏联向中国贱卖最后一份冷战红利。一脉相承的冷战三角战略最终打造了美苏之后第三个超级大国。世界第一发电量，和美国打平的卫星发射能力，中程反导和战斗机发展之路终于看到了美国的尾灯，这都是实打实的东西，毋庸置疑。

甚至百姓也不是没有获利。最直观的说，中国人吃肉的数量已经在人均上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医疗、教育尽管 90 年代有个自残式的发展，也超过了世界一般水准。这的确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

但是，奇迹的支撑者是普通人，70 年代-2010 年，30 多年，正好是一代劳动力成长到衰老的时间。之前，中国经历了一个成年子女最多的时代（因为能养活），然后是一个子女最少的时代。这个时代之前，中国拿退休金的老人寥寥无几，这个时代之后，人均寿命和职工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拿养老金的人=工作的人。

这意味着我们刚经历过的一代人时间，是中国自古以来供养比最有利的年代。空前，而且可能绝后。人是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90 年代的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摄像手机，否则武警支队和工人民兵师大战的场面，要比伊拉克战争火爆的多。直到 03 年，我女友在苏州高新区的医院上班，矽肺病工人也是连续不断的送进来。这都是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所以，大家不满的是普通人创造的财富，被豪强切走太多，而且还得意洋洋地赞美这个瓜分盛宴。

我们可以爱这个国家，但首先要保证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如果有人为豪强，为太子党，为房产商叫好，说这个国家首先是他们的，工人农民要为此牺牲。不论他是张宏良还是陈经，我都可以确定，他所赞美的那个东西，我们要提上三分警惕。我们可以在春节宴席上为这个国家祝酒，但陈经和张宏良先举杯的时候，我宁可把酒倒掉，等朋友来了再满一杯。
祝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
祝中国秉公义，行正道，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骄傲与榜样！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 CCTV 的狗血连续剧

5/4/2011

少年中国评论编者按

数日前，本站在一篇转载文章的按语中严肃且明确地表明了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就必须坚决批判改良主义和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左派只有把自己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清理，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其过程可能会伴随诸多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本文作为反民族主义系列文章第二篇，对当代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剖析。为了彻底揭示左派民族主义的反动内核，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章前半部分加以大量铺叙，并从历史角度分别阐述了"落魄贵族"的历史特征，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要点，左派运动的形势及历史任务等。文章略长，但我们希望所有追求真理的同志都能认真读完全文，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

作者：马前卒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 163 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 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 21 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 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 GDP 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 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 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 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 19 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

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 16 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 200 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

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 911 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
“（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 1988 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

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 50 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 60 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_ 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

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

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 1976 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 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 世纪 90 年代到了。92 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 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

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 10 多年，到了 90 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 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 20 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 20 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 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 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 1000 多块。作为这 1000 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 30 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

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 20 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 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 1991 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 500 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的来者不拒。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

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 年-2002 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该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 年大使馆被炸，2001 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 11（国产 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 59 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 80 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 20 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 10 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 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 10 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 10 年，意识到自己的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 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 2005 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 90 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 90 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

脏的比烂游戏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 10 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的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 90 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 90 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

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 80 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 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 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 21 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 tmd 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谈。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是很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 10 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

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 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 21 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 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

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的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处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 QQ 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的社会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 年代末、21 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进民退”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 7000 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 2000 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 90 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 36 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 bbs，所有文章都必须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1101/206873.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372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3/218474.html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884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76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30841.html
去理论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105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2/214886.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3/22221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548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4612.html
体制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5/231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647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09/50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3/2244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6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9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2730.html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

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说国家不说阶级，只说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曾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 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 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 21 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 20 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 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 21 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 8 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 2009 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 13 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

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 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味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向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 100 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 100 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

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
“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 30 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 1975 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

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错，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明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 10 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 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血统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血统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 CCTV 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 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 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的值；
CCTV 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 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 10 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 CCTV 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

狂奔马前卒

（背景）何为工业党

作者：卢南峰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吴　靖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东方学刊》“政治”栏目文章之一
【编辑组按】《东方学刊》是张维为、范勇鹏主编的复旦中国研究院刊物，主要立场为国家主义

【内容摘要】“工业党”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代表一股成分驳 杂的社会思潮，其主张是用工业化程度和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工业党”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历史认知与政治想象的一个抓手，也是进入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光谱、理解实践中的公共领域动态的一个入口。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工业党”群体及其思潮与宏观社会结构变革相结合，并对这一社会思潮进行政治分析，论证 21 世纪初“工业党”思潮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下简称 80 年代）和 90 年代问题的同时回应，完成了 80 年代宏大叙事与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并在 90 年代后“去政治化”的氛围中召回了宏大叙事。而这些知识体系的搭建和知识生产与共识达成的活动，基本上是在民间性质的言论平台上完成的，代表了中国社会政治阶层生成的一种现实模式。

关键词：工业党；网络民族主义；观察者网；自干五；现代化叙事

一、谁是“工业党”？

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将“中国制造”的“缺芯”困境戏剧性地砸在中国公众和知识群体面前。网民或批判中国公司不遵守国际规则招致恶果，或反思中国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发展滞后，或警惕冷战对抗逻辑重新主导世界，或庆幸美国当头一棒倒逼中国自主研发。在话语纷扰中，一支将工业化知识背景和科学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立场相结合的网络话语力量异军突起，主导了围绕这一议题的公共讨论。

正如近来舆论场上的讨论所反映出来的，人们最大程度地摆脱了那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政治哲学“大词”的折磨，也最大程度地排除了那些故弄玄虚、自说自话的经济理论模型的干扰，既然核心问题是芯片和科技，那么即使涉及中美关系这个庞杂问题，也同样可以运用科学的思维、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理解问题、讨论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文扬：《也许这是一场及时爆发的技术战争》，观察者网
http://m.guancha.cn/WenYang/2018_04_24_454658.shtml？from=singlemessage，2018-04-24.]

这支话语力量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有时被称为“工业党”。根据目前可考的文本，这一命名最早出自王小东 2011 年的文章《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在这篇文章中，“工业党”是区别于“情怀党”的群体和思潮，前者思维方式偏向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后者则类似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纯粹文人，文章将当前中国主流知识界的左右两派都归为“情怀党”。“工业党”信奉生产力与技术至上，认为工业化的价值超越政党、政权的更替、政治制度与一时的文化思潮。[王小东：《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载《绿叶》，2011 年第 1 期.]

但作为一种立场、逻辑和话语策略的“工业党”并非近两年横空出世，它有着十余年的发展脉络。“工业党”思潮大致萌芽于 21 世纪初的军史时政类 BBS，当时一批具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反自由派言论的大旗下。然而，网络民族主义的人员构成十分驳杂，除了爱国的基本共识，“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立起什么东西”（访谈记录 J20180407），缺乏共同的思想支撑与行动目标。在这种“没有什么凝聚点”（访谈记录 J20180407）的状态中，“工业党”初具雏形的思想体系开始浮出水面，其核心是用理工科的科学精神和工程思维改造所谓的“文科”知识，以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历史叙事和国家发展路径的讨论中。其萌芽的标志性事件是 2004 年底到 2005 年初论坛上的意见领袖钟庆与陈经关于中国工业化路径的长篇网络论战。后来钟庆一方将论战文稿结集成书，于 2005 年出版了“工业党”早期的重要出版物《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批“民间青年学者”聚集于网络空间的边缘地带阐发其对政治经济的看法，在沟通交流中达成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国家发展路径的基本共识，并组织起最初的成员与受众。

另一个对早期“工业党”思潮形成至关重要的载体是网络穿越小说。当时各大军史时政 BBS 大都辟有专门的“穿越版”或“架空版”供网友挥洒政治军事想象，通过想象创作弥补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缺憾。最为著名的“工业党”小说《临高启明》起源于 2006 年音速论坛的军事架空版上的讨论。相较于一般男性向“爽文”，“工业党”小说极其强调技术与工程细节，不厌其烦地论证现实可操作性，展现从无到有建立大工业生产的具体步骤，《临高启明》就由于这种现实可操作性而被誉为“穿越说明书”。

2008 年后，网络民族主义迎来了一波高潮。2008 年 4 月前后，Anti-CNN 网站成立，后更名为四月网，成为反击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民间阵地。但四月网同样面临“没有什么凝聚点”的问题，它的早期人气随着西方媒体报道回归正常而遭遇困境，内部又面临严重的经营问题，最终走向了分裂。[曾鸣：《四月的“叛徒”：一家“正面民族主义网站”的成立与分裂》，载《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96821，2013-12-19.]2012 年观察者网继之而起，较之四月网的理念依附性，观察者网则致力于打造理念自主性，资方与管理层尝试打造一套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中国立场”话语解释“中国模式”。而随着“马前卒”等“工业党”进入观察者网，观察者网在一些“工业党”代表人物眼里成为“第一个明确的‘工业党’思维为主的网络宣传阵地，对‘工业党’名称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访谈记录 K20180407）。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工业党”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倾向而不是具有实体的组织，观察者网也不是

纯粹的“工业党”的“大本营”。“工业党”话语只是“思想与资本的合作关系”。（访谈记录 J20180407）

同样在 2012 年，“马前卒”等 4 位 80 后[80 后又称八零后，“80 后”一词来源于国际社会学家们讨论社会发展一代名词。社会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 10 年分成一个阶段加以研究，80 后就是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人群，有时也泛指出生于 1970 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年轻一代。70 后，90 后如上.]合著出版了《大目标：文明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尽管后来“马前卒”在知乎问答中直言“我不是工业党”，[参见究竟什么是工业党？有自认为是工业党人的权威定义吗？ — 马前卒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90959/answer/34954146.]但这本书仍被视作 80 后“工业党”的“宣言”，其核心主张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随着互联网从门户网站向社交网络发展，2011 年，网络民族主义群体从 BBS 和门户网站转战社交网络，微博上“自干五”[“自干五”，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指那些自觉自愿为社会正能量点赞、为中国发展鼓劲的网民.] 群体兴起，“公知”的污名化开始。“工业党”代表人物逐渐成为微博和知乎等社交网络上的大 V，源源不断地进行知识和话语的输出。值得注意的是，知乎社区并未形成如观察者网般明确的“工业党”思潮，但从其宏观趋向上仍能看出“工业党”思想的倾向，诸如国际知识精英强烈的中国认同、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自由派话语的免疫、对中国工业化建设经验和实用主义施政经验的认同、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态度等。[卢南峰 ，许诺 ， 吴靖：《辨析“川普粉”现象—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中国知识青年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69-77 页.]这些基本立场的相似性，为“工业党”思维在知乎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正如“工业党”早期论战所揭示的，“工业党”内部存在不同的支流，为了行文叙述的方便，这里将他们粗略地分为三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基干工业的“基干工业党”，支持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强力促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工业党”，由于迷恋军事技术装备而支持大工业发展的“军宅工业党”。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工业党”自己认可的分类方式，各个支流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这里仅仅是提示读者注意“工业党”内部不同叙事之间的张力，并勾勒“工业党”内部人员构成的大致轮廓。

“工业党”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群体，他们的思想体系也存在诸多内在张力和不确定性，只不过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倡导工业强国、科技强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刷盘子》《大目标》为代表的“基干工业党”为例，他们的思想主张可大致概括为：坚持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水准决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理念。在经济上主张重工业优先、国有化、计划经济、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反金融资本主义，批判自由市场；政治上偏好集中高效的体制，认可政治服务于生产力；文化上强调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贬低农业文明和小农思维，反“情怀党”与“文艺腔”；在国际秩序上，坚持反帝国主义，展望中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未来，主张中国向第三世界输出工业化而非工业制成品。

若是跳出当代网络现象，我们就能发现“工业党”这一能指有着更加广泛的所指。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理论的根本前提，从工业社会早期开始，工业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两者与“工业党”网络思潮有着很强的联系。早在 19 世纪初期，昂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 Simon）开始不定期出版《工业》杂志，促使“工业主义”一词的流行，并提出未来社会的治理者将是工程师和企业家，[丹尼尔·贝尔，高铦：《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1 页.]这一学说可被视为“技术专家治国论”之滥觞。而在实践层面上，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曾爆发著名的“沙赫特案件”与“工业党事件”，就是为了清算当时苏联工业部门风行的“技术专家治国”思想。[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工程师政治地位的呼声也随之兴起，乃至强调科学技术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加重要。1928 年“沙赫特案件”审判了一批技术厂长，该案被定性为反革命经济事件。为了进一步清除工业部门的“沙赫特分子”，1930 年又爆发了“工业党事件”，八名技术权威和经济管理部门要员被判刑，“工业党” 和“现代技术专家治国论”得到彻底的清算。可参见樊玉红 ，万长松：《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专家治国运动”研究》，载《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第 343-348 页.]20 世纪 60 年代，赫鲁晓夫曾对苏共党组织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党自上而下一分为二划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其目的是使苏联共产党更加高效地领导工业和农业，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结果反而给苏联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多混乱和问题。[1962 年 11 月，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对苏共的组织领导和结构进行一次重大改组，根据生产原则自上而下地成立两个党组织，即工业党和农业党，其目的是使党更加具体地领导工业和农业，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然而，这一人为割断工农生产的领 导结构的改革却给苏联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严重的混乱和很多问题。这一改革持续了两年，直到 1964 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废止。可参见俞良早：《东方社会主义行进中：共产党执政与党的建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0-152 页.]这些历史片段都与“工业党”思想有着谱系学意义上的联系。在当代中国网络“工业党”的构想中，修铁路开工厂的阎锡山、东非接受工业化输出的坦桑尼亚政府，都可归为“半吊子工业党”“准工业党”。[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28 页。]“工业党”思潮提供了一个样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民族主义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理论的民间表达。

综上所述，可以给“工业党”下一个临时定义：“工业党”并不具有正式的组织形态，而是 21 世纪初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和一股成分驳杂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主张用工业化程度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工业党”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广义的“工业党”还泛指带有“技术专家治国” 和工业主义色彩的各类思潮，也指各国支持和实践工业化的技术工程人员、政党和政治力量。

“工业党”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基本与中国互联网新媒介的社会使用史相重叠，为我们观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一思潮背

后的意见领袖群体多为70后、80后男性理工科知识精英，这两代人的成长生活经历与80年代、90年代宏观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相映照。由此，"工业党"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历史认知与政治想象的一个抓手，也是进入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光谱，理解实践中的公共领域动态的一个入口。我们希望通过梳理"工业党"政治理念聚焦的过程与他们发表政治理念的渠道、方式、媒介平台与互动形态，去管窥中国政治公共领域动态和中国具有主体性的政治群体的形成方式及其历史社会意涵。

二、历史转折中的"工业党"

"工业党"代表人物群体出生前后，共和国经历了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思潮和政治思考都很关注的核心关切之一。[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版，第3-49页，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 历史含义》，《开放时代》， 2013年第5期，第183-193页。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_s.shtml， 2014-08-02.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习近平执政初期就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的讲话并非无的放矢，他所要回应的正是讲话中指出的两种思想倾向，即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但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媒体保持"不争论"的默契中，回避这一分歧。21世纪后，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暗流涌动的民间舆论开始倒逼执政者处理这一基本问题。在官方表态之前，民间尤其是知识群体已经开始利用政治修辞试图抹平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毛泽东的110周年诞辰（2003）和 120 周年诞辰（2013）、邓小平的 100 周年诞辰（2004）和 110 周年诞辰（2014）几个时间节点上，重新审视和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留下的遗产成为知识群体的一大风潮.]以邓小平时代为中介进入"工业党"生活现实的毛泽东时代成为其理论、经验与蓝图不断萌生的土壤。而"工业党"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成长并接受教育，"马前卒"将80后视作"第一代生在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并认为"这个时代特征对我们个人观点有很重要的影响"。[《工业体系建设决定我们的历史和未来》，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MaPing/2012_08_20_92038shtml.]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观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工业党"这一代人认知结构形成的现实环境，更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现实构成了其最主要的问题来源。由此，我们需要将"工业党"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进行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意义上的接合（articulation），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一） "文化热"与知识的人文化

“工业党”代表人物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在观念史意义上的“父辈”是所谓的“80年代人”。 在中国，80年代往往被认为是“文化的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思想限制也随之放开，在国家对社会放权所释放的言论空间中开始形成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话语体系。日后被“工业党”所贬斥的“情怀党”或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

80年代中期，知识界逐渐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框架中走出来，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和传统与现代冲突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被甘阳概括为“古今中西之争”，而在当时的甘阳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中华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35 页.]换言之，甘阳认为，“中西之争”是被夸大的，“古今之争”才是根本。李泽厚认为，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接续了并创造性地转换了“五四”运动的传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 100-101 页.]80年代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渴望现代化，在此语境中，“五四”的核心内涵转变为现代化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全盘西化”论滥觞的年代。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将中西文化比较作为求索现代化的知识路径，而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而言，中苏关系仍未正常化，且苏联泥足深陷，处于劣势，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现代化的样板。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国人不免产生“西方崇拜”的思想倾向。同时期的中国也经历了从“文学时代”到“电视时代” 的转型，[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2页.]“文化热”中的精英们也开始借助这一媒介进行“启蒙”大众的事业，而“西化论”的巅峰之一是 1988 年央视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这部片子以激进的姿态和诗化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机制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呼唤西方式的民主与法制，引发全国性的轰动，也预示了80年代“文化热”的最终收场。

这一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生产了繁复的话语，贺桂梅认为，80年代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能指的剩余”般的话语涌流。[贺桂梅：《1980 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上)》，载《励耘学刊 (文学卷)》，2008年第1期，第 210-226 页.]当时知识分子结成各类知识团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以李泽厚、汤一介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汇聚国学精英，旨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出发做东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译介20世纪西方主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将原为系统与工程学知识的“三论”包装***知识用作历史比较研究，鲜活地展现了当时知识的人文化风潮。同样的人文热潮也出现在文学、美术和电影等领域。而这些话语在后来恰恰被“工业党”认为是低效乃至无用的。

80年代是“工业党”父辈的年代，如果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庸俗化理解，80年代繁复的人文话语和对西方的崇拜日后将成为后一代年轻人批判、拆解和

重构的对象。

（二）市场化大潮与宏大叙事的退场

随着 “文化 80 年代”风流云散，知识分子迎来了“市场的年代”，面临与 80 年代截然不同的挑战。在许纪霖看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公共性的丧失，知识分子进入现代学院的知识体制，成为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专家，受到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主宰；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并趋于多元化与发散化，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传媒与演艺圈中的明星成为中心；最后，知识分子还面临理论上的致命挑战，即“后现代”崛起消解了宏大叙事，在理论意义上宣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死亡。[许纪霖：《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之六》，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097. html.]

公共知识分子暂时退场了，他们将在 21 世纪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回归，而 90 年代成为了技术专家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理性的主场，知识开始了“去人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符合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迅速增值，下海经商也在知识分子中成为热潮。经济专家开始取代人文知识分子占据舞台的中心。

随着“经济”成为知识界的中心议题，社会观念中的工具理性也强势崛起，在毛泽东时代和 80 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道德与理想黯然失色。“工业党”以“情怀党”为论敌，而后者正是 80 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苗裔。“工业党”吸收其成长于其间的 90 年代的精神特质，彻底摒弃了 80 年代生产的繁复的人文知识话语，高度强调专业性。“两个人辩论高铁问题，一个能说出标准轮距，能说出区分客运专线铁路和货运铁路的道理，而另一个不能，前者就赢了一半。”（访谈记录 A20180316）90 年代是“工业党”的工具理性思维和贬斥人文知识倾向的起始年代。

随着 90 年代的展开，伴随着国企改制、金融资本崛起、消费主义兴起、社会阶层分化等大趋势和大变革，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工业党”的个人成长史相交叠。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在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比如俄罗斯经历“休克疗法”后的寡头统治、激进的国企改制造成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的凋敝和严重的社会失序。缺乏战略思维的工具理性并不能餍足“工业党”这一世代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 由此，“工业党”不同于 90 年代放弃了公共性而进入学院体制的专家，他们继承了 80 年代的宏大叙事，在“草莽”之间仍然关心国家与社会的走向。“工业党”思潮在 21 世纪初同时回应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问题，完成了 80 年代宏大叙事与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

（三）两套工业化方案的分歧

在 2004 年底至 2005 年初“工业党”思潮萌芽阶段，军史 BBS 意见领袖钟庆和陈经曾就中国工业化路径的选择爆发一场长篇论战。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即认可工业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但双方却对工业化路径有着不同的选择。概言之，钟庆偏好毛泽东时代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国家

和企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忍受巨大的艰辛积累基干工业和技术。钟庆大力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劳动密集产业，瓦解了本国相对幼稚的重工业体系和技术力。而陈经则不排斥利用外资发展技术、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以提升被长期压抑的居民消费水平，他批评钟庆对改革开放前经济路线的幻想过于完美，而对现实中国经济政策发展的预测过于悲观。陈经总体上认为，工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陈经与钟庆的不同主张后来演变为“工业党”的不同支流，这里姑且称之为“基干工业党”与“经济工业党”的分野。两者之间的龃龉实质上是共和国史上两个时代的非连续性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领导的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方案上的区别，更是价值取向和治国理念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工业化有其内在延续性，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尤其是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在“文革”时期，“四三方案”就已经开始了西方现成工业技术引进的预演。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非沦为全球市场的附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国防和民用两套工业体系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必须有所取舍。根据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择前者，而邓小平偏向后者。工业化方向的调整缘于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和国际基本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和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视基于当时严峻的冷战形势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进逼，而到中国先后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释放了中苏关系解冻的信号， 邓小平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而这一判断成为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三、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之后

明晰了以上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尝试对“工业党”话语进行政治分析。

2015 年，澎湃新闻的一篇思想周报敏锐地认识到“工业党”与中国近现代史主流叙事的异同。[辛東：《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国内思想周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4231.]该文认为，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流，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察和描述，即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基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而现代化叙事则勃兴在改革开放之后，着眼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器物、政制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如果借用这一框架对“工业党”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党”话语对几种叙事的杂糅与取舍。 “工业党”认同革命叙事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也认同彻底改造社会的剧烈革命，并能够接受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工业党”还吸收了革命叙事的话语体系，如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压迫等。 但是，“工业党”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弱化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个体改造

和制度改造部分的讨论，而更多强调工业化本身作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改造。
与 80 年代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叙事不同，基于社会主义前期的建设经验，“工业党”强调中国工业化路径与西方工业化的时代差异。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先进技术却不能完全依赖西方，更不能复制西方对外掠夺的工业化道路，他们高度认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工业党”将工业化与现代化叙事中的其他维度，如政治参与、思想解放与个人价值，放到比较从属的位置上，批判文人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有其客观发展规律，并不能按照“情怀党”的主观期待，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强调科学家和工程文化中实干兴邦、艰苦奋斗的传统。

此外，“工业党”接受了嵌入革命叙事的民族主义叙事，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倡导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民族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用革命叙事的外壳包裹了工业化与民族主义的双内核。

而这种叙事的取舍，尤其是对民族主义叙事的体认，影响了“工业党”话语斗争的现实策略。“工业党”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都存在龃龉，同时反对各种“情怀党”：怀着共产主义和工人国家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倡导向西方学习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公知”与“主流经济学家”， 此外还有倡导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脱不开民族主义的底色，所以他们与“工业党”能在民族复兴和工业化的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同时也都认为只有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能够达成这一大目标，所以常常共同阻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由派和西化派。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或许不认同工业化的价值，而对传统文化抱有浪漫化的想象，但至少强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所以尽管“工业党”对其没有什么认同感，却也不至于与其发生激烈的对抗。

如前所述，在消费主义开始扩张的 90 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业党”没有放弃对公共性与宏大叙事的追求。但是，要重构一套宏大叙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这批中国青年而言，摆在眼前有两套现成的叙事可供改造：第一是向外看，即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其主要意涵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第二是回头看，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方案。随着 90 年代的实践发展，他们已经能够看到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父辈”选择向外看，而他们选择回头向后看，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并非全盘接受，否则他们仅仅是邓小平时代的毛主义者，而不能成为“工业党”。

对于有志于重构共和国历史叙事的“工业党”而言，两个“三十年”的分歧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创造性地转换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都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价值根基所在，所以“工业党”不可能彻底抛弃。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核心问题，尽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核心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与邓小平两套治国方案的根本差异也落在生产关系上。

尽管不同的“工业党”派别对共和国历史各有偏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党”

摒除了在他们看来低效的共和国前期的社会理想。同时由于不认同 80 年代包含了政治进步和思想解放内容的现代化叙事，“工业党”也没有采用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一”[(1) 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 6 页.]这样缺乏直接可操作性的文化叙事来弥合两个时代的分歧。为了统合两个时代，他们接受了更加偏向工具理性与工程思维的、以生产力为核心问题的、与苏联模式在形式上相通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而淡化或回避了更加深刻地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并将前者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打通，最终统合进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工业党”同时接受并工具性地阐释两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将生产力置于核心中的核心地位，将“现代化”和“工业化”作为新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 重构了宏大叙事的路径，从而取消或者回避了两个“三十年”的分歧。

四、讨论：“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一）“工业党”与“小粉红”

王洪喆等人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大致划分为三波，第一波网络民族主义中的主体以 70 后大学生为主，对官方在国际关系重大事件（如印尼排华事件、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上的表现不满，以强国论坛、铁血社区等 BBS 为阵地介入社会议题批判现实。第二波当中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被称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除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外，还兼通网络与英文，能够直接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有着系统的、基于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而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培养的“小粉红”群体。[王洪喆 ， 李思闽 ， 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 界》，2016 年第 11 期，第 33-53 页.]

2016 年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关键性年份。这一年，“帝吧出征 Facebook”“赵薇事件”“奥运霍顿事件”“萨 德导弹事件”折射出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舆论动员能力，同时也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态转变，新媒介商业文化和中国崛起语境生产出来的“小粉红”登上公共舞台，与作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的“军迷”群体及“工业党”群体共同演进，各自发展。[同上.]

“小粉红”成为一种“去政治化”时代与“再政治化”渴望的奇特结合。但这种新媒介商业文化生产的民族意识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最为著名的就是“表情包大战”。而这种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演戏” 形式是在商业化的粉丝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缺乏明确表征的、具有凝聚性和共识性的政治内核，消解意义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叙事，而其所形成的舆论动员能力可以被各种力量利用与形塑。

雷蒙·阿隆对法国“五月风暴”的评价也可以挪用到这里：“日常的沉闷生活突然得到了发泄消遣的机会。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演戏，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们的热情。……而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册）》，杨祖功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679 页.]

虽然舞台上“半真半假”的“演戏”仍在继续，但这种“私密的反抗”的话语也正在遭受青年的质疑，部分人开始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扰：当 20 世纪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暂别历史后，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导向真实的社会变革？从 2008 年到 2016 年这一时段的事态来看，许多群体开始转向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再政治化”的渴望超越后现代，有了历久弥新的内涵。世界从后现代的反抗表演往回退了一步，回头处理未完成的现代政治议题。

作为“小粉红”“兄长”一辈的“工业党”受到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浸染，但与新媒介商业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再政治化”的渴望并不满足于空虚的表现形式，而试图寻找凝聚的内核，召回并生产宏大叙事。“工业党”如何与“小粉红”进行有建设性的社会互动和争论？在网络技术与市场机制不断制造“部落化”的时代，他们是走入“回音壁”式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强化，还是能够继续其跨媒体、跨领域的话语实践，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团结？这是值得我们持续观察的。

（二）召回宏大叙事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工具理性和专业主义到了 2008 年，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导致了某种历史感与超越性社会关怀匮乏的状态，这符合前述的许纪霖的时代论断，也符合汪晖关于 90 年代“去政治化”的基本判断。汪晖的“去政治化”指的是基于特定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公共性与批判性的丧失。[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 37-40 页.]

然而，从 2008 年到 2018 年，变革的激情似乎正在被召回。回溯 50 年到 1968 年，战后维系了二十余年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结构遭遇了世界性的反叛浪潮，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又稍感不安”。[托尼·朱特 ， 林镶华：《战后欧洲史 (卷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55 页.]而他们战后成长起来的子女却召回了政治渴望与宏大叙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造反”运动，志在打破僵化的现存体制、固化的社会结构和沉闷的主流文化。

今天距冷战结束也是二十余年，恰好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我们也能看到与 1968 年同构的时代情绪。全世界似乎重新燃起了政治化的渴望，动摇了后冷战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趋势。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与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和库尔德的独立公投，“阿拉伯之春”后的政局动荡与叙利亚战争，还有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兰浪潮，摩洛哥、亚美尼亚等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都说明了 90 年代形成的稳定秩序并不足以餍足当代青年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打破现存秩序的渴望蓄势待发或喷薄而出，对另类社会发展方案的追求也开始超越“历史终结论”，开始了新的探索。

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60 年与改革开放 30 年所蓄积的政治经济力量磅礴而出，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这个世代出生于“文化再启蒙”的 80 年代，成长于全面市场化改革的 90 年代，在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加入了公共话语的战场，试图求索新的理论以测定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打开国家的未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叙事及其“中国立场”可被视作全球政经格局与中国社会结构激变时期的一个片断。他们拆解了“父辈”的人文知识话语，又不满足于“兄辈”缺乏理想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同时他们并没有能力摆脱“父兄”的文化遗产，于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 80 年代的宏大叙事与 90 年代的工具理性嫁接在一起，并创造性地转换了“祖辈”的革命叙事与“父兄辈”的现代化叙事，推出了属于这个世代的工业化叙事，并逐渐从边缘地带崛起走向主流。

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蓬勃发展，为“工业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当报纸和电视的公共话语空间被主流社会所控制，他们在 BBS、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几个阶段展现出比前一代人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同时大众传媒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互联网成为他们呼朋引伴、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而他们也摒弃了 80 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 90 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繁复的术语，开始用通俗的语言和媒体的逻辑组织公共言说的宏大叙事。

（三）政治公共领域与政治阶层的生成

在讨论现代政治制度生成或者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新阶层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认同如何塑造的时候，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理想模板。他以欧洲现代共和制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为经验材料，描述了资产阶级如何从受封建宫廷控制的公共领域中解放出来，在由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学公共领域中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内心和政治品格，进而在规范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中采取政治行动和政治实践。[[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这一模板一度在后冷战的高潮中成为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传统国家政治转型的标准叙事，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国际组织、自由媒体等联合互动的机制，以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为普世价值，强势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关系。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传媒和社交媒体的资本化程度加剧，传统政治代表性断裂，国家转型失败、治理危机深化和社会分裂加深等多重困境中，我们看到那种依靠强权、威权或者资本的公共领域转型在文化价值观塑造和社会认同建构中的虚弱表现。在中国，喧嚣繁荣的市场化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社交媒体中的众声喧哗都流于表面，并没有导向一个稳定的、有自我意识的、有主动价值认同的、有自治能力的中产阶层或者知识阶层。热闹的媒体公共领域和新兴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为转型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阶层，从而促使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反而由于资本、技术升级、权力、个体利益等多重原因，很快处于分崩离析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在新阶层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新生力量崛起和新

常态到来的氛围中，“工业党”从边缘地带的公共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汇集意见和力量，在相对健康的内部竞争和争论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共识、话语体系和相当的群体识别度，并在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公共领域建构的正面案例。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工业党”话语的缺陷。“工业党”以反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名兴起，他们采取的对抗策略是推出一套工业化的“普世价值”与之分庭抗礼，并把工业化价值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在公共辩论中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多元化未来社会的探讨，拒绝所有非进步主义或非现代化的观念，如宗教信仰、文化保守主义、环保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抹除工业化“普世价值”中的“异数”（访谈记录 J20180407），在“工业党”的逻辑中并不允许拒绝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变态”存在。同样的态度能够在对待民族、地域、性别等议题上找到。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仅有高度的智识自信与强烈的政治渴望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进一步的文化自省和更活跃多样的政治论争亦不可或缺。

附录：研究方法

20 世纪 80 年代，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展了“接合”概念（articulation），“接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要素能在一定的情境下勾连形成一个统一体。简而言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话语之间，或某些社会力量之间，或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能够以并非必然永恒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本研究采取类似的方法，尝试从文本呈现的思想认知出发，将其与个人生活史（尤其是教育经历、阅读经历和媒介使用）进行勾连，从而将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进行接合，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与虚拟民族志三种具体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对集中展现“工业党”思想体系的时政畅销书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工业党”思潮的基本特征和话语风格，辅助的材料还包括“工业党”代表人物的社交网络发言和网络穿越小说。

深度访谈：对“工业党”代表人物或相关人物分别进行了 1 到 3 个小时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其历史认知、政治经济主张、个人生活史，用以探索其思想主张形成的经验来源。

虚拟民族志：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进入 BBS、百度贴吧、网站跟帖区、微信群聊等平台，对“工业党”群体、粉丝社群和论敌进行社会身份分析并描述其群体特征，同时着重探索他们在现实和网络两个层面上的沟通与交往方式，勾勒“工业党”群体的社会网络。

本研究重点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期间对某“实业党”微信群进行虚

拟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

以下为本文涉及的访谈对象名单：

编号	访谈方式	特征
A20170316	面对面	男，1976 年生，数学学士，文学博士，现从事智库工作
J20180407	微信语音电话	男，1981 年生，心理学硕士，现从事文化传媒行业工作
K20180407	微信语音电话	男，1974 年生，计算机专业硕士，现从事人工智能开发工作

瓦良格号不能负担之“重”

任翀昊 2011-10-08

时政 | CURRENT AFFAIRS

中国人对航母的期望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但中国的海权战略，不能以最近20年美国独霸的畸形局面为参照系。100年来以空制海的大趋势，冷战这种均衡对抗中重型轰炸机取代舰载机成为进攻主力的史实，才是中国设计海军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瓦良格号不能负担之“重”

文/任翀昊

2011年8月，瓦良格号出港。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航空母舰。这在中国来说是一个突破，但从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晚了近一个世纪。早在近100年之前，飞机刚刚出现，海军就意识到了飞机对海战的重大意义，各个工业国纷纷把飞机用于海上战争，进而开发海上空军基地，也就是后来的航空母舰。在这场航母竞赛中，中国实在是个后来者。

航母横空出世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距离人类第一次飞行只有十几年，但飞机已经明显对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德国占尽优势，但没有像二战那样直取巴黎，一举打垮法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国投入了飞机进行战略侦察，发现德军侧翼空虚，果断反击，才避免了巴黎的失陷。到一战末期，各大国的军用飞机都数以千计。

陆地上飞机的用途这里不再赘述，只说海战。在飞机出现之前，海战的主要模式是炮战。1592年壬辰战争，日本舰队被中朝军队的枪炮全歼；1588年的无敌舰队带着大批肉搏兵力战败，这标志着冷兵器海战时代的结束，炮战时代的开始。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火炮统治着海洋。到了20世纪初，装备大口径火炮的战列舰及巡洋舰是海军的绝对主力，驱逐舰、鱼雷艇一类的小型军舰则承担配合任务，所有人都对海军炮战烂熟于心。

到了20世纪初，火炮射程已经增加到20多公里，几到火药发射距离的极限，火炮瞄准时已要考虑地球曲率。但海军将领们还不满足，他们和陆军一样盯上了飞机。1909年，第一篇论证海军航空兵的论文发表。

最早的海军飞机是用来支援炮战的。飞机的飞行高度可以高达上千米，还可以飞到舰队之外观察，自然比桅杆上的望远镜看得更清楚、更远。所以主要炮舰，如战列舰、巡洋舰都喜欢带上几架轻型飞机，开战前可以侦察敌人位置，引导舰队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交火后可以观察炮弹落点，把结果用无线电传回军舰，用来修正打偏的炮弹。

这一阶段，飞机的作用还是炮舰的辅助工具，许多侦察飞机用完后根本不回收，降落在海面上。随着飞机的航程逐渐增加，舰队对飞机的需求越来越大。但限于舰体空间，昂贵的炮舰不可能牺牲宝贵的炮塔数量来增加飞机数量，也没法用一次性使用的飞机进行连续侦察。所以专用的海军航空兵舰艇应运而生——水上飞机母舰。

水上飞机母舰，就是携带水上飞机的舰艇，船上有飞机的油料、配件，还有机库和吊车。作战时可以把带有浮箱的飞机吊到海面起飞，飞机归来后降落到海面，再用吊车吊回机库。

1914 年，皇家海军列装了一艘可以装载 10 艘飞机的水上飞机母舰，号称在海战中可以比三四艘巡洋舰更好地执行侦察任务。1917 年日德兰海战，英国在拥有战略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全歼德国舰队，最大的亏就吃在缺乏侦察力量、不明敌情上。战后英国痛下决心，开发更可靠的水上侦察力量，而不是继续用货船改造水上飞机母舰。

在飞机侦察能力增加的同时，飞机的攻击力也大大增加。1914 年之前，飞机几乎不带武器，双方的侦察机在相遇的时候甚至相互招手示意——飞机既携带不了足够重的炸弹，更带不了沉重的鱼雷，所以只能纯粹当侦察机。

1914 年，英国尝试着空袭德国飞艇基地，结果炸弹太轻，没能造成伤害，但至少证明了飞机从海上发动空袭的可行性。1915 年一架英国水上飞机从船上起飞，发射鱼雷，一举击沉了 5000 吨的土耳其货轮，标志着飞机可以在海战中击沉大型船只，从此飞机对于海战来说不再是单纯的侦察工具，还是重要的作战兵器。

1918 年英国和日本先后开建真正的航空母舰——著名的竞技神号和凤翔号。前者是第一艘被飞机击沉的航母，后者一直用到中途岛海战。

航母的发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暂时停滞。全面战争的结束，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困难，再加上海军条约的限制。各国的海军处于一个著名的“海军假日”阶段。直到 30 年代海军才恢复扩张。不过，在 1922 年的海军条约中，虽然“主力舰”的含义还依然限于战列舰、战列巡洋舰等炮舰，但在规定了主力舰吨位、火力之后，紧接着的条款就是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可见当时各国也都意识到了航母在未来的重要作用。

海战的航母时代

航母地位的提高，和飞机性能的提高有直接关系。一战时期的飞机，不过是一两个小时的续航能力，三四百公里的航程，一两百公里的攻击距离。二战时期的飞机，可以飞行五六个小时，横越数千公里，作战半径也有七八百公里。这和海军火炮至多几十公里的射程拉开了明显差距。航母可以很容易地保持在敌方舰队射程之外发动攻击，即便攻击失败，损失的也只是廉价的飞机。

航母的另一个特性是火力的精确性。舰炮投射的火力，完全是一种概率射击，炮

弹一旦出膛，能否打中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飞机则可以带着炸弹飞到军舰的头顶轰炸，甚至向军舰俯冲，低空精确轰炸军舰最脆弱的部分。鱼雷机贴着海面飞行，在离军舰几百米的地方投下鱼雷，可以一发就击沉昂贵的大型舰艇。所以，尽管航母不能像战列舰那样一次性投射几十吨钢铁，但可以用更精确的攻击来弥补火力的不足，往往对敌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海战是完全的火力战，根据最直观的逻辑，火力=射击威力×开火次数×射击精度。航母的射程远意味着开火次数多，打得准意味着射击效率高。再加上两次大战之间飞机能携带越来越多的弹药。航母在所有作战参数上全面赶超了原有的主力舰。

此外，海战最重要的是搜索到敌人，集中火力打击。在飞机可以搭载无线电之后，航母上的侦察机变成了航母的耳目，一旦发现敌人，所有飞机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赶到，发动打击。以航母为圆心，航母上飞机的作战航程为半径，这个圆范围就是航母的控制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航母的控制面积是和飞机作战半径的平方成正比的。随着技术进步，作战半径增加数倍，等于航母控制面积增加到原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30 年代的航母，作战半径可以达到几百公里，控制范围几十万平方公里。在战场广阔的大洋海战中，占有无可匹敌的地位。

二战一开场，盟军和法西斯阵营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海军航空兵进行偷袭，在地中海，英国地中海舰队用鱼雷机袭击了意大利舰队主力所在的塔兰托军港，瘫痪了意大利海军一半的主力舰。日本联合舰队出动 6 艘航母，轰炸珍珠港，用鱼雷和炸弹把美国 8 艘战列舰都打得不能动弹。这种打法既证明了航母在接下来的海战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证明了当时的海军对航母充当海战主力的事实还抱有疑虑。因为航母的首要目标无一例外是敌人的主力炮舰。而不是敌人的航母。

接下来的几年，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广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所有的海军行动，指挥者首先要问自己有多少架飞机，而不是多少大炮。珍珠港事件之后，美日双方舰队在珊瑚海交战，交战中，双方的军舰主炮一次都没有开火，完全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之间的搏斗，炮舰彻底变成了掩护兵种。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中途岛海战，日本出动上百艘军舰发动进攻，仅仅因为 4 艘航母的损失就全军撤退。此时，制空权已经变成了海战的第一要素。

好在这个时期的飞机夜战能力比较弱，原来作为主力的炮舰，现在还能趁夜晚的掩护出击。比如瓜岛海战，拥有制空权的美军白天占优势，炮舰较多的日本海军晚上占优势，打了几个月的拉锯战。要是战列舰敢于脱离空中掩护，白天出动，敌方空军立刻就会围上去给它好看。著名的日本超级战列舰：大和、武藏，都是被飞机干掉的。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战列舰，在北大西洋恶劣气候的掩护下试图偷袭英国的补给线，结果被航母舰载机的鱼雷打中方向舵，只能在海上转圈，被英国人围殴至死。

二战虽然只持续了四五年，但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各国海军都承认航母才是海战的核心战斗力。1945 年，美国海军拥有 24 艘主力航母。

两次世界大战也是潜艇肆虐的时代。潜艇在水下发射鱼雷，避开了水面舰艇的炮

火，往往几百吨的廉价舰艇就能击沉几万吨的主力舰，或是几十艘运输船。所以各国海军无不大力发展潜艇，同时保持强大的反潜力量。

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潜艇在二战时期极少下潜。在这个阶段，核潜艇尚且是遥远的科幻兵器，所有的潜艇都和水面舰艇一样使用内燃机驱动。内燃机需要大量的空气，所以潜艇下潜时间有限。平时和其他水面舰艇一样在海面航行，只有发动攻击或被攻击的时候才下潜隐蔽。反潜首先需要的是发现潜艇。被发现的潜艇即便紧急下潜，速度也相当有限，飞机或驱逐舰用几颗深水炸弹即可消灭它。这种反潜搜索，首先需要足够的飞机，只要发现潜艇，至少可以把潜艇压制在机动不便的水下。

这种以攻为守的反潜方式比驱逐舰消极防御的反潜要有效得多，所以各国又造了一批护航航母（比主力航母小，舰载机数量少）。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制造了10 艘战列舰和 48 艘巡洋舰，航母前后制造了 131 艘。

因为缺乏大型战争来检验新的海战模式，航母为主导的海战模式在二战后依然持续。核反应堆的出现增强了大型舰艇，尤其是航空母舰的续航力，航母可以长久地保持在海上充当作战平台。这进一步提高了航母的地位。只是核反应堆也同样也加强了潜艇，潜艇从此不必上浮也能保持长时间航行，而且速度还高于水面航行速度。所以航母不能简单地通过水面搜索就压制潜艇。再加上核潜艇能够发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地位逐渐上升。潜艇的吨位也越来越大，从名副其实的几百吨“艇”，变成了上万吨的巨舰。但总的来说，在不爆发核大战的前提下，水面舰艇能够承载更多的作战任务，包括支援陆战和截断航运。所以航母依然是海战的主角。

重型轰炸机和导弹取代航母

既然无人挑战航母的霸权。航母的发展还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前进。当年航母取代了炮舰。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飞机的航程远。60 年代之后，飞机的航程、航速进一步增加，从水面战斗来说，航空兵相对舰艇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因为重型轰炸机的航程越来越大，作战半径从 1000 公里上升到 2000 多公里。侦察机甚至可以有上万公里的搜索航程。这个趋势在 30 年代促成了航母地位的上升，在 60 年代之后，反而开始压制航母的发展。因为地球不是无限大的，一旦飞机从陆地起飞也可以覆盖大片的海洋，海军航空兵就不再是拥有航母的海军的专利了。

苏联设想的大西洋海战，主要交战方式就是由北冰洋方向飞来的重型轰炸机攻击越洋运输的美国海军舰队。在和平时期，苏联的图 95 飞机凭借上万公里的航程，6400 公里的作战半径，完全不借助任何航母，就能巡逻整个大洋。借助安哥拉、金兰湾等地的海外基地，苏联可以用飞机对整个世界的海洋发动攻击。

当然，二战时期就存在航程数千公里的重型轰炸机，比如向日本扔原子弹的 B29 轰炸机。但这种轰炸机并没有取代航母，因为重型轰炸机只能高空水平轰炸，精度极差。用来轰城市可以，炸舰队纯粹只能听个响。中途岛海战，美国曾经用陆地起飞的高空轰炸机水平投弹，无一命中，最后还是航母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来

解决问题。

日本在二战末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大肆建造神风飞机，把飞机当后来的导弹用，是二战末期日本唯一能威胁美国舰队的方式。就算不玩神风攻击，当时的海军航空兵也必须飞到对方舰艇几百米的范围内射击，和自杀区别也不大。中途岛美军的鱼雷机编队无一生还。只是因为飞机比军舰廉价，航母的攻击才有可持续性。

二战末期出现了导弹，著名的 V1、V2 导弹不说了，只说海军兵器。德国人也率先开发出了反舰导弹，不用人驾驶飞机冲到军舰附近，也能对军舰发动精确打击。长航程的重型轰炸机从此有了对付水面舰艇的能力。在雷达指引下，上百公里外发射的反舰导弹，可以比俯冲轰炸机更轻松地干掉敌人舰队，还不用损失宝贵的海军飞行员。只是能携带多枚重型反舰导弹的轰炸机，如“逆火（图 22）”、“海盗旗（图 160）”，至少也要一两千米的跑道来起飞，所以数百米长的航母不能搭载，只能在本土基地起飞。航空力量的加强，反而相对减弱了航母的攻击力。

归根结底，航母只是搭载飞机的海上平台，本身没有攻击和防御能力，攻守都必须依赖于飞机的战斗力。飞机性能的发展决定了航母的兴衰。最早的飞机航程和攻击力太差，所以海战以炮战为主，等到飞机性能有了一定提高，能搭载飞机的航母就开始体现自身的重要性。当飞机性能进一步提高，不再依赖也无法依赖于航母发动海上攻击的时候，航母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飞机主导海战是长期趋势，航母主导海战只是以空制海的一个过渡阶段。冷战后期，美苏双方的航母越来越多地搭载战斗机而不是进攻性的轰炸机，实际上就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妥协。在大国对抗中，航母的作用是盾而不是剑，主要作战方式是突前防御，为自己的重型轰炸机占领导弹发射阵地，掩护重型轰炸机出入战场。火力投放只能靠陆基轰炸机的反舰导弹了。中国现在整修的瓦良格号航母就是在这种思维下建造的防御性航母。

80 年代初英阿马岛战争，阿根廷一艘航母都没有，只能从几百公里外的陆地起飞轰炸机攻击英国舰队。结果还是打得英国人焦头烂额，若非当时阿根廷只有 5 枚进口反舰导弹，怕是英国这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败在一个第三世界小国手下。这体现的就是导弹时代，陆基轰炸机相对航母的优势。

可以预见，如果冷战期间的技术发展趋势持续下来，航母的地位一定会进一步削弱。像二战期间的战列舰一样，更多地承担防御性任务。

冷战后航母的回光返照

不过，冷战的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干净利索地解体，俄罗斯日趋衰弱。俄罗斯海军从 1500 艘军舰的庞大规模迅速地向 30 艘左右的岸防舰队跌落。苏联的航空工业被拆散了，其他大国都缺乏足够多、足够先进的制海轰炸机、侦察机。美国海军忽然之间发现世界上不再有能和自己平起平坐，正面对抗的舰队或航空

兵。再也不用担心成百架重型轰炸机，上千发反舰导弹齐射的攻击了。原本已经日趋边缘化的航母舰队从此没了天敌，从负担变成了美国的丰厚战略遗产。

攒下来的军事遗产不用白不用，此时全世界航母的舰载机规模大概 1200 架，美国自己就占了 1000 多。在这种绝对的数量优势下，防御性兵种也变成了进攻性。所以我们这 20 多年看到的是美国航母横行四海，控制大洋，轰炸沿海国家。仿佛再次恢复了二战时海战之王的地位。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的就是这种局面。电视直播镜头里，航母上频繁起降的飞机极有视觉冲击力，让人感觉到这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在这种情绪之下，航母成了主导世界的象征，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一传出来，立刻就得到了舆论的热烈响应。
中国人对航母的这种期望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不过，若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变成另一个世界大国，要削弱甚至消灭美国的霸权，中国不能把最近 20 年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秩序作为考虑问题的前提。

如此，最近 20 年的畸形失衡局面就不能拿来当参照系。100 年来以空制海的大趋势，冷战这种均衡对抗中重型轰炸机取代舰载机成为进攻主力的史实，这才应该是我们设计海军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从目前的技术发展前景来看，飞机的航程、反舰导弹的火力、在航天科技支持下的大洋导航能力都在快速进步，以空制海依然是下一步的趋势。**我们与其把目光集中在瓦良格号航母试验舰上，不如更多地关心一下中国大飞机、远程轰炸机、战斗机、导弹的进展。这对中国海权的发展应该更有意义。**

（作者系军事与政论作家）

【美国消防案】一桩火灾折射出的中美制度竞争

马平 媒体人，前工程师 2011-12-20 观察者网特稿

一 、不救火的美国消防队

近日，美国田纳西州一户居民在拨打 911 火警电话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因为您没有缴纳消防年费，消防队不会拯救您的房子”。按照过去 20 年的惯例，田纳西州南富尔顿市向此地居民征收每年每户 75 美元的消防费，只有缴费居民才能得到灭火服务。在此次事件中，当火灾可能殃及邻居的时候，消防队立刻出动灭火，保卫了那些缴纳过消防费的住房。但即便最初报警家庭提出立刻支付消防费的建议，消防队依然拒绝提供消防服务，坐视他们的房子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兼顾公益事业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职业，消防队员一直是美国各种文艺作品中典型正面形象的来源，好莱坞有数十部电影以消防队员为正面主角。911 事件之后牺牲巨大的救援工作更是把美国消防行业的社会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在这次“见火不救”事件中，这个传统的“英雄行业”声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消防员协会都不得不出面谴责富尔顿市消防队的行为，以挽回一部分公共形象。

不过，在一片谴责声中，并非不存在支持消防队的行为的声音。辩护者指出，此次火灾区域并非富尔顿市消防队的传统负责区域，只是因为本地没有组建消防队，居民才需要付费给富尔顿市消防队，购买消防服务。如果允许不缴费的家庭得到灭火服务，势必会鼓励不缴费行为的泛滥，进而影响消防队的经费，导致正常缴费的家庭无法得到足够的消防力量。当地有居民宣称：“这个世界充满了白吃白喝的人和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无权寻求消防队员的帮助”。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一个新闻主持人甚至公开说“若想制止某些人“蹭吃蹭喝”的行为，就要有更多这样的事情（见火不救）发生”。

类似的争论也爆发于中国的网络和平面媒体。大部分网民从生活常识出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拒绝救火，但也有少数新闻评论对这种行为高声赞美：“这种一板一眼的做法，同样也意味着公共服务部门对纳税人负责，对“衣食父母”所授予自己的权力负责，知道市民是主人，自己只不过是“差人”，这种意识的根深蒂固，有助于规范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和义务，角色与职责，避免对权力的滥用，和对纳税人税款的任意靡费，从个案上看有诸多不近情理之处，但从大局看，其实是利多于弊的……这种“办案收钱”的做法虽然“吃相难看”，却可以促使市民养成珍惜公共资源的良好习惯……对于“画地为牢”的是非见仁见智，其弊端和教训也应得到充分总结，但北美公共服务部门对责、权、利的清晰认识，和对纳税人、税款及纳税人所赋予权力的负责态度，却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在中国和美国，争论双方的理论阵营都比较相似。持无条件救火观念的人觉得消防队的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也导致了社会财产的损失。消防队的辩护者则从社会服务的成本着眼，指出消防队不能及时得到财务支持是更大的社会损失。既然保险公司不可能在出车祸的前夕再出售汽车保险，就不能指望消防队也为没有提

前缴费的客户救火。双方各执一词，貌似在逻辑上都没有明显漏洞。但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必须从更深入的制度比较层面来考虑。

二、 援助逃票者的中国救援队

2010 年 12 月，十几名上海的大学生自行组团去黄山旅游。为了逃票进山，旅游团私自进入未开发的旅游区域，深夜在险峻的山路上迷路被困，被迫拨打 110 求援。当地警方连夜派出搜救队伍，在付出一名警官牺牲的代价后救出了旅游团。除了少许罚款外，并未向旅游团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

这起事件同样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大学生旅游团不是黄山地区的居民，没有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过一分钱的税款，甚至没有向当地政府拥有的旅游产业缴纳门票费用，自行选择了一条险峻的山路通行。比起田纳西州的火灾事主，当地警方更有理由拒绝为他们提供代价巨大的公共服务。然而，当地警方明确表示，救人是警察的责任。虽然旅游团有违规行为，但警察决不能见死不救，再有类似事件，警察还会出动救人。

这起事件并非个例。自从“驴友”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开始流行，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当地警方救助受困旅行者的新闻。黄山事件只是因为牺牲的警官和逃票行为才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对于中国地方警方来说，旅行者的不理智行为，以及外地人的身份都不构成拒绝救助的理由。“有警必出”是高于收费问题的行事准则。

类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灭火是消防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战士必须立即赶赴火场，迅速组织力量排除险情，救助遇险人员，扑灭火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

三 、西方：纳税人才是人

中美的公共服务机关在类似情况下采取了不同的行事方式，不仅是一个行事习惯的原因，制度性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国家机构的起源和法理基础。

当代西方国家体系的起源在南欧和波罗的海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由少数大商人垄断政治权力，在工商业税中取得维持国家运行的财政基础，同时也为商业行为提供保护与便利。接下来，商人政权/税收的组织方式从南欧转移到西北欧的荷兰和英国，帮助荷兰和英国确立了早期的全球霸权。在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的震荡中，法、德、美等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最后这套体系激发出工业革命，用工业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这个脉络来看，现代西方国家的起源是商团，公共服务应该被视为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必须有费用的交割才能生效。对于公共服务而言，这个“费用”就是税收。所以西方体系的支持者津津乐道于“纳税人”的称呼。认为这个称呼体现了西方体系的“社会契约精神”。不过，契约不会为缺乏付款能力的客户服务，在

欧美统治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对无力纳税的大多数平民完全持无视态度。

比如美国就曾以“不纳税”的理由把印第安原住民排除到国家体系之外，任意剥夺。英国在 1832 年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只有每年付得起 10 英磅租金或是有 50 英镑土地收入的人才有投票权（19 世纪早期的英镑可以折算为 8 克的金币）。这直接导致了 95%的人口被排除到了选民行列之外。直到 20 世纪世界大战时代，为了动员底层人口当兵，西方才开始逐渐推行普选权。穷人用生命“纳税”，才得到了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待遇。从欧洲到日本，兵役在多种语言里的称呼就是“血税”。

四、中国：基于“国民身份”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国家机构起源是另一种模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不言自明，不证自立的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把个人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不需要个人的同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似乎有些粗暴，没有给个人以选择空间。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个人可以无条件的向国家力量寻求支持，国家机器因此带有了几分家庭式的温情。

即便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近年的案例来看，中国政府依然不认为公共服务一定要受限于“纳税人”的身份。2007 年，一名出生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的印度官员到中国访问，申请签证。被告知：“作为中国公民，你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直接入境”。虽然这位藏南居民应该从未到任何中国税务机关报税，但中国政府依然认为他享有中国居民应有的便利。

中国基于“国民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反过来说，明确放弃中国身份的人即便纳税，也不一定能享用到中国公民享有的服务。比如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任何参加别国入籍仪式的移民在法理上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但许多移民为了出入境便利，甚至为了继续享有中国居民的医疗、置业、出入境等服务，私自保留中国护照和户口本、身份证。基于管理成本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中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几个月前，埃及出现社会动荡，中国政府立刻紧急组织了撤侨航班，允许任何拥有中国护照（包括港台居民）的人免费登机。许多保留了中国护照的人也试图浑水摸鱼，继续享有大国国民的安全福利，借这个机会离开混乱的埃及逃命。但中国官员联系了埃及出入境官员，逐一检查出入境记录，凡是持外国护照进入埃及的人员都被当场撕碎了中国护照，留待中国公民登机之后才可以付费使用剩余舱位。这些被当场撕碎护照的华人中，不乏长期在中国居住、经营产业的纳税者，但在紧急情况下，中国政府基于自己的逻辑，不会让他们挤占合法国民的逃生机会。

五、中西制度竞争
以商业精神组织公共服务和基于身份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别，或者说中美政府运行模式的区别，可以总结为一个通俗的标准——要不要事事签了合同再做？要不要

事事按合同来？

对于个人而言，依据任何逻辑来待人接物都是个人自由。认同“亲兄弟明算账”的精明人和行事豁达，不拘小节的厚道人都是社会的常态。不过，对于公共机构而言，以何种运行模式为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运行效率，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竞争力。

在农业社会，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千年不变，除了少数游牧民外，绝大多数人口都必须参与稳定、简单的农业经济来养活自己。所以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反复签订契约，只要根据农业社会的通例，进行简单的交换，接受简单的公共服务，就可以保持生存，保持社会的稳定性。这就是农业社会不需要反复谈判，不需要复杂的“社会契约”。或者说，传统的文化结构、农业国家的稳定结构本身就是一份“长期有效”的“社会契约”。

历史进入近代，海运沟通了全球，上百的新经济部门打破了农业经济的垄断地位。以千万计算的移民在各个大洲之间穿梭，开发了一个个国家甚至整块大陆。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用新的生活模式来替代稳定的传统社会。

为了建立新的生活模式，商业精神和频繁签订的社会契约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既解决了新型社会模式的构建问题，也解决了公共服务的成本问题。西欧和日本就是典型的成功例子。而那些坚持传统社会模式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则被时代甩下，从举足轻重的大国变成了落后国家。

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带着各自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数千万移民要在一片荒原上用几代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社会，如果不用无数的契约和谈判来建立新秩序，就只有一个结局——内战。从这个角度说，内战以来的美国以纯粹的商业模式立国，以税收和社会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的确有其道理。在这个迫切的压力下，美国变成了最适应新的工业时代的国家，进而成为称霸地球一个世纪的工业霸主。

六 、世界新趋势下莫忽视中国制度优势

如果只看从古代社会到美国称霸的这段历史，“以身份决定公共服务”和“以商业契约决定公共服务”两种模式的对比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后者在 20 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全面胜出，变化的工业社会压倒了不变的传统社会。

不过，历史并没有停在西方模式称霸世界的那一刻。现代工商业社会压倒农业社会之后，继续向复杂化发展。工业门类越来越多，公共服务的种类也随之指数化增加。19 世纪工业城市的居民在市政会议上最多是讨论一下防火和治安问题。现代工业城市的居民要想正常生活，起码有宽广的道路、干净的供水、便捷的排水和排污、可靠的电力供应、覆盖全面的电讯网络，安全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没有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的配合，如此复杂的社会一天都运转不下去。要是考虑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还必须有环保、教育、防灾、邮政等部门的服务。就像农业社会的人类无法想象工业社会一样。工业社会早期的人类也无法设想 21 世纪

的城市生活。

如此之多的公共服务种类，远远超出了个人理性能理解的范围。个人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上百个公共服务部门逐一签订“契约”。而考虑到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公共服务部门也不可能逐一地和每个人签订“服务协议”，让每个人“定制”公共服务。因为即便一半的城市人口没有向警察局或环保局下订单，治安也必须得到维护，环境也必须得到监测——公共服务部门往往做不到，也不能做到只为一部分人服务。在这种新形势下，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契约体系必须进行足够的简化，才能把运行成本降低到普通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具体而言，这种“简化”工作就是由政府统筹公共服务，不再以个别收税的方式来为大部分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是统一集中社会剩余资源，默认所有人都“定制”了全套的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险和消防、治安服务。表面上这侵犯了个人和公共服务机构谈判的博弈自由，但为了在不违反基本伦理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最大限度的福利。这是发达工业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

社会的发展自有其惯性，即便出现了新的趋势，大国也不可能出现迅速的转向。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美国工业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商业模式的国家组织。所以，虽然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工业社会后期，虽然大趋势是公共服务再次从“向税收负责”转为“向身份负责”。但在美国浓厚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下，美国许多公共服务机构依然习惯于用市场模式，用契约模式来运行，为此付出伦理和经济的巨大代价在所不惜。这就是美国消防队会坐视火灾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经济在冷战后期开始相对衰落，逐步进入危机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工业时代早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之后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历程，终于在 21 世纪初期完成了工业化，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因此，**中国在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赶超阶段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美国人那种以自由资本主义来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思考习惯。换句话说，中国“跨越”了适合“向税收负责”来建立公共服务的阶段。**

在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中国必须对眼下的经济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清醒的判断。不能因为西方曾领先中国一个多世纪，就盲目照搬 20 世纪欧美的社会制度，甚至照搬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影响社会效率的制度。捡起别人正在丢弃的垃圾，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殷鉴不远，90 年代医疗、教育等服务项目盲目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惨痛教训和野蛮后果必须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完全可以把传统和后工业时代的趋势结合，保持以“身份”为主导的公共服务提供标准。这才是当下更符合效率原则的选择。

中国有责任改变湄公河流域无政府状态

马平 2012-01-09 观察者网特稿

中国船只被武装暴徒劫持，船员被绑架杀害；东南亚各势力互相推诿责任；公安巡逻艇出境撤侨；泰国拘留现役军人为谋杀嫌疑人；中老缅泰四国开会合议湄公河安全问题，国防部长梁光烈表示解放军将在必要予以支持……最近一系列事件把网民的视线引向东南亚。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除了东南海港、长江、珠江外，我国在大西南也有为数众多的江河通往大海。这些国际水道能否正常使用，与中国公民的经济利益乃至人身安全息息相关。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但是，湄公河事件发生在别国领土上，却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利益。在这种局面下，我国政府以何种身份介入、以何等策略进行干预，这些选择不仅与具体的案件相关，更是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合作的典型范例。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基本可以判断：这次湄公河事件不是敌对国家或势力有意挑衅，而是湄公河境外流域局势混乱、治安崩溃的结果。包括泰国在内，湄公河流域诸国政府都无法有效控制领土，对本国武装力量和暴力机关没有绝对的控制力。这种局面已在整个中南半岛持续多年。

以同属湄公河流域的缅甸为例，整个国家除内比都政府和政府军之外，还有“克伦民族联盟”、“ 掸邦民族军”、“ 掸邦联合革命军”、“ 佤邦联合军”、“ 克钦新民主军”、“ 克伦尼民族解放阵线”、“ 罗兴伽穆斯林团结阵线”等三十余个独立势力。这些势力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多则拥兵上万，少则数百，均与缅甸政府存在一定的对抗，缅甸政府自然无法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湄公河事件初起之时，泰国和西方媒体群起指责佤邦势力策划谋杀，佤邦则寻找目击人、竭力开脱。整个过程中，缅甸政府一直保持沉默。缅甸政府对湄公河治安缺乏控制力可见一斑。除了军阀林立的缅甸，老挝国内也有“民族联合阵线”活动；柬埔寨内战一直持续到 1998 年。

泰国在湄公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南亚都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人均 GDP 仅次于新加坡、文莱和石油资源丰富的马来西亚。因此，相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邻国，泰国军队军费相对充裕，能够压服大部分反对派武装。总的来说，泰国不存在公开割据势力，只在远离湄公河的南方存在少许地下反政府武装，在军事上算是东南亚相对安定的国家。

不过，泰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军本身就是“反政府”武装。泰国是君主立宪国家，依照法理而言军队应该向议会和文官政府负责。但实际上，泰国王室希望长久保持实际影响，不断鼓励军方干预政治，以避免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这导致泰国政府对军方没有实际控制力，反倒经常被军方左右政局。过去的 70 年间，泰军、以及深受军方影响的警察力量发动了 20 多次政变，平均每 3 年左右一次。泰国政变频率比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正常更迭频率还高。

不受政府控制，自成体系的暴力机关是治安的隐患而不是保障。缅甸、老挝的军阀长期以来就以贩毒、经营赌场著称。泰国军警虽然不会像缅甸军阀那样公开经营毒品，但也经常滥用暴力。湄公河上屡屡出现敲诈勒索，绑架抢劫的武装分子，附近的军警对此不闻不问，暗中分成。极端情况下，泰国军警为了牟利不惜伤害国家信用，破坏外交形象。比如 1989 年沙特王室珠宝盗窃案，泰国军警高层私分赃物，只交还赝品，前往泰国调查的沙特外交官在曼谷街头被枪杀。这直接导致沙特和泰国关系恶化，贸易额缩减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外交等级从大使级降到代办级。直到 2006 年，泰国原警察总监才被揭发私吞了部分沙特王室珠宝，并被抛出顶罪。但两国关系依然没有恢复正常水平。此次湄公河事件的嫌疑犯均为泰国现役军人，其中还包括校级军官。这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泰国军警长期失控的结果。

眼下掌握泰国政府的是偏左翼他信系党团。这个政治派系在军事政变和军警默许的街头运动下已经被多次颠覆。虽然他信系党团一次次通过议会路线重新执政，但绝无可能让军方贯彻自己的意志。最近曼谷洪水，泰国政府非但不能命令军方积极救灾，反而在军方借水灾政变的传闻下一夕数惊。所以洪水泛滥不退，经济损失异常严重。从这些不太遥远的历史案例来看，如果军队和深受军方影响的警察系统不愿配合，泰国政府在只掌握民政机关的情况下，完全没有能力维持湄公河流域治安。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以“纯”外交手段来保证湄公河航运安全。

从本质上说，湄公河流域治安问题和索马里海域的治安问题一样，都源于国际航线周边地区的实际无政府状态。当地政府无力控制本国武装力量，军警沦为盗匪，导致国际水道无法安全通航。由于湄公河流经中国，比起索马里海盗问题来，中南半岛治安问题更关乎我国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援引索马里海域护航的先例，联合湄公河沿岸国家政府，以本国力量参与湄公河联合执法，是合乎情理的必然选择。

安全与秩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湄公河流域经济落后的国家，如缅甸、老挝，正是军阀势力相对强大、内战频发的国家。泰国经济也屡屡受到国内军政局势动荡的影响。在治安方面，湄公河流域的主要问题是中南半岛各国缺乏有效内政管理，而不是别国干涉内政——中国政府无法干涉不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各国政府合作，维护湄公河流域治安，是帮助各国建立内政秩序、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行为，也是尊重各国合法政府的表现。

除了湄公河（澜沧江）外，中南半岛还有红河、伊洛瓦底江(独龙江)、萨尔温江(怒江)等多条国际河流源于中国，穿越别国流入大海。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西南省份要发展经济，势必要利用这些河流的航运、水利、发电效益。这同样需要安全的国际环境，需要流域各国的通力合作。在不远的将来，可以预计中国的铁路、电力网也将跨出国境，在东南亚地区建设国际交通、能源网络。因此，此次湄公河事件的后续处理，应该被视为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合作的一个范例和样板。在互相尊重内政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国际治安合作机制，积极贡献可靠的治安力量，才能保证西南地区经济平稳发展。

大国导航——北斗二代系统的历史意义

马平 2012-01-16

2011 年 12 月 2 日，第十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入轨（不含此前 4 颗试验导航卫星）。凭借这一网络，从 12 月 27 日开始，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中国周边地区提供连续导航服务。从规模和技术水平看，中国卫星导航能力达到了美苏冷战末期的发展水平，补上了超级大国不可缺少的一门“必修课”。从近年发展速度来看，北斗系统的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将在十年内完成全球组网，压倒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成为和 GPS 系统平起平坐的世界性卫星导航系统。

第一代卫星导航

1、美苏争霸

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按照预定轨道环绕全球，同时向全球发射了供测控的无线电信号。卫星导航几乎克服了以往导航技术的全部缺点。

卫星因为可以按照预定频率、方向发射无线电波，而不仅是可见光，解决了恶劣天气下导航难题，而通过多颗卫星组网，可以组成真正覆盖全球的导航网。并且卫星导航的接收方可以从电波中推算自身位置等信息。也就是说卫星平台下，可以全球范围内各种条件下接受导航。

所以，在第一颗卫星发射后不到 1 年，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的同时，美国就开始研制第一代卫星导航台——NNSS 系统（美国海军导航卫星系统）。1960 年，人造卫星仅仅出现了 3 年，美国就发射了第一颗“子午仪”卫星（因沿子午线飞行而得名）。到 1967 年，美国海军已经拥有了了 6 颗“子午仪”卫星，初步完成了全球组网。
冷战的另一方苏联从 1965 年开始连续发射导航卫星，组成了 12 颗卫星的导航体系(CICADA 系统)。为世界提供了另一套第一代卫星导航系统。

1967 年，美国开放了卫星导航数据，全世界的船只都立刻接受了新的技术。卫星导航用户迅速增长到 10 万左右，包括大部分世界远洋货轮。卫星技术在出现后不到 10 年内就对民用经济产生了显著的促进。

2、北斗一代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 1970 年，比美苏晚了 10 多年。所以，美苏第一代卫星导航体系开始运行的时候，中国的航天发射能力和测控技术还远不足以满足卫星导航体系的需求，只能被动地使用别国的卫星导航。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缓和，所以中国的船只、探险队大多使用西方技术，追踪美国的卫星信号定位。

直到 21 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在冷战后的新局面下才开始建立本国的卫星导

航系统——北斗导航。不过，由于资源相对有限，从 2000 年 10 月到 2007 年 2 月，中国一共只发射了 4 颗导航卫星，分布在较高的同步轨道上，采取双星定位方式导航。

定位一个点需要三个坐标，三个方程，两个卫星提供的瞬时数据显然不够用，所以北斗系统要在预先设定的电子地图上读出高程信息才能使用。这意味着卫星和用户之间不是单向的发送——接收关系，而是要进行双向沟通。

因此，虽然北斗系统利用了几十年来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要胜于美苏第一代卫星导航系统，但这一系统存在如下问题：第一，限于卫星数量，只能对中国及周边地区进行导航；第二，作为军民两用的系统，导航和军事要求的静默之间存在冲突；第三，双向沟通效率较低，不适用于快速移动的目标。

不过，从建设之初起，北斗系统（一代）就被定位为一个验证技术，积累经验的试验性工程。在北斗系统的最后一颗实验性卫星上，中国安装了用于精确定位的激光反射镜，为下一代导航卫星网的部署做好了准备。

第二代卫星导航

1、一代卫星导航的不足

第一代卫星导航网虽然是划时代的进步，但也存在许多不足。第一个问题就是卫星数量不足。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实际上都只能连续覆盖地球一部分交通繁忙的地区，卫星对高纬度地区的覆盖率不够。

卫星数量进一步限制了导航原理——导航对象同时只观测一颗卫星，根据卫星和自身的相对运动轨迹来判断自身的位置。结果，精确的定位往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在这期间，导航对象的运动就不得不被忽略，这给导航精度带来了很大的误差。高精度的定位必须在停止运动的情况下才能做出。

而且，当时无线电信号处理能力较差，多颗卫星之间信号很可能相互干扰，因此不能简单增加卫星数量。还有像原子钟精度、轨道测定精度都会限制卫星导航的精度。简而言之，第一代卫星导航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导航，直到第二代卫星导航网出现。

2、二代卫星导航的前提及优势

第二代卫星导航网自 70 年代末开始组建，依然是美苏各建一套。美苏各自于 1979 年和 1982 年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二代卫星。美国的就是我们熟知的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导航系统）。苏联的简称为 a，即俄语全球导航系统的缩写。

第二代卫星导航网能够出现，技术前提是美苏强大的航天发射能力。基本的全球导航网至少需要 18 颗卫星来维持，再加上必要的候补卫星，同时要有近 30

颗卫星在轨，才能可靠地对全球99%以上的地区提供导航信号。而且卫星会老化，卫星轨道会因为顶层大气的摩擦而变形，每年都要发射新的卫星来更新系统。美苏光是为了技术验证，就各自发射了十多颗作为消耗品的人造卫星。从技术定型到勉强组网，苏联（俄罗斯）足足发射了 54 颗卫星。如果做不到批量生产卫星和火箭，做不到高频率的航天发射，那么不要说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网，就连维护都做不到。90 年代的俄罗斯就差点因此把格洛纳斯系统报废。

如此之多的导航卫星，可以在天空没有遮挡的情况下，保证地球上的用户任何时候都能接收到来自四颗卫星的信号。每个信号源都可以测出从卫星到用户的时间，再乘以光速（无线电波的速度）就是到卫星的距离。根据简单的数学原理，两个球面交汇于弧线，三个球面交汇于点。所以同时取得三个卫星信号就能够确定任何一点的坐标。为了保证用户的时钟和卫星时钟一致，第四个卫星信号可以用来校正系统时间。于是 4 个卫星信号就可以保证高精度的定位。再通过对卫星信号变化率的测量，用户就能知道当下的运行方向和速度。

卫星的轨道数据随时是预先设定好的，但也在缓慢变动。所以，任何一个时刻卫星的位置也是个变量。为了保证三个“球面”的球心位置准确，卫星发送的导航信号实际上是一段内容丰富的电文，向用户随时通报卫星的位置。卫星本身本身不具备计算能力，所以分布在全球的测控站必须随时监测卫星的运行，根据各种环境的微小变化来计算轨道，再把轨道信心传递给卫星，由卫星传送给用户。在计算中，地球各部分引力的微小变化、太阳活动对电离层的影响、甚至卫星高速运动带来的相对论效应都必须纳入考虑。如果没有丰富的地球物理数据以及强大的计算、通讯能力，卫星导航的数据很快就会被误差淹没。所以，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开发导航卫星。其中能筹建到足够的资金、组织足够发射能力的国家就更少了。

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美国全胜，所以真正能够提供稳定服务的全球导航系统，几十年来只有 GPS 一种。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格洛纳斯体系后，一直不能正常地建设维护，可用卫星一度不到 10 颗。直到近年石油价格高涨，普京才能调集足够的资源来重建卫星导航体系。2007 年，俄罗斯造出了合格的格洛纳斯车载信号接收机。去年 12 月，格洛纳斯卫星达到了设计中的 24 颗在轨数量，2012 年 1 月，俄罗斯终于可以宣布格洛纳斯系统正式运营。和北斗系统开始导航服务的时间几乎相同。

3、诸强的导航开发

另一套名声在外，却迟迟不能运营的第二代卫星导航网络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1993 年，冷战刚刚结束，不甘心做美国附庸的欧洲就开始策划自己的导航体系。2000 年，欧盟提出了初步实施计划。当时中国的军工和航天工业正处于发展低潮期，因此中国曾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参与“伽利略”计划，试图通过“入股”的方式获得美国之外的卫星导航服务，也从中分享欧盟的航天、通讯技术。

不过，和欧盟大部分决策一样，宏大的计划总是一拖再拖，造价一涨再涨。

目前，伽利略系统的预算已经从 70 亿欧元增加到 200 亿欧元，预计中 2002 年即开始试运行的的卫星导航系统，到了 2012 年还是见不到影子。所以中国早早地放弃了和欧盟的合作，自行开发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直到 2011 年 10 月 21 日，伽利略系统才迎来了第一次正式航天发射——两颗由俄罗斯火箭搭载的导航卫星（此前曾有试验飞行）。在欧洲各国普遍陷入债务危机的背景之下，伽利略系统能否在新的期限上——2020 年完成组网，世界舆论普遍持不乐观的预期。

在美、欧、俄之外，值得一提的卫星导航计划还有日本和印度的导航计划。日本尽管在军事上是美国的附庸，但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是提出了一个由 7 颗卫星组成的区域导航计划。只是日本实际上缺乏可靠的航天技术，制造导航卫星的技术也不足，只能抄袭美国的 GPS 技术。从效果来看，日本这一计划的唯一优点只是增加了日本上空的 GPS 卫星密度，避免高楼林立的城市地形遮挡信号。争夺国外导航市场的能力很差。迄今为止，日本只发射了一颗实验性导航卫星。

印度一向自诩为世界大国，也不甘心把导航这个军事-经济命脉交到别国手中。2006 年，印度就做了一个 2009 年开始实施的区域卫星导航计划，只是直到今天，印度还没有一颗哪怕是实验性的导航卫星上天。估计这一计划会像印度开发了 40 年的“阿琼”坦克一样成为永恒的传奇。

北斗的价值

中国的全球导航计划起步晚，底子差，一度还托庇于欧洲的“伽利略”计划下寻求分享技术。但中国毕竟是美苏之外唯一拥有独立航天工业体系的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规模的扩张，经济实力指数化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逐渐进入领跑世界的第一集团。已经实施到一半的二代北斗导航计划，无论在规模还是导航精度上，都和美俄的导航体系相当，甚至有所超越。

按照规划，北斗二代系统包括 5 颗同步卫星，3 颗倾斜同步卫星和 27 颗中轨道卫星。采取和 GPS 类似的原理，即 4 颗卫星同时定位、授时。免费信号的误差可达到 10 米以内，测速误差小于 0.2 米，授时精度小于 50 纳秒。

不用说，这样庞大的工程，再加上遍布全球的测控网，投资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美欧类似的工程都需要上百亿美元（欧元）才能完成。但不论是美国的 GPS、欧洲的“伽利略”、俄国的“格洛纳斯”还是中国的“北斗二代”，都在建成后，或是宣称建成后要向全球开放信号，免费提供导航服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耗资巨大的重复建设，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过去的 30 年，在美国垄断最精确卫星导航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先是使用美国的“子午仪”卫星导航信号，继而免费享用 GPS 信号，都没有受到任何干预，为何中国还要花费巨资来建设维护二代“北斗”系统？

首要的理由显然是军事安全。

迄今为止的卫星导航系统，虽然都能发挥民用效益。但追根溯源，初始动机都在于军事用途。美苏（俄）的两代卫星导航体系都是冷战产物不必赘述，欧洲

的伽利略系统，本身就是“欧洲独立防务计划”的一部分。印度的卫星导航计划是由空军推动的，日本的卫星导航计划，既可以看做日本军事“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辅助性计划。

各国争相发展卫星导航体系的原因是军事技术的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武器的射程、航程、火力、机动性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原本被地理空间割裂的不同战区被连通为一个全球战场。如果没有统一、可靠的导航体系，再多的军队，也无法发挥数量优势协同作战，必然会被各个击破。

就是从发扬火力的角度说，火力=射程×破坏力×准确率。在导航系统的精确制导下，武器所能发挥的威力显然也更大。

对小国来说，反正开发不起，而大国基于军事安全，显然不能一厢情愿地依靠他国技术支持。事实上，现有的民用 GPS 导航信号正是 2000 年美国放宽 GPS 导航标准，允许民用用户分享一部分美军的精度的结果。美国能够放出高精度信号，也可以在必要时有选择地屏蔽信号，瘫痪对方的军事调动。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全球导航系统，就不可能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卫星导航系统也同样和巨大的利益相关。美国区分军民信号的模式意味着在免费的普通精度信号之外，还可以有偿出售高精度信号，这当然就能产生巨大的利润。甚至在将来，不排除除了航空、测量需要有偿购买高精度信号，就是一般的生产生活也都因为智能化而有偿使用更高精度导航信号的可能，如果都使用他国导航系统，其中的利润也将拱手送人。

当然，眼下的智能化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各国都在研究新一代技术。美国的新一代卫星定位系统 Block III 目前已处于装配调试阶段，计划于 2014 年发射。未来将有 70-90 颗美国卫星来取代现在 30 颗卫星的 GPS 系统。这意味着天空将越来越“拥挤”。在重要的同步轨道上，为了避免卫星相互干扰、撞击，卫星必须有一定的安全间距。尽早发射导航卫星，不仅是技术积累的需要，也是“占位”的需要。此外，为了便于制造卫星和地面沟通的通讯设备，占有合适的通讯频率也可以节约许多投资。按照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卫星频率的使用权属于先发射的一方。中国北斗系统抢在欧洲伽利略系统之前发射导航卫星，实际上已经占有了一部分本由欧洲申请的通讯频段。所以，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越快越好。

“天象”与国运

古人云：“一代兴亡观气数”。所谓气数，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天象来反映出来。这当然是神秘主义的牵强附会。但在人类能够发射卫星，改变“天象”的现代社会，卫星导航体系这种“天象”的确能否反映出大国的兴衰。

正如前面谈到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航天、材料、机械、精密仪器、通讯等多个行业天文数字的投入，财政紧张、技术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负担的起。反过来说，大国的经济、政治必然会受到全球各种因素的影响，

需要用可靠的全球导航体系来保证全球军事、航运的需要。所以，国家兴衰和卫星导航网络的建设互为表里，往往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比如说，前苏联组建卫星导航网的时候，国力正处于顶峰，每年可以进行100多次航天发射，间隔平均只有三天。马岛战争期间，为了从这场导弹时代的第一次海空大战中吸取经验，苏联在69天内连续发射了22颗卫星。所以苏联能在起步落后于美国的条件下，率先实现第二代卫星导航体系组网试运行。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本来预定于93年完成的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因此拖到2012年才完成。客观的说，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普京为恢复国民信心而进行的“面子工程”。因为俄罗斯已经丢掉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海外利益，可用的海军舰艇数量从1500艘跌落到50艘左右，

中国的卫星工业源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直到1970年才发射卫星。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一直依附于美国的卫星导航网来进行远程定位。这体现的是中国工业-军事实力相对薄弱的事实。从硬件上说，当时的中国在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无法真正独立，必须和至少一个超级大国合作，出让一部分利益，才有机会和平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发电量都超过了美国，航天发射次数和美国持平，让债务危机中的欧洲低头求助。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北斗系统出现了跨越性发展，超越了欧洲这个学习对象，也即将赶上曾经的老师俄国，和美国竞争冠军的位置。可见，**卫星导航系统既是大国争霸的工具，也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天空中闪耀的“北斗”星座，是21世纪中国最值得自豪的东西。**

2012年刚一开始，美伊（朗）关系紧张，三艘美国航母集结到了波斯湾周围。美国一面演练打通重要海峡运油的军事行动，一面酸溜溜的抱怨：“美国保持全球海洋的和平，中国是最大受益者”。客观来说，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冷战后期，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美国被迫把中国拉入自己的冷战体系对抗苏联。中国和西欧北美出现了史上最密切的军事合作，中国一度号称“北约的编外成员国”。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在西方获得廉价产品的同时，这一经济模式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中美欧合作的大环境中，中国免费利用GPS导航信号，能够入股欧洲“伽利略”导航体系，也是冷战带来的发展“惯性”之一。

不过，大国之间的“善意”必然是基于利益考虑。美国把中国拉为盟友，前提是有苏联这个更强大的对手。中国在冷战后继续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前提是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能威胁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后，俄罗斯的长期衰落已成定局，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工业国，独立开发了第四代战斗机和反卫星武器，和非洲等资源产地发展了密切的合作。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向东亚转移，计划在其他地区抽出实力，重点压制中国的崛起。在新的局势下，可以预料，已经被中国人习惯的GPS信号也不会再是可以安心使用的免费服务。中国开发北斗，既是国力的体现，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必须。

高铁的春天

马平 2012-01-28

2011 年年末，7•23 动车事故报告已出，上至部长、下至操作工的数十名铁路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分担了事故责任。在中国媒体上喧闹了差不多半年的动车安全事故，至此算是由官方盖棺定论。不过各大门户媒体的热情却早已远去，似乎只要完成了打压高铁的任务，其他都无关紧要。

虽然官方已经给出了调查结论，但动车事故引起的争论和对铁路安全问题的怀疑远没有尘埃落定——“带血的速度”这个 2011 年很多媒体给予铁道部发展高铁和动车的评价将继续影响舆论。但动车和高铁果真更危险吗？就在 7•23 动车事故发生之前几十个小时，河南高速公路大客车起火 41 人被烧成焦炭；2011 年 7 月 4 日湖北仙桃货车事故 23 人死亡，8 月 28 日河北中巴车追尾事件 18 人死亡，10 月 7 日天津境内高速车祸 35 人死亡，12 月 8 日济青高速百车连环相撞..这些事故恐怕除了当事人家属外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针对这些更嗜血的事故，媒体可曾反思过什么？可曾要求停下或者减少公路客运量？

媒体煽情的语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

动车事故的炒作，最大的原因在于远超以往的伤亡数量。在这个思路下，“尽可能降低死亡数量”应该是交通系统建设的首要目标之一。很显然，如果媒体真的关心中国人的生命，就应该把媒体资源集中于最容易导致人身伤亡的交通方式。提醒国人在事故率高的运输行业中增加安全投资，压缩基建投资；在事故率低的行业增加基建投资，这才是有逻辑、有良心的媒体宣传。简而言之，媒体在煽情之前，首先应该用数据说话。

媒体的炒作也并非全然不看数据，最起码，一切炒作的起点都是因为 40 条人命在瞬间丧失。但是，用科学的标准来说，数据必须有对比才有意义。40 条人命固然是个巨大的代价，但在更大的代价面前，就显得不那么震撼了——按照 2011 年上半年的数据，中国公路交通导致近 3 万人死亡，平均每天约 163 人。平均每 8 分钟会有一人死于车轮之下，每 6 个小时道路交通的伤亡就相当于一次 7•23 动车事件。中国铁路史上最惨烈的成昆线泥石流事件和荣家湾撞车事故，都赶不上一天内公路交通的伤亡数字。

仅仅用伤亡数字还不足以全面评价运输系统的安全性。最合理的办法是按照“人次×公里”来计算死亡率。从过去几年的平均值来看，每百万人公里的伤亡人数之比，铁路和公路的伤亡差不多是 1：24。这还没有考虑到大部分铁路造成的伤亡实际上缘于平交路口的汽车驾驶员违规。

另外，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成本之比约为 1：3，能耗是 1：4，占用土地的比例约为 1：5。铁路全面胜出。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言而喻，要想少死人，媒体就应该多关注伤亡率最

高的公路运输安全问题，同时呼吁让铁路承担更高比例的客流运输。而在中国这个国土广阔人均资源不足的国家，低能耗、占地少的铁路更应该是客运的首选方式，而不是指责明显比其他交通部门做得更优秀的铁路系统。

铁路滞后就是对生命的蔑视

在 1950-1980 年期间，中国执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国有的铁路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平均每年新增铁路建设里程 923 公里。

虽然中国从无到有地建设了汽车工业，但铁路依然在客货运输中占绝对主导地位。1980 年的时候，铁路承担的旅客周转量是公路的两倍。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转为强调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铁路迎来了一个建设低潮期。1980 年到 1995 年期间，平均每年铁路新增里程只有 313 公里，最低的年份只有 250 公里。在这个阶段，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见效快、投资周期短的公路运输更感兴趣。在最极端的 1997 年至 2002 年 5 年间，公路投资额达 1.4 万多亿元，铁路则不足 3000 亿元。2002 年，公路获得的投资额相当于铁路的 5 倍，铁路承担的旅客周转量只有公路交通的 60%。

公路大发展的代价是交通事故的伤亡急剧上升。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2002 年短短十余年，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数量从 5 万跃升到 11 万左右。近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也一直保持在 6 万-7 万的水平上。中国亟需更多、更方便的铁路运输来替代伤亡巨大的公路运输。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公路交通的伤亡有所下降是在总交通量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说明加强公路安全宣传有巨大作用，公路安全才应该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同时，公路伤亡数字的下降，另一个社会背景是铁路获巨额投资，全路网大提速、高铁、动车里程不断增加，铁路的客运周转量和舒适程度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分流了公路交通的大批旅客。像京沈这种中程繁忙线路，在动车开通之后，主要客流已经从公路转向铁路，伤亡数字因此大幅下降。

高铁和动车建设的另一个效应是减轻了普通铁路的客运压力。把客货混跑的普通铁路变成以货运为主的重载专用线，提高铁路货运效率，替代公路货运。

众所周知，繁忙的卡车运输是道路安全的重灾区，疲劳驾驶、超载、超速屡禁不止。而且与铁路运输相比，要多消耗数倍的能源。30 年来，由于铁路运输相对滞后，时效性不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增货源大多转向公路交通，石油相对贫乏的中国因此形成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卡车车队。甚至因为铁路请车满足率（即申请车皮的成功率）长期保持在 40%以下，连煤炭、矿石这种最适合铁路运输的大宗物资也转向高耗能、低效率的公路寻求运输能力。这种 “以油运煤”的模式既浪费了资源，也造就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每年数万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很大程度上源于铁路货运能力不足。

铁路货运缺乏效率，车皮供应不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铁路大多采取客货混运式的运输模式。强调快速、准时的客车和强调重载的货车对铁道路

桥硬件的要求有很大不同，重载车皮通过得太多，对轨道造成的微小变形可以直接导致高速客车降速甚至出轨。所以铁路提速和增加货运能力很难兼顾。

此外，正如我们经常体验到的那样，铁路上的规则是慢车让快车，而货车又必须为慢车让路。铁路客运每次提速，实际上都在时间和空间上压缩货车的“通过窗口”。所以，在多次提速之后，中国原有铁路网的潜力已经基本挖尽，列车间距已经缩小到技术极限。要继续扩大铁路运输，要继续降低交通事故伤亡，唯一的办法是独立于原有铁路网，建设新的高速客运专线。从这个角度说，高铁的速度不仅不带血，而且是少流血的必经之路。

杀人不见血？

炒作动车事件的媒体，常用的一个说法是“生命无价”、“每个生命都不能用钱来抵偿”。

媒体占住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就给自己赋予了无限的批判权。铁道部管理下的动车既然死了人，那就有了无限的罪过，可以从年中骂到年末，再骂到 2012 年，大有铁道部一日不废，炒作一日不休的架势。

从哲学上来说，“生命无价”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没人愿意为一笔巨款出售自己的生命。不过，对于整个社会任何一个经济部门而言，绝对的零伤亡运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的话，所有的办公室修成碉堡，所有的生产线都变成无人运行，所有的公共交通都改成步行，这势必会导致经济的运行成本超过全部工商业的效益，最终导致社会崩溃。

所以，现实社会运行必须容忍一定的死亡率，就像每年容忍全国 6、7 万人死在公路上一样。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力降低这个死亡率，不断地向社会安全的最短板调动资源，把死亡率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不是打着“生命无价”的旗号，在引人注目的项目上迎合媒体的炒作，无限地进行安全投资。

社会管理是一个必须量化控制的工程项目。所以，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在死亡率降低幅度和安全投资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比率。

或者说，在考虑具体的行业标准的时候，生命必须用一个合理的价格来衡量。以过低的安全投资漠视生命，或是以人造的道德制高点无限拔高某些领域的安全要求，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为全社会的安全开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无限拔高某些领域的生命“价格”，相当于削减了其他领域的安全投资，贬低了另外一些人的生命权利。

鉴于中国每年六七万人的交通死亡数据，如果几个月来对动车事件的恶意炒作导致公路和铁路的旅客周转量出现哪怕 1%的增减，这就意味着数百条生命的无端死亡。不知道那些自诩社会良心的媒体人可曾考虑过这些问题？再考虑到安监部门的精力、投资会因此从危险的公路交通撤出，转向闪光灯之下的铁路系统。那么用不了半年，媒体在中国造成的“屠杀”就会数十倍于一次动车事故。

归根结底，媒体宣传的方向出现偏差，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市场份额和利润。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利润这根胡萝卜在前，媒体自然丢下了自诩的“社会良心”。对此，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自己也有过尖刻的评价。当年刘涌案曾引发了社会争论，著名的自由派教授王怡有篇文章叫《法学家怎样变成有机知识分子》，文中说：“诉讼是这样一种模式，你要发言就必须先问你屁股坐在哪边。法庭不能接受任何一种自诩为不偏不倚的观点，因为只有法庭本身才是不偏不倚的。陈兴良等人既拿人家的钱要求发言，就是一个已经介入此案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发言前又干咳两声说自己下面的话是出于维护司法正义。他这话要是真的就对不起人家刘涌，是假的就对不起所有其他的人。”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评价动车事件中某些跳得最高的媒体，这些报刊网站为了吸引眼球赚广告费，抹黑高铁不遗余力。发财分红之余还要自诩“社会的良心”，这话要是真的就对不起投资者，要是假的就对不起其他所有人。读者是分得清什么是严肃的批评监督，什么是另有所谋的。

在动车事件中，那些积极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媒体，只渲染一部分事实，对另一部分事实视而不见；把媒体资源集中于动车事故带来的伤亡，向读者渲染高铁带来的直接问题，却没有指出放弃高铁，或是高铁降速、降低客运量带来的后果——大量客流将转移到危险性更高的公路交通，产生更多的伤亡。这才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制造了杀人不见血的效果。

民众将以生命为私有化买单

少数媒体和“砖家们”借着动车事故的热潮，最终走向极端化思维，清楚地提出了应对方案——拆分铁道部：

铁路部门出事故是必然的，不出事故是奇怪的..一套官僚系统运行精细复杂而市场的高速铁路体系，下场惨烈，温州动车事故就是典型案例。35 条生命的逝去，才能换回对铁路运行体制的改革，才能换来铁路市场与监管合一体制的反思。代价太大。..尽快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才能让我国的铁路建设摆脱在大干快上中噩梦不断险恶境地。

在中国近 30 年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泛滥的背景下，对市场、对私有化的崇拜已经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固化的思维方式。如果这个思路 100%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体户，最有效率的国家就是家天下的王国。因为任何规模超出个体户的企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所有者经过代理人实现的资产管理运营，其配置效率不如个体户。

这个推论显然和现实不符。原因很简单，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模型默认大部分交易本身不需要成本和信息，只要有供给、有需求，而且有价格差，交易就自然会达成。但现实社会没有那么神奇的交易所。交易需要成本，也需要时间，更需要通畅的信息。如果交易的成本太高，人类社会能否承担交易成本不说，仅仅是为达成交易而耗费的时间，就足以让经济全盘崩溃。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人类的对策就是成立超越个体户的企业，在企业内部用计划和指令建立固定的协作关系。用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未必是效率最高的组合，但至少企业节约了天量的交易成本。现代经济因此成为可能。经济越复杂，人类需要节约的交易成本就越多，大企业就越有优势。

著名经济学家钱德勒在其经济著作《看得见的手》中说：“在新的运输形式中，铁路是数量最多，活动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一种，他们是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方面的先驱。”书中第三章的标题即为“铁路——第一个现代工商企业”，这意味着从 100 多年前的 19 世纪中期开始，铁路部门的主要效率来源就已经从市场竞争变成了系统化的管理控制。170 年以来，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是蒸汽铁路、内燃机、电气化铁路还是现代的高铁网络，铁路的垄断化经营都是必然趋势。

当然，市场的崇拜者总是不愿意面对这种现实，总是希望在铁路系统内部也验证自己的信仰。就在不久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就做过代价惨痛的实验。

1994 年，英国把国有的铁路系统分拆成 120 家私营公司，分别承担地区性的路网维护、客运、货运、维修等职能。为了保持铁路系统的协作，120 家私营公司之间签订了 200 多种、共计 1.5 万多份合同，算是落实了市场化的运营方式。

结果，仅仅为了落实和不断修订这 1.5 万多个经济协定、处理因此引发的无数纠纷，铁路公司就疲于奔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甚至原有的正常运行也无法做到。为了节约成本，私营公司解聘了大批技术工人，代以低薪的非熟练工。私有化完成后的短短 5 年内，只相当于中国省级铁路网的英国连发 7 起重大事故，死伤惨重。其中火车对撞和出轨各 3 起。

英国用血淋淋的尸体为私有化支付了生命成本。到了 2003 年，英国政府在公众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决定，把铁路系统重新国有化，安全再一次得到保障。在今天的中国，铁路私有化、分拆铁道部的声音如此之大，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千千万万旅客也势必要用生命承担铁路的“交易成本”。

英国铁路私有化的失败案例并不遥远，想必高呼“分拆铁道部”的学者也不会无知到毫无耳闻。不过，既然分拆铁道系统，私有化运营并不能增加效率，倡导私有化的人为何如此积极呢？

中国有句老话说“无利不起早”。既然发言不是为了公益，那么自然是为了私利。在铁道部低利润甚至亏损运营的情况下拆分铁道部，低价购入铁路资产，再通过市场化运营谋取天量利润，这才是某些利益集团支持拆分铁道部的真实意图。不过，对于旅客而言，服务并不会因此改观，票价和运价却会有成倍上涨的可能，铁路运营的伤亡将迅速增加。普通人的生命和财产最终将是私有化之后垄断利润的来源。

2000 年，中国铁路每公里要承担 3026 万吨公里的运输任务，是法国的 7.9 倍、德国的 7.8 倍、美国的 2.7 倍。

2010年，仅大秦线650公里铁路，运载量已经达到2600亿吨公里，相当于印度6.3万公里铁路年周转量的一半，美国26万公里铁路年周转量的1/10。

5年以来，中国铁路高速客运从无到有，从实验运行到近1万公里国产化的高速客运网络。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接近全世界的一半。

这些不可思议的发展成就，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铁道系统进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相反，计划经济传统为中国铁路系统留下了政企合一的体制遗产，几十年来未曾有根本变化。在一个市场崇拜症泛滥的时代，这一体制曾饱受诟病，但客观上却最适应铁路部门的技术特性。

所以，虽然中国铁路系统的投资欠账很多，但这一体系依然超负荷地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运输服务。中国经济能够连续数十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铁路系统功不可没。当然，铁道部同样需要在管理运营中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真诚的批评声音，在保证科学安全的前提下，让投资、建设更透明、高效，要建立更独立的监督、反腐败机构。动车事故调查结论已经出来，处理结果也已公布，教训要吸取，工作要改进，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否定铁路系统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否定一条最尊重生命，最节约资源的发展道路。

对于华夏大地上普通的高铁乘客来说，他们也许用不着理解本文里每一个详细的数字，但他们用选择乘坐高铁这样一种用脚投票的方式，已经最扎实地向我们预告：龙年将是中国高铁的春天！

总要有人先死去——评中国直接购美债

马平 2012-05-22

2012 年 5 月 22 日，路透社忽然放出消息，称自 2012 年 6 月起，中国央行购买美债可以不再通过华尔街交易商，直接和美国政府交易即可。消息放出后不久，人民银行发出了一条名为“辟谣”的确认消息。人民银行称央行不会直接购买国债，外汇管理局才是购买外国国债的唯一机构。实际上，外汇管理局正是人民银行的下属单位之一。

这一消息对实际的国债销售影响不大。尽管中国可以不再通过市场竞价，直接和美国财政部进行协议购买。但一般来说，美国财政部不太可能让国债的利率、价格偏离市场太多。就像房产团购协议不会改变房地产市场基本面一样，中国或美国都不可能在这种协议中指望太多的利益。

不过，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两三个开发商和两三个买房的大客户（如机关、雇员较多的盈利企业等）。某个大客户和开发商之间的团购协议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尤其如此。一个房产商以优惠价换来了团购承诺，这意味着其他房产商的潜在市场急剧缩小，必须用更大幅度的让利来保证销售。现在世界的局势正是如此。

2008 年以来，经济危机席卷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政府都试图用印钞的方式来刺激市场，促进就业。很显然，钞票多了会贬值，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在整个市场都预期政府将继续印钞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可能会控制不住，一溃千里。所以政府必须有办法缓解通货膨胀，或者说回收一部分货币。

最直接的回收方式就是发国债。用承诺还本付息的债券来减少市面上的现金。尽管这会在将来施放更多的现金，但至少可以避免危机立刻爆发。换句话说，债务信用高，发债能力强的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越强。超发国债的国家往往就是第一个倒掉的国家。经济危机因此表现为国债危机。

在全球危机的情况下，最先崩溃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别国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像那个古老的笑话：“如果我不能比狮子跑得快，至少可以比同伴跑得快”。**欧美都遇到了国债危机，那么谁能取得中国的信用支持，谁就能避免先死于危机的惨景。**从这个角度说，中美的国债“团购协议”非比寻常。

中国选择美国不是无端的善意。从竞争关系来看，美国工业已经不能为自己提供足够的消费品，欧洲工业倒是还在积极出口，和中国争夺市场，让中国也体会到了需求不足的强烈压力。如果购买美国的空头国债可以打击最大的工业对手，中国或许宁愿接受这个代价。

此外，中国经济强烈地依存于全球市场和全球的资源供应，同时，中国海军相对美国海军微不足道，只是一支近岸防御力量。所以，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暂

时的盟友，中国选择美国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以上推论或许都是过于宏大的猜想。但路透社的消息和央行的“辟谣”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中美“G2 秩序”的影子。再看眼前的经济现实，2008 年的危机从美国发起，现在却可能借希腊-西班牙危机摧毁欧元。我们或许可以推论：欧洲，或至少一部分欧洲国家将成为全球摆脱危机的垫脚石。

六十年来家与国 —— 新书《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自序

2012-07-29

科幻时代

最近生活在西安。几个月前，有一次去宝鸡出差，拖到下午五点多才办完事，打算回家的时候已是黄昏。不知因为事故还是施工，本来畅通的公路水泄不通，堵车的队列漫长的好像没有尽头。幸而周围的风景不错，正好停车休息一下，就着风景听听音乐。泛红的落日从背后的云缝里照出来，给关中平原的村落农田涂上一层金色和一层淡红，往东看去，彩色的乡村好似一副精心修饰的怀旧照片。不知不觉，我竟睡着了。也许是因为车窗外的乡村景色，我梦到了远去的童年往事。

梦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因为我是被身后愤怒的汽车喇叭和敲车窗的声音吵醒的。顾不上多想，抬眼看见面前的堵车队列已经散去，我赶快手忙脚乱地打开雨刷车灯，点火启动，给后面憋了很久的司机们闪开道路。被带着湿气的冷风吹了几分钟，我才意识到天色已经全黑，好天气变成了蒙蒙细雨，看来堵车至少持续了几个钟头。

被嘈杂声从梦里拉到现实，周围的景色从金色的乡村绿野变成了黑沉沉的雨夜，这个反差让我顿生“今夕是何年”之感，几乎觉得自己从 80 年代穿越时空来到了 21 世纪。雨夜里的高速公路，堵车的队列刚刚散开，车灯组成的洪流前不见首后不见尾。遇到地形起伏和转弯，无数的光柱离开公路射入黑暗的夜空，画出一道光墙。在大灯的扫射下，路侧的反光标连成伸向天边的曲线。整个黑沉沉的雨夜因此被划成了两半，不再给人黑暗统治夜晚的感觉，在远方工业区的灯火映照下，甚至夜幕中的秦岭仿佛都隐约可见。一边开车，我一边惊叹，仿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一样。

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就算没有雨夜行车的经历，至少也不会对这种场面感到惊讶，因为这并不比任何一个城市二环路天桥下的景色更了不得。但我刚在梦中醒来，半个大脑还留在 80 年代，竟被这已司空见惯的景色狠狠震撼了一下。

20 多年前的中国，除了上海郊区的 20 公里沪嘉高速路试验段外，中国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只要一离开城市，即使是国道干线也立刻变成两车道七八米宽的窄路，最多在两边划条白线，再留上一米左右的空间给行人和自行车。这样的公路弯弯曲曲几千公里，贯穿整个国家，沿途串起无数的县城乡镇，夹杂着许多还没铺设沥青的土路面，构成了中国的骨干路网。

在生活在北方的我看来，低等级公路网中唯一的特例是北京到顺义的京顺

路，虽然还远不到今天高速公路的标准，但起码在城市之外设置了红绿灯，安放了中央隔离栏和路侧分隔带，做到了机动车自行车各行其道。道路笔直，不为沿途的小村镇而绕路，也不会每百十米就出现一个平面交叉口。这样一条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甚至已经需要改造升级的道路，在当时是绝对的工程奇迹。每次坐在解放卡车上路过这段公路，都能听到司机的感慨“开着真痛快！闭着眼都不会出事，要是公路都修成这样就好了……”

当年发感慨的司机，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可以想象，如果当年我和我父亲开的卡车忽然穿越到今天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滚滚车流中，恐怕只能目瞪口呆地停到路边，认定自己穿越到了科幻小说中描绘的场景。

那时道路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交通流。记得 80 年代夜里赶路，经常几公里碰不到另一辆汽车。从车里看出去，只能看到车灯照亮的一小块路面和路面坑洼留下的阴影，两边还能看到几十米被照亮的行道树，此外就是无尽的黑暗。如果对面有车开来，远远几公里就能看到远方另一片行道树被车灯照亮，以及黑暗中格外显眼的灯柱。为了避免司机在这种黑暗环境中被对面的车灯晃晕，那时夜间公路会车，不仅要把远光灯先换成近光灯，靠近时连近光灯都要关掉，仅靠 2 个小灯擦身而过。

这样的夜晚，在远处往公路上看，汽车的灯光虽然刺眼，但不过是无尽黑暗中转瞬即逝的小小光斑；从车上向外看，路侧工业城市的灯火会一掠而过，碰到其他的汽车是偶然事件。类似的场景看得多了，我得到了很感性但也很准确的认识——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居民为主的国家，代表工业时代的卡车和城市灯火只是大片农业地区的点缀。所以，当我带着一点 80 年代的回忆来看现在的高速公路时，在这最普通的 21 世纪场景中感到了科幻时代的震撼。

如果用当年的视角来扫视这个世界，感受科幻气氛甚至不用往车窗外看。我手边上便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廉价手机，这个在黑暗中闪耀着蓝光的小东西，时刻和遍布中国的基站进行不间断联系，可以让我在几秒钟内和任何一个朋友通话，或是在一瞬间接收几百字的信息。80 年代初最便捷的通讯方式——电报，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被这个小东西踢进了博物馆。车上最廉价的 GPS 信号接收器，能够以米级精度显示我的准确位置。其实，对于 20 年前的我来说，完全不需要知道 GPS 的实际用途，只要告诉我这东西正在时刻监测着卫星信息，让我听到“卫星”这个听起来完全超出 80 年代日常生活的字眼，就足以让我对技术神话顶礼膜拜了。

在看不到的车体内部，几十块单片机控制着我的汽车，让我这个上路没多久的新手也能在雨夜疾驶，用几个小时穿越关中平原。同样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开汽车从一个足以自豪的技术工种变成走路吃饭一样的平常事情，平常到大部分人会忽略其中的科技进步。

我身边的科幻场景可远不止高速公路和汽车。路侧的普通建筑如果换一种视角去看，也能震撼人心。90 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唐山，在公路上可以看到全套使用日本技术和日本机械的冀东水泥厂。十公里的传送带尽头耸立起一片白色的

宏伟建筑群，显得宏大而又精巧，在进入我视野的第一刻就让我看得目瞪口呆——这才叫现代化工厂，这才叫工业文明！因为这个工厂与一路上看到的红砖平房居民区和同样红砖砌筑、满是灰尘的的工业区截然不同；为了配合引进的先进生产工艺，它大量使用钢材作为支撑，在造型上要自由的多，一眼就能被看出来属于新时代。

现在，公路两边，不说蔡家坡，虢镇、兴平、杨凌这种现代化工业区，就是普通的乡镇，也遍布高耸的框架结构建筑和连片的大跨度厂房。在雨夜中，景观灯照出了这些建筑的轻盈轮廓和光洁的外表，证明了它们的用钢量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绝非砖墙承压、敦实厚重的老式砖混甚至砖木住宅可比。

再往前开，接近西安的时候，这些新式建筑渐渐连成一片，再加上远方数以千计的高层建筑，它们射出的灯火在地平线上形成一个连续的光带，甚至照亮了低处的云层。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这种场面还足以放到科幻电影里当背景，但在这个夜晚，很少有人会认为眼前的一切有什么特别。

车上的收音机在播报整点新闻，播音员用平静的语气说，2010 年中国钢产量 6.3 亿吨，接近世界其他国家之和。整条高速公路上，或许只有我这个年轻的怀旧者为眼前的景象，为一个 6 亿吨钢材支撑的科幻时代而感慨。

工业改变生活

生活在科幻时代而不自觉，也是一种幸福，就在我现在打字的时候，我 3 岁的儿子正在家里快乐的指挥玩具车。暂时不玩的玩具车排在墙边，大大小小几十辆排成长长的一列，其中颇有不少可以遥控。这在我童年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那时一辆可以遥控的玩具车动辄几十元，等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成人眼中的奢侈品，儿童眼中的珍宝；就算是无动力，无遥控的汽车模型，也总要好几块钱，相当于工人月薪的 1/20 到 1/10。一般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奢望得到这样的礼物。

现在，20 多年过去了，人民币购买力和普通人的月薪都有了几十倍变化，但当我走进玩具店时，我惊奇的发现大部分遥控玩具车还是当年的价格！几十元一个！一般的小玩具车也依然只要几块钱。无论是用普通人的月薪来衡量，还是用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来衡量，玩具车都变成了廉价消费品，而且做工质量比当年还强了不少。所以喜欢汽车的 3 岁男孩可以拥有四五辆遥控车、几十个小车模作为自己的玩具收藏。每天早上，我儿子都要清点一下最喜欢的几辆汽车，作为一天快乐的开始。

孩子们的快乐同样依赖于工业的扩张和进步。从原料方面看，由于国内石化工业的发展，制造玩具车外壳和大部分部件的塑胶比 80 年代要相对便宜许多。那时为了节约成本，许多玩具车要使用金属或者木制外壳，但也没有省下多少钱，因为塑胶加工要方便的多，只是开模具略贵。但以现在中国的轻工业规模，几乎每一款玩具都有几十万的生产量，还可以多个玩具共享通用部件，用一个模具。平摊下来，模具费用其实也没有多少。

至于玩具车的遥控功能，80 年代必须要用复杂的机电-机械结构来传达指令，协调各个轮子的动力和转速；现在的玩具车则像真正的汽车一样使用计算机来控制运行。读者到网上一查就能发现，市面上用于玩具的国产单片机，虽然只要几块钱，但可能比 80 年代指挥整条生产线的计算机还要强大。所以现在的玩具车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实现更复杂的控制，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乐趣。每次陪儿子玩遥控车，我都要替当年的我多玩一会，好圆一下当年拥有遥控模型的梦想。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为几十年的历史变迁而感慨并不是新鲜事。在上一代人的讲述中，可以听到另一个版本的幻想成真。

我父亲生于 50 年代，在那个时代，故乡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除了偶尔能从伪满留下的铁路上听到几声汽笛，父亲的童年世界没有任何工业社会的痕迹。每天早晨，叮当作响的驼铃声从门前大路上传来，成百甚至上千峰的骆驼商队从门前走过，带着北方蒙古草原的特产走向南面 100 公里外的长城隘口，半个月后再带着布匹和食盐返回。

驼队的兴盛是因为当时没有硬化路面的公路，中国大部分县城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只能通过泥土铺设的“官道”来进行。木制包铁的轮子刚性太大，遇到泥土路面任何的软弱点都会深深地陷进去，没法支持车辆在道路上长途跋涉，所以马队和驼队是主要的运输工具。

60 年代初的某一天，父亲发现家里的独轮车的轮子改成了安装橡胶轮胎的金属轮子，从此货物加在泥地上的压力被有弹性的车胎分散到更大的面积，这意味着车辆通行能力大大增强了，颠簸还减少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同时出现的还有马车使用的胶轮，于是各个生产队纷纷打造更多的马车，从日益裁员的马帮那里换来骡马，从农资公司购买新型的橡胶轮胎，在乡村中第一次建立了长途公共运输力量。

从此以后，山里的木材、山货和平川里的物资开始频繁交流，车把式成了新兴的热门职业，就连小脚的妇女都因此获得了逛一趟县城的机会。县城不得不为这种新兴产业设置了专门的大车店——60 年代县城的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

在 21 世纪的孩子看来，甚至在我这个 80 后的回顾视角中，贫困的农村多了几辆马车和独轮车，县城多了几排散发着马粪味的平房，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变革。但这对于几千年来少有变化的农村，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用我父亲的原话讲：“日子从此不一样了”。

1959 年，在几千里之外的兰州，中国第一个万吨级合成橡胶工厂竣工投产，开始为中国这个缺乏天然橡胶的温带国家提供制作轮胎的原材料。父亲当时还在学龄前，不会知道遥远的大西北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宣传画和下乡干部向他讲述的那个工业社会，原来或许听起来不过是个神话，现在通过工业化物资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威力，为穷乡僻壤带来了一次飞跃式的进步。所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也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坚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随后几年，村里的寺庙改成了小学，农村电网消灭了煤油灯，公社里架上了电话，有线广播出现在农村的街头，殷实的人家开始购买“戏匣子”——收音机。1970 年的一天，有线广播预报了人造卫星今晚的飞行时刻表。那天晚上天气不错，我父亲在自家的院子里目睹了国产航天器第一次划过星空，用收音机听到了东方红一号播放的音乐。

60 年代的农村没有科幻小说，他应该不会用“科幻时代”来形容社会的沧桑巨变。但每次听他讲述第一次观察卫星的经历，我都能体会到工业文明对 40 年前那个农村少年的巨大冲击。

20 世纪 70 年代，村后出现了一条沥青路面的公路，国产的解放卡车在上面成队地开过，日夜川流不息。比起高高在上的卫星来，这种身边的巨型工业机械更能激起一个农村少年的向往甚至崇拜，我父亲也不例外。直到 20 年后的 90 年代初，当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随父亲的汽车驶入偏僻山村的时候，还能从山里的孩子们眼中看到类似的神情。那是穷困的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所以，在少年时代，我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汽车司机，能够驾驭这种疾如闪电（解放车的速度上限是 65 公里/小时）、力大无穷（额定载重只有 4 吨）的机械，前往地理课本上讲述的那个广阔无边的世界。

他的愿望实现的不慢，或许比他自己最好的设想还要惊人。中学毕业后，我父亲先是在水库工地上劳动，用人力平板车运输土方，然后以高中生的身份接收了生产小队购买的第一台拖拉机，从此开始了操纵工业力量的生活。附近的矿山扩建，他成了一名矿工，又因为拖拉机驾驶经验而被选去当司机。

在我父亲的同事中，有一位朝鲜战场归来的老兵。这位老兵的首长曾经为缴获了几十台汽车无人会开而懊恼，一遍遍的向部下询问：“谁会开汽车？谁会修汽车？谁坐过汽车？谁近距离看过汽车？！”。因为近距离看过汽车，出身农民的老兵变成了驾驶员，在少数几个正版司机的指导下，练习了几个小时就开车出发。他们连一张“新手上路”的贴纸都没有，就要去接受崎岖山路和美国轰炸机的测试。

很幸运，这位没有驾照的志愿军通过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路考，战争结束后成为了一个熟练的司机。因为他们的英勇作战，当我父亲开始学习驾驶的时候，有充足的时间练习开车。出师不久，我父亲带着来自朝鲜战场的工业技术，每天奔波几百公里，往返内蒙古两次运货。再后来，他当过配件管理员，车队队长，还去读了几年大学。20 世纪 90 年代，从我父亲第一次见到解放卡车算起还不到 30 年，他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的运输处长，要管理上百台各种型号的重型卡车和工程机械。我至今记得他站在单位附近山头上，俯瞰着停车场和大修厂房时发出的感叹：“当年实在想不到有今天！”

今年，我父亲已经 56 岁，很快就要退休回家给孙辈讲故事了。或许他这几十年有很多遗憾，但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他加倍实现了自己的童年梦想，和千百万普通劳动者一起创造了“科幻时代”，这是一段了不起的生活。我很高兴我的儿子在享受科技乐趣的同时，还将从他爷爷那里听到梦想成真的往

事，从他的父亲口中知道从科幻到现实的平民历史。这些故事浓缩着家族和国家的历史，值得子孙铭记。

谨以此书：

祝福工业化的中国继续高速发展

祝福所有的中国人在工业社会中梦想成真

祝福每一个家庭都能留下工业时代的凡人传奇。

任冲昊 2011 年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大目标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访谈之三

2012-08-15 因过于啰嗦访谈一二不再引用

【1】你们稍显极端的提出了工业化就是普世价值，这种工业化崇拜和中国复杂的现实之间，构成了何种关系？

是指导性口号和不可回避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严格定义，我必须承认“工业化就是普世价值！”不算准确。这句话就像列宁说：“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一样，只说了最基本、最不可缺的部分。

事实证明，苏维埃加电气化无法避免苏联解体，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苏维埃和电气化，就没有列宁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类似地，工业化或许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必然是在一个工业化社会才能得到落实。

不仅如此，普世价值的各部分不是独立的，工业化是其他部分的前提。不实现工业化，不把绝大多数人类都融进现代化的生产、消费，就谈不上“普世”二字。所以说，如果要一个相对准确些的口号，我可以仿照邓小平的话说：“**工业化是第一普世价值**”。

不过，我必须指出一点，你可以说我“工业化崇拜”，即把工业化看成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钥匙。但这个“大部分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复杂的现实”，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房价问题、比如说宗教问题、比如说人口问题。但**不管什么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资源不**足。

比如说，房子无非就是土地和钢筋水泥，只要工业化水平足够高，我们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降低钢筋水泥的相对价格，让少数工业中心变成广阔的工业地带，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宗教问题，从社会来说，就是失业率高，年轻人没法参与现代化的生产和分配，所以觉得世俗生活不值得为之努力，所以极端宗教主义扩展的厉害。从国家层面说，几乎所有的宗教冲突都是争夺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石油。如果工业经济持续扩张，让大多数社会精英可以在经济增量里得到分配，而不是致力于争夺原有的经济存量，大部分矛盾也就自然消失了。总之，工业化是世俗社会繁荣和稳定的基础。伊朗这些年就是走这条路来缓解内部问题的。

人口爆炸问题，在一个有廉价避孕手段的时代，根源就是妇女地位不高，出去工作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在家当生育机器的成本很低。在发达的工业经济里，一方面女人不会因为体力弱势而不能正常工作，一方面女人在家生孩子的成本很

高，生育率自然就下来了。这些年埃及、孟加拉国人口爆炸，就是因为失业率高，男人都没工作，女人自然只有生孩子一件事是正事。

总之，前工业时代的人工作效率很低，地位也很低，人融入工业化经济，才能创造足够的财富，才能变的“贵”起来。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大部分问题，让人活的像人。

【2】书中有诸多对西方军事史、世界争霸史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理论描述，这种描述仅仅是“为我所用”，还是你们确认了，你们基于“历史的同情”已掌握了足以支撑你们观点的基本逻辑？

这个问题很直率。的确，历史是很复杂的东西，如果只截取一部分事实，几乎任何荒谬的观点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

比如说，如果你只看少数精英的回忆录，民国时期，甚至日占时期都是很温馨、很繁荣的美好时光。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人均寿命 30 多岁的恐怖时代，恐怖到我的祖父辈几乎从不提起那个时代夭折的孩子或者亲戚——司空见惯，不值得哀悼。

还有，如果你只看少数下放知识分子和知青的回忆，那六七十年代显然是一个教育崩溃的年代。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大量知识分子进入此前他们疏远的农村，中国才在广阔的农村建立了密集的教学点。在校初中生从几百万增加到几千万，中学第一次成为了普及教育。这个事实对于已经受教育的人来说当然是个打击，他们不仅被发配到了农村，而且发现仅仅读过中学已经不足以产生优越性了。但如果站在全体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文化繁荣时代。

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是说，当你把用感性来描述历史时，历史可能根据视角的不同，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大多数缺乏感性记述的普通人一边来描述历史，必须用数据说话，用客观的数据，而不是个体感受来描述历史。我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包含两组关键数据：人均寿命、受教育人口的变化。数据一摆出来，感性描述带来的错误形象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如此自信，而且能自诩是客观描述历史，是因为本书对历史的描述都尽量以客观数据为基础，以有对照的历史事实当依据，来构造一个量化的历史脉络。简而言之，本书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过去很时髦，现在很不时髦的词。

我承认，没有绝对客观的调查方式，没有绝对准确的数据，但只要你承认数据和同类事件的对比是构造历史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把历史讨论变成科学的讨论。我欢迎读者都能以客观的态度来质疑、反对本书的观点。只要讨论不陷进感性认识的口水，就一定有价值。

【3】在书中，你们提出了美国法西斯化的可能，这种观点显然在中国的部分学者或知识分子当中都会遭到嘲讽或质疑，除书中观点外，你们还有其他的观

点来支撑这个论断吗？

我想，这涉及 2 个问题：什么是法西斯，美国是否会在危机时选择法西斯化。

所谓法西斯，是工业化社会衰落的时候，中产阶级和破产中产阶级很容易选择的一种极端路线——团结到少数极端领袖和大资本身边，用极权来保卫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他们原来自以为是社会的中坚，所以和无产阶级不一样，不会反对一个让自己得益的秩序，不会选择推翻体制来解决问题。同时，他们也没有独立行事的能力和财力，必须团结到一个“强势”领袖周围，和军警结盟，用非常专制、非常野蛮的手段来维护旧秩序，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至于法西斯的外壳，可以是君主制，也可以是议会制，还可以是独裁制。比如说 2006 年泰国军事政变后，上台的阿披实政府就是代表泰国曼谷周围中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政府，外壳用的是立宪君主制。又比如说二战前的波兰，在 1926 年建立了”萨奈奇”军官团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比德国纳粹还早的多，但也不排斥议会政治。这体现的都是中产对边缘化威胁的不安。没理由说美国有稳定的议会民主，就不会搞法西斯。

美国过去当了 100 多年的第一工业国，先是用工业，然后用金融养活了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如果未来在中国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下，美国既不能保持工业优势，也无法从国外持续用金融吸血——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庞大中产阶级的工业物资供应必定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他们无非是两个选择，对金融统治集团宣战，内部革命，或是埋怨全世界不供养他们。从美国金融统治集团的手腕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至少不比前者小。所以，我认为美国法西斯化有很大的可能。从有备无患的角度考虑，这是一个必须考虑应对的未来。

从历史上看，上一次美国工业的大收缩是在 1929 年，那时候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曾经试图选择过法西斯主义。我这里引用一段《光荣与梦想》的记述来看：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 1931 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 年 9 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 34 个名誉学位、当了 30 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

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 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 年 2 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1935 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 1934 年 11 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美国这个趋势是被罗斯福拯救的。他用凯恩斯主义挽救了经济，带着美国打了一场胜利的世界大战，解决了内外问题。虽然冷战的时候，美国还有麦卡锡主义这种法西斯参与，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工业社会一直在扩张，中产阶级没有全面失业、破产的危险，法西斯主义也就逐渐边缘化了。

今天和罗斯福执政之前，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相比，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区别。相似的地方是工业经济都在收缩。不同的地方是，大萧条时代美国工业经济的收缩是暂时的，今天几乎可以肯定是永久性的，只是靠进口物资才填上了消费缺口。所以，从长期来看，美国内部必然有破产中产阶级支持法西斯倾向。我虽然不能预言这种倾向一定会吞噬美国，但世界第一军事大国法西斯化的可能性值得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未雨绸缪。

【4】你们认为最有可能打断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国际国内因素主要有哪几种？

从外部来说，几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第一工业大国的上升阶段，从没听说过哪个国家或者联盟能阻止它的上升。只有工业冠军自己放弃先发优势，眼睁睁看着其他大国赶超之后，世界发展的趋势才会发生变化。从可预见的将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可能在工业规模上赶上中国，所以我不认为有哪个国家真能阻止中国工业化进程——甚至包括美国。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情。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开始前都拥有广阔的领土，美国有中西部，英国则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广阔的领土既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也在开发中提供了足够的市场。中国地狭人稠，可利用地远不如美国，必须在国境之外获得足够的资源和经济协作。所以，虽然个别国家没法阻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中国不能和世界为敌，不能追求帝国主义目标。帝国主义化的中国会让此前的老牌帝国主义显得像天使，和世界人民一起来反对中国，自然也会掐断中国工业化的前景。

当然，当不当帝国主义，这主要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我不客气的说，现在一部分中国年轻人颇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这既是中国过去 200 年积贫积弱的反弹；也是在自卑心理环境下，一部分年轻人对欧美日帝国主义的盲目仿效。换句话说，他们坚信财富来自于征服和特权，而不是劳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反动”。中国因勤劳而兴，也必须靠勤劳而繁荣，中国的未来应该寄托于和世界人民一起勤劳，而不是谋求特权。

过去几十年，和“勤劳”这个词连在一起的往往是“节俭”。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人必须坚持的传统。所谓节俭，不是说我们要继续住集体宿舍，骑自行车上班，吃萝卜白菜。而是说，我们的消费不能超前，不能相信什么“消费拉动经济”的鬼话。工业需要投资才有增长，我们人均经济水平还差的很远，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持续投资，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我不反对收入分配合理化，但目的不是把所有的工业产出都消费掉，相反，是为了让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一起为未来而积累。现在中国有一种消费主义的错误倾向，反对投资，反对政府代表全社会搞基建，搞技术升级，希望把一切都分光吃净。这其实就是 80 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时把拖拉机拆成零件打锄头的思路。必须避免这种思潮。

总之，我觉得主要威胁有两个：帝国主义倾向和消费主义文化。

【5】在书里，你们认为“中国成功，多则三四十年，少则十年八载”，能否深入地阐述一下这一观点？也就是说提出这样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定义中国的成功？

单引这一句话很容易造成误解。这句话原稿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中国（以帝国主义路线）压倒美国，少则十年八载，多则三四十年。这说明，即使中国成功地变成世界帝国，最多也只能在帝国的位置上享受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是世界的总崩溃。

这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推出来的结论——帝国主义无法长久。正如前面所说，帝国主义是反生产的一种组织。帝国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全社会各个小团体一致认同用扩张来解决内部矛盾，实际上就是把最有活力的社会行为——生产，推给别人来做。从历史上看，这样的帝国是没法长久的，不是被推翻，就是自己慢慢腐蚀掉自己。

你指望帝国主义自控，有特权而不腐败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理智的行动，而是内部各个利益集团转嫁矛盾的自发行为，一旦发起就停不下来。直到灭亡。

此外，必须看到，工业化代表人类的未来。但不发展，低水平扩张的工业化没有未来。因为几百年来工业的基础都是矿业，要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才能维持运行和发展。眼下化石能源和各种矿藏都出现了耗尽的苗头。要是工业化不迅速进步到依赖可再生能源运行，不在地球之外开拓新的资源渠道，工业时代的几百年繁荣早晚会变成历史上的传说。

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投资，努力促进工业技术升级，让所有人在享用工业财富的同时，也以工业化的方式努力工作，为自己、为子孙后代投资，开发出不依赖地球矿物的工业体系。如果说几百万人的工业化英国，几千万到上亿人的工业化美国可以不在乎这个目标，有十多亿工业人口的中国却不能不在乎这个目标。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的发展路线。因为中国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意味着大部分工业剩余、大部分优质资源将不会用来投资，而是用来供养帝国化的中国，用来镇压全世界的反抗，技术发展会因此停滞。从现在的资源消耗速度看，用不了几十年，这样的世界就会因为资源而走上下坡路甚至崩溃。在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里，霸主也无法摆脱与工业经济一起灭亡的命运。所以，我一点也不向往中国称霸的帝国主义时代，也不认为这种时代能长久。

【6】无论“左派”和“右派”，他们在展开各种讨论时，都有意无意地无视中国工业化成果，你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情绪化的论断还是有相关的依据？

政治就是对社会的规划。不管哪一派，谈政治必然是因为对现在的社会有不满，试图用自己的规划改造现在的社会。

中国的政治讨论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之外，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至少看起来还是很和谐的——否则就没这个社会了。剩下能看到的不和谐因素，或者说这些讨论政治的网民，本身或许缺乏为政治观点付出代价的意愿，但无可否认他们的确具有改变社会的意图。

改变社会，行动上需要很多东西，这些暂时不提。仅限于思想本身，有两样东西也是缺不得的：道德制高点和可行性。

所谓道德制高点，就是论证自己提出的社会规划比现在更好。但实际上大部分网络政治派别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甚至给不出一个完整的社会规划，只能抓住一两条貌似简单的原则，比如“自由”、“民主”、“公有制”来搞宣传。这显然不足以赢得足够的支持者。

没有像样的社会规划怎么办呢？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把现在描绘成一团漆黑，认为过去的几十年毫无成就可言。只要把现在描绘的足够烂，那么自己主张的社会规划再缺乏支撑，也比现在强，也有道德制高点。这是他们否定当前工业

化社会的第一个出发点。

另一个出发点是论证变革的可行性。没人会主张一项不可能实现的制度。但很显然，无论左右派，都没法具体论证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哪怕是为了给追随者打气，他们也必须预言变革即将到来，预言社会上大部分人将支持他们。

这个预言的基础就是否认社会在进步、否认经济在发展，让追随者相信社会在衰退，至少陷入了停滞。这样才有信心支持新的社会制度。这种话说到最后，他们把自己也催眠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左右派一起否认中国工业化成果的荒谬现实。

总而言之，我认为他们否认工业化成就的原因有两个：证明自己观点的正义性、证明自己观点的可行性。他们已经是为证明而证明，或许谈不上情绪原因，但也绝对没有可靠的依据。这正是他们边缘化的原因。

我并不是现体制的全面支持者，我也认为中国需要变革，从政治到经济需要全面的新制度。但我并不认为变革的原因是工业经济衰退。相反，我认为，需要变革的原因恰恰是中国工业社会发展太快，以至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容不下新生的七八亿工业人口。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的改造，前提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社会变革，才当得起："社会进步"这个描述。

【7】你们怎么理解你们书中表现对工业化的乐观，与当下中国年轻人所面临的困惑与痛苦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一回事。

工业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生活、工作选择；但是，他们的眼界和目标提高的更多。所以他们觉得更困惑，更痛苦。这一方面证明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人口的工业化才是真正的工业化，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工业社会大有前途，证明新一代人愿意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中国人还远没有停在一个安逸的社会里享受的意愿。

【8】美元类似于军票这样的论断，是否对美元在历史上、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所起到的作用有所歪曲？请假设一下，如果美国死于美元，将是何种死法？

第一个问题：历史地位和当前的价值没有必然联系。法币刚发行的时候也很坚挺，最后还是变废纸了。

纸币就是纸，只是因为有实际财富可兑换才有价值。用来兑换的财富要么是自己生产的，要么是剥削别人的。过去美国努力搞生产，用自己的财富给纸币当担保，当然美元有可靠的价值。现在美国年年逆差，用全世界的财富替美元担保，这样的美元基础不稳不说，从性质上来说就是世界的祸害。纸币没有变，变的是

财富的来源。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不该这么问。从现在看来，美国资源丰富，平均劳动力素质不差。很难想象美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会迅速死掉，毕竟巴西、墨西哥这种黑帮当政的国家也能维持。真正会死的是美帝国，在全球驻军，用金融手段剥削世界的美帝国。这个帝国死于美元不是“如果”，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值得讨论的是具体表现方式。

其实看看最近被危机逼向绝境的希腊和西班牙，很多细节就能说明未来美国的命运。国债卖不掉，又不敢离开欧元区印钞还债——新印出来的钞票没人要。只要美国印钞的收益低于全球驻军的消耗，我们就能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和金融信用螺旋下降，只有法西斯化、全面收缩，和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正常国家两种选择

【9】你们认为你们的总体观点哪一部分最容易受到攻击？

对今天中国的定位。

正如前面的问题所提到的，无论左派右派，都拒绝承认现在中国的工业化成就。都不认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而且即将成为最重要的国家这一事实。这个定位会从根本上，而不仅仅是从逻辑上掀翻他们的观点，消灭他们的存在价值。砸人饭碗是惹人恨的事情。

【10】设想一下，胡锡进、茅于轼、方舟子、韩寒看到本书的评价？

胡锡进：这本书的资料很全面，应该对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有启发，结论未免有点说大话。但我还是打算选几段数据放到环球时报的评论版。

茅于轼：我翻了一下这本号称要提出新的普世价值的书，一没提市场，二不提自由，通篇都在炫耀低水平下堆积的庞大产能。这是典型专制教育下自我麻醉的产物。

方舟子：没有读完，因为读不下去，不想评价。就读过的部分而言，作为学术读物太粗糙，作为时政读物太繁琐。

韩寒：我这个人对政治、经济什么的大话题也不关心，我就是上海小镇的一个普通人。推翻美国霸权什么的，你到街上问问摆摊的老头，他关心么？我和他的态度是一样的。作者如果真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我想请他一起到我家乡的小镇街头抽根烟、散散步，看看城管和市民，然后再谈这个话题。

【11】从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来看，是一群生于工业时代的青年人针对中国的工业化现实与未来世界格局之间关系，提出了自己构想的作品，你们认为这本书中的哪些观点是最具建设性的？

从历史的角度说，建设性的观点几乎没有，都是前人曾经说过的。但从最近一代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捡起了许多被遗忘的宝贵思想财富，用今天的语言和事例做了新的阐述：

a 工业化劳动是财富之源

b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艰难，成果辉煌

c 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做帝国主义

d 中国的繁荣和世界的繁荣密切相关，中国要和亚非拉人民一起现代化

【12】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很多年的，但现在中国工业化成果一方面正以强大的竞争优势改变世界格局，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问题，而你们对工业化的前景是乐观的，你们是怎样看待工业化带给中国的负影响的？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工业化进程太快，快到过渡期只有一代人。结果就是新一代人身边缺乏农业社会的对比，工业社会的富足、安宁、基础设施都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条件，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不需要为之付出任何代价。所以，他们就像欧美的小资一样，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规则和平等不满，不愿意为维护工业社会而辛勤劳动，总想追求一个虚幻的、不受限制的天堂。这种思潮如果真的落实，结果将是工业社会的崩溃，他们的所有梦想消失，饱饱地吃一顿快餐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至于其他的诸多问题，正如前面所说，不是因为社会给我们的福利变少了，是大家的心变高了。

【13】对中国的工业化进行完整的回顾，分析以及前瞻性的探讨的作品似乎只限于学术著作，而鲜有大众普及度较高的作品，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实状况？这本著作会改变中国人对工业化的认知程度么？会有怎样的改变？

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不够用，致力于在工业基础部门追赶欧美，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科普工作。二就是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即过渡期太短。从大部分人生于农业社会，到大部分人生于工业社会，只有不到一代人时间。结果就是普通人要么无法感性理解工业社会，要么是漠视已经成型的工业化社会。

这本书的四个作者，在少年阶段正好经历了中国短暂的过渡期，所以，我们希望把个人感受和社会大变革联系起来。告诉普通人应该珍惜工业化的生活，应该努力建设更伟大的工业社会。如果我们暂时做不到让父辈和子弟辈的读者接受这本书，我希望至少能暂时能让经历过过渡时期的同龄人分享我们的感受，一起把工业化过渡期的观察变成完整的工业化知识体系。无论如何，这只是开始。

【14】这本书的“工业化”概念很显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规概念中的工业化，在你们理解中，工业化的战略概念是怎样的？

对于单项工作来说，工业化就是用现代工业生产的工具来劳动。比如说过去挖土用铁锹，现在上挖掘机，可以顶 100 个挖沟工人，这就是工业化。这也是普通人在工作中能直接体会的工业化。

但是，这种工业化代表着效率，却不一定代表效益，因为挖掘机本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须从市场上买来。如果挖掘机太贵的话，可能出动一次的成本大于 100 个挖沟工人的工资，这个时候工业化就没效益了。

之所以工业化可能没效益，是因为自己技术能力不够，用 100 个工人的劳动力，造不出能用一天的挖掘机。换句话说，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效率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具体工作的工业化是昂贵的浪费行为。现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挖掘机或是机器出售，大部分穷国也不是不知道用机器工作效率更高，但他们只能用劳务、粮食等初等产品来进口挖掘机，往往买不起，买了也得不偿失。这就是国家层面工业化和具体工作工业化的区别。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说，所谓工业化，就是所有的工具，所有的机器，包括制造机器的机器都要自己造。最终形成一个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所需的大部分机器都在体系内制造，有自我循环能力，然后再向社会各个部门提供工业物资，把具体的工作都工业化。中国过去 60 年，就是先用 30 年打造工业体系，再用 30 年升级，同时把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工业化。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15】在你们看来，在我们身边以及网络社会里，与你们持有相似观点的 80 后一代人是普遍化的还是你们只是年轻人中的异类？

从目标和感性认识来说，我们和大部分 80 后甚至 90 后、00 后都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中国继续繁荣，希望中国提供更多收入丰厚、工作体面、有上升通道的职位给年轻人，希望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能在今后得到延续。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个目标如何实现，或是如何可靠的实现。因为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专业分化很强的经济体，虽然大部分年轻人很熟悉自己的领域，但往往因此不能看到工业体系的全貌，不能从全局的角度来认识繁荣的原因。所以、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在年轻人中有市场。从这个角度说，本书的作者还是有些特别的。

我们几个人并不是专家，相反，每个人都跨行业地从事过三种以上的工作，至少去过 20 几个省份。这种经历可能对求职不算有利，但便于我们从多种视角来观察这个蓬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再加上我们生长于工业社会过渡期的有利条件，我们的确得出了一些即便在年轻人能中也不算“主流”的结论。但我们相信同龄读者的理性、智慧和阅历，他们很快也会捅破这层窗户纸，接受我们的看法。

【16】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国家社会以及国际整体格

局之间产生某些特定的对话和协商机制，而你们认为这本书发出的声音是独具特色的还是与前辈们一脉相承的？若是特色，特在哪里？若是传承，又继承了哪些？

年轻人总是要发声的，哪一代年轻人都不例外。看看历史上的记述，哪个时代都有类似“愤青”的记录。但是，大部分时候，年轻人的生活和上一代人没有本质区别，不管他们是抱怨还是建议，往往老一辈人可以付之一笑：“我们也年轻过，我懂”。

但是，在大变革的年代就不是这样了。老一辈人尽可以继续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年轻人经历了他们没经历的事情，在评判时事，预测未来的时候，阅历并不比上一代人差。甚至因为生于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感性认识更强，直觉更准，能够更理智地接受新规则。这个时候，年轻人的建设性建议就比其他时代的“愤青”言论具有更多的重要性。

我们刚经历过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七八亿人从农业人口迅速地转为工业人口。论起转变的重要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最起码也可以和秦始皇时代书同文、车同轨，消灭六国贵族相比。这么大的历史转折，我认为，年轻人的意见或许一如既往地包括许多不成熟的想法，但肯定比生于农业时代的父辈更接近未来。

【17】你们希望你们的言论被哪些群体接受，你们最不希望读者对这本书产生怎么样的评价？

最希望 90 后能读读我们的书，当然 00 后长大后也欢迎。他们很快就要走出学校，体验这个社会了，但他们又不像此前的两代人，没亲身体验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很容易忽视工业化的重要性。这个社会的未来终究由他们来决定，所以，他们是我最期望的读者群。

大部分门户网站，在文章后面会有一个表情选项，你可以点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表态。一般选项有这么几个：

深刻 及时 犀利 心声 新颖 荒谬 存疑 空洞

就本书而言，我最不希望看到 “空洞”，其次就是“及时”。因为本书不是一本被突发新闻催出来的应景书，而是对几百年来世界史，几十年来中国史的一个盘点，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长期战略的推断。对于认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过上几年、十几年再看也值得一读。

【18】书中的很多观点可能会被质疑、攻击，甚至谩骂，你们将如何应对这些不同的声音？

质疑的要听，如果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质疑，我希望能邀请质疑者一起座谈，甚至可能会邀请质疑者合写下一本书。

至于谩骂和无端攻击的人，我觉得出版商会很乐意帮我一个小忙，送他们每人一个高音喇叭。

【19】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将你们这四个人聚集在一起，写成这本《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读者分享？

不算巧合。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思想交流空间，也是一个高效的筛选机器。虽然网络上充满了各种观点，资料和垃圾信息，但只要你积极地利用网络搜集材料并发表言论，你很快会和与你观点相近的人互相发现，并和他们有更密切的交流。我们 4 个作者在决定合作写书之前几乎没有见过面，完全是通过网络成为朋友和合作者。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读者的只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网络是一个高效的学习系统，也是一个优秀的协作工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功能至少和网络的娱乐用途一样重要。

【20】你们处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从出生起就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经历了前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变革，你们既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生长于这个特殊时期，对你们看世界、分析问题、规划未来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前面几个问题里侧面答复过。

用历史视角来看，我并不习惯用“改革开放”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标识我的人生。这就好比你开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朋友打电话问你在哪里，你回答说在一个路灯杆下面。我经历过的 30 年，是中国工业体系从成型到成熟的 30 年，是中国大多数人口快速转为工业人口的 30 年。是廉价消费品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现代生活的 30 年。这个转变才是过去 30 年唯一重要的事。

我们的父辈亲手推动了这个转变，深知新时代来之不易，但他们的青少年还是在农业化生活中度过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无法体会新时代的全部美好。

我们的下一代直接生在成熟的工业化社会，能享受新社会的美好，却不知道工业化生活曾是稀缺品，是需要千辛万苦才能积累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容易忘记新时代的珍贵。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农业化生活向工业化生活转变的过渡期，青少年形成世界观的年头跨越了两个时代，所以我们能亲身体会到工业化社会的美好，也能体会到它的珍贵。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给读者的感受，是我们设计未来的出发点。

【21】你们几位都是 80 后，代表了年轻的一代，但是通看评论，很多人越来越有一个共识：80 后并不热衷政治、不关心社会，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有何见解？你们认为新青年应该如何关心政治？

我敢保证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从来没用过 bbs，不知道啥叫网络社区。但即便只用过微博也应该清楚，中国人，而不限于中国年轻人，是世界上最喜欢政治讨论的群体。

不用去专门的时政和思想论坛，就在最普通的车友会、宠物论坛，或是同城交友论坛里，最普通的话题也很容易转到政治讨论、争论和吵架。要是活跃 id 达到几千的 bbs 哪天没人为政治话题吵架，那真是个稀罕事。不要小看过去几十年政治课枯燥的政治启蒙，即便中国年轻人在毕业后只记得最基本的一些名词，相对国外的大部分同龄人也是政治专家了。所以中国的时政 bbs 比任何国家都热闹。

当然，我不是说 80 后只在网络上谈政治，任何一次同学聚会，任何一次商务宴会或者家庭宴会，政治也是从不过时的话题。我只是说，网络是新一代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

之所以上一代人觉得 80 后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觉得聚在广场慷慨激昂才是谈政治，觉得和中央委员握手才算玩政治。他们觉得谈政治的同时让所有人看到自己才算有意义。过去少数教育精英垄断谈政治权利的时代形成了这种思维惯性。现在中国的 90 后，至少三分之一有大学教育经历，几乎 100%的人会上网，他们有什么必要把政治讨论限于低效的广场讨论呢？

至于如何关心政治的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讨论方式问题。固然政治就是经济问题的集中体现，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每个人的政治观点都受自己的立场和视角的影响。但如果政治交流只是用来发牢骚，用来告诉别人自己的屁股坐在哪里，我看也不必讨论了，因为屁股不是脑袋，是没法拿来思考的。

讨论的目的是交流，是互相说服，是摆事实讲道理。如果你真的想对政治问题说点什么，希望能多说建设性意见，多拿事实和数据说话，清楚地表达你的立场和目标。这样，即便相互不赞同、不支持，至少不同的人也可以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各自构建有参考意义的模型。

【22】《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借助近现代史，构造了一个工业视角的世界模型，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如此庞大的一个问题，很多专业学者都没有定论，请问你们的角度和立足点是？

角度是唯物主义。我认为，繁荣的经济、高效的生产是一切文化成果，一切人道主义的基础。所以，我们不会直接去讨论“自由”“人道主义”这些目标如何达到。我们先考虑如何促进工业经济发展，为这些目标提供存在的空间。一旦物质基础具备了，我相信人类绝不缺利用这个基础的创意。

立足点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现实：工业化生产的效率远高于手工生产。

【23】这本书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工业的乐观，人类历史划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你们认为中国现在处在什么阶段，面临一个

怎样的拐点？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不是有点误解。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不认为会存在“后工业社会”，只有相对今天工业时代的“发达工业社会”。

只要人类还保持血肉之躯，还保持现在的遗传基因，就存在物质需求远超过手工经济效率的矛盾。唯有工业化生产能解决这个矛盾，所以说我们现在享用的社会和未来要发展的社会都是工业化社会。中国现在的阶段就是工业社会和发达工业社会之间的阶段。

发达工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就是成人与孩子的区别。孩子能吃能喝，但不能自己解决食物和其他用品的来源。我们现在的工业就像孩子，能制造丰富的消费品，能制造更先进的机器，却离不开地球母亲提供能源和其他矿物，一旦资源耗尽，当前的工业社会是无法维持运转的。所以，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必须追求产业升级，在更高的层次上超出不可再生资源的限制，维持工业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这就是发达工业社会。

眼下许多资源已经有耗尽的迹象，所以说，如果有什么不可回避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必须在资源耗尽之前进步到发达工业社会。这是中国乃至人类的第一目标。

【24】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主流的思想派别，其实都是情怀党，是中国工业化的绊脚石，请问你们是怎么看待“工业党”与“情怀党”的对决？

所谓情怀党，就是唯心主义，把人道主义、自由、爱情、梦想这些东西看作是独立的目标，号召大家直截了当地冲上去追求。

所谓工业党，倒不一定是唯物主义，但肯定把工业作为发展图腾，认定工业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

我觉得，所有成功都必须是工业党和情怀党的联手。情怀党告诉你要追求什么，工业党则客观地指出我们能追求什么，然后努力搭建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情怀党，我们可能会把工业图腾当作终极目标，的确可能陷入为发展而发展的陷阱，成为机器的奴隶。但如果没有工业党，那人类将求做机器的奴隶而不得，回到农业时代大多数人穷困愚昧的生活状态。我实在没法可以省掉工业党还是情怀党。

但是呢，眼下的情况是，能提出目标的多，能分析目标的少；指点江山的多，拿出测量仪器修路的少。物以稀为贵，既然情怀党过剩，工业党远远不足，我只能说，工业党是中国的要害，工业党的数量决定了中国的进步速度。

【25】《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可以说是第一本由年轻人自己表达对中国政治，和世界格局的对话。很多人称 80 后为垮掉的一代，但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你们认为第四代人将会在中国这段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已经扮演了哪些角

色？

网上有句话我很欣赏："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和平演变这回事让对手主导了是悲剧。但换个思路，如果我们自己干了，就轮不到别人忽悠我们干了，是不是？

和平演变这个词可能有点扎耳朵。虽然"和平"和"演变"都不是贬义词，但毕竟中国的对手用了几十年，好词也变臭了。我们可以换个词："主动转型"。总之还是和平演变的意思，但听起来大不相同。

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么？绝对需要。

从长期来说，就是前面谈的，工业社会要向发达工业社会跃进。从短期来说，中国好几亿新劳动力不愿意再上流水线，需要更体面的工作，更丰厚的收入，自由度更大的生活。这就是转型的必要性。

中国需要主动转型么？必然。

转型这种事，主导权交到帝国主义手里，往好了说是休克疗法，把一切福利折腾没了从零做起；往坏了说就是让人趁机收购，转型完了让买办当家。只有主动转型，才能避免苏联和平演变带来的崩溃阶段。

既然如此，只要我们这一代人有了工业化自觉，主动地迎接转型，"和平演变"还是一个威胁么？冷战已经结束几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只有美苏两条道路。我们作为共和国的第三代，自己给世界走出条路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第四代去和平演变世界，带领整个世界走向发达工业社会了。

（本周六，8 月 18 日，宋晓军老师、作者马前卒（即马平）共同参加上海书展，有公开演讲和现场签售。为《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做推广。地点是上海展览馆（展览中心）"东一馆"，演讲时间是 18 日晚 19 时到 20 时。）

中国文明只有 63 岁——《大目标》后记

马平 2012-08-24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许多人说起中国的未来也非常乐观。满口的“中华文明复兴”或是“中国是天命所归的霸主”。但是，我不认为我和他们的观点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他们喜欢说“自古以来”，说的是过去传承千年的农业时代，我则只认同年轻的中国工业文明——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历史只有 62 年，基石是共产党带着我们建设的工业社会，未来是给整个世界当榜样。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不需要复兴，只需要创造，不会因为年轻而羞愧，只会为自己的活力而自豪。

我说新中国文明只有 63 年的历史，本身听起来像是数典忘祖。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文明是需要人当载体的。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载体都是儒家士大夫，平民被割裂在文明和历史之外，直到新中国搞工业化，才把平民拉进历史的主流，这是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作为平民的后代，我当然要认同这个 63 年历史的新文明。

几年前，曾经有个人在网上发帖，说新中国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传统文化损失殆尽。然后举例，说当年民国晚清，人人都有字有号。现代的中国人都被毛润之带坏了，只剩下一个粗鄙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直呼其名在古代非常不礼貌，所以现代中国是个不懂礼貌的社会。

我立刻回帖，说这个价值判断对错暂且不论，仅从事实上说，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也是不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最多再加几个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级鸿沟。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然后歧视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说他们不懂礼貌，倒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礼貌地称呼没有字号的老百姓的？这种说法放在农业社会也就罢了，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玩这套，只能说明农业时代的等级思想还没有清洗干净，需要进一步推行思想革命。

常见的批判还有诸如繁体字简体字之争。这几年经常看到指责简体字的文章，动辄上纲上线，指责建国后几次简化汉字是毁灭文化，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联系，几乎把共产党骂成了不喜欢开科举的元朝。坦率的说，我是个书法外行，过去的繁体字到底有啥文化内涵，是否更美观，我不敢妄言。不过，繁体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 年的中国，识字率还不到 15%，人口的 85%是文盲，是读书人口中的“睁眼瞎”。剩下的几千万识字人口，大部分也不过是为了记账、誊抄才略通文字的伙计、富农。所谓文学的优美，书法，只对几百万旧文人才比较有意义，对于 90%以上的中国人而言，繁体字的“文化底蕴”一文不值。

新中国是个平民的时代，没有义务为几百万文人的怀旧感负责，倒是工业化社会迫切需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

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的资格。所以，消灭字形繁琐，影响识字速度的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势在必行。

从印刷的技术问题来说，简体字也大大有利于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为在铅字时代，印刷中最繁琐的工序就是拆版。当时在印刷完一批书籍后，为了给后继的书页提供铅字，每个版面里铅字都要按照字号、字形分别拆出来，逐个用汽油细细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门别类地放回字架。繁体字笔画多、转折多，做出来的铅字显然会影响拆版效率，减少书籍的印数。从普及书籍的角度说，推行简体字会大大节约成本，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实，新中国公布的第一版简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1935 年版，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表。只是民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政府各部充斥着旧文人，从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积极性。所以民国只有简化字表，没有简化字运动。只有坚决站在平民一边，坚决推行工业化社会的新中国才有魄力推行包括简化字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运动，让中国天翻地覆。1976 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不算没上学的孩子，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 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镜读报纸的奶奶，包括受过我中学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为世代务农的平民子弟，我必须站在平民化、工业化的新中国一边。为这个消灭旧时代，创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欢呼。

在 63 岁的新中国之前，旧时代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只归属于少数人。旧时代也不是没有仁义道德，不过地主文人们只知道用这种仁义道德去压迫百姓。比如说，绵延上千年的孔府，就是山东最大、最残酷的地主，养着上千仆人与家丁，地租比别家高上两成。遇到灾害，孔家不说减免租税，宁可逼死人命也要追缴地租。稍有机会，孔府就会霸占田土，抓奴隶，被霸占土地的农民要么被自杀，要么就当了孔家的佃农。

这个聚敛无度，视百姓人民如草芥的孔家，历朝历代都负责为新统治者证明统治合法性，提供儒家仁义道德的解释。孔家门上的对联是“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地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样的仁义道德，除了在士大夫和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制造和谐之外，又如何让我这个平民子弟向往，如何让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所以，对于我，对于大多数现代中国人而言，眼前的文明社会只有 63 年历史，新中国才是属于我们平民的时代。

新中国文明有着明确的工业化意识。在建国之前，新政权就致力于破坏旧制度，为工业社会做准备。建国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来破坏农业时代的族权，为新时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准备。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学教育，给了普通人自由恋爱、享受工业社会的机会。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中国的城市变成了生产中心，在构筑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同时，农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被批判，电影带着革命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影像走进每一个社区，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构筑的儒家世界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

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因为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止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的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 2 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

这种躁动是工业化教育的结果。30 年的时间，10 亿中国人的梦想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甚至超越了中国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决地走工业化道路。但我们的父辈实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个儿童那样急于获得精美的糖果，躁动因此汇集成震荡，反思变成了怀疑。儿童版的纯真和执著都走进了历史，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青春期喜欢直接的物质刺激。所以我们的父辈一度放弃了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口号，转而追捧各种“立刻见效”的思想，追随各种急功近利的运动。

“市场经济，一包就灵”，于是不管工业农业，全国一起搞承包，从军队到党校一起下海经商。“人体科学”可以快速挖掘人体潜力，全民爆发气功热、人人都想有特异功能。教育医疗从投资变成了包袱，于是教改、医改通通改成了收钱。国外的一切都被无限美化，所以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免税三年，拍屁股走人。国有企业被低税收的外资挤垮，只能 “减员增效”，宝贵的工业人口被迫成千上万地下岗摆摊。投机最来钱，所以社会资金涌向投机市场，炒股票、炒古董、炒大蒜、炒盐、炒房子，最后地方政府也把财政押到了高房价上，不得脱身。甚至传销老鼠会、水变油、永动机这些明显荒谬的戏法，也能一次又一次地骗走巨额资金。

这些“折腾”，是新中国工业社会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国的童年只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横向比没有先进工业国那么发达，纵向比没有农业社会那么稳定，建设过程中还拆了不少人为之迷醉的旧社会文化，挨点批判不奇怪。我们的父辈生于新中国的童年，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看不到工业社会的全貌，缺乏对工业化的理性认识，当初更多的是凭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红色工业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时间内产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二三十年来的折腾也不是坏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业化激情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业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确

的道路在哪。新中国童年的建设有激情，基础打的牢，也经得起青春期的折腾、付得起学费。再加上国际环境配合，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已经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 70 年代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到 80 年代国内精英纷纷逃离中国投奔自由世界，再到 08 奥运海外华人争相护旗，这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定位进行了两次 180 度转向。但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简单地转了一个圈，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自信。当年狂热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被自我否定，再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实实在在的自豪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结束，新中国即将成人。

社会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思考方式有影响，我们生于新中国童年的父辈已经用他们主导的新中国青春期证明了这一点。80 后一代是第一代生于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到了我们的骨髓里。不用宗教式的激情来拉动，我们就能接受工业化思维方式，冷静地观察工业化社会。

西方的富裕、美国的霸权、世界的广阔、工业化的威力、以及工业化必需的代价，这些客观事实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都是充满形容词的感性认识。往往会造成夸张的心理定势，进而产生错误的决策，碰壁才知回头。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丰富的资料触手可及，出国观摩一下其他工业化社会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对世界有清醒、量化的认识。所以 80 后不会再用“情怀党”的试错法来寻找道路，而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做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从宏观的角度说，这就是 80 后的优势所在——生长在新中国的青春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成熟的速度要比父辈快得多。

激情也罢、叛逆也好，过去的 60 多年已经都化为历史。在我们的眼里，父辈们曾经高大强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安心地看着他们给中国掌舵摇浆。现在，他们老了，他们已经到了回家养老抱孙子的年纪，交给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开始进入而立之年的 80 后，如何推动这个国家继续过去 60 年的快速发展？如何总结新中国的青春期，把工业社会推进一个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本书尝试给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方案。希望同样生于工业时代的 80 后读者们也来规划这个触手可及的未来。

“说完不之后，这本书在说是”

2012-08-24 长江商报

作者简介



任冲昊：同济大学训练的道桥工程师，后从事文字工作，现为观察者网主笔。网名马前卒，人称马督公，长期活跃在天涯、www.sbanzu.com、西西河、龙的天空等论坛。

王巍：本书主要策划人和作者之一，军事和科技爱好者，从事贸易工作。

周小路：宅男，文物店的小店主。

白熊：专攻国际关系，现为某杂志撰稿人。

导言

今年 7 月出版的《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是北京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亲力策划的年度重头书目。

1996 年，他曾策划并参与写作过《中国可以说不》，这本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持续被谈论，吸引了全世界 100 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盗版数量近乎神话的奇书。

2009 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横空出世，延续了之前“说不”的奇迹，张小波作为书商，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一度传闻他已移民加拿大。

这次，他找来 4 位在网络论坛上相识的 80 后，合作写成与前两本“中国”系列一脉相承的《大目标》。并在封面上用这样四句话表明姿态——

“新青年对老世界的一次历史清盘

新语体对旧格局的一次技术超越

工业人对情怀人的一次战略喊话

大目标对日常性的一次自由心裁”

本书主笔任冲昊说，“这本书无法用一句话概括。它的逻辑是先回顾近代史，借助历史构造一个工业视角的世界模型；然后以这个模型为出发点，结合最近的时事，探讨一条未来的发展道路。”

因此，这本书显然不是讲故事，故无所谓情节，甚至没有悬念，它只是从第一页开始，为你带上一副“工业化”眼镜，观察这个你自以为已经了解的世界。至于看完之后，是否决定把眼镜摘下来，或者“工业化”之视角是否已烙入脑海，这些都是读者自己的事了。

《大目标》面世一个多月，暂时还未搅起如它的“父兄”当年那般惊天的动静。一方面，是因为四位作者年纪尚轻，知名度不如之前宋晓军、宋强那般惹人注目，另一方面，也许是时代变迁，媒介更替，多元化的思维已成为常态，而之前两本《中国》的余温，还未来得及完全冷却、沉淀。

太阳底下无新事，想要吸引现在因刷微博而已经习惯接受碎片化信息，习惯随时获取到最新鲜信息的刁钻读者，去捧着一本 20 万字的书看（或者无论看不看，先买回去再说），其中所需耗费的心血与努力，可能要远远超过 1996 年做《中国可以说不》时百倍不止。

对政治、军事的热衷程度，与性别可能有关，但与年龄大概无关。无论是 60 后、70 后，还是 80 后、90 后，如果他们张开嘴唱出的是一个调子，除了就好这一口的粉丝照例捧场外，想要保持住自己的吸引力，则不是仅靠着音色的变化所能做

到的。

本报记者 刘雯

内容简介

一部历史写给现实的时事教科书，几位 80 后作者，站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回望 100 年前的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现在站在世界变革的风口浪尖，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应变大变局的力量。书中从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历史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世界各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回顾历史很容易，站在历史的车轮上选择下面的路却很难。这本书清楚地阐述了几位 80 后对当下道路的思考与选择。他们将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他们又将和这个时代协商些什么？

专访

“我们要什么，是怎么去赢”

锐读：这本书的作者有 4 个人，但是整体文风十分统一，请问具体是怎么分工合作的？

任冲昊：这本书是 4 个人合作，但初稿是我写的，之后每个人都改了一遍，并不是你分一段我分一段这样写的，所以风格上是统一的。

最初是凤凰联动的总裁张小波，想找一些年轻人来写一本这样的书，也算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然后他找到宋晓军老师（《中国不高兴》的主笔），宋老师就介绍我们去写这个书。

我的原稿是给出了一个总体逻辑，当时写了有 2 年时间，初稿 100 多万字，但怎么看都太像论文，书商那边不满意，他们觉得这本书应该非常通俗易懂，之后又一直改写，直到现在这个版本。

锐读：这本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不高兴》是一脉相承的吗？它目前的反响还未达到前两本书那种火爆程度，你觉得这是暂时性的吗？

任冲昊：这三本书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对于反对西方主导秩序等等，《大目标》是完全继承下来的。区别则在于，说完“不”之后，这本书在说“是”。

但是说不，是对美国说的，是对美国人宣称的普世价值说不，因为这些普世价值其实只对他们自己有利。《中国可以说不》讲的是我们不要什么，是怎样才能不输，而《大目标》讲的是我们要什么，是怎么去赢。

短期来说这本书不可能达到前两本书的影响力，因为前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知名人

士，而且在写书之前即已成名，论影响力我们几个 80 后是比不上的。

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的最高峰将在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到来，而且跌落也会比较慢，因为现在大量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工业人口，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来给他们提供解决方案。而据我所知，之前没有任何一本书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系统阐述的。

锐读：请问这本书主要针对的读者是谁？在你们几位作者活跃的论坛中，有网友跟帖说这本书主要是给“那些需要被传播论点的人”看，是这样吗？

任冲昊：实际上，这本书写的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而是都知道的事。只是它的阐述方式是与“工业化”挂钩的。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许是一样的，只是需要一个整体的阐述方式，而这本书所做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方式。也许我们看到还有不少人在盲人摸象，只得到片面的印象，无法通观全局，我们所做的就是想法让大家的眼睛能张开看到整头大象。

这本书也许在目前来看，与我们类似的 80 后，经历过两个时代过渡的同龄人会更好接受一些，而对于父辈和子弟辈则比较难。因为比我们小的一代根本没有经历过工业化之前的生活，他们一出生就物资富足。

“‘工业人’的声音不是主流，但它符合每个人的观感”

锐读：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本书是“工业人对情怀人的一次战略喊话”，请问“工业人”和“情怀人”的定义是什么？目前“工业人”的声音是占据主流的吗？

任冲昊：这句话并不是我们写的，而是书商最后加在封面上的。

在我的理解中，工业人指的是“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丰富是第一步，而要实现物质的突破，唯一的方式就是走工业化道路。

而“情怀人”信奉唯心主义，信奉感性的东西，比如爱心、仁义等等，认为有了这些东西世界就会变得美好。

情怀人认为美和道德可以改变世界，不错，但是要以工业化的方式来阐述，先把工业化做起来再说，到时候等到大家都能上大学了，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难道不好吗？

目前来说“工业人”的声音不是主流，但实际上它符合每个人的观感，它应该成为多数派。

锐读：有关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采访中你提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太快，因此未感受过工业社会之前生活状况的一代人，会对现代化的生活环境视之当然，反而形成西方的小资思想。为什么这种思潮会令工业社会崩溃？

任冲昊：现代社会，大家都喜欢少干活、多拿钱，他们远离工业化的劳动过程，但仍在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这些人反对工业社会，并不是他们就真的想回到农业社会，他们可能讨厌把工业本身当做崇拜对象，但是他们所吹捧和向往的田园生活、男耕女织，其实也只是一种想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工业化之前的生活。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转折年代的人才明白，不进步就会落后，不发展工业就会衰落。

我们只能尽量不碰壁地去解决这件事，中国要避免走美国那种老路，只印钞票不工作，产业空心化。

锐读：《大目标》的腰封上写着“不寻求争论，不害怕争论，不止于争论”，现在这本书也有很多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你是尽量求同存异，还是坚信自己所思考和掌握的就是对的？

任冲昊：很多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就像小孩子可能需要一定的惩罚才会认清错误。如果仅凭一本书，用语言去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也是不可能的。争论一定会有，没有争论就没有思考，只有争论才会变得更好。

“《大目标》不是百科全书，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锐读：书中多次出现“大国崛起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解释？

任冲昊：不是请客吃饭的意思就是这不是一件温情的事情，必须有人倒霉。

大国崛起的一种方式是，在不改变原来模式的基础上，干掉原来的霸主然后自己当新霸主，饭桌只有那么大，必须踢人自己才有位置坐，这不是温情脉脉的事情，因此才会接连两次发生世界大战。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模式，改变整个规则，不是挑战霸主的地位，而是把之前被霸主剥削、欺压的人都叫到自己这边，不让霸主继续进行剥削。这相对而言，会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互惠互利的模式。

锐读：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戴旭放言“日本自卫队敢在钓鱼岛动手，解放军就干它”。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强硬态度的？

任冲昊：无论学术水平还是其他方面，我都看不起戴旭，他尽捡些大家爱听的说，这是传销模式，不是解决问题。

钓鱼岛问题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日本没有军队，它的陆军主要是反登陆，而海军主要职能是反潜，其他的功能是零，它不过是个傀儡，跟它说些反日之类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上次中国出现反日游行时，日本那边已经在反对中国帝国主义了。

现在一切对话的对象最终都是美国，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海军力量是否比日本强

大，而是应该和美国相比。我不赞成对待钓鱼岛事件，经常放些要死要活的言论。那些游行、砸车的愤青也是保持理智的，否则他们怎么没砸自己家的日本电器跑去砸人家的日本车？

如果中国能压倒美国，日本马上就会倒向中国。

锐读：前两天在微博上盛传许小年的一篇访谈，他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以至于钢铁企业去养猪。这和你所说仍然需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多制造，多生产，好像是相反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任冲昊：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想不想买车？想不想住一个大房子？

中国人有炼钢的能力，为什么不炼钢？过剩是结构没有调整好的表现，而不是真的产能过剩，从钢铁人均占有量上来讲，我们跟美国还差得远呢。调整好模式，把钢铁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好吗？削减产能绝对不是解决办法，需要的是结构调整。只有多生产东西，我们才有财富，那种认为“钱是财富，物质不是财富”的想法是错误的，没脑子的。

锐读：在“币缘战争”这一节里你提到了乔良将军的《美国为何而战》，我看到网上有人反问，在有了币缘战略之后，靠现在的制度和人能否去实现得了这个战略？“就算老美在烂掉，谁能保证我们不会垮台？”

任冲昊：肯定有很多工业之外的因素会起到影响作用，比如腐败、体制等等原因。工业确实不能解决 100%的问题，但没有工业，100%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也许中国不是世界上最适合搞工业的国家，但真正的财富只来自于工业。工业不是充分条件，但它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大目标》不是百科全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观察者网”公众号负责人任冲昊：依法治国对网媒提出新要求

2014 年 10 月 25 日人民网-传媒频道



“观察者网”公众号负责人任冲昊（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 10 月 25 日电 “重点网站负责人学习宣传落实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观察者网”公众号负责人任冲昊参加座谈会并发言。以下是发言内容：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会公报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看到后很有感触，因为互联网正是亟需落实法律权威的地方。

作为一个网络编辑，作为一个网龄 16 年的老网民，我对早期互联网的无政府、无法治状态记忆犹新。在一段时间内，现实社会的法治规则无法延伸到虚拟空间，

网上的诽谤、造谣、商业炒作和有害信息往往不受任何惩戒。许多家长因此视网络为洪水猛兽，一谈到青少年上网，就默认孩子“学坏了”。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惩处了一批谣言制造者，清除了大批虚假言论。这大大改善了互联网秩序，也明显提高了优质信息源的可信度。

全会公报指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这几句话对我们网媒提出了明确要求。我认为，宣传要以中央精神为准则，也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偏好。读者需要通过熟悉的事物来理解政治方针。下一步，我们计划组织一批生动案例，从法律角度解析近期互联网事件的细节，希望会对读者产生较好的法治教育效果。

没什么能防住恐怖主义，除了进攻

马平 2014-12-10

【观察者网：本文写于 2014 年，其中部分材料和刚刚发生的法国卡车恐怖袭击案相关，故再次向读者推荐。】

首先，我先引用昨天我在媒体年会上听到的一句话。一位不愿具名，来自新疆，研究恐怖主义的老专家对自己的发言做一个总结："新疆的反恐局面到什么时候才能根本扭转呢？我有生之年不抱希望了！"。专家今年也就是六十岁左右，从他的发言看，今后 20 年，恐怖主义都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问题。

1、杞人忧天坐高铁

今天是 11 月 19 日，16 日上午有个大新闻，高铁通到乌鲁木齐。看了这个新闻，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以后去新疆更方便了，而是"要小心恐怖主义"。我这个想法倒不是因为我在高铁上碰到过什么事情，有心理阴影，因为我第一次坐高铁就是这么想的。

我第一次坐高铁在郑州，一进候车室，就看见四个大字"贴地飞行！"。我耳朵比较敏感，火车上坡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海拔迅速变化，耳膜能感受到气压的变化，一下子就理解了"贴地飞行！"这四个字的含义。当天晚上，我到了西安就上网，把我首次坐高铁的感受记录下来。我现在给大家摘录一下当年的发言。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多了一个恐怖袭击防御面。毕竟这玩意的速度直追飞机了，还要一直贴地，和可以一举击毁列车的各种障碍物在十余米的距离上擦身而过。一旦出事，死亡率比空难应该要高得多，毕竟空难大部分都是机体和平滑的机场摩擦。

平时朝铁路上扔石子是恶行，高铁上这种事就是恐怖袭击。绝大多数空难发生在起飞和降落段——高速运动的物体和地面最接近的时候。事实上，铁路局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有上跨铁路的人行或机动车道，火车到来前就有时刻值勤的人员拿着牌子阻止交通。应该是怕火车通过时，有高空坠物。但很明显，一个人无法阻止卡车冲过去，加个杆或临时路障也难。就算能阻止，也无法在千里铁道上处处设防。每次我从京承公路辅道路过首都机场附近，看着每一两分钟就从头上二三百米慢悠悠通过的大飞机，都会想，我自己用民用材料，估计用 3 年也能造个车载山寨防空导弹来打飞机了。现在，只要在附近的山头上埋伏，随随便便就可以给比飞机大十倍的目标造成致命伤害。当然，也可能是我多心了。有那么多地铁，步行街，演唱会可以更简单的下手，估计反社会的个人恐怖主义还不会先盯上火车吧。

但如果是有心的有组织恐怖主义，恐怕还是要多防防高铁。将来高铁成为二十多个省长途出行的首选，和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的时候。高铁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

打击经济的重点目标了。对高铁安全的一点恐慌，都足以造成经济的大问题，以及让被舆论挟持的政府，承受不太可能承受的全面防御。哪怕只是面子上的全面防御。

最后。高铁达到 350 公里时速，落石的影响极大，路侧的还有一道栅栏，隧道口处的防护有待加强，不行多做点明峒，毕竟山上掉下来的东西，对普通列车来说是子弹，现在是炮弹了。”

这是 2010 年 5 月份写的。那时西郑高铁是全国第二条 350 公里高铁，第一条武广高铁开通才一年。现在是 2014 年 11 月，再过几周，12 月 10 号，中国又要全面更换铁路列车运行图。更换之后，甘肃、贵州、青海、内蒙古四个省首次开通动车，全国铁路动车组达到 1556 对。覆盖 28 个省市区。咱们中国一共 32 个省市自治区。我 2010 年预测：“将来高铁动车是 20 多个省长途出行的首选，和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现在每年仅京沪高铁客流就超过一亿人次，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我当时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也延续到了今天。

不过，4 年半以来，对高铁的恐怖主义袭击只听说了一次，还未遂。只在今年 7 月，有人在衡阳高铁上摆放三角形铁架，还没造成破坏就被发现了。大家说我对高铁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我依然认为我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从技术上来说，袭击高铁的办法实在太多，我想不出全面防御的办法。

2、换位思考

我接下来就从普通人的角度考虑一下高铁的弱点。我不是教唆恐怖主义，因为我只是一个非常差劲的前工程师，学过几年土建，做过几年设计。我能想到的事情，中国至少也有上千万人能想到。这几天，电影《星际穿越》很火，里面女主角叫墨菲，台词给墨菲定律下了一个定义：可能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我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在发生之前被指出，总比发生之后再暴露强。

回到前面的问题。衡阳抓到那个破坏高铁的，其实就是在高铁上放了角铁做的三脚架。我小时候听说去破坏铁路的，起码也得弄个炸药包，拆一段铁轨才有效。现在他就放了这么一个小障碍物，怎么破坏几百吨的高铁呢？

高铁和原来的铁路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快。我 1998 年上大学，正好赶上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从平均四五十公里开始向 100 多公里跃进。那时候京沪线上的客车，从北京到上海要开 24 小时还多，提速后变成夕发朝至，让大家觉得很方便。过去我坐火车，一夜时间往往都不出省，现在我一夜就从北京到了上海，下车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怎么坐了一夜火车，气候带就换了呢？当然这和后来动车化、高铁化还是没法比。

大家中学就学过，动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从 1997 年第一次大提速到现在，客车运行速度差不多增加到原来的 4 倍，同样质量携带的动能就是原来的十六

倍。如果是障碍物撞到车体上，威力也是 16 倍。如果因为出轨或者障碍物，车体在短时间内减速为 0。这 16 倍能量都要车体和乘客的肉体一起承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经常可以看到车祸现场，交警也经常会讲车祸常识，一般来说，超过 120 公里时速的车祸就很难有活人了，现在高铁跑到 300 多公里的时速，可以说整个列车就是炸药做成的。恐怖分子不需要自己带炸药，只需要想办法引爆这个炸弹，然后就能瞬间造成上千人的伤亡。

高铁跑到这么高的速度，对整个铁路系统的精度要求和过去完全不同。我小的时候，经常有同学到铁路边上玩，把铁钉、硬币什么的放到铁轨上，让火车压扁了玩，火车熟视无睹，只要撞不到人就随便你玩。就算有块大石头在铁路上，也会被车头的排障器给轻松推出去。衡阳那个小铁架，对蒸汽车头根本不算个事。现在高铁对轨道平整度的要求是 0.1 毫米，每天晚上高铁都要停运 4-5 个小时搞检修，早晨发车之前还要对开一趟空车，才能保证白天的安全运行。当年的恶作剧，放到今天就是恐怖袭击。所以高铁现在都是全封闭运行，用栅栏和铁丝网围起来，再也不会允许小孩子随便到铁轨上玩了。

不过，拦住小孩子容易，拦住随便穿行的路人也容易，拦住故意上轨道的人很难。7 月份衡阳这个案件，当事人就很轻松地破坏了隔离栏，上来放障碍物。就算人力破坏不了隔离栏，机械总可以。高铁经常会穿越田野，随便一个拖拉机，农用汽车，就能搞定高铁隔离栏。还有许多公路和铁路的立交，公路在上，铁路在下。为了防止你向下丢东西，桥边上都有隔离栏。但和前面那个问题一样，挡得住无意丢东西，但肯定挡不住故意砸下去，更挡不住卡车。在有意的恐怖袭击面前，这些措施都近乎于用纸包火。

当然，高铁的设计者也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现在高铁都尽量要修桥，高高的架起来，让你不那么容易碰到。但高铁要进站，要和其他铁路交叉，要调整纵断面曲线，总不能一直高高在上。至于我第一次坐高铁就担心的隧道口上方安全问题，目前我还是觉得无解。更何况桥也要架在地上。前面我提到过，高铁对轨道起伏的敏感度是以 0.1 毫米计算的。现在挖掘机这么普及，要是有人用重型卡车和挖掘机对桥墩下手，或是干脆用油罐车在桥下引发火灾怎么办？我学过一点桥梁设计，知道桥梁要考虑防撞。但那防的是事故，不是故意破坏。真要是处心积虑、不惜代价的来破坏，钢筋水泥和铁丝网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结实。

当然了，警察和铁路方面也不会看着你搞破坏无动于衷。整个高铁是全程监控的，无论你在哪里下手，很快都会有人赶来制止。不过，以现在的铁路发车密度，只要你能对铁路造成破坏，绝不会等不到车。京沪高铁每天对开 100 多对列车，扣除半夜检修时间，高峰期三五分钟就会有一列车过去。而且每一列都是以秒为精度通过，昨天是什么时间通过某座桥、某个隧道，今天也会分秒不差。真想做什么事情，绝对可以准确地在火车通过之前一分钟造成破坏。现在的高铁，就算急刹车也要四五公里才能停下，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要命的是，做我上面说的一切，物质门槛和技术门槛都很低。从工具上说，可以是拖拉机、农用车，反正只要破坏了隔离栏，把一车石头卸到轨道上就够了。实在要对高架桥下手，也不过是挖掘机、卡车、油罐车等工具。都是随随便便就

可以买到，可以操纵的东西。911 之前，恐怖分子专门学了飞行培训班。现在蓝翔的广告打的满世界都是，打个电话就能让驾校上门来接你，绝对不能低估恐怖分子的潜在破坏能力。

3、什么都不安全

大家不要被我吓的不敢坐高铁。实际上，每月我至少坐两次高铁，北京到上海全程。这也不是我不怕死，而是相对来说，高铁并不算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有潜在危险的地方还很多，犯不上为高铁操那么多心。我高铁分析的多，所以问题多，其他地方随便分析一下，也是到处是漏洞。

我随便举个例子，每天高峰期的人民广场地铁站，几十条换乘通道里满满的都是人。要是赶上一个周末，经常有上万人挤在换乘通道里人挨人人挤人动弹不得。每次遇到这种场面，我都担心踩踏事件，时刻左顾右盼，想万一出事儿了可以怎么逃。但每次的结论都是——逃无可逃。在这种地方爆发昆明火车站这种暴恐事件，杀伤力恐怕会十倍百倍的放大，被刀砍倒是小事情了。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在地铁站这种地方策划恐怖袭击，就干脆放弃以刀作为主要杀伤的想法， 刀具完全只用来制造恐慌。通过手机联系，几个人在不同的地铁换乘通道同时发动袭击，计算好时间，让不同方向的人流在同一个大厅撞在一起，破坏力恐怕不比高铁出事小。

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刀具是受管制的，没法带到地铁站里面，但在我这个方案里，其实你的刀完全不需要过安检，直接从地面入口开始搞事情就足够可怕了，只要无组织的人流奔跑起来，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做。

退一步说，发动这种恐怖袭击，一定要动刀动枪动炸药吗？我看未必。人民广场地铁站里，要是忽然有恶臭，有粪便到处喷，你说人流会不会立刻向反方向跑？要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忽然三五个人拼命跑，说后面有炸弹，你跟着跑不跑？会不会形成无序人流？会不会把任何试图阻挡的工作人员踏到脚下？

关于这个对人口密集区下手的方案，我设想过许多变种。比如说在上万小女孩狂热的演唱会上扔几十个老鼠。或者还是在地铁站，不砍不杀，在几个特定的通道上撒百元钞票，引导人流。只要设计的好，这些看似无害的做法都能造成严重踩踏事件。归根结底，这和高铁是一个道理。高速行驶的动车组本身就是炸药，成千上万无组织的人群本身就是杀伤力。你要做的不是去砍杀，只需要把潜在破坏力释放出来。

前面说的，都是间接手段来搞恐怖袭击。其实用直接手段也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各位肯定对横行霸道的渣土车很熟悉吧。渣土车没牌子，一般和当地的建设管理机关，当地交警都有关系，习惯性超载超速，所以造成的事故很多。但毕竟他们还是在乎交规，在乎人命的。反过来想想，要是他们不在乎呢？要是他们冲着人群去呢？平时不许他们去繁华街道，更不许他们去步行街，有交警和交通规则阻止他们。但如果到了司机不在乎这一切的时候，让警察用手枪和警车去拦住

一辆在步行街上狂奔的重型卡车，那就真是螳臂当车了。古代战场有种武器叫镰刀战车，就是在车轴上装一把很长的刀，非常适合追杀步兵，像割稻子一样把人割倒。但这种战车的马力肯定比不上大马力的摩托车，收割人命的能力肯定比不上两辆摩托车中间拖一道钢丝绳。

我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考虑问题总是离不开挖掘机卡车这些低技术含量的东西。不过，其他行业的技术我也能想象一点。一旦拥有相关的技术，杀伤力可能比我这些靠蛮力的方案还要可怕的多。比如说，铁路或者地铁的调度人员，信号人员搞破坏，不用挖掘机就能造成惊人的撞车事故。懂供水工程的，不用去有一定警惕性的自来水厂，在小区管道上投毒，危害和恐慌就能扩散到整个城市。至于医学、生物学、计算机行业，我虽然不是很懂，但推测起来，这些行业的技术人员，大多数也拥有很可观的破坏力。

在今天，技术不仅可以学到，还可以买来。许多刚刚面世的新技术，扩散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社会的安保措施是不太考虑这些新技术的。比如说无人机，这东西很早就有，但发展成熟，廉价化这最近几年的事情。所以管理很放任，某些快餐店拿他送快递也不用审批，婚庆公司拿他航拍，也没人说你这东西砸下来很麻烦。总之，现行的安保措施不太考虑这些新型的遥控装置。我们经常在重要机构外面看到电网，看到狼狗，看到对着门口墙头的摄像机，但从未听说哪个单位配雷达和防空机枪的。但实际上呢，无人机用来搞盗窃可能还不够，但用来投放一些危险品已经很足够了。无论是把铝热剂送到铁路道岔上，还是在粮库释放病菌，都能不露痕迹，分秒不差。

过去新技术是少数人掌握的东西。就算普通人能买到一些高技术产品，也可以追溯技术产品的传递源头。比如为了避免随便谁都能印刷传单，过去许多国家会搞打字机、印刷机登记制。很容易能反过来查到谁用这个东西制造了违法资料。现在呢不一样了，互联网时代普及了，技术的传播不再是从少数科研机构向大众单向传播，而是在许多普通的技术人员之间网状传播，你根本没法事先预测哪些潜在的危险人物会拿到杀伤性技术。不管哪个专业，技术人员都会在网上形成自己的社区，外行只要有心，都能到这些社区学到非常深入的技术细节。

甚至制造能力也在向普通人普及。过去某些特殊形状的零件必须用特殊的机床制造，普通人想造枪炮，根本就接触不到特定的机床，造不出有足够杀伤力的武器。现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私人定制，通过数控机床和 3d 打印，造个爆炸物，造个枪很容易。不用翻墙，你直接百度“3d 打印”“枪”这两个关键词，有大把的新闻和相关资料。这些私人制造的武器在耐久性和精确性上还没法和传统制造的军用武器相比，但用来制造恐怖事件绝对已经足够了，在生产成本上，3d 打印也比机床加工贵一些，但恐怖分子不会在乎这点成本。2 个月前，日本警方抓了一个大学老师，以私自制造枪械的罪名判了他两年。他就是用 3d 打印机自己造了一把手枪。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有这个能力，而且很快会有上千万的中国人具备这个能力，到时候想通过简单的枪支控制办法来解除普通人的破坏力根本就不可能了。

4、变动的世界，不变的你我

恐怖分子可能的具体操作方案就谈到这里，再分析下去，警察可能就会上门找我了。前面讲那么多，总结下来就一句话——现代化社会浑身是漏洞，到处是弱点，与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相比，现有的反恐管制措施，最多只能算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礼节性预防。

不过，我们反过来问一句，为啥会有这么多漏洞？人类社会怎么就带上这一身隐患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大，很古老，不是最近一两百年的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这个物种的产生。

我读书的时候，历史书还是这么定义的：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制造工具。后来我知道，这个定义不太确切，大猩猩、海獭、河狸都会使用甚至制造工具。但是，从制作水平来说，这些动物和人类是天壤之别。就算它们能制造工具，也是一代代使用同样的简陋工具，我们人类的工具不仅比他们复杂几万倍，而且能做他们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持续改进工具。刚才我提到火车提速，从十几年前我熟悉的绿皮火车升级成今天时速 350 公里的动车组，这就是工具的进步。

这么看来，可以这么定义人类：能制造、使用，并且不断主动改进工具的动物。

不过，我们人类能制造工具，在地球上混了上百万年。别的动物不会制造工具，但也动不动就混了几千万年上亿年。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达尔文说的很清楚：进化！物竞天择，每一代的生物基因都有微小的变化，然后残酷的竞争决定进化方向。过上几千万年，生物有的学会了飞行，有的下了海，有的下海又回来，总之和祖先已经大不一样。通过改变基因，生物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环境。

人类和他们不太一样。自从学会了改造工具，人类就不那么讲究基因改造了。因为明显改造工具更容易、更快。大象进化出几米长的象牙，要进化上百万年，人类学会制造几米长的长矛，只花了几十万年；射水鱼进化出远距离攻击能力，起码也花了上百万年，人类用不到一万年的时间就发明了弓箭。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基因，人类也能适应各种环境。

肉体上长出来的东西，力量再大也有限。陆地动物长到恐龙那么大，海洋动物长到蓝鲸那么大也就是极限了。工具的力量就不一样了。我们人类喜欢用马力来形容机器的功率。载重卡车达到 500 马力很常见，轮船动不动就有几万马力，最近很火的挖掘机，一台大概是 200 多马力。总而言之一句话，机器压倒肌肉。

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过这些常识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结论：只有人类才能搞恐怖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设想一下，动物要搞恐怖主义，要杀掉许多同类，要破坏同类的生活，他怎么搞？它只能用自己的肌肉，用自己的简陋工具去搞。问题是它有肌肉，它的同

类也有啊，它有简陋的工具，它的同类也会制作啊。归根结底，肌肉破坏肌肉，这是个效率很低的行为，你仗着偷袭能赢一次赢两次，最终不被人打死也要累死。所以动物是搞不了恐怖主义的。

人类就不一样了，人类有工具，远超出肌肉的工具，用工具来撕裂肌肉，比狮子撕裂肌肉的效率高几千倍。请大家注意这个关键结论：人类的基因并没有改变，肌肉并没有因为工具多了而加强。所以，一个忽然发起袭击的人类可以用工具迅速干掉很多同类。这一点动物做不到

当然，你可以说，人类不仅有用来攻击的工具，还有防御工具啊？比如穿上盔甲，持刀的恐怖分子就没用了。住在碉堡里，趁你休息时下手的恐怖分子就干不成了。出门开坦克，拿枪的恐怖分子就下岗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比如打仗的时候。士兵们想相互干掉就很不容易，领导人再发动战争的时候也要考虑能不能打下对方的城市。

但是，人类生来不是为了天天穿盔甲、住碉堡、开坦克的。人类发展工具，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互相杀害，而是为了过的舒服，为了满足我们的基因。所以，我们和原始人的生活共同点很多，比如都要穿软软的衣服，都要吃肉吃甜食，都要晒太阳，在开阔的环境中相互交往。这样的生活方式，恰恰对恐怖分子毫无防御力。恐怖分子杀一个原始人和杀一个现代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杀现代人可能还更容易一些。恐怖分子如果从日常生活中下手，我们没有防御能力是正常的。前几天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个 68 岁的退伍老兵，闲来无事就带一包针去超市，向肉块里面插针，有什么技术手段能杜绝这种恐怖主义吗？我看没有，除非你恢复原始人的生活，自己打猎自己屠宰，然后再吃肉。

说到这里，这次演讲的第一个主要结论就出来了——恐怖主义是一种“富贵病”。人类越能改造工具，越是聚集在一起生活，恐怖主义的隐患就越大。

这也符合我们观察到的恐怖主义发展趋势。过去 1 万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处在农业社会，工具比动物强点有限，同时人类居住的也太分散，你没法同时对很多人下手，所以恐怖主义不太发达，最多就是给邻居下个毒，半夜到敌对的部落杀几个人。

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一下子改变了人类工具的进步速度，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搬进密集的城市。恐怖分子可以在广场上放炸弹，可以开着火车头去撞车，可以用开着飞机撞大楼，只要你豁得出自己的生命，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拉足够多的人垫背。恐怖主义从此成为一个明显的社会威胁。

这样，我就回答了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有这么多恐怖袭击的隐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副产品，有隐患才是正常的，没隐患说明你还不够发达。只要人类不打算时刻活在军事总动员的状态，不打算放弃现代文明，你就不能指望靠全面防御来解决恐怖主义的隐患。

恐怖主义的经济基础

1、经济问题

刚才我渲染了半天恐怖气氛。但实际上，至少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同学来说，恐怖主义离我们是很远的。有多远呢？远到我们身边的安保人员对此都不当回事。

虽然人民广场地铁站每天都有发生一次 911 事件的潜力，但就我这几年观察，如果乘客坚持不把包放上安检机。十次有八次地铁安检人员也会无奈的放人过去。尤其是四五十岁的上海本地女人，20 出头行李很重的年轻人，冲关成功率几乎是 100%。但即便如此，上海地铁至今也没出事儿。我刚才举了好几种可能，都可以用挖掘机造成重大恐慌，但也没听说蓝翔技校招生要政审。这说明什么？说明不出事儿的原因不是隐患少，不是我们在硬件上堵住了恐怖主义的漏洞，而是这个社会在软件上暂时还能应对恐怖主义。

什么是恐怖主义的软件？我百度一下“恐怖分子”这四个字。首先跳出来的就是本拉登的照片。如果要给“恐怖分子”这个词加个前缀，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加“阿拉伯”或者伊斯兰这两个词。最近最火的恐怖主义组织就是中东那个推出哈里发的 ISIS，它也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从整个伊斯兰世界招募人手。

伊斯兰世界是个很大的范围，西到大西洋边的突尼斯，东到太平洋里的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点呢？目前看来，和恐怖主义最大的相关共同点就是贫民多，失业率高。2005 年的时候，全球经济危机还没发生，油价正在积极上涨，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14.4%。埃及的贫困率达到 41%。按照今年 9 月 10 日的数据，阿拉伯世界的失业率是 17%。其中西亚北非，年轻人的失业率在 30-50%之间。就连沙特，失业率也有 12%，和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印尼差不多。沙特女性的失业率就没法看了，有 35%。

你们可不要觉得沙特遍地是石油美元，富到不用操心工作问题。实际上，沙特和所有国家一样，富裕的只是少数人。在这几年油价飙升的情况下，沙特人均 GDP 也只是 2 万美元，和上海相当，你们生活在上海没觉得遍地是钱，生活在沙特也不会。实际上，你们看到摆阔的贵族土豪越多，看到的豪车和私人飞机，说明其他人越需要工作来养家，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郊区有大片的贫民区，比中国的县城差远了。沙特光王子就有好几千，为了努力赶上被这些王子拉起来的平均数，普通人还是很需要一份工作来赚钱的，要是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可就要考虑别的选择了。

沙特这个例子还说明。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地位尤其低，失业率比男性高得多。这带来另一个效应，就是人口爆炸。女性不就业，被关在家里，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才能心甘情愿的生孩子带孩子，连续不断。要是女性有像样的工作，还能决定家庭事务，生一两个都会抱怨影响生活。所以就业充分的工业国不用搞限制生育，只需要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放开二胎，大多数符合条件的人都没去申请，比如我。但在阿拉伯国家，女性至今还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所以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带来人口爆炸。整个阿拉伯世界，60%的人口在 25 岁以下，换句话说，你们去了阿拉伯国家会发现，一半的人口比你小。这么高的青少年比例，这么高的失业率，所以阿拉伯世界是恐怖分子最大的源头。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明明我们周围处处是恐怖袭击的隐患，但恐怖袭击并没有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从中国进入工业社会，自从中国有了爆发恐怖主义的资格以后，年年经济繁荣，从我记事到现在差不多 30 年，中国 GDP 从全世界第 12 爬到全球第 2，工业产值从全球第 10 增加到全球第一，而工业是最能吸纳就业的。从 2008 年经济危机到现在，全世界一半的经济增量都在中国。这些数字，你们可能觉得其中有水分，但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你勤劳，四肢健全，找个体面的工作不一定很容易，找个月薪稳定在几千块的普通工作易如反掌。这就是恐怖主义无法明显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阿拉伯世界，他们通过卖石油，不劳而获地把整个社会拉到了现代化社会的门槛上，建起了现代城市，普及了工业化工具，让这个社会有资格产生恐怖主义，然后他们的经济停滞了。所以恐怖分子遍地。这一轮油价下跌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中东恐怖主义新闻。

2、还是经济

这些年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闹的凶，有的人就换了个思考方式——反正恐怖主义都是伊斯兰教干的，都是阿拉伯人，是中亚人种干的。干掉这个宗教，消灭这个民族不就得了吗？

宗教文化问题我后面会谈到，这里能不能搞定宗教且不说，就说没有伊斯兰因素的恐怖主义，例子也到处都是。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高铁上放障碍物的，他就没有什么宗教因素要搞恐怖主义。他之前还在广州搞了公交车纵火，烧死 2 个人，重伤几十人。从 2008 年到现在，能上全国新闻的公交车纵火或爆炸案已经发生了 10 起，厦门和成都两次都烧死了几十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袭击中，当事人都是汉族，自己都当场烧死，是标准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这显然不是宗教和民族问题。

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新疆也有很多，甚至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不少，比如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族。但大多数恐怖主义和维吾尔族相关，这说明伊斯兰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南疆维族自己也未必真的对教义很在乎，维族年轻人喝酒的比例，恐怕比平均水平还高一些，维族特产也包括一种叫木赛来斯的葡萄酒，而古兰经是绝对禁止喝酒的。

维族聚居区，也就是南疆，和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还是就业率和经济问题。从人均 GDP 来说，地广人稀的南疆是中国最低一档，比贵州还穷，和甘肃几个生态崩溃的地区相当。这样的地方失业率高是个必然。顺便说一句，这里的生态并不太差，伊犁等地方可以说是千里沃野，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资源水平可能还好一些。

失业率高，就该外出打工。但维吾尔族也是 1000 万人口的大民族，相当于内地小半个省了，但外出打工的人数还不如内地几个大县。如果把县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的话，在 2000 年-2010 年之间，中国起码有 1/3 的县靠打工者汇回来的钱维持整个县的经济平衡，不至于流出的现金多于流入的现金。维族在这 1/3 的县里也算落后的，偏偏在打工潮中还落后，产生今天这种局面也不奇怪。

为什么呢？这和打工者的特性有关。

打工这种事，往往是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扩张的。因为农民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认识，不会贸然地付出时间和金钱去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一般是老乡发现了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工厂，发现这里能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然后回去发动老乡来干。春节回家的时候，老乡之间也会交流，发现你那边不错就跟过去干。

像我老家，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就有上万壮劳力在西部的钻井队干，这就是最初几个人带动的结果。北京天津近郊，有许多新形成的棚户区，一个片区里全是老乡，来自一个县甚至一个村，做同样的小生意。农村从没出过门的年轻人到这种新形成的村落里生活，就像在老家一样自在，还能赚钱，这就是先出去的打工者给同乡降低了打工门槛。

现在高铁这么发达，铁路收费这么便宜，为什么相对收费贵，时间长的大巴还有生意做？就是因为中国打工者往往是成群结队出去，不是从家乡出去就均匀分散到全国各地。在这些打工聚居区和老家之间，需要大巴做点对点的交通，让他们不用换车就能带许多行李，直接从村口工厂宿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大巴车头上印着的起终点。过去十多年，许多大巴的起点不是某市，甚至不是某县，而是某个县的 XX 乡、XX 村。终点也往往不是某个大城市的中心客运站，而是郊区某个偏远客运站甚至城中村。这样的大巴能盈利，说明他们基本不靠沿途客流，全靠点对点的交通。而这种运输线的存在，也说明了先出发的打工者给同乡开创了相对廉价、方便的交通线，让从未出过门的年轻人也能到大城市赚钱。只要你还能看到这种从某县某乡开到某个大城市郊区的大巴，只要你在城市边缘还能看到几十个打工者聚在一起，带着大量行李等车，就说明中国许多打工者还在以籍贯为单位生活，靠老乡关系寻找工作机会。

回头说维吾尔族的打工问题。南疆是和中国发达地区距离最远的一处人口密集区，维族人打工还有语言障碍。可以说，从地理和文化上看，这里本来也应该是外出打工最难的地方。然后我们考虑上面那个打工者互相引领的因素。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地区错过一步，就会步步错过。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没人领头出去打工，没有在打工潮的早期培养出这种点对点的交通线和信息流，接下来敢走出去竞争的青壮年就越来越少，和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积累了二三十年，就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很严重的影响。80 年代初，中央错误地废除南疆的强制汉语教学；年南疆铁路修到库尔勒就停下来，这都是后来南疆出大问题的重要因素。

3、下岗与砍刀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维族独有的问题。只能说在维族地区比较严重。

大家对砍人的威胁最直观地感受应该是今年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事件。但在我的记忆中，对砍刀威胁更直观的认识是 90 年代到 2005 年前后全国的治安崩溃，以及黑社会借着帮政府拆迁的机会迅速崛起、半合法化乃至和基层政权结合。那个时候民间有一个著名的打油诗，总结中国四大害，就是公检法、地国税、东北

小姐、黑社会。为啥要强调东北来的妓女和黑社会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东北大下岗，同时经济崩溃，整整一代青壮年没有出路，在本地打零工一天赚不到 10 块钱。尤其是县城和镇上的工人后代，连土地都没有，如果考不上大学，又想给家里赚点钱，最直接的出路就是到内地卖淫和砍人。

卖淫不说了，砍人往往就是跟上在各地已经“混社会”的头领，去霸占各种边缘行业。给开发商拆迁，打砸抢算是高档工作，一般就是霸住搬家、农产品收购、小商品市场等边缘性行业，收保护费和提成。有人不服就打，有同乡团伙来竞争就砍。一般市民看到的是这些东北口音的人每天在地盘上闲逛维持秩序，在各种大排档喝酒打架，也能听说这些人聚在一起几十人拿刀乱砍。直观的感受就是：“黑社会都是东北来的”。

其实许多黑社会的本地化色彩很浓，只是那几年东北青壮年供应充足，在十几个省份的黑社会一线冲杀，所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期间无论是抢地盘的斗殴，还是反抗黑社会引发的冲突，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砍死在城乡结合部，也不知道有多少东北男青年再也没回到故乡。你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

我说也算。因为从动机上来说，东北汉子虽然个头大一点，但也不是凭着能打，不是因为学过武术才出来吃这碗饭的，而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绝望，拿自己的命不当回事，才出来混社会。我不相信当地的人真的就打不过东北人，更何况人多。大多数向黑社会让步的人只是因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放弃自己的正常生活，不会像他们那样玩命，才允许他们在正常行业的利润中拿一部分的。所以，他们符合恐怖主义的“亡命”、“用不要命来换取让步”特征。

从效果上说，黑社会得到充足、廉价的打手供应，让城乡结合部的治安失控，带坏了许多本地中学的风气，威胁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也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这当然可以算高失业率带来的恐怖主义。

实际上，当年遍布全国的东北黑社会和现在的维族恐怖分子，不仅在效果上像，在起因上也有一定的关联。打开中国地图，我们看到，东北和新疆是两个明显的突出部，和内地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交通障碍。90 年代普遍的国企破产和大下岗，对东北和新疆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东北的惨状我就不说了。关于新疆，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数据：

“1995 年新疆城镇就业人口 349.7 万人，5 年后的 2000 年反而下降到 318.4 万人。这 5 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 58.6 万人，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减少了 14.7 万人，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合计减少 73.3 万人。而 2000 年全疆城镇人口也不过 624 万多一点。

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和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这 4 种行业中，少数民族职工总数由 1997 年的 18.5 万人下降到 2002 年的 11.3 万人……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维吾尔族 15 岁以上人口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即产业工人)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 2000 至 2010 年间，维吾尔族产业工人不仅比例从 5.89%下降到 4.55%，实际人数也从 26.5 万人下降到 24.9

万人。而此期间，维吾尔族 15 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总数从 134.8 万人增加到 177.7 万人，增幅为 31.6%。”

1990 年到 2010 年是中国全面工业化的 20 年。这 20 年开始的时候，在内地县城当一个工人还是很荣耀的职业，需要求人送礼才行；到这 20 年结束的时候，到流水线上当个工人，每月按时拿工资是内地年轻人最底限的选择，是没有其他出路才去干的事情。但是，这从上面的数据看，维吾尔族的工业人口不仅没有跟着整个中国一起增长，反而收缩。此消彼长，和内地整整拉开了一个时代。这就是恐怖主义的经济土壤。

还是看中国地图。东北和新疆都是中国本土的突出部，但东北的铁路发达，新疆到上周才有第一条高铁；东北到内地可以坐几百公里的火车，或是坐几个小时的船，新疆只能是坐几千里火车或者飞机；东北人都说汉语，南疆的维族年轻人因为 80 年代的反动政策很多不通汉语。所以，同样是 90 年代大下岗，同样是年轻人没有出路，东北通过 20 年的转型虽然还不算发达地区，至少已经不再输出砍人的黑社会了，南疆的问题却一直没解决。但同在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东北人是同胞，新疆人就不是。同时，绝不能把整个少数民族当敌人，更不能歧视。恐怖分子的幕后黑手就希望能制造出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杀。

4、客观看待落后民族

从社会发展层次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发达工业时代，维族地区还停留在农业时代，我们和南疆的差距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了，还有文化。我们到南疆去看，他们不仅是穷，而且似乎也没有打工赚钱的意识。懒懒散散，有钱就花，没钱就闲着。于是有人下断言，说他们懒，他们狡猾，他们天生就想不劳而获，活该受穷。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因为 90 年代初，几乎所有报纸说起那些吃救济的山村，都是一样的口气，抱怨他们把扶贫的牛杀了吃肉，把扶贫款换酒喝，说他们吃救济是天生的。你们在座各位可能没有记忆，但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当年的报纸，当年的杂志是不是经常这么归纳中国贫困问题。

实际上呢？实际上这话也不算夸张。90 年代初，我对中国农村的记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遍布台球案子。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也就是百十个青壮年，往往就有三四个爆满的台球室，壮年劳力天天围着这里打球聊天，生很多孩子，就是不出去打工。实在娶不上媳妇就琢磨着卖房子，花钱买一个。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这些人的后代去抱怨少数民族地区了。可见对所谓“劣根性”的抱怨无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从国外横向比较来说。伊朗是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信奉比较激进的什叶派，还是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神权国家，宪法就规定了由宗教领导人掌握最高权力。只有梵蒂冈这个弹丸小国有类似的神权结构。这样一个国家，偏偏没有内部恐怖分子。你用伊朗+恐怖分子当关键词，百度一下，会发现第一页全是伊朗抓恐怖分子和杀恐怖分子的网页，或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恐怖袭击，到处搞暗杀的消息。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 20 年，伊朗是唯一工业经济增长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家（不考虑那些人口几百万以下的小国）。伊朗的人均 GDP 还比不上沙特，但已经是工业最发达的中东国家。在社会发展上，伊朗已经从人口爆炸转为人口收缩，以至于从 2012 年开始，伊朗废除了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否则他们的人口在下一代人将转为减少。现在连美国都要拉上伊朗一起搞反恐，打击逊尼派的 ISIS。这说明，即便在中东，即便在伊斯兰教国家，只要能做到充分就业和分配相对合理，恐怖主义也根本扎不下根。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派去的海德里希很有统治手腕，不是一味的镇压，也不是让捷克人当二等公民。相反，他以外来征服者的身份，不受本地原有的利益集团束缚，反而能更好的组织军工生产，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给工人多发福利，增加食品供应。捷克的局势很快就安定下来，甚至觉得融入轴心国体系也不错。

这让流亡到英国的捷克政府很担心，让英国人也很担心。因为捷克是一个中等工业国，这样的国家失去反抗精神，心甘情愿地加入轴心国的生产，是一个大麻烦。所以，一定要杀掉海德里希，而且要通过刺杀的方式来刺激纳粹德国，让德国进行屠杀报复，再激发捷克人的反抗心理，给游击战创造机会。最后，英国训练的捷克伞兵用带有肉毒杆菌的炸弹干掉了海德里希，果然激发了德国的屠杀和捷克人的反抗。

抛开政治立场，刺杀海德里希事件在正反两面对今天的恐怖主义问题都很有借鉴。归根结底，经济问题是恐怖主义的基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对于恐怖分子来说，得到整个世界的许诺可能是虚幻的，但如果他们连个无产者都当不上，打工的机会都没，那么现代社会的繁华与安宁的确对他们没什么意义。破坏的时候，他们既没有心理负罪感，也不会顾忌惩罚和报复，任何能提供心理安慰的极端主义都可能动员他们去搞袭击。

极端主义的理论，在我们看来很荒谬，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对于大多数维族人来说也一样。但恐怖主义本来也不需要动员所有人，只要动员一小部分人舍生忘死，就能恐吓剩下的民众，制造民族隔阂。一旦普通民众开始搞相互仇杀，相互歧视，乃至于开除对方的国籍。极端主义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如果说穷和失业就能给极端主义提供土壤，那么过去更穷的时候，为什么极端主义不那么厉害？我们现在看到新疆维族的年轻人没有出路，但他们至少还能吃饱饭，还能穿上整齐的衣服。过去农业社会的时候，维族年轻人辛苦一年，也就是勉强吃饱，勉强有衣服穿。现在怎么说也比那个时候过得好了，为什么他们反而更极端了呢？

这个问题其实提给 90 年代的东北也一样。下岗时期的日子是苦，但毕竟也能保持一个底限的城市生活，也有房子住，比五六十年代建厂的时候，比招工之前还是要强一些。当年能吃饱高粱米饭就满意，现在日子清苦一些，单调一些，为什么就宁愿把命交给黑社会呢？

这说明，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也必须考虑经济基础的表现方式。接下来我们考虑经济基础之外的问题。

对恐怖主义的全面进攻

1、不止是经济问题

大家都听说过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理论。当然人的生活多种多样，是不是每个人都严格符合他那个需求金字塔不好说。但总的来说，人需要先吃得上饭，冻不死然后再去寻求精神生活，这个顺序是不会差的。

直到我的祖父那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可以说都在马斯洛金字塔的基层，能保证每天吃粗粮吃饱，到冬天有一件新棉衣就足够对大多数邻居骄傲了。这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固定的社区里，交通不便，一辈子也未必会去几次县城。所以，一方面普通人没有多少心情去考虑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只能接受眼前的生活，别无选择。那个时候的宗教，除非是在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否则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强。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外来的政权征服一片地区之后，只要有能力把僧侣和知识分子换一遍，普通人对新宗教的抵制一般不会持续多久，反正信仰那东西他们的生活里也占据不了多重的位置。

近代以后，化肥和现代农业技术开始显著提高农业产量，工业消费品，尤其是纺织品越来越廉价，普通人的生活一下子变容易了。在中国的农村，也包括西部的农村，这个转变发生，也就是最近 2 代人的事情。

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吃饱肚子很容易，穿上衣服也很容易了，再存点粮食，你的安全感也有了，但是更进一步很难。因为廉价的化肥和纺织品是工业社会溢出的福利，但要是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和服务，你必须自己也卷入工业生产才行。如果不能卷入呢，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只能带来一项福利，就是闲暇。刚才我提到，80 年底末、90 年代初，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台球桌和超生的孩子，就是因为打台球和造孩子是他们仅有的娱乐。

在各个年龄段中，少年受这个转变的影响最大。因为农业社会是没有少年这个概念的，你还不能干活，你就是童年。你能干活了，你就是少年。现代的农村不需要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下地干活，连辅助性工作也不要你干。半大孩子的闲暇和精神生活缺口才是最大的。

在大多数内地农村。壮劳力很快被城市繁忙的工业经济吸走了，孩子被送进了寄宿制的中小学，不会给你那么多闲暇。少数没有被这个体系占据的人，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新闻上看到的留守儿童、留守少年问题。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农村始终停留在 90 年代初的样子，如果一个地区大多数壮劳力和青少年既没有外出打工，也缺乏升学的机会。如果大多数青壮年的精神生活和留守儿童差不多，这个社会会怎样？

先不用到维族地区找答案。就到河南、河北、山东去看，到我们的中原地区去看。这些地方正好夹在京津城市圈和长三角城市圈之间，周边缺乏有活力的中心城市，本省也几乎没有 211、985 大学，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小。因此某些农村积压了一大批壮劳力和青少年，他们走不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是邪教爆炸性发展。在 flg 退潮后，几十种邪教像野火一样在中原省份的农村蔓延，互相促进也互相敌对，动不动就举行几万人的宗教活动。今年 11 月 17 日南方人物周刊第 40 期就对这些农村邪教活动做了一次专访，推荐大家找来读读：

在已有的潜在信徒瓜分完毕之后，这些邪教经常互相展开定点清除活动，把对方的骨干绑出来，不投降就分尸，就灭门。前一阵子在山东肯德基，东方闪电那几个人一言不合就要打死人，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对使用暴力已经习惯了。肯德基死人我们看得到，在这些年基层失控的农村因此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庭，我们平时根本不在意。一个几百骨干，几万信徒的邪教，教主很容易聚敛上亿的资产，在大城市买几十套房子。这等于彻底吸干了上万户农村信徒的流动资金，孩子不能上学，老人不能看病。你们说这算不算恐怖主义？我看也算。

只是内地农村毕竟人口总量大，卷入现代经济比较快，这个问题平均起来不算太严重，所以农村的邪教问题虽然前景堪忧，但暂时还没失控。南疆的问题是整个地区没人出来打工，所以宗教泛滥，所以极端思想垄断精神生活空间。毛主席怎么说的，“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现代经济没能占领中国落后农村的闲暇，基层党组织废了，极端思想侵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当然了，现代社会就算没有精神生活，还有廉价娱乐业能占据人的闲暇。据我观察，各种网游尤其是收费网游，很大的一部分市场就在留守儿童身上。因为这是他们少数消费得起的精神生活。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警力非常紧张，治安问题能维持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壮年外出打工，家里无所事事的少年都挤到镇上的网吧了。维族地区的问题是，他们还消费不起网吧、消费不到网吧呢，我有个朋友曾经开玩笑，在维族地区援建几千个免费网吧，恐怕比任何维稳投入都更解决问题。

2、拿什么占领文化思想阵地

当然，我那个同学的建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南疆的基层已经失控了，甭说网吧，连亲政府的的阿訇都不敢随便离开军警控制区。更何况网吧这种廉价娱乐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一旦人们厌倦了批量制造的娱乐，其实更容易寻求在哲学上高一层次的精神需求。现在 ISIS 许多兵员，就是在西欧北非大城市里玩游戏玩腻了的青年，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玩“使命召唤”玩腻了，主动去中东参加恐怖主义军队的例子。

打个比方，为什么政府要禁止大麻？大麻本身无害，但很容易让年轻人习惯于用物质来直接刺激神经系统，让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真正的毒品，让真正的毒品吸起来更爽。网络游戏就是精神上的软毒品，如果拿电子游戏用于维稳，就像政府免费发大麻，用来抵制海洛因和冰毒。一时可能有用，最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极端主义宗教做了免费广告。

归根结底，人是一种需要精神生活的高等动物。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对付意识形态，只有思想能对付思想。自古用暴力对付思想的尝试，很少有成功的，尤其是在你不可能用屠杀当手段的时候，暴力无论如何不能解决问题。

从意识形态入手，不是说管那些意识形态的标志。比如说现在新疆留胡子的越来越多，穿长袍的越来越多。你跑过去宣传，说没必要留胡子，没必要穿长袍，有的地方甚至派警察出去，在大街上给人剃胡子，禁止穿长袍的人进入公共场合。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无效了，简直就是愚蠢！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留胡子？为什么穿长袍戴面纱？是为了符合教义么？错了，他们喝酒的时候怎么不想到教义？怎么不想想默罕默德的圣训？他们和山东、河南那些追随邪教的农民一样，不是真的离不开上帝，只是面对现代社会不知所措，正在摸索着寻求自身的定位，想找一些文化符号来安慰自己。极端主义先占据了这些精神空间，本来还没站稳，他们自己也吃不准到底留胡子，穿长袍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公开禁止，好了，证明了留胡子穿长袍是很有意义的根本问题，必须坚持。我对一个朋友说，这就是中国版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政府这种措施就是帮助极端主义在制造现代民族主义，巩固恐怖主义的精神生活。

政府这种办法错在哪？还是错在用暴力对付思想问题，而且只对付思想问题的皮毛，不敢触及本质。如果你能用思想对抗思想，挖出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些皮毛问题会自然消失。如果你挖不出思想根源，也解决不了经济基础，只搞这些皮毛问题，那连扬汤止沸都算不上，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下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去对付他们？

从现在政府的操作来看。是企图用所谓可控“正经”宗教去对付极端主义宗教。政府出钱给他们修清真寺，鼓励所谓传统民族服装，培养所谓的正教阿訇，给他们报销去沙特麦加的机票钱。中东最野蛮最极端的瓦哈比教派，在中国政府登记后，可以到处撒钱传教，这似乎算是用思想对付思想了。

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农业时代的信仰和现代社会的信仰根本不是一回事。农业时代大多数人没什么闲暇，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宗教意识再强烈，也只是平民生活中一小部分。现代人的闲暇，现代普通人考虑精神生活的层次，现代人接受宗教思想之后的行动力，都已经超过了古代的一般僧侣层次。现代的传教骨干放到古代，都可以进史书。

这是传统宗教完全没有应付过的现实。所以，暂且不论支持传统宗教有没有好处，在纯粹的技术层面，这些传统宗教也完全没法和现代极端主义宗教竞争。现代这些看起来很土的邪教，这些初中小学文化的教主，要是带着自己的几十个骨干穿越到古代，很容易就成为一代宗师，能赤手空拳创造一个宗教，甚至取代穆罕默德，让耶稣下岗，搞一个世界性宗教也可能。

所以，政府所谓“用思想对付思想”，首先错在了定位。政府潜意识里总以为自己在和传统在斗争，总想借用另外一部分传统力量给自己撑腰。实际上政府对付

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用旧手段去对付是完全行不通的。至于眼下发掘什么儒家传统道德，搞传统文化教育，读四书五经，那根本就是笑话，我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3、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所谓思想斗争，首先你得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是应该取代对方的正确价值观。在这个基础问题上讲多元化是行不通的。我可以宽容你，但你必须尊重这个宽容的基础，也宽容别人。这个共识，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这样一种东西。如果天生的把自己定位为反普世价值，那极端组织在发起恐怖袭击之前，都可以用多元化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前面说了，现代社会到处都是漏洞，而且不可能都堵住。你每次都等到极端组织动手了，才进行干预，永远是消极防守，是不可能阻止恐怖主义蔓延的。

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不敢提自己的普世价值，我们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行不行呢？目前看也完全不行。欧美在对付恐怖主义上，没有什么好经验供我们学习。实际上，现代恐怖主义倒是从他们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也经常会支持恐怖主义实现自己的目的。

具体分析起来，欧美普世价值的基础就是自由主义。政府是世俗的，中立的，大家宗教自由，行动自由，但必须在公共事务中互相宽容。

这里首先的问题是，我凭什么要接受你这套体系？过去的政府都有国教，动不动搬出上帝来做最终权威。政府推行的具体法律条文可以解释，但道德体系本身不容质疑，我就是要无条件推行。现在大家都知道没上帝了，起码政府自己不拿上帝说事儿了，那么我凭啥相信你的体系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普世价值讲究宗教自由和宽容，但如果我的宗教教义就是不宽容呢？我不容许异教徒侵犯我的教义，我认为你必须尊重我这个教义，你怎么办？尤其是自由主义不管家族内部的事情，甚至连社区内部的事务都让你们自治，结果就是在宽容的气氛下，不宽容的极端组织日益发展，直到彻底破坏社会秩序。

第三个问题是，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秩序，更是一套经济秩序。自由主义不管贫富分化和失业问题，你混得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失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竞争不过别人没理由找社会负责。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还好，经济增长一旦减速，没有增量来安抚穷人，立刻就为恐怖主义提供了肥沃的经济土壤。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在美国已经是个显著问题了。美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快，人口密度低还好一些，但还是出了 911 这种事情。西欧各国的部分移民区，无论是中东移民还是东欧移民，都是警察毫无办法的犯罪高发区，都是中东恐怖组织的人力仓库，平时则窝藏各种非法生意。对付这种现象，欧美实际上就是两个办法：

1 放任，随便你。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有钱人给自己雇保安，中产阶级去

住房产税很高，保安很多的高等社区。穷人社区的治安混乱就随便你了。时不时来个恐怖袭击，可能还可以加强统治的合法性。有一段时间，普京的支持率只要一下降，高加索恐怖分子就会恰到好处地来一次袭击，让俄罗斯人死掉几百人之后，更加支持强权统治。这未必不是情报系统定期放松监控的结果。

2 彻底的高压统治，消灭个人自由。这就是欧洲极右翼现在主张的观点。对恐怖分子所属的社区进行无差别报复，搞民族消灭，搞宗教战争，对个人生活进行全面监控，甚至搞白名单制度。就是说，你只能干政府允许你干的事情，而不是仅仅避开政府禁止的事情。这就是斯诺登正在揭露的事实，是俄罗斯政府在中亚的统治方式。过去俄罗斯政府搞不定车臣，现在普京把那边一些军阀的任命永久化，实际上就是搞贵族制度，搞土司制度，让土司自己在内部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一个国家有主导民族和强大的军事-经济贵族统治集团的时候，这种事未必干不成，但问题是，这样做下来，自由主义就把自己否决了。

当代的西方实际上就是在这两种选择之中摇摆。最后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两种措施的混合。不是说黑色白色混合成灰色那种混合，而是围棋的白子和黑子倒在一起那种混合，社会可能这一块是高压统治，那一块是自由放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欧美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济进一步衰退，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4、拖不得

说来说去，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让我们照抄。但我们也不能坐等。因为恐怖主义对中国的现在，尤其是未来已经构成了很清晰的威胁。

前面咱们说经济基础是恐怖主义的根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减速期。半年前还用来证明经济没问题的“克强指数”，现在已经不太敢提了。过去几十年，富人占有了大多数经济存量，把经济增量中的一部分分给打工者，解决了社会内部矛盾。现在经济增速下来了，怎么办？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本来就没赶上打工潮的落后地区，少数民族怎么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来了。

2008 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是，农村还是经济的减压阀。打工者实在不行，可以回老家去。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了。打工者宁可在城乡结合部租房，也不愿回老家住自己的房子。他们，尤其是他们生在郊区的子女，完全没法接受一切靠自己的农村生活，根本离不开城市生活的便利。换句话说，农村社区已经完全没用了，新一代人在经济减速时期的经济需求、精神需求都要用全新的方式填补。社会主流不填补这个空间，自然有人来填补。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

尤其是现在大学生和技术人员的供应已经很充分了。他们的技术或许不能让他们获得高薪，但肯定可以让极端组织的破会力成指数增加。眼下的极端组织里面，找个能开车的都算技术人员。这是恐怖主义的破坏力至今限制在局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如果经济减速和精神生活空虚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卷入恐怖主义。从我今天最开始讲的那些技术可能性来看，未来必然还有更大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实际上恐怖主义现在已经很影响经济了。我小的时候，幼儿园放学是我自己回家的。小学要接送，那是闻所未闻。现在，任何家庭，有谁不接送小学生上下学的吗？任何小学，乃至中学，到中午晚上放学时都必然是堵车的源头，都必须有交警和民警到场指挥。这意味着，要保证孩子吃饭，保证接送，一个家庭起码要有一两个人为孩子服务，没法上班。家里如果有退休的长辈，身体还好，那还好办，如果没有，那就要往往耽误一个人的工作。你们过几年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人口总量开始下降的今天。这肯定是对经济有显著影响的。从原因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对孩子的犯罪太多。尤其是最近连发对小学，对幼儿园的暴力攻击，就是个人恐怖主义。如果大家还把新疆当我们的领土，把那些离邪教很近的公民也当同胞，承认经常出现个人恐怖主义的底层也当成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喜欢把全部的个人隐私都交出去，放弃太多的个人自由，就必须考虑一个对恐怖主义的全盘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别的国家没解决，我们这个最大，也是最新出现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在变成工业国，在变成最大工业国的同时，人均水平还和发达工业国差很远。如果中国就此停住，问题不会更少，而是会更多。到那时候，恐怕连现在的水平都维持不住。

工业社会发展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前面说过，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把他们推进了现代世界，但没有建设一个能自主进步的工业化社会，所以炸弹和内战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搞阿拉伯之春，年轻人互相串联，靠的是中国造的山寨机和华为、中兴公司的基站，换句话说，阿拉伯之春的硬件是中国出口的。我们在国内也普及了类似的硬件，我们在工业化的阶梯上比他们爬的更高，潜力更大，一旦遇到进步障碍，风险也更大。

所以，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保证工业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必须设计新的软件，增强社会的抗风险性。前苏联地区自解体以来，已经爆发了十几场内战，出现几十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眼前的教训。千万不要觉得繁荣的社会下面没有危机，千万别觉得过去几十年没问题，按照这条路走就能万事大吉。

有句话叫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患不是我们读了书才产生的，而是我们了解社会之后发现的。各位既然能在周末晚上的大好时光来听我谈恐怖主义，也是希望对社会有深入了解的人，不应该把思想停留在社会的表层。我们享受了这个社会的繁荣，也希望这个繁荣能长久下去，所以才要仔细研究社会繁荣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潜在的危机。

仔细研究下来，现代社会繁荣的基础实际上有很多在工业社会之外，比如资源，比如环境。还有一个基础，就是稳定、相对简单的社会环境。任何社会在经历工业化之前，结构都是很简单的，进入工业社会后开始复杂化。一旦工业化进程停滞，这种复杂化就很可能带来恐怖主义问题。完全可以说，工业化早期的简单社会和高发展速度也是一种会“过期”的“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资源曾经是我们眼前这个繁荣社会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消耗光了，社会变复杂了，粗放型高速

发展也要结束了，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就开始走向前台。这就是我今天谈的主要问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在思想上未雨绸缪，重新为繁荣的工业化社会打造社会基础。

5、方案？

从前面看，潜在的恐怖主义实际上是没法从硬件上杜绝隐患的，只能通过软件来解决。否则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我承认到现在为止，我都是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这么大的问题，让我一个人来回答，本身也不太现实。但是，我可以把我高考的经验捡起来，用排除法试着回答一下。

从经济基础来说，解决方案必然要包括经济平等的因素。不管原因是什么，你把一部分人抛到经济主流之外，就必然会给恐怖主义提供土壤。所以，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绕不开恐怖主义的。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还不能是社民党发福利那种模式，因为光是保证吃饱喝足，用养猪的模式养人，反而是给恐怖主义增加土壤。必须让所有人都参与生产，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分配才解决问题。

从意识形态来说，现在科学发达，肯定不再是搞国家教会，用上帝忽悠人的时代了。我们必须基于世俗社会重建普世价值，建立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天堂地狱，也能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社会。这样的东西，我上中学的时候学过，叫唯物主义信仰。

从具体操作来说，再好的经济政策，再好的意识形态，也是基层组织操作出来的。新闻联播里面说的再完美，比不过传教士天天在你身边装神弄鬼。半夜一个人想起哲学问题睡不着，你要找个人忏悔，要谈心，无论这个人是牧师还是党支部书记，他都能影响你的思想，都有极大可能说服你改变价值观。

这几个特征摆到一起。大家很清楚了，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实际上，**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确很彻底的解决了极端主义宗教问题，解决了恐怖主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时代最后自己维持不下去了，不变不行。也许后来发生改变的方向未必是正确的方向，也许转型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时代自己把自己解决了。**所以，照搬过去的方案肯定是行不通的。

再其次，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只是刚刚给中国的工业化做了一个序幕，给大家打开了现代化社会的大门。我今天前面讲了两个小时，主要说的是什么？我说恐怖主义的表现、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土壤，这统统是发达现代社会的副产品，是过去任何时代没应付过的挑战。你照搬一个工业时代门槛上的旧体制来解决发达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我看肯定也是惹麻烦。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把问题留给了大家。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解决恐怖主义这个任务是新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肯定需要一

个升级版的社会革命来解决恐怖主义。新型的普世价值、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平等的分配机制则是这个方案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落实到具体方案，要提出一个充分条件，这肯定不是我一个人坐在编辑部里能设计出来的东西，从设计到施工再到维护，这是需要所有人，包括今天在座的人解决的问题。我今天的演讲能让大家开始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就算是没白讲。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于华东师大、中国地质大学两次演讲的讲稿汇总，对演讲内容略有修订。）

背景：少年中国评论（YCA）分裂

2015 年

Youaskme

看完网友们的回答，要么是对左圈一阵嘲讽，要么是对键盘政治圈一阵嘲讽，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者一阵嘲讽。有的人还把批马的人说成是“改动资本论一个字就说成是修正主义”，但实际情况呢，看看当事人微博里的内容吧：





传说 马前卒:

瓦特发明了通用蒸汽机



传说 马前卒:

资本论那玩意



传说 马前卒:

翻翻就行 真的是太啰嗦了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激情作文中视而不见



传说 马前卒:

作为一个宣传作品 视而不见也没啥了



传说 马前卒:

如果你认为这是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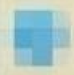
传说 马前卒:

那共产党宣言的确是够黑暗的



传说 马前卒:

小生产者对经济的理解去构建乌托邦




传说 马前卒:
马克思只见过一次工业革命
传说 马前卒:
所以他不懂工业革命
没有选择吗？
传说 马前卒:
很正常 历史的局限性
传说 马前卒:
当然我依然认为马克思是开天辟地的人物


管理员
对啊，还是要系统论述
传说 马前卒:
不过如果只说产业升级
话唠
你们这是要把督工的头发都逼没了么
传说 马前卒:
其实大目标和刷盘子读书已经足够和资本论 和萨缪尔森一起并列读了

图中的马前卒，说“马克思不懂工业革命”，“在产业升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是小生产的理解”，这个怎么也不算是“改动一个字两个字这么简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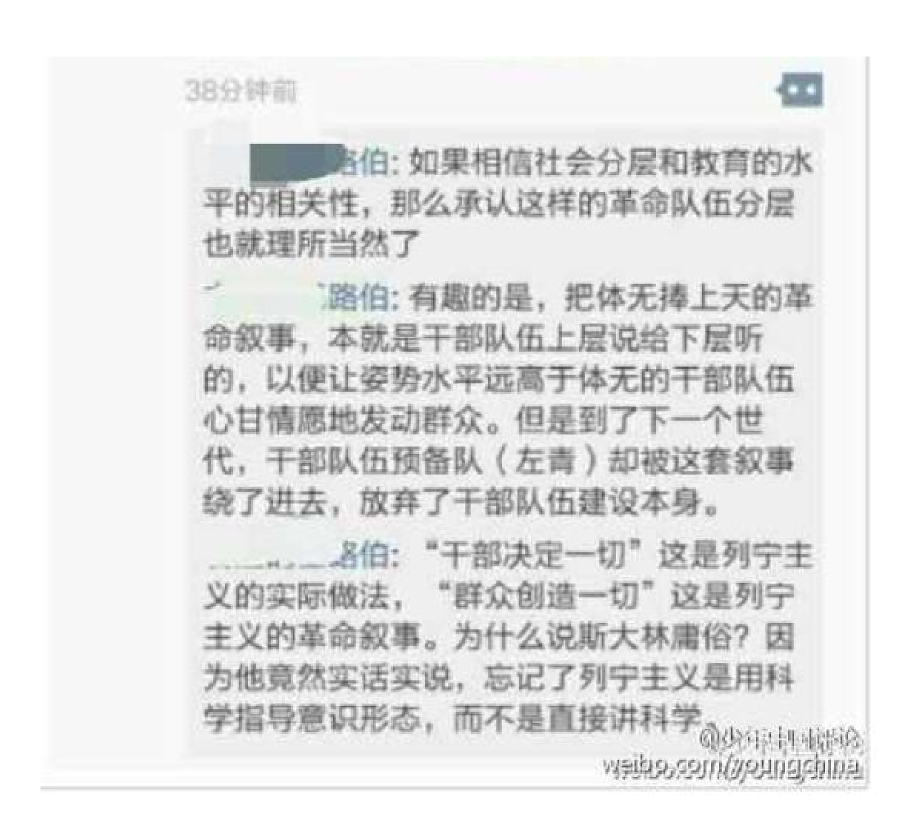
再看这个：



第三国际简史：觉醒的大资（马克思恩格斯）用无产阶级看不懂的文章启蒙了中产和脑无。持共产主义立场的大资（比如毛泽东）和脑无（比如商务印书馆职员陈云、奔赴延安的知青）建立核干部队伍，这批干部队伍用底层听得懂的简单教条（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依托封建化的旧组织（青帮、行会）动员群众。说得赤裸裸一点，在阶级社会，连革命都是分层的。

收起





图中这个人说的东西，恐怕不是超出一个字两个字这么简单。他的言谈那种对工人阶级尤其是对体无的俯视的态度，一副“我就是来领导你们”的架势，难道只是改动一两个字这么简单？所以啊，不要妄下结论，说什么“左派就知道扣帽子”啦，“教条”僵化啦什么的。还是好好看看人家到底说了些什么，在争论些什么。

至于有些人说，说是思想争论，其实是利益之争，是争权夺利。我觉得吧，这个里面能有啥利益。在 YCA 混，能混到多少钱一个月？混成 YCA 老大，到外面去应聘时，能写到简历上不？还不如观察者网里的一个小编辑呢。

勇敢的转身

上面评论那么多，将近一半不懂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

观察者都能跟 yca 一样了？难得你不知道黑牛攻击马前卒就是因为他去观察者当编辑了吗？观察者可是右派国家主义立场的，yca 虽然混杂，但是还算是左圈。

yca 也不是第一次分裂了，前前后后，带上这次也有三次了。

现在左圈普遍看戏态度，因为 yca 水平还是略低端，政治正确倾向有些严重，出现任何事都是先黑 tg，而不是就事论事。所以大家对他不咋感冒，不过 yca 那套适合学生与办公室小资白领，受众还是挺广的。

再说马前卒这事，借用一位左圈同志的评论：“马前卒的问题不是这一两年才有的，零八年，他在描述中国革命的时候已经透露出一股子对工人阶级变革社会努力的不屑。一零年左右，他又把中俄革命描绘成民族自强运动，标题为《历史从

不温柔》。一二年，他跟我说自己在观察者网上班，当时我还觉得只是谋生没什么，而且写些不带政治色彩的时评文章也不是问题，但他的《大目标》面世的时候，我惊呆了。否认工人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中的支柱地位，为中国帝国崛起鼓吹，洋洋得意的技术决定论，用认同政治以及领导权理论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辩护，而他的好学生"右边的基路伯"更是把这种路线推演到极致。对马前卒的反击至少五年前就可以做了，最不济三年前就应该做了，而现在，赤色补天路线努力已经成型。"

马前卒算什么左派，上面一口一个督工喊得。呵呵。

倒转马前卒

（谬）马前卒：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注意问题不是“如何评价共产主义”，也不是“如何评价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相信共产主义的体验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理性思考和情感经历，我并不指望别人能通过和我一样的体验来理解共产主义。但是，所有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遗产，就是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共产主义，是最客观，最普世的一个角度。我上个月有一个演讲，主题是如何对 00 后谈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一个上世纪的老家伙，我也没能力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分析了一下新时代共产主义绕不开的历史问题，尽可能地把我们这一代人感性的革命记忆变成理性化的人类遗产。内容如下：

马前卒谈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定位——《给“00 后”的唯物主义人类简史》（在发言稿基础上有一定修改）

今夕何年

大家好，今天是 1 月 23 号。按照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周期，春节之后才真正算进入新的一年，在我的心理感受中，现在也依然是 2015 年的年末。但是，日历告诉我们，21 世纪第 17 个年头已经到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批生在 21 世纪的人已经满 16 周岁了。

咱们国家的劳动法规定，16 岁以上的公民参加工作，不再视为童工；民法通则规定，满 16 周岁的公民，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在 1 月快过完了，很多单位马上要发 2016 年第一次工资；换句话说，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同时，有成千上万的“00 后”正在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公民。虽然他们还要 2 年才能获得理论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从政治道德来讲，和这样的成年人谈政治理论，和他们谈现实政治已经不算利用未成年人了。他们和 90 后、80 后一样有资格参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

在座各位和我都是 20 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我们共同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向“00 后”介绍共产主义？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21 世纪出生的人，历史视角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和我这种成年后才用上互联网的人尤其不一样。我们有革命大潮末期的记忆，但绝不能用这个记忆去替代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教科书上枯燥的记录，不是现实中能体会到的东西。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在 00 后出生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在他们成年以前，大多数前革命组织已经连装饰用的红色都不多了。“00 后”看毛、邓、乃至看某老者 X 的感受，和我在历史书上读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事迹差不多。我们在读过教科书之后才接触的网络段子和抗日“神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历史启蒙教材。上周刚刚结束的台湾选举，在我们看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反而可能是国民党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所以，很难再通过分享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或情感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红色记忆淡化、娱乐化的年代，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考虑如何把革命讲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新故事。

在向别人宣传之前，我们自己首先要理清自己的的想法。所以，革命的新问题可以简化为下面 2 点：

A 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坚持的是什么东西？
B 我们如何把自己坚持的东西推到现实世界？

注意，就算 00 后今天还没成年，这两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说明共产主义对你还不是一个真实的目标。

对于上一代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因为他们身边就有革命政权这个最大的成功案例。就算革命政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身边还有共产主义的普及教材，图书馆里有马恩全集，他们始终可以说服自己，革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背离了革命导师的本意，是因为放弃了革命早期的纯洁性。只要"回到马克思"，只要"重建革命精神"，就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再反问各位 20 世纪出生的朋友三个更直接的问题：

A 在座有谁完全是因为读了马克思原著而倾向共产主义，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有一人举手）
B 迄今为止，哪次革命基本实现了马克思的预期？或是结果符合你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
（无人举手）
C 历史上有没有哪一次革命让你觉得可以复制一次？怎么复制？
（无人举手）

如果没人能对这三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就往先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马克思这个人没关系，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坚持的。我们在政治上遇到了障碍，毫无疑问应该首先拿起唯物主义工具来分析问题。

那么，我们眼前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前面说了，就是近 200 年来的革命文化遗产不能再感动人，从列宁到现在 99 年的革命政权建设经验不能再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工具，分析一下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析一下共产主义思想自身。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近百年来几乎没人做过。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往往会给共产主义者提供一个固定的思考原点，让共产主义者站在这个原点上看整个世界。结果就是共产主义者看得到世界，看不到自己，看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脑勺。（包括"修正主义者"在内的国际共运的对立面，和独立的学术人士早已看到共运的后脑勺）

现在所有国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成为了过去式，敌人拆掉了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原点，让共产主义者从零开始，反而让我们拥有了自由的视角，客观地分析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这个现实也让我们惊慌失措，找不到观察的出发点。我今天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一个客观的出发点。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

说起从零开始认识共产主义。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读过的一本老干部回忆录。作者是解放战争后期投奔解放军的大学生，共产党当时已经准备发动战略决战，非常需要这种受过教育的青年当干部，来接管新解放地区。所以组织没有让他参军，而是直接把他编入随野战军行动的南下干部学校，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学习管理技能。

这个老干部回忆，因为时间紧急，只能边走边学习。第一节课是在野地里上的，一个穿着军装的首长亲自主讲。他本来以为要学土改，学打仗，或是听到政治口号，论证共产党好国民党坏。没想到，首长让人抬出一个大黑板，开始讲原

始社会，从几万年前讲到几百年前，第一堂课快结束了还没提到眼前的革命战争。这让台下的学生又新鲜又诧异，没想到共产党的教育中，最基础的一课是文明史。

我在上世纪末看到这一段，和作者感同身受。因为我当时正在上政治课，从初中开始——实际上是从小学历史课开始，翻来覆去的要学社会发展简史。像"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话，我从 10 岁听到 20 岁，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还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看到老干部当年第一课也是社会发展简史，我立刻感觉同病相怜，和同学一起吐槽共产党体制僵化，这么多年翻来覆去还是这么点招数。

等到我成年以后，我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我才发现。原来当年的教育大方向没错！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意味着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底层反抗，更是一万年文明史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人类未来大多数问题的必需工具。要是不讲社会发展史，就没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意义，也没法展望共产主义的未来。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这样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而 20 世纪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者把文明发展史这个故事讲的太僵化了，以至于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地位，不能再把具体的革命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相结合。

所以，我今天也要先用一半的时间谈谈我理解的人类发展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给共产主义运动定位。然后再谈谈现实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

原始社会的"混沌"

人类何以为人

谈人类发展史，首先要说人类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种灵长类，那么多种猿人，只有我们这一支变成了地球的统治者。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说起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恩格斯放在《自然辩证法》里面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文章里这么说："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总而言之一句话，恩格斯认为，劳动塑造人类，人类和猿类的根本区别在于会不会制造工具。一旦学会了制造工具，人类就会被工具所塑造。人类后面的一切成就，比如说语言和抽象能力都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个说法总的来说不算错，

考虑到19世纪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成就，考虑到恩格斯的学术背景，甚至可以说恩格斯的逻辑非常准确，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观感。毕竟没有枪和弓箭，我们打不过猩猩，也打不过其他猛兽。

但是，从现在更进一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来看，恩格斯的许多论断是有问题的。我到现在也记得恩格斯自己写的一个注释：“这方面的第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一亿年多一点。”

这个认识显然完全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观点。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据和具体结论都不能盲目相信，不能说马恩列斯毛说过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当做真理、当做论据。在上面那篇文章里恩格斯还有一句话：“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毛泽东在1943年也说过类似的话：“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这两句话显然也是错的，因为其他生物也会造工具，包括石器和木器。根据20世纪和21世纪的考古学和发掘生物学观测，好几种属于人亚科的猩猩都能制造工具，更不要说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属的生物了。就在这个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大批十万年历史的石器，被认为是佛罗勒斯矮人制造的石器，亚洲大陆上的丹尼索瓦人也有很多工具残留。总而言之，制造工具不是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的专利，甚至连猩猩这种和智人有明显生殖隔离的猿类也能制造工具。但最终只有我们一个物种发展了现代文明。

当然，也可以把智人的优势总结为运气。毕竟一旦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生物也发展文明了。也许另外那些会制造工具的尼安德特人、猩猩是被我们扼杀的文明物种呢？也许我们只是比他们运气好一点呢？

但这种想法也被考古学证据否定了。因为早在我们现代人进入文明时代之前，我们就干掉了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把其他会造工具的猴子赶进了丛林，把其他人种全部灭绝。像什么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根本没活到人类建立文明。实际上，人类是唯一到达西半球美洲大陆的人种。大航海时代，欧洲探险者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现野人，但这些野人统统是和我们一个物种的智人，可以相互通婚。换句话说，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现代人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所有会造工具的人种，就占领了这个地球。就算是在野蛮时代，其他会造工具的人和猿也不是我们智人的对手。

那么，如果智人统治地球的关键点不在于工具，那还能是什么？

我两周前去过北京周口店的猿人遗址。那里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级科普基地。现在中科院还在持续地开挖这个遗址，经常有科考队在那边科研兼搞科普，我特意拍了那里给小孩子看的科普条幅。

大家从这些科普条幅可以看到，现在科学界已经达成了比较普遍的认同——抽象思考能力和虚拟符号体系才是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关键优势。很多动物都可以制造物质工具，还有一些生物拥有语言，但只有人类能想象出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用声音、手势乃至后来的图画、文字来描述这些抽象概念，再把概念落实成现实的工具。上面的条幅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即猩猩可以接受抽象概念，但不能自己发明一个抽象概念。其他一些实验证明，猩猩可以像原始人一样打制石器，但不能从石器中抽象出锐角和钝角的概念，结果就是他们打制的石器

很粗糙，始终无法达到现代人祖先的水准。

这就把恩格斯的逻辑倒过来了，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改造了我们的思维。而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比其他灵长类物种丰富，才能制造更好的工具。换句话说，“软件”上的微小差异是人成为人的关键。最近有一本书，以色列人写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这本书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用语言来吹牛、聊八卦新闻、讲段子的生物。最终人类因此发展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够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道德和法律。或者用刚刚去世的那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只有人类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所以人类能够跨越血缘和熟人网络，搭建复杂程度超出任何生物的群体，进行空前复杂的合作，把自己的想象力和别人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构造人类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抽象能力看做一种重要的工具。毕竟工具未必一定是有形的东西。我前几天在知乎写过一个回答：

相对论刚提出时，号称全球能完全理解的人不超过十人，现在却成为理工科必修课程，是我们智商提高了吗？ - 马前卒的回答

你要说服自己的大脑，“数学工具”这个词绝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客观、准确的描述。铲子、汽车、充气娃娃等有形物体是工具，思考方式也同样是工具，都是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理解世界能力的“放大器”。这一点在理智上接受很容易，在直觉上相信比较难。就像大多数人可以在理智上承认电场、磁场也是物质，但真的思考复杂问题的时候，直觉就只承认椅子、汽车这样的东西是物质了。

什么是工具呢？严格来说，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只是附加了“信息”的某种结构。砍木头做梯子，木头是自然界的物质；炼钢造汽车，铁矿石和煤都是地球本来就有的。我们没法凭空“创造”物质，只能把既有的物质赋予人类设计的结构，才能变成实体工具。至于思考工具，只是把这个“结构”直接用思想表现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思考工具和日常的实体劳动工具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说，人类现在能一枪撂倒大象，不是因为力量增加；人类能迅速理解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物理前沿思想，不是因为智商提高，两个事件都完全是工具水平提高的结果。相对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最近一万年我们的基因没啥明显改变，进步的是工具。

回到物理学，如果还让你用 500 年前的数学工具和实验工具去研究物理，不要说理解相对论，连牛顿三定律都不是“显而易见”呢。

这和我在北京周口店看到的另两个条幅说法是一致的：

过去一万年、五万年、乃至十万年，我们的基因和智商都变化不大。但我们最终在所有灵长类和所有人亚科动物中脱颖而出，恩格斯认为主要原因是工具，但更可靠的原因是人的想象力，是抽象思维这个工具包。有了这个工具包，人类就能开发出许多高级的“无形工具”，比如说数学、宗教，比如说政治理念和生产关系。我们因此能不断改变自己的“文化基因”，去配合那些不断进步的“有形工具”。

为什么“无形工具”能帮我们进步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复杂到靠条件反射并不能对付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河狸能在小河筑坝，但不能到大河筑坝，只有人类才能通过设计来建造水库。其次是因为这个世界还不够复杂，人类

的智慧足以在大脑内建模，用抽象的概念来对付世界。尽管我们的抽象思考不一定总是正确，但成功率是高于基因的随机变异的。这就是人类相对其他生物最大的优势。前面说的《人类简史》就从这个角度描述了法国大革命：

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果还不只如此。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 1789 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赋君权"转成"人民做主"。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

其实，基因演化的速度也不算慢。我们驯化狗只有一两万年的历史，现在最大的狗可以像马一样拉雪橇，小的狗可以藏在杯子里玩，几乎都看不出是同一个物种了。猫的驯化是从人类开始种地，有谷仓开始的。马的驯化还要晚一些，可能只有几千年。游牧民族第一次进攻农业文明的时候，马和野驴还没有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强壮到能被人骑，只能几匹马合在一起拉车。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战车兵逐渐转化为骑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变的越来越强壮了。这说明，只要淘汰率足够高，动物的基因变化并不是太慢。但是，人类文化基因的变化比动物基因变化还要快，所以人类成了统治所有其他动物的物种。

这样看来，就不能说生产力、生产工具这些有形的东西一定要主导文化、生产关系这些"无形"的东西。从人类社会的一开始，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就是相互配合进步的，无形工具的重要性可能还要大一点点。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也是有区别的。恩格斯解释文明的出现，就是完全基于于有形物质工具的进步：

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坚持认为，只有生产工具的进步算进步，其他的进步都只能是附属品。这就是他的唯"物"主义，但在我看来，思考方式和文化产品也是"物"，我们大脑中特定的抽象能力也是"物"。我们想象美好的未来并频繁尝试，我们比其他物种的心更"野"，更需要"自由"，这既是我们人类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共产主义在人的基因和本能中是有物质基础的——大脑的特定结构也算物质基础。

恩格斯还用他的人类学理论论证过唯心主义的出现：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现在看来，恩格斯这个理解也有点偏颇了。他把唯心主义看做一种习惯性的错误，认为只有人类之外的物质进步才能带来精神上的变革，其他都是假的。实际上呢，人类喜欢用虚构的东西来解释现实世界，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可能是一种本性，一种让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性。在人类学角度看来，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可能是同源的，你在感性上能相信虚幻的东西，才能依靠逻辑和证据相信那些你没见过的真实东西。有的人类相信上帝，有的人类相信天上的星星是遥远的大火球，这都依赖于人类的“虚构”能力。

当然，我们人类的抽象思维最终发展出逻辑和理性，压倒了感性认识，所以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我们能客观地研究人类大脑，研究人类学，研究唯心主义本身，就不用担心唯心主义会把我们束缚在神权社会，就不必避讳唯心主义也是我们人类重要特性的事实。

前面讲了这么多，核心概念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人类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就是唯心主义，就没有一点用处。不能把脱离生产力现状的政治构想当成纯粹的幻想。实际上，这可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方式。前几天我在知乎发了个恶搞段子。有人问：

一个热衷于看宫斗剧的民族有民族前途吗？

我回答说：

“这要看你怎么评价 1600 年的英国……”

还有人回答说：

你听说过《纸牌屋》么？

这两个回答看似是恶搞，实际上有一定的逻辑。英国的莎士比亚，美国的好莱坞，这种高级无形产品出现在两个靠工业力量统治世界的国家，并非完全偶然。人类群体脱离现实世界的想象力的确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工业力量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工业力量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与之类似，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自然存在于世间的概念。但通过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我们发现，这些抽象概念也可以帮我们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所以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是看上去美好，同时也是现实的人类思考工具。是帮助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

我前面说了，拥有抽象思维和吹牛的能力，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生物学特征之一。共产主义在文明社会中的第一个雏形是“空想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生物学特征的一部分。说明人类有通过抽象思维追求幸福的本能，说明共产主义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当然，只有空想是不够，但如果不正视人类的这个本性，不利用这个本性，共产主义也很难成功。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本节要点：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可能不仅仅是劳动实践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空想共产主义在大脑内部有物质支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本质的需求之一，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工业革命之前，这个需求没有实际的物质支撑。（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基因遗产

我前面讲的这些枯燥内容，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已经相当离经叛道了。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用社会性来定义人类：

马克思在 1845 年写过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有名，就是那句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篇短文里还有另外一个明确的判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即人类的本质是社会性。

马克思的话倒不是非常针对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没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主流看法，即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先天形成的。人要信上帝，要服从统治阶级，要安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就算革命了也得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也不会获得任何进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背后其实有个潜台词，即人类天生是一张白纸，被社会塑造才拥有了阶级、等级、私有制的概念。既然这些概念是后天形成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的平等社会概念，进而搭建一个新社会。

总的来说，马克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把话说绝对。比如说他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讨论就有问题。费尔巴哈其实也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性，在《宗教的本质》这本书中，他指出，上帝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部投射，指出宗教产生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

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即真正信仰上帝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种依赖性在动物和动物阶段的野蛮人中，是个不自觉、不自省的依赖性；将它提升到意识中，表象它、思量它、承认它，就是进入宗教。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他谁正确呢？

以 19 世纪的观点看来，马克思的看法更“理性”一些。但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固然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要是说到底有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支持，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现代科学结论。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男女感情中，男性的忠实程度和催产素浓度有非常高的相关。进一步的生物研究显示，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激素水平有关系。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观点未必就会输给马克思。

催产素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中国社科在线

Nature: 催产素在人类社交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荷科学家发现催产素可促使人类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行为

催产素（英语：Oxytocin，又称缩宫素，简称为 OT）是一种哺乳动物激素。可以在大脑下视丘“室旁核”与“视上核（英语：supraoptic nucleus）”神经元所自然分泌，经下视丘脑下垂体路径神经纤维送到后叶分泌。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英语：Ethnocentrism），是一种相信自身种族或族群是极为重要的，并认为其他族群都和自身族群有关联性的倾向。民族自我中心的个人会判定其他族群与自身族群或文化有关连，尤其是语言、行为、习俗与宗教方面。这种民族上的优越感可定义每个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

而真正让后叶催产素名声大噪、引起科学家极大兴趣的研究发生在 2005 年。当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中，志愿者们模拟一个游戏，将资金投给一些并不算十分让人放心的理财机构。研究人员发现，吸入催产素的志愿者们比吸入安慰剂的志愿者们更愿意投资给这些机构。

在文章发表前的 8 年中，催产素对人类社交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孤独的领

域；文章发表后，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重复试验，用来测试催产素对人们各种社交能力的影响。

之后很多研究小组发现催产素可以使人更慷慨，能够更好地读懂别人的表情，在争论中能够建设性地和别人沟通，觉察到别人更可信、更有魅力、更平易近人等。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卡罗林•德克勒克研究发现，催产素只对接触到“对”的人起作用：当他接触到较为熟悉的人，那么催产素将让他更擅长交际；但如果是陌生人，催产素将没有任何效果。另外，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催产素只能使使用者与本国同胞拉近距离，而对外国人则效果甚微。

催产素可以让你对熟悉的人更信任，更慷慨，产生道德感，和“自己人”抱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教的产生。换句话说，宗教本身可能的确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催产素的表达可能还会依赖于宗教之外的一些文化结构。比如说前面那个材料还提到：

……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起作用，而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有在悲伤时寻求友谊的习惯。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Heejung Kim 就发现，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即使 OXTR 基因中那个特定位点变成 G，催产素也不再有那种积极的功效，或者是收效甚微。

在悲伤时寻求友谊，这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基督教纪念耶稣受难的仪式。而且，在远东文化背景下，催产素对人类情绪的影响比较小，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解释基督教在 19 世纪之前无法在远东扎根呢？作为一个生化方面的外行，我不是说宗教一定就是某种特定激素的副产品，但如果完全抛弃人的生物性研究，许多人类社会行为是解释不通的。

我前面提到过，上个月去了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博物馆。就在我拍的那几张挂图旁边，是一个科普性的儿童游戏室。有一些机械配合电子投影设备的体感游戏，有模仿原始人摘果子的，有模仿原始人用长矛刺鱼的，有模仿原始人扔石头打动物的。我那天带着我儿子，我在拍横幅的时候，我儿子就在后面的游戏室里跑来跑去。

拍完那些横幅之后，我回去观察了一会小孩子们的行为，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摘果子的游戏前停留比较久的都是女孩，但挥舞着长矛刺鱼、扔石头打动物的几乎都是男孩。其中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也遵循这个规律。这可不是家长刻意引导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回忆了一下，我小的时候上下学，也喜欢像我儿子一样，折一根很直的树枝挥舞起来，就算没什么目标，手里拿着这么一根棍子也很开心，很安心。但我几乎从没见女孩有过类似行为，就算家里完全当男孩养的假小子也没有类似的举动。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男女天生的差异。即男人天生更倾向于当猎人，喜欢拿着一根长矛瞄准目标，女性则更倾向于采集植物果实。

但是，许多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拒绝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尤其是某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坚信男女差异 100%都是社会灌输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联手压制女性无产阶级。认为任何职业和专业上出现性别不平衡，都是必须纠正的结果。结果就是她们极端化的主张得不到普遍认同，甚至不会得到女性自己的支持。这就是忽视人类生物性的结果。

比如说不管哪个民族，人类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的肉食都比较多。分散开吃零食的时候，吃甜食和坚果比较多。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没有冰箱，不管打猎

打到多大的猎物，都得一次性吃掉。所以全部落习惯在一起聚餐吃肉。甜食在原始社会意味着水果，男人们出去打猎的时候，女人和孩子们就去采集，摘水果，砸坚果。这些甜的东西、脆的东西可以一边摘一边吃，也比较耐放，可以放在山洞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所以不管什么民族，都是聚餐吃肉，零食吃甜的和脆的，没有哪个民族会反过来。

又比如那时候男人们出去打猎，都是全部落一起出动的。一个稳定的部落几十个人，能跑能打的壮年男人也就是十几个左右。所以，全人类的男人都形成了结成十几个左右的队伍去打猎的习惯。到了文明社会，大家不需要打猎也没地方打猎了，但男人的基因里还是埋着结队打猎的本能。所以男人扎堆的地方，基层组织的单位基本都是 10 多个人，这样合作才最有效率，多了少了都不行。现代步兵班的基本单位就是 10 个人出头，加一个班长。古代军队的基础往往是十人一队，这都是原始部落给我们留下的基因烙印。

其实这个推论最合适的地方是体育运动。世界第一运动是足球，足球每队上场 11 人，可以换三个人，平均每场是十二三人上场。橄榄球虽然修改了足球的规则，但上场人数也是 11 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而是我们从基因里继承的游戏规则。

除了足球和橄榄球，我们还玩其他球，比如说篮球排球冰球。但只要是有激烈身体对抗的球类，上场人次都会努力地接近十二三人这个数字。篮球上场是 5 个人，冰球 6 个人，但是随便换人，一场下来往往也是十多个人上场。排球上场人数是 6 个人，一局比赛允许换 6 次人，加起来正好 12。这些数字都不是偶然的。

从游戏模式来说，球类运动的基本模式，就是这么十来个男人追赶一个快速移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圆形，但一般来说肯定是动物皮包裹的有弹性的东西。这些男人要对这个球干什么呢？一般的目标都是赶到网里，然后庆祝胜利。这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像打猎。在球场休息的时候，会有一群女人跑上来跳舞，助威，这也是原始社会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现代人找个机会把他发掘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没必要抱怨在球类运动上男女不平等，女人不喜欢足球。对足球的热爱本来就是男人基因决定的潜意识，女人看球本来去看最健壮，最帅的那个男人的，你让女人关心足球技巧，那是和基因对抗，没有好下场。女人最喜欢的运动是采集，过去是拿着篮子钻在灌木丛里翻草莓，现在是拿着包包在街上找自己喜欢的商品，几百万年的基因决定了女人喜欢逛街，这也是任何人拦不住的爱好。

足球和逛街的例子，说明人类的行为并不神秘，完全可以像研究动物行为那样归纳总结。读人类学，让我们在认识中摆正人类的位置。既不用宗教神秘主义去解释人类的行为，也不会两手一伸，说人类行为完全没有规律，没法预测。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先天属性呢？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用文化变异代替基因变异的。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必须适应这种打猎采集的小团体生活。不适应这种生活的祖先，要么被淘汰，要么去了别的环境。在这几百万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通过基因进化来适应环境的，最终形成了一些深埋基因的“本性”，不受这一万年的文明史影响。甚至共产主义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平等的原始社会里形成的动物性。只要具体参与到管理学和经济工作中，就能体会到类似“本性”的影响。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实际操盘的共产主义者，解释人类本性的时候，就比马克思“修正”了很多。1943 年，刘少奇执笔给一个国民军将军续范亭写信，毛泽东把信拿过来做了很多批注。毛泽东的前几条批注开始还是重复了马克思的

话：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但后面就说的比较实在，一方面不否定马克思的话，一方面对漫长原始社会生活塑造基因的事实做了部分承认：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总之，人类有很多先天的基因属性，包括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善于抽象思维，善于八卦，比其他生物多了艺术感，这些特性的确不依赖于社会塑造而存在。如果共产主义者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要给人类最大的“自由”，正确的思路是承认这些生物性，尽可能让社会结构和生物性相互配合。而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关系塑造的“社会性”，贸然追求绝对的“发展自由”，以至于和人的生物性作对。因为在人类有资格对自身搞转基因之前，和生物性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修改人类自身的基因，本身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技术能设想的未来，暂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应这些生物性去塑造新的社会性，就能事半功倍。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部落规模是有上限的，平均几十人，最高不超过 150 人。我们每个人手机电话簿里的有效联系人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数字。在这样一个团体里，人类能彼此认识为熟人，彼此直接交流八卦新闻和信任感，满足人的群居愿望。许多大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焦虑，就是因为缺了这么一个塑造集体感的团体。

我举个可以量化的例子。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开始农民自发结合的上限就是这种生产队。后来一度盲目提升集体化规模，上升到大队（行政村）乃至公社（乡镇）级，效果都不好。最后逐步下放，回到生产（小）队级才稳定住。1961 年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集体财产三级所有，以小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和日常劳动单位。事实证明，这个级别的集体化是很有效的，兼顾了集体劳动的规模效益和内部监督，也同时提高了农村基建水平和技术扩散速度。

小队的人口是多少呢？老幼青壮在一起，全国平均就是 100 人出头，一般是五六十个成年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正好是扎根于我们基因的“熟人单位”规模。所以这个级别的集体生产单位最稳定，最有效。之前搞大公社带来的效率损失，之后盲目拆分集体经济对环境和教育的破坏，都说明不能和人类的生物本性作对。类似地，中国军队长期把连级作为基本伙食单位，设炊事班为全连服务，也是因为人类本性希望在 100 多人的群体里生活。在未来，我们考虑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基层社区规划也要参照这个数据。

当然了，我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分工不显著的情况下的例子。70 年代的中国农村，大家都搞农业；80 年代前的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原始人的“分工”层次，所以这个不超过 150 人单位的规模效应比较显著。再搞新社会建设，必然不会有这么简单的分工，也就不能照抄当年的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尊重人的生物性是必然的选择。

在社会学的角度，最重要的生物性是什么呢？是平等。今天我们可能把平等当成一个逻辑概念。或者觉得根本不用讨论。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大多数群居动物是没有什么平等的，就算是灵长类，绝大多数都在自然状态下有非常严酷的社会等级，从猴王到最底层的新猴子，顺序一点不能乱。他们的基因里就埋着不平等的本能，就要在一个不平等的群体里争夺更高的地位。但是就考古学证据和自然观察看，原始人相对大多数猴子，是非常平等的一个团体。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等级（？）。所以才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

人类在类似的条件下度过了上百万年，不适应这个平等社会的基因都被淘汰了。追求团体内部的平等是我们非常本质的一个生物性。人人生来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你也可以像毛主席那样，说这个生物性也是社会塑造的。但不能否认这个本性的存在。作为遗传物质的 DNA 是 1953 年才被最后确认，马克思时代没有对基因的概念，毛泽东也很难说去世之前能不能接受这个思想的社会学意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本性”这个东西做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懂基因，知道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就该实实在在地把这个唯物主义概念说清。

本节要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各种特征，主要是生产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性，但固化于基因的生物性也不可忽视。为人类规划未来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用新型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型的“社会性”，也要兼顾考虑人类的生物性，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至少要避免对抗。在宣传共产主义的时候，也必须尊重生物性本身的规律，否则也是另一种唯心主义。（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和谐社会”的末日

我曾经考虑过一个严肃的问题。原始人的生活和文明社会生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仔细想了想最大的区别是文明生活有历史，有变数，而原始人没有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原始人的视角看出去，纵向看，世界变化很慢，用尽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逻辑，都看不出他和他的祖先生活有什么区别。也看不出他的子孙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横向看，也看不出他和附近的部落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样的打猎采果子生活。他既不羡慕祖先，也不羡慕其他人类。他的生活和他的梦想几乎是合一的。

到了文明社会就不一样了，至少顶层的统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世界在变化。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最长也就三四百年，商朝据说有五六百年，但中间迁都那么多次，肯定也不是那么稳定。周朝 800 年，但西周只有二三百年，后面的王室都是装饰品。所以，统治集团的每一代人最多只占稳定王朝的十分之一，能感受到知道时代在显著变化，要做出政策调整来应对。他们装神弄鬼，说世界永远不变，说贵族和国王永远统治，不过是糊弄被统治阶级的鬼话。这一点他们自己一般来说也清楚。

就算是被统治的农民和奴隶，没文化，不知道历史，没法纵向比较，觉得自古以来农民就该过这样的日子，他们也可以横向比较，比比自己和统治者的生活。大家都听说过皇帝用金斧头砍柴，顿顿吃烙饼的笑话吧。这样的认识虽然很傻，但也和原始人有本质区别。只要农民认识到世界上有人过的比自己强，认识到自己坐上统治者的位置也能过更好的生活，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变数的。和横向纵向都看不到变化的原始人不一样。

没有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非遇到什么自然灾害，否则原始人不知道有变化，也不期盼变化，更不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好。他们基于基因本能生活，也

基于自己部落的文化传统生活。他跟着自己的部落学习怎么生活，怎么长大，他的所有生活理想就是像祖辈那么生活，而且也基本都能得到满足。这算什么生活水平？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和谐。因为他们并不批判自己的生活，也不批判其他的人类。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和谐。你可以说他们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低，但不能否认他们的确生活在和谐社会。

说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原始人也有自己的巫师和巫术，他们也崇拜一些自然神灵。他们在日常生活之外，也有一个构想出来的精神世界。但是，这个精神世界和我们现代宗教的神有很大不同。他们崇拜的精神力量和现实物质世界是合一的。

咱们现在主流宗教觉得神制造了道德体系，我们人类去遵守，去崇拜，然后神会对我好。就算神对我不好，也是神的安排。原始人的巫师不这么看，他们企图直接去干预自然界的运转，用各种各样的巫术去影响神秘的自然。比如说天旱了，他们就搞个求雨仪式去求雨，野兽少了，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增加野兽的繁衍，中间丝毫没有道德体系什么事。他们不会说我行善，祈祷，遵从神的意志，神就会保佑我，给我赐福，就是认为仪式本身足以改变自然。从这个角度说，巫术不是宗教，而是原始人探索自然的一种方式。医学和化学的根源都在原始社会的巫术。直到汉朝，医和巫还几乎是同一个职业。

其实我们现代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巫术残留。比如说车牌号不喜欢带 4，比如说我们到庙里许愿烧香，就是认为自然规则会因为烧香而改变。如果愿望成真，我们还要去庙里还愿。这是认为自然规律可以和我们做交易。求财的时候我们去财神庙，求升学我们去孔庙，这就是巫术。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见过全村人包括小学教师都参加的求雨仪式，献祭一头猪，到泉眼去求雨。必须承认，这些巫术是包含一定唯物主义思维成分的，否则他们为啥要去泉眼求雨，不去山顶呢？显然是企图在地上的水源和天上的水源之间建立联系。

当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的宗教特色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宗教成分少，巫术成分多，这一点我们先不说。这里我说的是，原始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没有矛盾也没有批判，没有变化也没有对变化的期盼，是一种和谐生活。这种生活不能从内部被打破，只能被外部压力而强迫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文明社会的出现。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变化的过程：

大概 7-1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这一波人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晚期智人。

智人有抽象想象能力，他们制造了了许多不能靠纯粹试错法制造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不限于利用一个实心的简单物体。比如说石块和木矛。而是开始把许多简单工具组合到一起，制造一些有内部结构的工具，比如说弓箭、油灯（炉）和许多自动捕兽机，还在这些东西基础上发明了大规模围猎技能。——引自《事物的起源》

从发现的材料看来，他们的劳动已经有相当复杂的分工。他们不但捕捉野兽，而且也捕鱼。他们不但能够生火，而且有了石灯，利用野兽的脂肪来做燃料。他们不但有了绘画雕刻，而且有了原始的宗教。

所以，这一波走出非洲的人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哺乳动物。在他们捕猎的能力面前，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不是被吃光就是饿死。就连西伯利亚的冰原也被占领。他们吃猛犸象的肉，用猛犸的油点灯，照明兼取暖，用猛犸的骨头搭建卧铺，一直从热带走到最冷的北极圈，在极昼极夜的循环中生活附近。

哺乳动物的灭绝

大概 2 万年之前，智人遇到了一个危机，就是可用的土地已经被占满，可宰杀的动物已经不多了。其他人种都灭绝了，地盘都被智人占领了。当然当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地球被占满，不会说所有部落派代表开个会解决问题。每个部落只会感觉到猎物越来越少，地盘竞争越来越激烈。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整个部落迁徙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现在迁徙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紧张局面。他们只能往越来越远的地方迁徙。本来没人去的亚洲东北角，现在也可以冒险去试试，结果就是出现了危机的第一个后果——占领美洲。人类走过了冰封的白令海峡，穿越到美洲的温暖地带。美洲过去也有猴子，但是从来没有人科动物，现在智人成了第一波到达美洲的人。

当然了，去美洲的智人其实很少，只是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但并不能显著地缓解危机。欧亚非大陆的智人还是一天比一天饿，而且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邻居，他们逐渐开始从迁徙转入定居。

而且去美洲那部分人也没快活几天。那边和旧大陆分裂很久了，除了河狸这种靠本能制造工具的生物，大多数动物根本没见过会用工具的动物，不像旧大陆这边的动物和猿人共存了几百万年，已经懂得远离拿着石器的猴子——即便这些猴子很低矮。所以新大陆的智人有无穷无尽的肉吃，以指数增长方式繁衍，几千年就分布到整个大陆，吃光了大多数哺乳动物。最多比旧大陆晚几千年，他们也遇到了环境的压力，开始转入定居。

智人的扩张

按照一般的想法，人口压力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转向农业，毕竟种地能提供稳定的食物。但实际上，农民的工作很辛苦，营养很单一，生活很枯燥，需要为了保护固定的领地而战斗，而且因为定居，卫生状况很差，很容易生病。在没有发明现代灌溉技术之前，旱地农业的稳定程度也不比采集稳定太多。这样的陌生生活很难吸引原始人主动加入，他们宁死也要过传统的生活。原始农业技术的出现并不是原始社会转变为农业文明社会的终极理由。

社会更不平等，更何况还要接受诸多新制度的约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早期的农民都宁愿做一个旷野里打猎采果的自由人。这一点在圣经里也有反映：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圣经 创世纪》

古人的选择不难理解，收集自然的出产显然要比挥汗种植单一作物要轻松愉快。古代神话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子孙的惩罚是世代耕作谋生，几乎所有农业民族的贵族都以狩猎为娱乐，这正是几百万年的草原游猎生活塑造人类本性，淘汰不热爱游猎生活的基因的证据。直到 21 世纪的网络时代，“偷菜”还是中国人的乐趣。

然而，农业社会拥有人力优势。而且可以通过文明社会的强制手段，把这种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在最富庶的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难养活一个猎人，但至少能给几十个农业家庭提供足够的耕地。如果农业社会和采集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胜利的必然是农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强迫农民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拿出口粮供养士兵和官吏，再派遣这些专职人员去消灭竞争对手。游猎部落无法储备食品，即便没有打败仗，但只要被士兵们打断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迁徙和死亡两个选项。所以，农业文明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

进，最终占据了大多数适合耕作的地区。

简单地说，只要出现了第一批农业社区，农业生产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扩散。其他人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得选择农业生产，进入文明社会。

不过，农业文明能赢的前提是农业文明已经存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选择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并在糊口之余向统治集团交出剩余产品。所以，我们无法绕过最初的问题：怎样让人忍受文明社会的制度束缚？怎样让曾经自由的人类种地并缴纳余粮？

农业文明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弄一块地撒种子就行。还要有谷仓，有渠道，有围墙保护自己的产品，才能持续。必须很多人同时选择农业生活，并接受辛苦的劳动才行。否则你的种植就是别人的采集场。这种组织力量并不会凭空出现。

暴力当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组织有训练的暴力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人类只能用木材、石头和毛皮制造工具，最强的武器不过是镶嵌燧石的长矛，或是皮索制作的弓箭，和众多普通农民的武器甚至农具相比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只依靠暴力来迫使农民劳动、交出剩余产品，恐怕监工和税吏就会耗光所有收集的粮食。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精神力量。我们前面提到，走出非洲的智人是一种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生物。他们能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超越物质世界的神灵。那些想象力最强的巫师把巫术升级成宗教，把自己从普通部落成员升级成第一代统治阶级，利用虚拟的力量迫使人类转向农业，从而开创了农业时代和文明时代。

这就是第一代文明。中东文明和美洲的文明都是原创性的第一代文明，都是完完全全的神权文明。他们在没有金属的时候，靠宗教力量维持秩序，靠唯心主义的发明来保证统治。所以中东和美洲文明的神权统治都特别厉害。西班牙人入侵南北美洲，都利用了当地的神话，让当地人以为自己是神，所以打的特别轻松。

后来的一神教也出现在这个神权非常明显的中东。从埃及开始，最终发展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一神教相信有一个神灵超越所有的自然力量。和这些原创文明的传统是一致的。相对来说，东亚被帕米尔高原隔在东面，出现文明较晚。是在青铜器出现之后，才被输入文明的。这时候世俗力量已经很强了，我们输入的文明不是纯粹的神权式的，所以我们这边的巫术保留的比较多，宗教成分比较少。所以我才能看到居民抬着猪肉去到泉眼边上找神谈交易，而不是去佛教寺庙或者教堂。

总而言之，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和谐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缓慢扩张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外部资源压力，导致原始社会的结束。

但这个物质压力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农业文明，因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都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这个力量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发选择来形成。我们回顾前面关于人类抽象能力的结论，可以推论：文明的开始，关键原因在于宗教力量的出现。我们人类是一种有独特想象力的动物，是一种从骨子里喜欢胡思乱想的动物，是一种天生有催产素来产生宗教情感的动物。这种特性曾经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的哺乳动物，现在又在人口压力下，创造了农业文明。

本节要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讲历史，总是把文明的出现解释为纯粹的物质进程，低估了宗教等唯心主义力量在创造文明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在考虑未来创建共产主义文明的时候，往往也低估了感性力量与想象力的作用，单纯强调物质因素。

农业时代 光明与黑暗

唯心主义得势，唯物主义得分

在开始讲农业文明时代之前，我想先讲几个神话：

首先是中国的

南海之帝为倏 shū，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　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中国，提到混沌的另一个神话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开天地也是开这个混沌，清气上升成了天，浊气下降就是地。中国人的历史就从消灭混沌开始。

然后是北欧神话：

世界初开之际，没有天也没有地，在浓雾中，只有一道金伦加（Ginnungagap）鸿沟，鸿沟之北为“雾之国”尼福尔海姆（Niflheim），其中有泉名赫瓦格密尔（Hvergelmir），是所有河水的源头，据说其中一条河的水带有剧毒。鸿沟之南是“火之国”穆斯贝尔海姆（Muspelheim）。在热汽与寒冰的交错中，诞生了霜巨人之祖尤弥尔（Ymir）和一头名为欧德姆布拉（Audhumbla）的巨大母牛。

埃及神话：

最初世上只有 Nun（混沌之水），原始海洋中的躁动开启了一切创造。从这些水中，Ra 自己浮现出自己，然后生了 Shu 和 Tefnut。Shu 是空气之神，Tefnut 是水气之神生出了 Geb（大地男神）和 Nut（天空女神）。然后物质世界被创造了出来。人类被从 Ra 的眼泪中创造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后，人类被证实不感恩，于是众神决定消灭人类。Ra 创造了 Sekhmet 去执行这一决定。Sekhmet 用她高超的能力杀死了几乎所有的人类，在还剩很少的人类时，Ra 变得温和并让 Sekhmet 停止屠杀。这就是现在的世界被创造出来的经过。

圣经的 2 个故事。第一个是圣经创世纪：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然后是吃智慧果的故事。人类吃了智慧果，知道善恶，就不能再留在伊甸园里吃果子了，必须出去种地。然后上帝就告诉人类前面提到那句话：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印加神话可以看成把圣经的 2 个故事结合起来：

很久以前，在今天秘鲁的土地上，仍然棘荆丛生漆黑一片。既看不到光明，也没昼夜之分。正好有一天，创世主帕查卡马克（在印地安通用语中，“帕查卡马克”即“赋予世界生命的人”的意思）来到这里，心血来潮，便随手造就了第一批人类以及飞禽走兽。然后便来到后来的科利亚地区一个风景独秀的湖泊中隐居歇息，这湖就是今天的的的喀喀湖。

此后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帕查卡马克打算回到宇宙中遥远的居处去，便从湖中走了出来。此时的大地仍然一片漆黑，他所创造的那批人虽然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生活，但不仅不懂得向赋予他们生命和灵魂的创世主感恩戴德，而且连最起码的敬天畏神之心都没有，整天骂骂咧咧指天咒地，抱怨这抱怨那，甚至向走出湖面的帕查卡马克扔石块、吐口水。帕查卡马克一怒之下，把他们都变成了石雕像，有些正朝着湖的方向一边走，一边指指戳戳，有的正在涉水过河……

等心平气和之后，帕查卡马克仔细回味了那些野蛮人的抱怨，的确是自己的一时疏忽，不禁对自己的行为有些懊恼和后悔。于是便决定重新来过，只是这次有了比较周详的步骤和计划。

首先，他回到湖中小岛的小山洞里，召集众神商讨有关给黑暗中的世界带来光明的事宜。经过众神的推荐，帕查卡马克决定由孔蒂拉雅-维拉科查男神和基利亚女神兄妹俩担此重任并结成夫妻，由孔蒂拉雅太阳神司白昼，以金星为前驱后卫，风雨雷电为仆役；月亮女神基利亚司夜间照明，昴座七星为仆役追随左右，并准许基利亚从每月抽出三天主理太阳宫中事务以尽主妇之职。帕查卡马克分派完毕，嘱咐他们道："贤兄妹夫妻不辞辛劳，以自己的光和热哺育世间万物，堪称万物生灵之衣食父母。为酬谢二位的奉献精神，贤兄妹夫妻之长子女及其后代当为此一方土地之主人，以施教化之功，克尽教化之力，以历数十二为期，切记！切记！"

帕查卡马克指令太阳和月亮由东往西，交替运行，并约定当太阳升起的第一束光线照射进的的喀喀湖中岛上小山洞时，即为新人类生命的开始。

总之，这些神话都描述了一种没有善恶，没有光明黑暗时代的结束，一个有光明海岸，有正义邪恶时代的到来。只有混沌状态死了，新时代才能到来，人类才能开始种地。全世界的神话都具备这个消灭混沌的特征，就不是偶然了。

神话描述的是历史开端。但我们都知道，原始人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生活永远不变，也就没有记录历史的必要。所以历史开端实际上就是原始时代的结束。混沌就是原始时代，分出善恶，有光明黑暗时代就是文明时代。我们前面说宗教创造了文明，实际上就是宗教突破原始巫术，创造了道德和善恶概念，给人类带来了规范。进而创造了文明。不同文明的神话都达成了一致，说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化遵循相同的规律。

这个善恶标准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人随意编造出来的。但不是所有编造出来的宗教和道德标准都能流传下来，因为一旦文明时代开始，各种制度和文化就开始进入筛选。有的能够运营一个农业文明，有的不能。那些不能的显然就被筛掉了。然后各种上层建筑之间开始竞争，竞争的标准是看谁能促进生产，谁能从经济中榨取更高比例的资源投入竞争，谁能够发动更强的军事力量，然后用物质力量来赢得竞争。

在《天国王朝》里面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萨拉丁和他的手下谈论战争的胜负问题。

穆斯林："为什么要撤退，神没有眷顾他，唯有神决定战争的胜败。"

萨拉丁："胜败由神决定，但也取决于备战，兵力以及健康和储水。有后顾之忧不可以围城，在我之前，神为穆斯林赢过几次战争？"

穆斯林："为数甚少，那是因为那时我们罪孽缠身。"

萨拉丁："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备战。"

穆斯林："你若这么想，在位必不长久。"

萨拉丁："我若不在位，伊斯兰更加不堪设想。"

萨拉丁这句话翻译一下：虽然表面上看竞争的是各种上层建筑，但最终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对抗。能动员最多物质力量的一边制度才会赢。

当然，上层建筑的胜利不一定是扩张，也能通过迫使对手采取和你一样的上层建筑来实现。

比如说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就是因为马越来越强壮，能负担一个骑兵了，匈奴已经开始搞大队的骑射兵，中原王朝的军事贵族还是上一次蛮族入侵的结

果。比较适应几匹马拉车的战车时代。同时在平坦的中原过安逸日子，不愿意在复杂地形作战了，所以匈奴骑兵开始压制中原。赵国贵族不管衣服有多么代表文明，主动放弃长袍，穿紧身衣和裤子，组织骑兵在更广阔的空间机动作战，对抗了匈奴。就是主动采取对方上层建筑的例子。

恩格斯也论证过这样的上层建筑扩张过程。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注意恩格斯说的这两种可能性。要么我灭了你，要么你学习我。总之要形成一个主流的制度。制度的扩张可以相对独立于人类社区的扩张。

那么，最后主流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是非常低下的。虽然已经有了剩余产品，虽然农民家庭除了养活自己，还能交税养活别人，但必须很多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不直接参与劳动的家庭。

其次，农业社会出现了分工。而分工意味着人做不同事情的效率不同。注意这个分工不仅仅包括日常劳动，还包括打仗、传教和管理。就是说少数专业人员做的比多数兼职人员要好。比如说打仗，几千个专职的军事贵族，往往能打败十万个临时动员的民兵，几十个受教育的传教士，胜过几百万农民磕头念经。所以，一个成功的文明，一个能扩张和传播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多数农民加少数专业人员的制度，否则就会被别人用战争或者传教的方式消灭。这就是剥削的必然性——如果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留在无数个农民手里，让他们农闲的时候练兵，有空的时候传教，固然是很美好的制度。但实际上完全没有竞争力。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这样温馨的农村公社，但只要附近还有其他密集的人类社区存在，类似的农业乌托邦就会被瞬间消灭。

所以，所谓农业文明，首先意味着少数专业人员要从多数农民那里收集剩余产品。怎么收集呢？首先肯定离不开镇压。毕竟少数军队能打赢外敌，也能对内镇压。从这个角度说，土匪和贵族是一回事。都是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体制。也会对抗其他土匪和贵族，不许他们到自己的地盘上抢劫。

但总是镇压和抢劫，收集效率太低了，于是就要有常设的文职机构来收税，让农民承认这个日常秩序存在。但农民为什么要承认文官的权威呢？这就需要宗教和其他准宗教来说服他们，让农民相信这个制度是天经地义的，相信自己天生就该交税服兵役，贵族和僧侣天生就该统治。这个军事力量加文官再加僧侣知识分子的综合体，就是国家。

国家名义上是所有人的国家。但是，既然出去竞争的是少数专业人员，意识形态最终也会论证少数人的统治合法性，把少数人的利益说成所有人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利益在文明内部可能是对立的，但意识形态必须论证他们是统一的。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所以，不论宗教或者其他思想最初是不是宣扬人人平等，宣扬神爱所有人。它要在农业时代混下去，就必须适应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少数人要统治多数人，要统治的稳固，也必须利用宗教、国家、教育来解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农业社会阶级结构的解释。是基于私有制的“善恶”来源。

从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的结构，所以在这一场竞争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得势，容易被人相信——如果人类不信虚幻的宗教，根本就不会有文明的出现、但是根源上上，是国家的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所以本质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分。

我们前面说了，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变数。

首先人和人之间出现了差异，所以有了阶级矛盾。原始社会自身是稳固的，如果不是地球太小，猎物太少，原始社会可以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出问题。但是到了农业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文明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在内部受到文明居民自身的批判。任何一个阶级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这个不稳定结构崩塌。

其次，文明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及宗教。我们上面分析了，只有那些配合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才能最终存活，所以一个稳定的宗教或者农业社会思想必定会劝说贵族不要骄奢淫逸，劝说农民乖乖服从统治。造反的行动会被定义为坏，逆来顺受会被定义为好。许多农民也真的会相信这一套东西。

但是，意识形态也有独立性。比如说宗教创造了文明，这本身就是宗教意识形态脱离原始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表现。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会经常脱离主流，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说某些意识形态会发现，实际上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宗教会用两套道德标准，但为了自圆其说又努力把这两套标准说成一套。每个时代都有人发现这其中的矛盾，改编一套倾向于平等的教义来造反，或者企图和平改造剥削制度。比如说伊斯兰教的马赫迪 ，比如说中国的白莲教，汉朝的黄巾贼，比如说原教旨主义基督教者。而且他们也总能在底层找到信徒。

为什么这些“非主流”的信仰有那么多人信呢？因为人的基因是在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上形成的，按照生物学本性，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平等的世界上。而且意识形态这东西天生就有自由度，不会别人灌输什么就信什么。现在大多数人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知道有人比他们生活的好，还统治他们。所以，他们更容易相信一个倾向于平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信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但是，相信了又怎么样呢？相信了平等的思想，起来造反。如果有幸打赢了，又要建立什么制度呢？前面的两个条件在农业社会是一直存在的，一个是农业生产率低，一个是分工搞军事搞行政的效率都高。只要这两个条件存在，农业社会的物质稳定结构就一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任何一次成功的造反，最终都会学习此前的旧制度。不管你的名字叫李自成还是宋江，或是朱元璋。只要农

业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不变，任何平等的教义，最终都会滑向自己的反面，说服多数人服从于少数人。这就是农业社会一次次造反和剥削的循环。可以说，农业文明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就要毁灭原始社会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文明是有原罪的。

但是，我们能说这种循环没意义吗？无论如何，多数人基于阶级立场，基于自己原始社会留下来的平等生物性，愿意接受一个平等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这本身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把这些造反叫做起义，说农民起义推动历史，有积极意义，不是随便说的。这些起义反应了农业社会内部的矛盾，说明农业文明内部有批判自己的物质力量（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精神力量（意识形态的自由度，由于人的动物性，倾向于平等）。

过去原始社会不分善恶，没有绝望和抱怨，也就没有进步。现在分了善恶，有了道德，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剥削和不平等，带来了不满，但也提供了希望。现代社会的进步，很多就来自农业社会带来的这些希望。可以说，文明的原罪本身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从起义到超级起义

前面的分析表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多数人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主流制度。但这个剥削制度，在一定程度下也会出现松动或者解体。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统治阶级发善心，也不是被统治阶级祈祷被神听到。马克思说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个剥削制度的松动，我们也必须去找物质原因。

首先，最典型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统治者要的是剩余产品，不是被统治者的命。有了剩余产品，他们就能养活自己，养活军队官僚和知识分子，去和别的统治集团对抗。所以，如果放松一点剥削和统治有利于稳固统治，他们就会放松统治。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变化呢，一般来说是生产环境的变化，而最典型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比如说，我们常说古代有一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化。真有这么一个变化吗？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准确的。但从世界历史看，的确有一个大范围的放松人身控制的趋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性不断减弱，工作自由逐渐增加。为什么呢？我个人理解为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区别。

青铜器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金属。是合金，需要多种元素铸造到一起。产量低成本高。产量低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只能是贵族用，很少给农民用；其次大多数用来做武器搞镇压，少数用来搞生产。所以，贵族的镇压能力相对很强，农民主要用木器石器工作。要修理自己的工具，要使用青铜工具，都得到贵族的作坊里才能用上。

所以，青铜-文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王权压倒了前面说的神权，军事集团依靠暴力专政。由于青铜的稀缺和制造不易（需要多种金属融合），贵族军官很容易垄断金属的供应，进而垄断了从政（管理经济）和从军（掌握暴力）的资格。普通农民如果想在青铜时代糊口，就必须紧密依附于军事贵族，甚至充当奴隶，才可能获得军事保护和有限的金属工具。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奴隶制时代，但似乎用“属民制时代”描述更合适一些。

所以这个年代，农民离开贵族控制的城市太远，就得不到青铜武器的保护，也得不到青铜工具的技术支持。农奴在空间上，在身份上都得依附于贵族，才能

生产和生存。农民因为没有金属工具，劳动的方式比较简单，贵族监督劳动的成本也比较低，所以愿意把他们放在城市周围监督着干活。这就是常说的奴隶时代。

铁作为金属，质量其实比青铜要差一些。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便宜，而且和适当的碳混合起来就能变成钢。铁器时代一到，每个村都可以有铁匠炉，每户农民都有铁制的农具。统治者也可以用铁制兵器把农民武装起来打仗。有了金属工具，人就能从事复杂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很难直接监督的。与其把人控制在城市周围按照安排劳动，不如直接让他们自己干活，向他们分成或者收税。所以，到了铁器时代，让农民进行比较自由的劳动，虽然让农民的日子比农奴好过一些，但统治者可以用收地租、收税、服兵役的方式拿到更多的剩余产品，所以愿意放松一些剥削和统治。

具体分析一下，铁器时代，农民地位相对上升，无非就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生产率提高了，一家一户的小农场也能生产很多产品；其次是你也有铁器了，镇压成本提高了，不能把人逼的太惨；第三是农业地区比之前分散，从城市出发不能随时镇压到每一个地方。所以青铜时代那种严酷的等级制消失了。这就是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变化。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可以带来类似的效果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获得一大块农业地区，形成边区。边区人均土地多，小农户也能生产很多产品；边区人口分散，强行收集剩余产品不容易；边区的农民比较富裕，武器比较好，还有充足的农闲时间用来相互组织，镇压比较麻烦。所以，在有边区的地方，社会等级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格，农民生活相对自由一些，不直接受贵族和官僚控制。典型案例就是东欧俄国农民的公社和发现美洲之后的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晚年的马克思还专门研究过俄国农民公社的公有制萌芽，把他的想法写进了共产党宣言序言。

其他一些对剥削制度的冲击就比较典型了。比如说统治阶级自己腐化，什么叫腐化呢？本来统治集团把资源集中起来，应该是大多数用于镇压和对付其他的统治集团，小部分用于奢侈消费。现在你大多数用来奢侈消费，小部分用来镇压，剥削肯定就难以持续了。尤其是那些普通人看得到的奢侈，不仅浪费了用来镇压的资源，还严重的挑动底层不满。非常容易引发起义，这就是腐化。

有的时候，统治者可能还不算腐化。但古代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低，统治者能吃饱穿暖，生孩子比平民快得多。结果就是统治集团繁衍太快，比如说宋朝的冗官，比如说中世纪西欧贵族太多，结果就是一部分受了上层教育的统治阶层被推到下层。一方面带来了统治经验，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上层和下层之间两种道德体系的冲突，往往会给底层带来造反的动力，去破坏旧秩序。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只要有读书人加入，就容易成功。欧洲则是升不上去的基层教士僧侣往往加入造反的行列当骨干，效果明显。

关于这个统治集团繁衍问题，我举个例子：两班（朝鲜语：양반。英文音译：Yangban）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两班”一词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文武两班”，之后，两班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古代朝鲜对贵族或官员的尊称也是“两班尼”（양반님，相当于汉语的“大人”）。在这个基础上，朝鲜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

* 1 两班贵族(亦称士大夫)。
* 2 中人(官员的良妾所生的儿子，良妾是平民百姓嫁给官员作为妾侍的称呼)。
* 3 平民

*4 贱民

朝鲜社会是采“从母法”跟“一贱即贱”，目的就是避免贵族数量快速扩张。但是，从 15 世纪确立两班制度开始，到了 19 世纪，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多数，占了六至七成左右。这种扩张速度势必带来旧制度的崩溃。

还有社会动荡，对外战争，也会影响统治集团的稳定性。这一方面会把人口从稳定的农业社区里面抽出去打仗，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旦日常的统治秩序被破坏，群众自发选择的秩序天然地会倾向于平等制度。所以统治者太频繁的打仗，往往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饥荒和水旱灾害也有类似的效果。

咱们总结一下前面的几个条件：有边区，有生产效率进步的时候，统治秩序会逐渐放松；社会动荡，对外战争的时候，统治秩序会被迫松动；统治阶级繁衍的太快，底层负担重，多余的统治阶级会加入底层造反；对外战争失败，势力范围收缩的时候，统治秩序就危险。要是再加上统治者骄奢淫逸，那农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肯定撑不住了，一定会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秩序一起崩溃。

一般来说，这几项条件一般有一两项碰到一起就能带来改朝换代。近代的西欧就符合其中的好几个条件。

比如说生产力进步，13 世纪，欧洲终于发明了中国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风机和高炉，开始批量生产铸铁，中世纪也因此接近了尾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各国吸收阿拉伯航海技术，利用内海优势发展经济，商业越来越发达，最终激发了大航海时代，也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

其次大航海时代也有一个独立于生产力的影响，欧洲各国大多是殖民狂人，在全世界抢了很多殖民地，很多边区和宗主国关系密切，很多欧洲人迁移到这些边区生活。边区的平等思想传回欧洲，也带来了思想变革。

第三，近代欧洲当时始终是频繁的战乱状态，几乎没有一年不打仗。战争对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不得不放松对底层的一些限制，换取底层服兵役，避免底层造反。

第四，在这些条件促进下，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旧制度的平民和知识分子基于本能和阶级地位，开始尝试各种更平等的制度。但也包含了社会改革的意思。空想社会主义逐渐在近代的欧洲出现。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

我读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提到空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欧洲主要的例子出在英国。比如写《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是英国人，17 世纪英国的平等派军队就是克伦威尔消灭王权的重要力量。虽然平等派被克伦威尔镇压了，但是英国底层一直要求平等和消灭封建特权。近代史课本上还必然会提到法国出现的卢梭 伏尔泰等知识分子，明显提出了和之前的农业社会不同的一些意识形态。

英法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变革，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欧洲列强争霸，到了 18 世纪，进入决赛的就是英法两国。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意大利城邦都衰落了。英法在殖民战争中成为了胜利者，生产力进步最快，打仗也最多，殖民地最大。所以这两个国家进步迅速。但是，进步这东西对于统治集团自身来说未必是好事。农业文明的统治集团喜欢稳定而不是变化，英法在近代越是成功，潜在的阶级矛盾就越大，旧秩序的危机就越强。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把矛盾转移给对方。

到了 1754 年至 1763，英法打了一场叫七年战争的殖民战争决赛。结果是英

国取得全球海军优势。从此以后，英国控制了全球殖民地和市场，能继续用经济发展转嫁矛盾。法国开始相对的战略收缩，之前所有潜在的阶级矛盾，现在都得退回来总清算。眼看这大法兰西就药丸。

法国在这之后还挣扎了一下，借了一批国债，到美洲去发动英国殖民地独立。那时候英国海军虽然相对强，但没有无线电，不能绝对封锁欧洲海岸，不能完全阻止法国资金和援军去美洲。这事儿还真被法国办成了。就是我们知道的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就是在法国援助下上台的。

但独立战争之后，海权还是在英国人手里。日常的贸易还得经过英国人的同意。所以，实际上英国人损失不大，法国人却因此欠了很多债。欠债的结果就是出售贵族身份。1700 年至 1789 年间，法国增加了 5 万个新贵族。上面提供的社会变革的条件又满足了一个，就是统治集团盲目扩大。

而且，在文化上，法国在北美的成功实际上是自杀，是自己的催命符。独立的美国属于我们说的边区，平等和民主思想非常强势。法国没获得殖民地的贸易利益，倒是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我们中学课本上提到的那个放风筝去做闪电实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常驻巴黎，宣扬美国人的独立诉求多么正义，欢迎你们掏钱支持我们建设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所以美国独立宣言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传遍巴黎。，法国国王消耗在美国的所有资源都是在文化上给自己催命。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姊妹革命》，就在讲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是互相影响的这个事实。

最后，大家都知道法国贵族集团腐化是很快的。我们现代人使用的大多数奢侈品都源于近代后期的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国王就迫使贵族到巴黎生活，或是至少被巴黎的奢侈文化同化。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的问题了。国王希望贵族在宫廷中为帮助国王更衣之类的琐事而争风吃醋。这样路易就可以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到自己手中了。慢慢地贵族失去了地方的掌控力，但还是要从领地获得收入，拿到巴黎宫廷去奢侈消费，让法国尤其是巴黎人看到了他们的奢侈消费。

到此我们可以发现，上面列举的所有的社会革命条件在法国都齐全了。

生产力总体上进步

和边区这个民主思想的策源地联系

打仗失败

统治集团扩张太快

统治集团腐化 而且越来越无能，控制不了地方

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法国就会出现一场超级大起义，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1788 年法国旱灾，法国从上到下都不好过，第二年国家财政濒临破产，国王还不起旧债，借不到新债，决定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问题。1788+1，就是我们熟悉的年份，1789 年法国大革命。其实就算没有这场旱灾，法国旧制度也拖不了几年了。

把所有造反条件都集合齐了，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所以 1789 年这一次造反的规模空前，力度也空前。空间上冲出法国，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在时间上成了以后 200 多年所有造反的模板。在力度上，他们否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必要性，否认固定的社会等级，甚至否认宗教的必要性，把教会都解散了。可以说，农业社会因为阶级而出现的道德、上层建筑都被法国的造反者否认了。一切都否认之后，他们会怎么办呢？

咱们说过，道德这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些造反者还谈

不上什么经济基础，只有小生产者的直觉，还有就是生物学本能。所以他们像历代的造反者一样，政治上企图建立一个平等、民主的制度；经济上试图建立一个个体生产者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结果呢？

从法国自身来说，结果毫无意外。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它也像历次起义一样失败了，乌托邦梦想持续不了几年就要失败。巴黎带领整个欧洲，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尝试了各种平等主义的革命，在法国搞了 5 个共和国，2 个帝国，2 次王国，一次共产主义政权。但最终底层和平等主义失败了，资本家控制了国家，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依然符合我们前面说的主流规律。一次超级造反还是造反。

不过，这个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独特又不独特。说不独特，因为它无非是规模特别大的一次造反而已。几千年来类似的造反不少了。但我们说到现代社会又必须把这次规模特别大的造反拿出来说。说法国大革命是现代社会的开端——注意这里的措辞是法国大革命不是造反。而且之后我们再遇到穷人造反，也开始说革命，不是说造反或者起义。

历史上那么多次造反，为什么这次就开创了现代社会呢？为什么从此名字就变了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概念，双元革命。

工业革命 机遇和挑战

双元革命

双元革命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来的。他在写《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 1789—1848》《资本的年代 1848—1875》《帝国的年代 1875—1914》）的时候，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政治理想大多来自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但是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大多来自同期英国工业革命。两个革命在时间上重叠，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所以被称为双元革命。

但是，我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个革命。而是说模糊的说生产力进步创造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恰当的时刻促进了产业革命。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给工业革命一个独立的定义。

我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察。他们实际上没有见到完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字是什么。在英文里，就是 The Gread war，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不是一次可以做对比的普通事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而且时间上那么近，必须归并到一起。我们不比他们聪明，但是看过了更多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所以能比他们更客观的评价这个双元革命。

当然，既然两个革命被分开了，我们还得解释为什么两个革命离的这么近。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大航海时代的作用，的确在 18 世纪之前，欧洲有一个社会和技术共同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到这个阶段，工业革命必然爆发在欧洲。决赛的胜者技术继续进步，有资源去搞产业升级，结果能出现工业革命，失败的一方要爆发政治革命。所以两场革命离的非常近。咱们可以这样总结，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下来，最后在英国爆发，成了工业革命；农业社会的社会矛盾和理想主义积累下来，最后在法国爆发，是政治革命。

要问哪边的革命更重要一些？我认为是工业革命，因为就算不爆发法国大革命。只要工业革命在当时的欧洲某一个国家爆发，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战略收缩，爆发类似的政治革命。但反过来说，类似的政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工业革命的爆发。但是呢，既然工业革命必然会造成政治革命，可以说政治革命在生产力上也

是有必然性的，分享了工业革命这个必然性，和工业革命是伴生的。

这个问题再说细一点，我们还可以回顾工业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在欧洲。这个问题我之前写过，不是今天的主线，我们先放下。现在我们继续说工业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说说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的开创者。

动荡的世界

我们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原因。这场革命出现在法国，是因为英法争霸世界失败，法国成为一个半边缘国家。如果法国胜利，这个政治革命就要出现在英国了。

半边缘国家有两个特征，从统治集团的角度说，要被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压制、剥削，所以镇压国内力量不足。

从被统治阶层的角度说，在发展中，普通人在旧秩序中的位置已经开始被破坏了，但是由于统治集团是半边缘国家，所以新秩序建立的还不够快。等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来控制新型的底层，这样的国家是最容易出乱子的。

所以大的起义不会爆发在获得霸权的国家，比如说取得霸权的英美，在欧洲一度取得霸权的德国都不没有成型的起义。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没有。也不会爆发在没有被霸权国家波及的边缘地区。比如说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没有足以挑战清政府的力量。

只有那些被打出中心地带的原中心国家国家会有超级动荡。比如说普法战争之前，法国刚回到世界头等的霸权地位，国内就还算稳定。等到普法战争战败，国内立刻就出现了巴黎公社。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拥有欧洲霸权的时候没事儿，一旦美国加入战场，把德国变成了实际上的边缘国家，德国水兵就起义，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实最好的例子是俄国，这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被认为是必定要革命的国家。实际上原因就在于他在帝国主义秩序中是半边缘地位。相对中国是霸权，相对英法是非边缘。

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一直盼着法国带动德国革命，主要原因除了德国是祖国是欧洲的核心，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是半边缘地带。1870 年之后，德国压倒法国成了核心，俄国成了半核心，革命趋势就转向俄国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努力研究俄国。

总而言之，工业革命确立了一个新局势，在接下来的 200 年里，世界一直存在中心——外围结构。这个中心不是因为武力而形成的蒙古帝国那种中心。而是从经济到军事到文化全方位的碾压。给边缘国家的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在中心国家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半边缘国家出现了连续的起义。这些起义都和法国大革命有渊源，所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传统。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一个造反成为常态的世界。所以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次非同一般的造反，还是一个超级造反年代的开端。

所以说，没有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次超级造反而已。有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 2 个世纪造反年代的祖宗。工业革命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的江湖地位。

科学共产主义来了

法国大革命非同寻常的第二个原因非常关键，也是我们今天讲课的主题之一。大家前面如果打瞌睡了，现在要打起精神来听：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是工业革命造就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政治思想

的出现。换句话说，科学社会（共产）主义出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造反因此一次比一次水平高，从单纯的推翻旧社会进步到建设新社会。换句话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造反那是真造反，只破不立。法国大革命之后，或者说同期的工业革命之后，大多数造反开始认真地考虑先破后立的问题，要设计一个新制度了。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个分界点。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民众造反，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底层革命。

那么，科学共产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咱们首先要谈谈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

空想共产主义，就像前面说的，既是底层对于剥削制度的一种反抗，也可以说是基于人类平等本能的一个选择。大家都基于本能和日常经验做事，觉得造反是为了反对坏人，反对坏统治者。所以一旦造反成功，大家无非是两个想法，第一是要让好人当统治者，第二干脆不要统治者，大家各自过自己的小日子。最激进的想法也无非是法国大革命那样，搞一个有底层色彩的议会。

这几种想法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实际上都是同一个选项，就是旧制度一定会回来。因为你造反成功后建立的社会，必须和世界上其他统治集团去竞争。他们能剥削，能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来发动战争，发动文化侵略，你不剥削，就一定会被他们干掉。所以，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或者说议员上台的时候怎么说，最终他们得变成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坏。写《悲惨世界》那个维克多雨果算是同情革命了吧，可他同时也是 1848 年支持拿破仑三世称帝的重要政治人物。

那么怎么才能让好人不变成坏的统治者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个不会变坏的新制度呢？

我们是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过 20 世纪革命的案例，读过马克思和毛主席的书，最起码也读过政治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起码知道革命成功之前怎么办。我们知道，在制度问题上，指望道德，指望个人品质，甚至指望制度本身都没有用。因为制度也要受到这个竞争规律的约束，也要受到经济基础的改造，最终变成旧制度。

所以，如果让现代中国青年回到 19 世纪操盘，多半不会直接去找什么好人，也不会搞太多的道德说教，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建设政治和文化。在全世界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让经济发展的又公平又快速，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最终消灭全世界的剥削制度。这就是政治课本和迄今为止大多数革命理论教给我们的事实。

然而，这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在 19 世纪之前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显而易见。因为历史视角完全不同。

比如说，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变化，生产关系等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化，可是自古以来，有谁直观地观测过类似的现象？说历史没用，大家要看身边的例子。你说农业文明取代原始社会，铁器时代的国家取代青铜时代的国家，那历史久远不说，而且必须要许多代人的数据累积起来才能体现这种转变。根本不足以证实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存在。真正可靠的证据，能启发人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证据，必须是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明显改造，才能信服地让人类接受唯物主义历史观。

这样的事情，在 19 世纪之前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因为农业社会的经济节奏非常缓慢，哪怕是青铜器、铁器、指南针这种超级发明，扩散到整个国家也需要上百年，扩散到整个世界需要上千年。所以，一般来说，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变

化，起码也得几百年完成。你说好的制度能改变经济，还有人信，说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谁信啊？

工业革命给整个世界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在几十年之内发生了巨变。马克思前后的几代欧洲人，只要不是太闭塞，都能在一生中目睹工业经济的扩展，看到经济基础从人的肌肉变成蒸汽机，看到西欧的工业经济如何摧毁旧的统治集团，到处引发战争和动荡。看到最神圣的国王和教会被新时代的革命打垮，天也没塌下来。

很多国家革命后，执政的不再是旧的贵族和国王，也不是新的贵族和国王，而是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由得你不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加上欧洲人在全世界殖民，把各个国家的历史书和现实都展示给欧洲人看，历史学家第一次拥有最鲜活的一手资料，证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基础可以改变上层建筑。原本只有少数人接受的唯物主义思想终于上升为主流思想之一。

普通欧洲人逐渐开始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社会制度和人都是可以被经济塑造的。他们就在局部开始落实唯物主义思想。比如说我们历史书上经常提到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是 1771 年生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早半个世纪。欧文是个有空想共产主义倾向的大资本家，但他既不是把家产都拿出来搞慈善，也不是雇一群刺客去刺杀其他资本家和贵族，甚至也不是简单地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福利。他改造社会的方式是建立新的模范工厂，到美洲去买下大片的土地，搞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提供经济基础。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欧文的举动很可笑，也几乎可以断定他会失败。但是从 18 乃至 19 世纪初期的视角来看，他的举动非常牛了。因为他懂得用经济基础来决定上层建筑，哪怕只在局部改造，这也是飞跃式的进步。你可以把欧文这个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人看做一个过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过渡。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都是真正的空想共产主义，到他已经懂得在局部改造经济基础了。1817 年，欧文 46 岁，正式提出合作社制度。那一年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第一艘蒸汽军舰刚刚下水，史蒂芬孙已经在试验第一台蒸汽机车，工业力量马上就要出去摧毁整个旧世界。紧接着第二年就是 1818 年，马克思出生。

1818 年是个什么年头呢？马克思正好出生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结束的时间，他可以从父辈那里听到两个革命的过程，在青年时代正好看到工业经济怎么摧毁旧的生产关系。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历史试验场。马克思拥有此前所有人都不具备的历史视角。

如果用物理学比喻，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第一代拥有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必然会命名最基本的物理定律。我们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可以发现，他们的出现是有必然性的。就像华莱士和达尔文几乎同时发现进化论一样，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不在马克思手里得到总结，也会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配套的革命思想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历史的成果。

那么，差了一代人，马克思的思想比欧文进步到哪里呢？

首先马克思定义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彻底抛弃了此前用传统道德做的定义。新社会会有自己的道德，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不是用来剥削人，约束人的，是用来提供人的自由度的。每个人的幸福，只有自己有权定义，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让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这就是最理想的社会。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其次马克思是全局视野。马克思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上层建筑，全世界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制造的，都相互影响。在工业时代，社会大生产的时代尤其如此。指望靠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搞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设计的是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未来。

第三，马克思正确的理解了从农业社会继承的起义传统，认为被统治阶级最有动力去破坏旧制度，统治阶级整体上则必然捍卫阶级利益。所以，不能指望很多欧文这样的资本家发善心，而是要指望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打破旧制度。

第四，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打破旧制度之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兼顾自由和强大的制度。自由主要靠公有制来保障。但如果公有制不能同时促进生产力，让共产主义越来越强大，那也会变成历史上的乌托邦。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公有制的优势所在。发现了公有制压倒资本主义的可行性。

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取代其他制度，成为最新，最主流的剥削制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这东西是先进的，也观察到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要么用奢侈消费来稳定经济，同时降低发展速度；要么搞清教资本主义提高速度，但增加不稳定性。总之稳定和发展不可兼顾。

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共产党宣言》

当然，最关键的点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经济危机既然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经济减速。减速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被浪费。

马克思准确的给这个现象下了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容纳自己创造的工业经济了。谁能容纳，谁就有未来。然后马克思论证，公有制经济能避免经济危机，所以公有制更能容纳这个工业经济。无论是和平竞争还是比武力，都有这个重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可能建立这个新制度。

前面说了，其实马克思提出这套理论并不是偶然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了这么久，碰到工业革命这种大事儿，必然会有人提出系统化的理论。马克思这辈子到处和人论战，其实和他论战的很多人，是赞同马克思大多数观点的。马克思只是为了剩下那点不一致才去抓住别人论战。就算马克思在论战中被气死，我们今天也会拥有一套差不太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总之，重要的不是马克思这个人，而是工业革命后必然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潮。有了唯物主义这个武器，造反者就能知道不能一味的破坏，要建设，就能模模糊糊知道怎么建设一个新体制。造反就这样一下子升级为革命了。而且每次造反都比前一次多掌握一点唯物主义知识，在创建新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力度画一个坐标轴。那么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是 0-0-0-0-0-0……每个 0 代表依次造反，到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大写的 0。但法国大革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唯物主义一起来的，之后的造反一方面连绵不断（上一个结论），一方面不断升级，懂得建设，不会轻易地被旧制度反扑，0-0-0-0-0-0 1 2 3 4。有了这个进步，法国大革命这个 0 就和之前的 0 不一样了，是现代社会的开创者。

本节要点：解释了双元革命开创现代社会的原因。在历史中找到了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的位置。归根结底，根子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只是附属品。

审视马克思

当然，尽管我们说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由马克思来整理这个体系则是历史的偶然。但客观事实就是马克思在同时代的所有学者中，在唯物主义这条路上走的最远，最愿意把唯物主义成果用于支持同时代的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了 19 世纪唯物主义工具的代名词，乃至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代名词。对这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唯物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的专利。作为一个 19 世纪的学者，马克思观察到的事实，马克思的具体观点，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具体解释都只属于他自己，必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这些带着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观点当成绝对真理，不许讨论，那必然会导致严重后果。

好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不怕历史局限性的，因为我们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强大的工具。这个工具一旦出现，就不能只批判别人，不批判我们共产主义者自己。马克思自己也肯定知道这个规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级运动都失败了，我们尤其有必要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看马克思，看看马克思代表的共运历史。

大家都读过共产党宣言吧，我从里面摘出两段话给大家读一下。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这是 1848 年，30 岁的马克思观察到的社会发展趋势。恩格斯在 1844 年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方面社会结构日趋简化，另一方面中间等级想对抗这个过程。马克思认为这个发展趋势就是社会进步，进步的源头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等到无产阶级起来接管这个世界，革命就胜利了。

事实如何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真正见过的革命就一次，1870 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亲手组织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就一个， 1864 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这两个政治组织都在 1848 年之后很久出现。我们可以看看它们的成员结构，先看第一国际的：

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领导了巴黎公社起义，所以巴黎公社骨干的构成和第一国际很像：

委员的组成成分：选进公社委员会的一共 86 人，其中有 35 名知识分子、25 名工人、8 名职员、1 名手工业者、17 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久，这些资产阶级代表自动退出了公社，工人或者公社的工人阶级的代表领导着公社，因此

公社委员会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府。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中间阶层和技术阶层也反抗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怎么看这个中间阶层也不像越来越消亡的样子。反而在革命组织中充当骨干力量。而且就算是纯粹的工人，新时代的工人，不同工种的革命性也不一样。最骨干的工种一般是那些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比如说印刷工人历来是法国革命的骨干，因为他们干印刷，必须识字，必须能读报纸。

我又仔细读过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里面发现了两种工人：

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

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

很显然，前一种工人正是这一批中间阶层工人：寄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设新社会的希望，后一种工人是工人的主体寄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反抗旧社会的希望。但两者都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期盼中的工人，只有他们在身份上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一方面能建设新社会，一方面有打破旧社会的意愿，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说阶级格局越来越简单，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阶级。这批优秀的工人没法上去当资产阶级，自然只能留在工人阶级里，带领同志们搞革命。可以说，社会结构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看到的现实，也是他们希望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

但是呢，我们看上面的资料。这个趋势很快就中止了。实际上直到第一国际成立，骨干还是马克思预言要消亡的那个中间阶层，那些从农业文明时代就出现的工匠。马克思因此修改自己的观点和预言了吗？

没有。

我们知道，到了 20 世纪，随着工业进一步发展，这个中间阶层已经相当显著了，上层会被接纳到统治集团，下层至少也可以稳定的当中产阶级。一旦他们不再有被工业消灭的危险，他们就不愿意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当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本来也不是同志。

就算再遇到社会危机，他们也愿意团结到大资本身边当法西斯的基层干部，来镇压剩下的工人革命。苏联中国成立之后，又是技术官僚和干部集团最终葬送了革命（？）。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逻辑，这些人本来都应该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可见他们的这个具体预测其实是有问题的。尤其低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阶级分化。德国革命最终没有成功，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因此垮掉。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胜利的唯一要素。只要斗到底，其

他的问题都是小事儿。——《共产党宣言》

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

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里能找到的建设经验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十条：

说了这十条，马克思就说了下面的结果：

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规划过新社会怎么建设。就认为大家阶级斗争到底，忽然到一个阶段。阶级消灭了，一切都解决了。这就是胜利的必然性。

实际上呢？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工人绝不会从阶级斗争的惯性上停下来。之前是破坏一切，只要工人的利益。现在革命胜利了，难道你要削减利益吗？显然不可能。马克思这个概念，实际上把批判体制变成了批判统治阶级这个群体，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下的体制更替简化为消灭旧的统治阶级。给现有的社会集团带来好处——而不是在一个新体制下带来好处。结果就是，就算一个革命集团偶然上台，也只能不断地提高工人福利，直至把再投资所需的财富也分掉，否则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执政。委内瑞拉和现在欧洲大多数左翼政府正是这样送掉了社会主义的未来。

但实际上，无产阶级政权绝不是不要资本，不投资。我们只是投资不受经济危机阻碍罢了。如果只强调工人们分利益，反而可能会让工人丧失制度变革的热情，反过来反对革命，80 年代的国企工人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事实证明，就算有马克思论证的必然性担保，革命还是会屡屡因为短期利益而碰壁。

靠必然性还有一个问题——效率高就是最好吗？马克思论证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时候，在哲学上论证，既然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道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那么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经济基础一定能带来先进的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发达的一定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进步快，在竞争中能胜利，就是最好的人类制度。

这个论断隐含了一句潜台词——不择手段。即没有什么比竞争胜利更重要的。这个思路被绝对落实后，实际上否认了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价值。在这个价值观下，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为了发展，没有经济之外的绝对目标。为此可以牺牲很多价值观，牺牲许多社会需求。实际上，正如我们最初的论证。人本身在基因里

是有隐含的社会要求的，比如平等。如果效率要求我们牺牲平等呢？如果要求我们牺牲无产阶级呢？共产主义者也一味照办吗？

分掉未来的投资、生产力决定论，这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革命非常容易出现的两个趋势，是两个非常容易吞噬革命的惯性。所以列宁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果断改造了马克思理论，建议用一部分革命者的觉悟来刹住这些惯性，保证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左右逢源，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好（符合普世价值）。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

当然，我们知道，先锋队制度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说先锋队不固化，很难取代旧的官僚体系，固化后就容易产生自身利益，产生无法控制的腐败。比如说先锋队官僚化之后，各个产业部门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生产指标，不愿推动全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之相比，发展到金融资本时代的资本主义倒是能借助资本这个工具，不断地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给产业升级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最要命的是，官僚化的先锋队会本能地避免一切风险，因为在官僚晋升中，不犯错比表现优秀要重要的多，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越来越保守，到最后要借助传统社会的文化工具来拯救自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把孔子请回来的时候，也就药丸了。

还有，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工人阶级政权最大的依仗就是消灭经济危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但如果资本家也能消除经济危机怎么办？边缘地区革命的后进地区靠什么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学会了印钞？学会了国家调控呢？如果资本主义学会了用信用货币制来缓和经济危机怎么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1972 年之后的美国就是推行了全球信用货币制，在冷战的后半场对苏联施加了空前的压力。

最后，如果资本主义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改良建议了呢？我们回顾一下共产党宣言提出的 10 条方案：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这些方案是不是大多已经被资本主义接受了？是不是革命尚未成功？如果我们严格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去做，接下来是不是不革命了？不再寻求社会制度的主动进步？

这些问题，马克思有的说错了，有的没提到。但这不是马克思的错。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就指责马克思主义。错在后人思想固化，动辄用修正主义这个词指责别人，用“既定方针”和“已定方针”的争辩来夺取“正统性”，咱们不能让马克思负这个责任。

但是，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失败就是褪色，本身就说明 19 世纪的理论不能完全指导现实，我们应该拿出唯物主义这个工具，不仅批判资本主义世界，

也批判整个共运史，批判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然后才能突破思想枷锁，探讨适合今天的共产主义理论。

所以，我今天要谈人类简史。为的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

总结

到此，社会发展简史就算讲完了。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1 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最本质的特性之一。这个特性让我们变成地球的统治者

2 原始社会是一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状态，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我们的基因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形成了平等的本性（？）。（以百万年-十万年为单位）

3 因为外部环境的压力，我们发展出了文明。具体的转型过程是通过宗教神权这个精神驱动做到的。

4 文明就意味着阶级和剥削，不剥削的统治集团会被消灭。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处于这个历史阶段。（以万年为单位）

5 现代社会是从双元革命开始的。在近代的门槛上，英法两个国家争霸，结果英国赢了，出现工业革命；法国输了，出现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不仅在法国引发革命，接下来 200 年在全世界引发革命。法国大革命只是头一个革命而已（以百年为单位）

6 双元革命的结果是证实了经济基础转变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双元革命之后出现了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总结——马克思主义。从此底层造反不再是简单的破坏旧制度，而是追求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所以造反变成了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次造反，第一次革命。从这个规律来看，唯物主义思想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7 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很强大的工具。但是也有固有缺陷。而且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固化，批判修正主义。所以，它的很多缺陷直接导致了革命未能成功，其中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8 马恩列斯毛的观点都是他们在唯物主义原则上做的具体阐述。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本身。我们可以用唯物主义原则加上新的科学事实去批判继承他们的遗产。

总结之总结——作为一种有抽象思维，有精神生活的动物。我们会因为梦想没有实现而痛苦，因为不自由而反抗。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原始社会我们愚昧，所以没有这些问题。到了文明社会，我们一方面逐渐开化，但同时也被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同时束缚在社会结构里，没有机会落实自己的梦想，没有机会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矛盾，也是共产主义最基础的动力。我们搞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当然，不自由，不能实现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精神问题。但是，精神问题未必是通过纯精神的讨论来解决。几千年来，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看，人类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精神问题。直到 200 年前，工业革命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地位，我们才知道，精神问题是要通过改造物质世界来解决的。从此出现了科学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拯救自己的东西。我个人并不会在字面意思上相信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但因为精神生活必须寄生于物质世界，我绝对相信唯物主义是我们人

类的必需品，是我们实现自由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唯物主义去搞共产主义。

不过，工具再强大也只是工具。唯物主义是我们所有工具里最高的东西。但也不能忘了它作为工具的地位。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进步而进步。我们进步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和梦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反对被别人扣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

当然，我今天讲这些，不是为了纠结唯物或者唯心主义这些属性，我只是想从文明史的角度给共产主义和今天的历史阶段做定位。在座各位肯定会经常使用共产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词，但如果不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去理解，实际上我们没法给这些词下确切的定义。我看到很多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不研究人类史，也不敢讨论共运史，就是抱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带着一种神秘感去使用这些名词。但神秘感或许能安慰自己，却吓唬不住别人，尤其没法让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信服。这在宣传上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今天尝试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人类史，破除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神秘感，然后我们才能真正使用这些工具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解答“00 后”的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点用处。

（驳）马前卒理论水平

（目前最重要的系统批马论）

白头豕
知乎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26706/answer/90592699

一、

严肃认真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由于某些原因，对马前卒支持或批判的人中，都有很大一部分没搞明白马前卒究竟秉持什么理论？我想从这个角度回答问题。

首先认同 @玄不救非氪不改命的答案，这么做并不好。左翼中有传统渊源的那几支对 @马前卒一定是批判态度，但不该把要害的事情放在知乎上（虽然有很多了）——那么做就和马前卒的某些拥趸拆别人台没有差别了。本人虽然是流浪汉，也知道一些江湖规矩，会注意的。

二、

回到正题。扫一遍答案可以看到，许多批判马前卒的“左翼”人士，观点可以汇集为两大类：一、马前卒的理论表达水平差（文章又臭又长）；二、马前卒的理论观点错误（工业党，机械唯物，机会主义，阴谋派，集权等等），是个伪社会主义者。产生这两类观念的原因都值得分析。

马前卒的文章肯定是长的，但有些人觉得香，有些人觉得臭。长不一定就臭，觉得臭的原因其实是可以总结的，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1、马前卒历来不挑明结论。
2、马前卒爱陈述大量知识碎片，却多有错谬，无法支撑他的逻辑推演。
3、马前卒的结论无论逻辑还是立场上都是错的。

三、

谈谈马前卒文章对结论讳莫如深的问题。

对观点成熟的左翼、右翼而言，对长文只需要结构性地扫一扫，一般能看懂对方的理论结论，然后瞬间判断敌我，准备点赞或开撕。而马前卒文章特别的长，扫来扫去找不到提纲挈领的东西，最后还不给出结论。这让观点成熟的某派人看他文章，感到无用功特别多。

要证明这点，就要举马前卒 2015 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这篇发言稿特别的长，最后自己总结了八个观点：

1 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最本质的特性之一。
2 原始社会是一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状态，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我们的基因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形成了平等的本性。（以百万年-十万年为单位）
3 因为外部环境的压力，我们发展出了文明。具体的转型过程是通过宗教神权这个精神驱动做到的。
4 文明就意味着阶级和剥削，不剥削的统治集团会被消灭。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处于这个历史阶段。（以万年为单位）
5 现代社会是从双元革命开始的。在近代的门槛上，英法两个国家争霸，结果英国赢了，出现工业革命；法国输了，出现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不仅在法国引发革命，接下来 200 年在全世界引发革命。法国大革命只是头一个革命而已（以百年为单位）
6 双元革命的结果是证实了经济基础转变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双元革命之后出现了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总结——马克思主义。从此底层造反不再是简单的破坏旧制度，而是追求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所以造反变成了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次造反，第一次革命。从这个规律来看，唯物主义思想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7 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很强大的工具。但是也有固有缺陷。而且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固化，批判修正主义。所以，它的很多缺陷直接导致了革命未能成功，其中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8 马恩列斯毛的观点都是他们在唯物主义原则上做的具体阐述。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本身。我们可以用唯物主义原则加上新的科学事实去批判继承他们的遗产。

这些话在左翼看来每一句都是有严重错误的，很明显可以看出马前卒要颠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史观；更关键的是，给了这八点，也看不出马前卒颠覆这个史观的结论是什么。

人的逻辑层次有论据，论点（对论据的抽象），逻辑（对论点的组织），观点（对事物的结构化描述），高层逻辑（多个观点的组织），结论（更高层的观点，可以继续迭代）。马前卒写了几万字，才到了“观点”层，结论还是深藏不露，你敢信？

四、

谈谈马前卒为何要隐藏结论的问题。
@马前卒总是特别刻意的隐藏自己的真实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最接近他结论的一段话是：
但是，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失败就是褪色，本身就说明 19 世纪的理论不能完全指导现实，我们应该拿出唯物主义这个工具，不仅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也批判整个共运史，批判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然后才能突破思想枷锁，探讨适合今天的共产主义理论。

所以，我今天要谈人类简史。为的是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后革命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我们才能考虑下一步要干什么。

浓缩一下，马前卒说他这篇文章在：
1、批判共产主义运动史
2、通过批判暗示下一步该干什么

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哪些历史行为和观点是错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两个结论还是没有给出来。对理论派而言，这种文章写法好比一直在蒙着眼睛说“猜猜我是谁”，令他们很烦躁。

因此说马前卒的文章又臭又长，是有道理的。有理论水平低的成分（论据到逻辑特别单薄），但也有刻意回避结论的因素。

换而言之，这就是“忽悠”。马前卒有他的观点和结论，但直接说出来肯定被大部分听众凭经验就拒绝。因此他不息用大量篇幅来诱导读者思维，好比用磁石去磨铁，把人“磁化”后惯性地就能接受他的结论。

这一点马前卒比他的拥趸 @江津的梅菲斯特等人要高明多了。后者结构上接受了马前卒创造的共识后，总是怀着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在论战中把结论都塌出来，然而引起许多人的围攻。

五、

其实马前卒隐藏结论，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他的理论目标并没有变化，但观点和结论一直在大幅度嬗变。

读过他那个特别长（连载数十篇）又特别无聊（讲常识，立了很多争议观点，不论证也不说结论）的《……》（标题忘记了），可以摸到他当时的理论目标是什么，但他写了数十篇文章，支撑他逻辑的具体观点还是受个别门派理论和历史观点引导，结果越写越支撑不了他的理论目标。太监是必然的。

马前卒在 2015 年前通过大目标和观察者，把他之前对各种议题积累的小观点都先行变现了，又不停在吸纳其它人的，有利于他理论目标的观点（例如苏拉密，微博工业党等）。

有了这些准备后，马前卒在 2015 年找到了知乎这个特别利于个人的新平台，写了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一系列文章。典型的是对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斗争的批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歪解，对老国企职工扣帽子。这些文章准备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能串起来导向他原先的理论目标。因此他写了这几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这篇文章得到的重视不够，马前卒肯定是不满意的。要批判马前卒的朋友，在拿

马的那个长连载就过时了，还是得看明白这篇。

六、

上面说马前卒长文另一个问题是琐碎的论据不足以支撑逻辑推演，有没有例子呢？

看看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 举一个例子吧。
大家从这些科普条幅可以看到，现在科学界已经达成了比较普遍的认同——抽象思考能力和虚拟符号体系才是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关键优势。很多动物都可以制造物质工具，还有一些生物拥有语言，但只有人类能想象出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用声音、手势乃至后来的图画、文字来描述这些抽象概念，再把概念落实成现实的工具。……这就把恩格斯的逻辑倒过来了，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改造了我们的思维。而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比其他灵长类物种丰富，才能制造更好的工具。

马前卒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核心哲学观点提出了根本的批判，但他写了成千上万字的生物学，考古学观点和资料，才来了一句逻辑（逻辑还不是在论据之前的）。

只要这个逻辑错了，前面的论据堆砌基本是废话。那这个逻辑错了吗？

逻辑意义上当然是错了。马前卒的驳论构成了一个鸡蛋问题，先有劳动还是先有进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本来是辩证法才能处理的问题。恩格斯阐述强调了劳动对人类进化的意义，到毛泽东内因外因的论述之后，鸡蛋先后问题在辩证法的框架里已经彻底解决了。

可马前卒却用了一个典型形而上学的观点，要么基因决定了劳动，要么劳动决定了基因，不考虑这在时间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空间上是多个种属共有的过程，把二者对立起来。

不论马前卒的观点是对是错，都无法构成对恩格斯的批判，因为他用马克思主义不认同的形而上学去否定一个辩证法的概念。逻辑推演输在了起点。

所以，他成千上万字的论据之后才抛出的这个观点，过于单薄，没有意义。而他的文章通篇都是这种内容。

说到这里，我做一个结论，一部分人批判马前卒文章又臭又长；而他总是刻意隐藏结论，又用庞大琐碎的论据去支撑几个特别单薄的逻辑，没有逻辑层本身的推演。结果是一些读者感觉花在大量琐碎论据上的时间毫无意义。所以说马前卒文章又臭又长是正确的。

七、
话说回来，马前卒长文隐藏什么观点呢？

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 马前卒的回答 每一个论点都是颠覆性的。

但因为他没说清楚，不容易知道他要干嘛。万一假设了马前卒的结论，可马前卒不认，就绵绵地化解了。

我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果断解读一下马前卒的观点吧。

1 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是最本质的特性之一。这个特性让我们变成地球的统治者

恩格斯说劳动塑造了人，马前卒反驳了这点，认为抽象思维让人成为地球统治者。

这个颠覆有啥用呢？

一切革命理论的目的都在于“未来怎么办”五个字上。按马恩列斯毛的逻辑，在生产劳动中人类才会逐步发现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且他们已经总结了一整套路径理论。

马前卒无非是有另一套路径理论，而马恩列斯毛成了他理论的历史阻碍，必须一个一个搬石头罢了。从他否定劳动塑造人类社会可以看出，他要的是“抽象理论”塑造人类社会，而这个抽象理论不必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和斗争，那么，自然可以出自一群脱离劳动人民的“先知”，比如马前卒和他的拥趸了。

八、

2 原始社会是一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状态，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我们的基因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形成了平等的本性。（以百万年-十万年为单位）

马前卒又说平等是人类的本能。按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中，因阶级地位需要平等的人才会认同平等，因阶级地位特别反感平等人会表现出极端自私，但并非人性，而是一种阶级性（社会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强烈怀疑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按马前卒的说法，平等是本能，所以阶级地位等社会性不影响脱离劳动人民的“先知”们向往共产主义。那么他们这批“先知”就可以参与革命了。
3 因为外部环境的压力，我们发展出了文明。具体的转型过程是通过宗教神权这个精神驱动做到的。

马前卒又说人类文明（农业文明）的转型是因为宗教和观念（构建了新社会蓝图，又用先进的方法组织了人）。这个说法说真的，我觉得都不值一驳了。而马前卒自己也没找到好的论据，这里逻辑无比单薄，要驳都没有对象。

这段用意是什么呢？马恩列毛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劳动者组织起来，然后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来解决路径问题；马恩向往的是工人民主，列宁至少做到党内民主，他们多少有点矛盾；毛泽东发扬了民主集中制和建立了群众路线，把这两个悖论用辩证法统一得比较好看，结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先锋队要向群众学习。

马前卒彻底否定了人民史观，既然农业社会由少数宗教精英靠想象和组织化才诞生，那未来的共产主义也可以靠他这类的“先知”和先锋队在想象中创造，而不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做法。

同时马前卒又特别强调组织技术，不仅语焉不详地认为农业文明来自先进组织技术，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靠的就是组织，甚至是强制组织（红军也抓壮丁）。所以可以看出，先锋队集权或曰先锋队专政，是马前卒这一派在理论高度上的共识。

九、

综上所述，做个阶段性结论，马前卒是典型的唯心主义革命论者。有人要惊讶了，马前卒不是通篇在宣传唯物主义吗？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核心区别，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上承认物质第一性。

人类因基因而成为统治者，是为先验论；人本性平等，是为性善论；宗教创造文明，是为英雄史观；先进组织是少数人头脑的创造，更是直接唯心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在实践层面的核心特征。而马前卒引而不发的理论，则是精英专政论，又是唯心主义的典型做派。

不要被科学用词误导了，别说用量子力学论证佛学，用引力波论证基督教的人了，就连马前卒批判的韩德强，也是承认人类由物质构成的。马前卒理论本质和韩德强是同一类的，他看不起韩德强，无非因为韩德强的理论构建更弱智罢了。

十、

4 文明就意味着阶级和剥削，不剥削的统治集团会被消灭。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处于这个历史阶段。（以万年为单位）
结论是仍处在这个历史阶段。而马恩列斯毛的观点是人类已经应该迈入社会主义了。

那么，马前卒如果又是共产主义者，又对当前历史阶段悲观，他如何自处呢？逻辑结论很直接，当然是“曲线实现共产主义”了。他们肯定很欣赏马克思主义有一句“恶是历史的动力”类似的话，用欣赏 necessary evil 的目光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只是觉得这个资本主义应该被引导走更短的路径（发展生产力）。

这个流派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太常见了，社民派，孟什维克，托派取消派，数之不尽。有些左翼认为马前卒一派属于托派，多半是从这个视角。而且大概因为这个理论观点，马前卒和杜建国之类的人走得近，是可以理解的。

十一、
5 现代社会是从双元革命开始的。在近代的门槛上，英法两个国家争霸，结果英国赢了，出现工业革命；法国输了，出现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不仅在法国引发革命，接下来 200 年在全世界引发革命。法国大革命只是头一个革命而已（以百年

为单位）

6 双元革命的结果是证实了经济基础转变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双元革命之后出现了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总结——马克思主义。从此底层造反不再是简单的破坏旧制度，而是追求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所以造反变成了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次造反，第一次革命。从这个规律来看，唯物主义思想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这个话又是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史观，却语焉不详的。在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工业革命和大革命、巴黎公社等是一个历史规律的两个角度，共运史特别强调工业发展对大革命的促进，比如主要力量，主要诉求等。

而在马前卒这里，与右翼史学家合流，认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形而上学领域才会提出的“双元”革命了。两者和劳动与基因的关系一样，被解开成两个轨迹。

显然，马前卒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需要这种分割才会如此投入形而上学怀抱。那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如果是双元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在马前卒的“唯物主义”里是决定性的（成为“先知”社会主义观念所需的“必要条件”），则不成熟的社会革命则是聊胜于无的了。

马前卒作为先知和专政的先锋队，想推动的是工业革命，又对社会革命保留意见，那自然是要大为发扬“necessary evil”了。简单来说，由先锋队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超工业化革命。而剥削在这个历史时期是必要的。

十二

7 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很强大的工具。但是也有固有缺陷。而且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的固化，批判修正主义。所以，它的很多缺陷直接导致了革命未能成功，其中很多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8 马恩列斯毛的观点都是他们在唯物主义原则上做的具体阐述。不等于唯物主义原则本身。我们可以用唯物主义原则加上新的科学事实去批判继承他们的遗产。

马前卒的“唯物主义”，根本的作用是说明先知们搞精英专政，组织群众实现他们设计的理想国这个唯心主义结论的，只是用于支撑他的路径理论——搞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这种组合关系在现代之后很常见，经典的哲学理论中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许多人真以为马前卒是唯物主义。

他这两段话很关键，说来说去，就是把革命不成的锅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在要“批评自由”。然而列宁早就告诉左翼，批评自由的关键不在于反对对立面的哪些错误，而在于要树立自己的什么观点。马前卒在批评自由之后宣传的究竟是什么，才是如何对待这种批评的出发点。

另一个重点是，马前卒从方方面面颠覆了共产主义经典理论，要批评自由，最后宣称要“继承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反映的，自然是马前卒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咯。既能全方位颠覆前人的理论，还能继承他们的遗产，然后走一个倾向于先知、先锋队、组织化专政的“剥削社会”工业化道路，这条路要走通，马前卒当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了。

我读马前卒的文章，看他观点一直摇摆不定，但方向很明确，就是一直指向他给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

十三、

上文解读了马前卒究竟是怎样的理论风格和观点，谨代表本人的个人认识。至于如何评价他理论水平的优缺点，就交给大家了。

（谬）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

（马前卒著名大毒草）

一 “修正”到哪里

很多左翼小社团因为马前卒这个人吵架，这我见识的多了。吵架当然有很多个人原因，也找了很多理由，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马前卒把大家忽悠成修正主义了，要坚决斗争。今天我就想谈谈我的修正主义思想。

修正主义，有多修呢？我说几个事情，都是我在公开场合发言，当场就看到老朋友脸色变了的例子。比如说**我对工会评价不高，说工会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罢工虽然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但只能算是封建主义的反击，过去各个地区之间交流不方便，作为局部的反抗方式还有效。现在信息流通快了，封建主义的反抗只能激发全社会的抵制，不能作为主流方式。同理，**我对劳动法的大多数条款评价不高，说这是在实际上损害所有劳动阶级的利益，虽然也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

当然，最根本的是我对经典著作的看法，我不仅不拿毛选当经典，甚至列宁和马克思都不怎么尊敬，不认为马克思的言论是我们一切的出发点。这用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共产党明规则来评价，都是修正主义，所以我也就直接认了这顶帽子。

但是，我不仅接下了这个帽子，还想把这顶帽子送给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者或者革命领袖，我认为他们同样是修正主义，同样也不是把马克思或是什么人的著作当绝对出发点。只是他们做了未必要说，我还没做什么就公开说了，当然要惹人恨。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触犯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

二 “政治正确”不讲政治

不过，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来说，“政治正确”最近都不是很受欢迎。比如说那个什么都敢说的特朗普几乎要当美国总统了（注：写的时候还不是），更奇特的是中国网民也有大批的特朗普粉丝，很多人自己也没去过美国，平时说起美国民主就是鄙视，向来对两党都平等地嘲笑，现在居然赤裸裸地为特朗普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拉票，说明反政治正确很有市场。

同样是这批网民，说起欧洲的难民政策，说起西方国家的福利，说起女权主义同样是痛恨加嘲笑，以至于制造了一个专有名词：“白左”。本来西方国家的底层应该支持这些政治正确，但现在欧美国家的右翼纷纷上台，公开反“政治正确”的言论越来越多，看来“政治正确”很难在未来继续占据道德制高点了。

为什么“政治正确”反而会激发反对呢？因为政治正确坚持的不是真正的政治原则，而是一些僵化的政治习惯。这些习惯曾经有利于贯彻正确的政治原则，但在过时后还被很多政治狂热分子支持，结果招来了反对。

比如说，给基层发福利是对的，但在福利已经普及化，工作已经不难找之后，还

强调无条件的发福利，这就是错误的政治正确。实际上苏联一度贴的最多的标语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又比如保护多元文化，保护少数民族保持生活习惯的自由，保护同性恋不受歧视，这也是对的，但在这些人已经基本能自主生活之后，要求全社会去适应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个人选择支付成本，这也是错的。让所有人都不吃猪肉，都用不分性别的厕所，这种要求当然会激起反感。

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人当然也很不服，他们觉得自己在保护自由，保护弱者，实际上呢，过时的政治习惯反而会损害自由，损害弱者。比如说无条件维护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维护他们的宗教，实际上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族长和神职人员，压制了那些想放弃宗教和民族身份的人，尤其侵犯了儿童自由选择进入现代社会的权利。本来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政府充分干预那些不符合法律的家庭习惯，但坚持政治正确的人还活在一个世纪前，所以他们的政治正确放到今天，就是落后的，是错误的，当然要激起别人的反感。伟大领袖几十年前就说他喜欢右派，不喜欢左派，喜欢和共和党打交道，我理解，就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所谓左翼的“政治正确”。

三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也一样，如果你坚持的不是最基本的原则，而是在历史上某个时代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案，那迟早会发现，越坚持政治正确，你身边的人越少，胜利就离你越远。换句话说，坚持政治正确的人，错在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呢？其实说来也简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源头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每个穷人都可能萌发的狂想，简单地说就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希望大家幸福。但是，幸福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不说幸福，说自由，让每个人去选择自己的幸福。

下一个问题是人和人的绝对自由必然有冲突，必须考虑到相互妥协，让相对的自由最大化，让每个人的自由都去保卫其他人的自由。所以最终共产主义凝结成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

但仅有目标还不够，其实许多宗教，许多社会运动也在宣称要达到这个目标。比如说孔子说自己人生圆满之后，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你看，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如果推广到所有人，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意思啊。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落实方式。我们的目标要求的是人类幸福，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充分自由地生活，这本来是一个心理状态。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状态，决定于物质世界，所以我们要幸福，要自由，就必须改变整个人类社会，改变生产、分配、使用物质财富的方式，进而达到人类的幸福。

其他那些思想流派，都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坚持唯物主义到底。比如说中国很多宗教，通过劝你放弃一些欲望来达到幸福，这是改变你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多宗教劝你把自由生活的希望放在天国，这是虚构一个东西来安抚心灵；有的哲学告诉你眼下就是幸福，接受这个状态就不会胡思乱想；有的人虽然也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认为只要传播善良和美好的想法，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变好。这些东西，我们统称唯心主义，不一定是邪恶的东西，但一定不能把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导向美好的未来。马克思主义没他们那么温情，没有那么上层次，坚持要从物质层面，用科学方法来推进社会进步，经常要革命，还要让很多人不痛快，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四 世界在变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东西，都是下一个层面的结构，都要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批判，看看是否有利于这个基本目标，是否在科学规律上讲得通。如果讲不通，你就不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如果过去讲得通，现在讲不通，那就要抛弃，否则就成了另一种激起反感的“政治正确”。

从这个角度出发，不管传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反正我自己能解释通很多我的修正主义。比如说我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在可期望的将来，未必不能和社会主义共容；比如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许也要允许某些企业有独立的利益，也要有自己的创业公司和投资公司；比如说下一次革命未必就要走传统上的暴力革命道路，也未必需要列宁式的政党。

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问题，其实从列宁时代就开始放弃从无产阶级中寻找所谓的先进性和自发性了，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赞颂无产阶级尤其是所谓产业工人的先进性，只是因为 19 世纪早期最新的工业技术、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最具备反抗意识的人群集中于产业工人，而不是说必然由这个群体引导革命，并创造共产主义。明明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没有说一定要有 19 世纪概念上的无产阶级么。

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我修正了，是很多人被历史修正了。他们不肯离开上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走不下去。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去批判这些人，批判他们从上一代人甚至 19 世纪继承的所谓政治正确，建立新的政治正确。这才可能在 21 世纪推进共产主义运动。

更何况今天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生活的硬件设施可能十年就更新一代，20 年前的日用品，在新一代人身上就是文物。比如说我儿子，今年十岁了，但他从来没有在煤气灶之外的地方用过火，几乎没划过火柴。中国的人均 gdp 虽然刚刚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传统的家庭和社区几乎都要解体了。要是手机和互联网忽然消失，这个社会会迅速崩溃，我猜在座的除了我之外没人发过电报，应该也没人在邮局发过 10 封以上的信。除了玩户外的人，大多数年轻人应该都没用过手电筒。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硬件变化的这么快，社会的软件也会跟着变动，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手电筒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政策，本身也是社会的软件，也必然要不断接受新时代的考验。所以，我们想离共产主义更近，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上一个时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口号绑架。具体怎么检验呢？只有两个标准，就是前面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工具，就是人类的自由和唯物主义规律。

五 当自己的导师

当然，我也承认，否认前一个时代的革命模式，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他逼你思考，逼你用唯物主义这把手术刀去解剖你曾经认为神圣的东西。虽然共产主义者眼里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带着神圣光环，但很多人没法这么彻底地相信共产主义。有人曾经向我解释过，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回到列宁或者毛泽东，原话说的很恳切：

“我们总要坚持点什么吧，难道我们比列宁/毛泽东更聪明吗？你把他们都否定了，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很理解他提这个问题的原因。列宁毛泽东两次革命实在太成功，马克思恩格斯两个 19 世纪的知识分子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从历史来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几次革命在政治上都已经失败了，但很多人仍然活在它们的光环里，不相信自己和年轻人能掀起更大的风浪。所以潜意识里不肯放弃上一次革命带给自己的安全感，宁可按照上一次革命的模式再试一次。这好比手机掉在水里了，正确办法是立刻拔掉电池用吹风机吹干，但很多人就是有侥幸心理，一定要先开机试试，希望手机一切没事。这是人性的弱点。

不过，虽然我能解释某些人一定要停在之前的革命模式上，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意义：“接下来干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人在焦虑的时候总是重复去做熟悉的事情，比如说拖延症患者，事情越急，越想去玩游戏。如果不能回答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就算很理智的人也可能会重复上一次革命的道路。这里我谈谈我个人的想法。

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这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问题。既然现在没有革命导师，既然毛主席在 40 年前就挂了（那年头还没有 8086 芯片），我们就得给自己当导师。自己拿出勇气和精力，用唯物主义精神去研究这个世界，对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要有所了解，最终自己建立一个世界模型，一个能能帮你定位世界上大多数事务的模型。

然后，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找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本矛盾，可能是阻碍生产力进步，也可能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阻碍人类解放，总之是社会最需要革命的地方；第二个是普通人视角下，自己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和不足，即普通人最可能被动员的角度。然后你坐下来思考，这两个东西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有没有可能通过某个社会运动互动？如果可能的话，联系这两者的那条路，就是革命之路，就是你应该去努力的地方。如果不可能的话，要么是这个社会不需要革命，要么是你唯物主义没掌握好，对社会挖掘的不够深。以上这个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文革期间“九大”和“十大”的基本理论议程，只是他们找的比较糙，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所以没有明确的结果。我们今天就要比他们走的

更远，做的更踏实。

六 群策群力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置问题，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寻找这两个矛盾的的人越多越好。你给自己当革命导师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一百万个人来寻找社会矛盾，找出正确答案的概率就高的多了。可以说，发动更多的人用唯物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其实历史上历次革命也是这个过程。从 19 世纪欧洲的历次革命开始，几乎每一次革命的发动者和策划者都不是那些日常生活矛盾最激化的人群，或者说，有没有知识分子来发动革命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是革命和造反的根本区别。从巴黎公社开始，领导层就不是以普通产业工人为主体，苏联革命的领袖不是工人或士兵，中国革命的领导集体不是农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引导自己所属社会集团之外的力量。

这批人有自己的局限性，可能犯错，可能把革命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但没有这批人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革命的第一天就知道谁是王明，谁是李立三，谁又是毛泽东。如果上来就不允许尝试和犯错，那只能什么都不干。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愿意用唯物主义标准来评判自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所以最能走向胜利。就我现在所能预见的未来，下一次社会革命或变革也会有类似的状态。而且，由于教育扩张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之余开始考虑社会模型，开始对整个社会有一定认识，很有可能在下一次革命中，革命思想本身的动员阶段会更长，甚至可能和社会矛盾本身发挥的作用相当。

那么，脱离社会基本矛盾，去谈革命思想或者说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是唯心主义呢？不是的，因为我们这里同样把思想的传播看做一种可以研究的物质运动。世界上有新闻传播学，有市场营销学，同样也应该有人客观地研究如何推广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

七 理论自信

其实，你们看这个社会，人类在吃饱穿暖之后，客观上对精神生活有需求，对世界模型有好奇心。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地下宗教的发展速度却惊人，朴槿惠当了总统还要弄个邪教头子当顾问，这本质上都是寻求现实问题的全面解释，寻求一个道德优越感或至少是安全感。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对人类有信心，就该相信，唯物主义可以比宗教，比现有所有的思潮提供更完善的世界观，提供更美好的预期。如果做不到，那说明我们做的不够好，没有包装好。

这样，最后的结论就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包装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不歪曲的前提下，去感动更多的人，发起普遍的社会思考和研究。以往的革命文化没有针对大多数教育阶层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就要做到。革命文艺和社会科学科普可能是眼下最急需的革命产品。

绕了一圈，我从唯物主义绕回了感动人，说服人。这似乎很不唯物。但我并不是让大家去骗人，去忽悠人。相反，我希望大家展示唯物主义最真实的一面，只是

要结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去展示。不要以为唯物主义就不能谈美感，不能谈感性。好的科学理论必然是美的，必然能感动人。自然科学的理论有这个特征，社会科学也一样。我前天回顾了一下这几年的作品，最满意的事情就是写了梁祝这个曲子和新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马平：3015 年 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么？）。其实，无论在历史和现实中，唯物主义和革命都有无数的魅力从未被展示过，如果找不到，说明我们还不够努力，对不起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也对不起当下迅速进步的社会经济基础。借用最近的一句话，我们辜负了这个时代。这种负疚感是催促我每天在谋生之余做一点有用之事的动力，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任冲昊 2016-10-29

评论选：

江津的梅菲斯特（基路伯）（注：马前卒资深粉丝）
我认为督公被一些左派恨的原因并不是砸烂了旧的权威和路线，而是尚不能提出完整的新的路线和策略……对于许多人来说，有没有东西信是比信什么东西更要紧的。

龚义哲（注：中马库翻译）
他也配“砸烂旧权威和路线”？他也能“提出完整的新路线和策略”？他这套玩意，无非就是“工人阶级已经失去先进性，应该由知识分子来领导工人阶级”，最起码也能追溯到五十多年前了。他什么也没能砸烂，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玩意。

（驳）马哲贴吧发言

修正与发展

什么是修正主义？
马前卒先生面对左翼小社团的指责——修正主义，不仅接下了这顶帽子，还将这顶帽子扣给了几乎所有革命和革命领袖。

最根本的是我对经典着作的看法，我不仅不拿毛选当经典，甚至列宁和马克思都不怎么尊敬，不认为马克思的言论是我们一切的出发点。这用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共产党明规则来评价，都是修正主义，所以我也就直接认了这顶帽子。但是，我不仅接下了这个帽子，还想把这顶帽子送给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者或者革命领袖，我认为他们同样是修正主义，同样也不是把马克思或是什么人的着作当绝对出发点。

如果马前卒先生认为修正主义就是所谓的否认马克思的言论是一切的出发点，那么，毫无疑问，在马前卒眼中的马克思主者无非是教条主义的信徒。而马前卒先生对于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无非是暗示修正就是一种发展，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发展呢？或者修正和发展就如马前卒先生而言是同一性质？再此，是必须郑重回答的。
修正主义从理论内容上来看，在政治经济学上否认商品价值理论，否认剩余价值学说，用风险论、多要素论、边际论、综合论取代商品价值理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在经济所有制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私有制的历史属性，用全民所有制（实则小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实则国家私有制)取代无产阶级公有制，混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概念；在政治上，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到共产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过渡，无视阶级社会阶级属性，鼓吹立即实现无条件、无差别、无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历史观上，否定劳动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否定人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再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英雄史观、唯心史观、唯生产力论、历史虚无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否定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及理论上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用多元化、知识化、去政治化取代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及理论；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用二元论、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辩证法、机械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形而上学、多元化取代唯物辩证法。
修正主义者从社会面貌上来看，是以“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但就其实质而言，是改良主义、和平—渐进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盲动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民族、宗教）社会主义中一个或多个相结合的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方面使得这些修正主义者不得不承认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外部危机（经济危机、阶级对立、环境污染、资源掠夺、人口问题等），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既得利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或将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简单的暴动而不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必要手段。主张无原则妥协改良，不争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将无产阶

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运动交到统治阶级的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中去。简而言之，这些修正主义者平素是以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者、导师的头衔自我标榜，然而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就必然是走向投降、出卖革命的道路。

什么是发展？
更准确的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妨看看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论述：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在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现在，再理解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于事物发展过程的阐述。(A)本质否定——形式否定(B)——本质否定——形式否定(A’)。这绝对不是经院式的教条，更不是诡辩式的玄学，而是事物发展过程的绝对规律。从它的外在形式是 A——B——A’，从它的实质是 A<A’。用文字叙述就是：形式的回归和实质的升华。事物以具体形式存在，然而它的内部存在着否定这种具体形式的内核。当这种内核不断发展在本质上占据主导因素时，旧有的形式与本质也就出现了对立，不可避免地要求否定旧的形式并以新的形式完成形式与内核的统一。这个过程是否定的过程，是事物由一个具体形式转化为另一个具体形式的过程，是事物本质内核运动造成的外在形式运动，是事物普遍的绝对运动造成相对的静止形式的跳跃。这个否定的过程还不能说是发展，它只是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当事物经历第一个否定的阶段时，新的具体形式也要求将本质中符合外在形式的内核占据主导因素。一旦符合外在形式的内核丧失主导地位，新的具体形式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老旧的东西。于是，第二个否定阶段开始了，在规律上是同第一阶段一致的，可在实质和形式上确出现了第一阶段完全相反结果。形式逻辑在这里崩塌了，这也正是无数形式逻辑者根本不能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原因。当旧有的形式被否定时，并不是旧的本质内核被绝对抛弃，而是说旧的内核在不断运动中被新的内核所否定，被取代主导地位成为了次要的因素，从而造成了形式的变化，这也是形式逻辑绝对观所不能理解的。形式逻辑看待物质运动的形式变化（A——B——C)和量的变化（A——A’——A”)被割裂了，成了两个独立的运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事物运动形式（A——B——A’)在形式逻辑的逻辑自洽看来反而成了因果倒置、愚蠢的绕圈，这样一来，事物的发展就和复辟混为一谈了！否定之否定，这正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要发展自己就必须突破旧有的形式，就必须否定旧有内核的不合适新形式之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个新形式是过渡的，还必须保留旧有内核合乎本质的因素在不断运动中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最终否定这个过渡的形式，实现形式的回归和实质的升华。 看到这里，相信各位对于修正和发展都有初步的了解和判断。修正主义既不是文人相轻式的讥笑谩骂，也不是政客阴谋式的网织罪名，更不是理论特色式的批判发展。修正主义的产生说明了以下问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使得阶级对立和斗争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本能的遭到广大无产阶级反对和抵抗。因此，资本主义势力要渗透到无产阶级中就不得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不得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来对马克思主义做一些小小的修正，使它成为资产

阶级能够接受的东西；就不得不许诺无产阶级短暂的现实利益来消磨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不得不将经济决定论庸俗化成唯生产力论；就不得不空谈超阶级性让无产阶级在阶级国家中幻想着长入和平。
因此，修正主义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阉割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小心翼翼的改造成一种庸俗的、调和的资产阶级学说。而发展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价值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批判、升华。
那么，马前卒先生的发展修正同义论究竟是其理论的无知还是实质的修正？给几乎所有革命者和领袖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究竟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是往革命者、领袖身上抹屎？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还必须深入分析马前卒先生的理论体系。

马前卒先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谢天谢地，马前卒先生天才式的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让相对的自由最大化，让每个人的自由都去保卫其他人的自由。同时马前卒先声还不忘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自由真是一个好东西！我们的小资本家，小生产者，小市民不免长舒了一口气，原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让相对自由最大化的东西！在此，简直要热烈的祝贺马前卒先生的伟大发现了。如果说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性的创造了红色资本家，那么马前卒先生的自由本质论则显然是“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重生！
既然，马前卒先生还不忘引用马克思的著作来证明相对自由的最大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那么，就必须回敬他一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理性"，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在看不见手的指引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呢？难到马克思出现了思维混乱？或者说出现了思想异变？在此，我必须提醒各位读者应当注意“自由发展”的前提——代表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也就是说“自由发展”的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自然也不会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既然马前卒先生鼓吹相对自由的最大化，那么就不应该忘记，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是没有绝对自由的，只能是相对的。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无产阶级的相对自由是经济自由，是自由地占有劳动工资；是人身自由，是自由地出卖劳动力；是政治自由，是自由地选出剥削阶级代表。而自由的最大化只能是资产阶级，自由地占据生产资料；自由地剥削劳动力；自由地组织阶级统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含义。也就

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所讴歌的普遍自由从来都不是什么普世的东西，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已。那么，马前卒先生的“自由最大化”究竟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大化？还是说让每个无产者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下相对自由？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下才能实现的每个人自由发展？马前卒先生对此很明智的选择避而不谈而让读者自行理解“相对自由的最大化”。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对自由最大化下自由发展了！为了“人类的幸福”，自由和谐的前进，多么美妙啊！马前卒先生上一刻还在批判宗教“把自由生活的希望放在天国，这是虚构一个东西来安抚心灵”并且称马克思主义“要从物质层面，用科学方法来推进社会进步，经常要革命”。接下来却说：“下一次革命未必就要走传统上的暴力革命道路，也未必需要列宁式的政党”。这究竟是马前卒先生逻辑的混乱还是实质的背叛？是修正主义的异变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马前卒先生夸口而谈“科学”、“自由”、“革命”、“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并且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在可期望的将来，未必不能和社会主义共容；比如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许也要允许某些企业有独立的利益，也要有自己的创业公司和投资公司”。那么这种“可望的将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还是多个阶段（或是全阶段）？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有什么本质区别？马前卒先生既不懂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懂唯物辩证法，通过几个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拼凑就自诩为发展。胡乱的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混作一团，这样一来每个社会阶段的主要任务就全成了马前卒先生口中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对自由最大化！这位杰出的庸人在市侩的清谈馆里竟成革命家！

（驳）清华求是：论左翼青年的发展方向

2017-01-12 周道登

一：八卦和八卦

笔者近日在网路冲浪时，不经意间看到了我国著名高端问答网站“知乎”上面的几篇回答或文章，颇有感触，因此探讨一二。

首先是“大学里的左派社团应该如何发展？”这个问题。据我和提问者的私人沟通，他是一位关心左翼社团发展的大学生，希望看到一些想法，了解一些现实，因此在知乎上提问。我非常感动，送给了他我们求是学会的八字口号：“读书、实践、争鸣、战斗”。并告诉他，作为普通的学生，我们应该关心民生国计，关心工农兄弟，学习马列主义，他也感觉收获很大。

然而，该问题下面的回答却是百花齐放了。排在第二位的回答全文援引了《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段落，摘录如下：

“讨论时就更过分了。每个人摆出很懂的表情，使用艰深语句说话，因为听不懂，我就问了。比如所谓帝国主义式剥削是什么？跟东印度公司有何关系？所谓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是指大学毕业后不准到公司就职吗？但是没有人向我解释。而且还生气了。你能相信这些吗？……当时我就想，这些全是伪善冒骗的人。他们适当地卖弄堂皇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让新来的女生大表钦佩，其实心里只想着把手塞进女生裙内那回事。等到升上大四了，赶紧把头发剪短，准备毕业后进三菱公司、TBS 电视台、IBM 电脑或富士银行做事，娶个从未读过马克思的漂亮太太、替孩子接个文雅又讲究的名字。什么叫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啦。其他新生也很过分。大家其实听不懂，却都装看很懂的表情无缘无故地傻笑。事后就对我说，你真傻，即便不懂，只要拼命点头称是就行了嘛。嘿，还有更气人的事，想不想听？”

看到这个回答我心里一惊，完了，帝国主义式剥削是什么我知道，东印度公司和它有什么关系也能说出一点，更惊人的是，我竟然猜得出什么叫粉碎产学协同联盟，这个名词是日本学生左翼运动的产物，要求反对和摧毁资本主义体制下大学教育机制和产业(即资本)共谋的现象。我似乎感到主人公正指着鼻子骂我，也不由得开始自我批判：我干过这种事情没，不会没干过吧，知道的东西多了好惨啊，好气啊。唯一稍感安慰(或者也算不上安慰)的是，我们学会既然立足于清华，读书讨论的时候往往绝大部分是男生，卖弄名词借机把妹客观上难以实现。

再往下拉，下一个答案更令我震惊：“接触过十几所高校的所谓“左翼社团”里的各色人物。各种高校各类社团都有。有 985、211 高校，也有三流高校。有清华求是系的社团，有早年乌有之乡组织的社团，有与 YCA 关联的社团，也有以上三类以外的。我们先不谈论这些“左翼社团”的政治倾向。几乎所有这些社团大致都是由中二病普通社员+政治掮客社团理事组成的。但凡混得稍微久点的人，

就开始笼络青年，搞黑社会式的大哥带小弟。偶尔还会出现学长带学妹，带着带着就以革命的名义求爱，典型的例子就是 YCA 的“求爱门”。学姐把学弟的也有，搞成约炮组织有些人还很引以为荣。为了争夺青年，冲突从没少过，各种下限不断刷新，在微信群里刷屏谩骂都是常事，举报也是随手之劳，更有甚者还找关系花钱买通新浪等公司的管理员封禁其他社团的账号。我也是搞不懂了，一个个年纪不大，政客思维不小，满脑子朋党之争、党同伐异，跟老红卫兵一样喜欢寻衅滋事，跟资本家一样喜欢尔虞我诈。”

我看到了什么？！“清华求是系的社团”！什么情况？求是怎么还搞出一个系了？是和工物系电子系一样的系吗？还是黄埔系 CC 系的那个系？郑重声明一下，求是学会和其他任何校内社团都没有发展出超出友谊的不正当关系，和任何校外社团都没有发展出关系，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先别急着讲上面的八卦，后面还有呢。“说得没错啊，“左翼社团”比社会上一些地方还脏。底层会员多为小粉红。要是当上社长了，捞个几万不成问题，学妹也是各种手到擒来。这才 100 人，就搞得跟大肃反一样了，规模再大点可想而知。”

惊天大秘密！我恍惚中仿佛进入了一个异位面，在那里，清华男女比例一比九，社团干部学校给发工资，会长直接保送，学会成员人手一本甄嬛传：“小主今日偶感风寒，听不了《资本主义论》了。”清华求是的作风到底是什么样的，想必合作交流过的同学们都比较清楚，如果有不清楚的，也欢迎在下学期报个名，参与几次活动，自己来看一看。书呆子和学渣有之，工科男生过多，但估计野心家阴谋家可能还没出现呢。至于那些贵圈真乱的八卦，我相信任何严肃的人都不会相信，即使是这个答案地图炮扫到的其他左翼社团，这种现象恐怕也只可能是个别而已。

虽然此回答荒诞无稽，大可以会心一笑。不过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它已经收获了 649 个赞。我们学会辛辛苦苦在微信上写的文章，也没有上百个赞的啊。这些人要么是满怀恶意传谣造谣，要么则对左翼社团天生厌恶，即使看到这种段子也能信，要么就是相当享受指手划脚藐视他人的优越感，轻轻松松敲敲键盘：“学生也就能干这些。”同问题下已有很多参与过实际社团工作的人的科普和反驳，同学们有时间也可以看看，就当增长见识么，我希望这篇文章也能够减少一点不必要的猜测。

二：左翼教主马前卒

然而 649 个赞已经很多了吗？也是在前一段时间，知乎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同样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329 个赞，307 条评论，传播范围比起求是学会来说大得太多了。左翼社团也不知道招谁惹谁，关上门自己组织学习会讨论会都不行，非得有人来指指点点什么是正确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那么看在这篇文章总算不是恶俗八卦的份上，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标题吧。

文章作者马前卒开篇明义："很多左翼小社团因为马前卒这个人吵架，这我见识的多了。吵架当然有很多个人原因，也找了很多理由，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马前卒把大家忽悠成修正主义了，要坚决斗争。今天我就想谈谈我的修正主义思想。"这一点我坚决不同意，请马前卒先生不要自以为能够将人忽悠成修正主义。如果我记忆力不大错的话，修正主义指的是如伯恩斯坦、考茨基那样的领导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至于马先生写了一本《大目标》，表示工业时代越来越复杂，只有人口十亿人的国家才能进行下次工业化，还要中国在非洲大搞投资，走出一条不是帝国主义的新路来。又搞了一个观察者网，天天搞抄袭和假新闻。这么着混了一通，怎么何德何能将自己视为修正主义呢？我实在不是很懂。

"修正主义，有多修呢？我说几个事情，都是我在公开场合发言，当场就看到老朋友脸色变了的例子。比如说我对工会评价不高，说工会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罢工虽然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但只能算是封建主义的反击，过去各个地区之间交流不方便，作为局部的反抗方式还有效。现在信息流通快了，封建主义的反抗只能激发全社会的抵制，不能作为主流方式。同理，我对劳动法的大多数条款评价不高，说这是在实际上损害所有劳动阶级的利益，虽然也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

虽然我没有将这段话的整体逻辑看出来，但萨斯噶马前卒，一出手雷霆万钧！我冒昧猜测，马前卒又在卖弄其并不很高的经济学水平，认为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影响工会斗争，拉低工资等等。然而为什么工会不去团结那些未加入的工人，反而非要把他们视为敌人呢？将工人视为敌人对于工会有什么好处呢？马克思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马前卒"修正"成没加入工会的工人是最大敌人，太厉害了。

将工会罢工称为"封建主义反击"则更加莫名其妙。罢工本身破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莫非马前卒崇拜"组织术"等名词若此，认为工会继承的是封建时代的行会传统，所以就是封建主义了？罢工更不会"激发全社会的抵制"，跟信息时代又有何关系？在马前卒眼中，激发全社会抵制再加上信息时代的意思大概是观察者网的绝大部分网评员反对罢工和工会吧。毕竟在这些人眼中，中国工人的生活环境是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体现，工人提高工资这种向白左学习的运动一旦风行，全社会都要遭殃。马前卒认识世界的方式也算是很先进，很"资本主义"了。

"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人当然也很不服，他们觉得自己在保护自由，保护弱者，实际上呢，过时的政治习惯反而会损害自由，损害弱者。比如说无条件维护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维护他们的宗教，实际上保护了少数民族的族长和神职人员，压制了那些想放弃宗教和民族身份的人，尤其侵犯了儿童自由选择进入现代社会的权利。本来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政府充分干预那些不符合法律的家庭习惯，但坚持政治正确的人还活在一个世纪前，所以他们的政治正确放到今天，就是落后的，是错误的，当然要激起别人的反感。伟大领袖几十年前就说他喜欢右派，不喜欢左派，喜欢和共和党打交道，我理解，就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所谓左翼的"政治正确"。

这段话又展现出了高超的混淆概念的技术，马前卒向众多反政治正确的右派取经归来，动不动就诉诸极端化，滑坡，世界非黑即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认为，一方面要承认和维护民族自决的权力，即任何民族都应该有自由民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又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造社会，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的制度。而在宗教方面，同样也是两条。其一，应该坚持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人们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迫害。其二，在党的宣传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坚持无神论，跟宗教争夺思想上的阵地。这些东西列宁在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强调过多次，马前卒嘲弄政治正确支持者活在一百年前，而对于一百多年前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无所知。在这种观点之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正确"还能不是错的吗？而他轻巧地提出的"政府充分干预那些不符合法律的家庭习惯"之类的解决办法和马克思主义有何共通之处？难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前卒又忘了问一句：这是谁的政府，谁的法律？认为毛泽东喜欢右派是因为反感政治正确则是践踏历史之举了，要知道，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之所以痛骂肯尼迪和约翰逊，可不是因为这些人通过民权法案太过"政治正确"，而是因为这些人一边出手镇压汹涌澎湃的民权运动，另一边还在大打越南战争，马前卒就这么不顾史实，自我理解了。

马前卒怎么会在政治策略上面出现这么大的失误呢？这是因为他抱有的不是左翼强调的阶级(或曰社会集团)斗争论，而是国家-社会的右翼史观，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十万八千里远。工人斗争成果如何他不关心，一看到工会和劳动法就开始从大局出发，指责工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少数民族如何生活得依靠于国家政策和治理，而无视他们的意愿和内部的阶级矛盾。对于宗教而言，看的是政府"充分干预"与否，当然又跟宗教背后代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毫无关系了。左翼和右翼之争，不是阶级斗争的体现，相反，只是两派人在争论国家如何发展，当然左翼也有错的一天啦。最后，还要悄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西方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正确捆绑在一起，借着国内反政治正确的舆论来为自己撑腰，真是好风凭借力送君上青云啊。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呢？其实说来也简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源头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每个穷人都可能萌发的狂想，简单地说就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希望大家幸福。但是，幸福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不说幸福，说自由，让每个人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下一个问题是人和人的绝对自由必然有冲突，必须考虑到相互妥协，让相对的自由最大化，让每个人的自由都去保卫其他人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词惊天地泣鬼神，原来马克思主义正是相对自由最大化，我在看密尔还是马克思？倘若马克思主义修正到这步，阶级斗争不要了，唯物主义不要了，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跟一般的自由主义哲学还有何区别？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东西，都是下一个层面的结构，都要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批判，看看是否有利于这个基本目标，是否在科学规律上讲得通。如果讲不通，你就不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如果过去讲得通，现在讲不通，那就要

抛弃，否则就成了另一种激起反感的“政治正确”。从这个角度出发，不管传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反正我自己能解释通很多我的修正主义。比如说我认为市场经济至少在可期望的将来，未必不能和社会主义共容;比如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许也要允许某些企业有独立的利益，也要有自己的创业公司和投资公司;比如说下一次革命未必就要走传统上的暴力革命道路，也未必需要列宁式的政党。”

马前卒表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既然他的理论本身已经扔掉了唯物主义，扔掉了阶级史观，现在又要回头来用唯物主义批判一番，那么这种唯物主义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口口声声要回头检验，回头批判，但最终又是一个可靠的论证也给不出来，直接抛出自己的结论：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没有任何论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能共存，剥削和社会主义也能共存，社会主义还能够和平长入。这哪里是什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的新东西呢？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点了解的人，哪一个不对这一套东西熟悉无比呢？

三：怎么办？

在用自己贫乏的政治学和历史知识举起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后，马前卒终于开始对于左翼社团的发展做贡献了。一共三条：“当自己的导师”、“群策群力”、“理论自信”。

其一是叫左翼社团勇敢学习马前卒，找一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努力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赞数可以想见，不少人很吃这一套，可是就这一点来说真是恕难从命。大家想一想，假如求是学着马前卒那样，整天一句有根据的话也不说，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不看，那么我们还能举办什么活动呢？社团不是名存实亡了吗？还是跟马前卒似的批判一番政治正确，痛骂白左，反对工会，那这样的求是学会，还有脸自称左翼吗？左翼社团是要脸的，参与的同学是要脸的，举办的活动也是要脸的。

其二是要动员起大部分人，共同探索共产主义的新道路。我觉得，这种事情真是太难太难了，还是由马前卒打打头阵为好。你们看，在知乎这种高端问答社区里面，马前卒的赞数和回答质量都如此之高，吸引了许多人和他一起修正马克思主义。在人民观察家这个高质量的客观理性真实的新闻网站中，马前卒作为主编，吸引了许多人和他一起批判“刁民”，向工人阶级进攻，可以说进行了成功的群众动员。而我们学会竟然还是在使用落后组织方式，比如说组织宣讲团，比如社会实践，比如老师讲座，比如鼓励同学们读书学习，这种封建组织术跟马前卒的先进的信息时代宣传之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其三是要有高度的理论自信，换言之，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达到“相对自由最大化”，相信社会总是在进步。“其实，无论在历史和现实中，唯物主义和革命都有无数的魅力从未被展示过，如果找不到，说明我们还不够努力，对不起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也对不起当下迅速进步的社会经济基础。借用最近的一句话，我们辜负了这个时代。这种负疚感是催促我每天在谋生之余做一点有用之事的动力，今天给各位分享一下，谢谢大家。”不要说马先生了，我也有很大

的愧疚感。如果放着马先生不管，任由他在网络上当一个“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起左翼社团来，那么无疑对学会的发展不利。不是马先生你辜负了这个时代，是左翼社团辜负了你啊。

马前卒在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意见之后仍不消停，就在 12 月 31 日，他再发雄文，继续开展对于左翼社团的指导工作：“环视周围，放眼世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99%言必引经据典，论必举领袖案例，否则一句话都不敢说。战战兢兢，比刚进宫的小太监都惶恐。从党校官僚到左翼游击队再到网络爱好者，只在这份寻章摘句找借口的本事上达成空前团结。现在世上大多数运动都不把称“原教旨”三个字当好话，连罗马教会都承认了进化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回到马克思”(或者其他领袖)当救命稻草，当荣耀。然而，马恩列斯毛五祖都是 19 世纪生人，最小的一个在 100 年前都快大学毕业了，和今天的 21 世纪社会之间隔着 100 倍的生产力差异，1000 倍的知识总量。他们当年的文字只是摸石头过河的工(xiu)作(zheng)笔记，又不是推背图，哪有那么多微言大义，怎么可能为今天的复杂社会给出无穷的解释？青年们自以为熟读文选三百卷，设几个 19 世纪风格的 Cosplay 道场就能开门大杀四方，这样的人就算再多几百万，除了给资本主义添几个“多元化”的彩头，还能怎么样？”

我想，网路上有一个小知识是必须要具备的。那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口口声声说要实事求是、行动起来，言辞华丽，震撼人心，可惜就是看不到他实际上求了什么是，做了什么行动，那么以上的言论则尽可以当作放屁。马前卒先生对这一套是十分熟练的，他老是喜欢口口声声说现代社会变了，复杂了一百倍一千倍，马克思早死了一百年了。可是我们却永远也看不到他具体地说现代社会哪里变了，什么地方复杂了，更看不到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质上的改变。恰恰相反，他的时代性比起马克思也强不到哪里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难道不是马克思的时代就存在的吗？那些鼓吹社会主义也需要剥削的人究竟“新”在了哪里呢？马前卒大笔一挥，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为今天的复杂社会给出无穷的解释”？可是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于任何理论都成立的万能灵药吗？这个“100 倍的生产力差异，1000 倍的知识总量”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吹成“10000000000000 倍的生产力差异，100000000000000000 倍的知识总量”吗？

当然，马克思的工作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想要在今天回到马克思已不可能。在马克思之后，还有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历史，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但是，马前卒先生既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识，更无多少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一遇到马克思，则痛骂两句马克思脱离当下时代，因此自己就是对的。一遇到别人引了几句马克思基本原理，则嘲笑他们是在搞 cosplay，什么事也做不成。普通学生要是跟着这套方法学，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大概是“工业社会无比复杂”、“现代生产力过去共产主义者都想象不到”、“网络时代颠覆了传统组织方法”等等词句翻来覆去，最后来一句：趁早回家洗洗睡吧。

笔者只是一个求是学会的普通成员，发此文和读者进行一点探讨，心情倒真有一点马前卒痛骂的“战战兢兢”。鲁迅先生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说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荧光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当今的左翼社团正在踏踏实实地做事，能学一点学一点，能做一点是一点，正不必等待马前卒先生这样的“光亮火炬”。也希望大家在看到此文后，能够有所思考，有所观点，有所行动，一起推动求是学会的发展，方不会违背求是学会“读书、实践、争鸣、战斗”的初心。

（驳）马前卒的修正主义，泛左教团的发展方向

傅友德

序、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自从伯恩斯坦以来，“修正主义”这顶帽子在无产阶级阵营里是臭了大街的。不过，在无产阶级这边越是臭，在资产阶级那边就越是香。在当代的泛左教主马前卒大将那里，对这顶帽子看来也是趋之如骛，不惜从地上捡起来戴了（知乎专栏）。对此，我还真得说一声好。牛鬼蛇神，总是要自己跳出来，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不跳出来，倒还可以迷惑一些人，让他们认为“马前卒是灰常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这种人随着历史的发展，是越来越少的；不过，从量变到质变，要他们逐步地认清马前卒的真面目，哪有马前卒自己出来当反面教员痛快呢？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大将的一篇文章，要胜过我二十篇、二百篇文章。这是无产阶级伟大征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也可以说，我到贵乎的初衷得以基本实现了。
不过，牛鬼蛇神虽然总是自己跳出来，但又总是不甘心灭亡的，总还要挣扎一番。马前卒大将也不例外，明明自己跳将出来自供修正主义罪状，却也还不免自我粉饰一番。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将这些粉饰一一破去，揭开你泛左教主的真面目了。

一、马前卒到底修正在哪里？
马前卒自辩说，自己的修正主义就是与时俱进，不搞本本主义，不为“历史所修正”，坚持反对“政治正确”。看起来这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即“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而正如马前卒所预言的一样，昔日的革命领袖斯大林也曾支持这类论断：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词句，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词句顶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词句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针对季诺维也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的。
季诺维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话的意义和作用。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看来革命领袖不但做而且说，也并没有“惹人恨”（季诺维也夫派的刺客另当别论吧），马前卒的这番言论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反倒是有自我标榜的意味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只要把马前卒的所作所为同斯大林进行一下比较，就可发现两者刚好相反：斯大林要求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角度来吸取新的经验，发

展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而马前卒则是像季诺维也夫一样利用“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词句”来修正乃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区别只是在于季诺维也夫采取墨守成规的办法，而马前卒则采用天马行空任意延伸的办法罢了。换言之，马前卒比之季诺维也夫，离开马克思主义更遥远了。
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马前卒任意地从马克思主义里抽象了一些片面的词句，宣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本质”（见下文分析），然后就围绕这一套“本质”胡乱地发明了一套资产阶级理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以至于发展到攻击工会是封建行会、攻击无产阶级不具有革命性、宣布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等概念不矛盾，诸如此类等等。这难道不充分地说明了一点：马前卒就是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掩盖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嘛？

二、“政治正确”是什么东西？
“政治正确”，本来是资产阶级左派用来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东西，绝大多数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比如高福利、多元化等等。资产阶级左派就是利用这些或是历史上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运动之下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又或是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的贿赂，来安抚广大无产阶级，使之丧失斗争性的。
然而在这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下，这些“政治正确”成为了妨碍资产阶级进一步提高利润率的绊脚石，被资产阶级认为是摆脱危机的阻碍了。例如资产阶级认为，高福利提高了平均工资、多元化增加了社会成本而降低不了劳动力成本，诸如此类。因此，资产阶级和恐惧自己下降为无产阶级的“困境中产”就要团结起来要求废除“政治正确”，保障资本的利润率，恢复资本主义的景气。
当然，实际上这样做可以在局部恢复景气，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增加就业，然而却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消费，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剧了生产过剩，最终只会让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因此，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了资产阶级的持久利益就提出了他们的反对，然而这些反对却不能被行将破产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接受，毕竟“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这就是“欧美国家的右翼纷纷上台”的根本原因，特朗普选民的财产分布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政治正确”和所谓“反白左”的资产阶级民粹思想在你国也会“很有市场”呢？因为这同样代表了你国特别是贵乎相当多资产者、小业主乃至精神资产者的利益。从前财政部长开始到东莞血汗工厂主再到马前卒，反对《劳动法》的阵营也是由同一批人组成的。简而言之，“白左”虚伪，而“民粹”则是赤裸裸地不要脸：发展到了极点无非就是远古邪恶的“一切权力归土豪”和硕会主义的“穷人居然胆敢非要跟我们一起过日子，那就干掉他们”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政治正确”之所以会激发反对，不是因为什么“过时僵化的政治习惯”被什么“政治狂热分子”所坚持（在这里，马前卒教主就走向了宗教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在他那里就一点也看不到了——原来美国超过 40%的选民都是不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狂热分子”），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内部激烈的路线斗争。我们可以看到：硅谷和华尔街的垄断资产阶级，因为在危机中保持了相当高的利润，所以仍然坚持代表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白左”；而锈带的实业资产阶级，因为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因此倒戈到了“民粹”的特朗普一边。在法国和德国情况也都是如此，法国的农民大都支持勒庞，原因无他：这些小业主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伟大领袖几十年前喜欢右派、喜欢跟共和党打交道，是因为资产阶级左派对苏联

社会帝国主义大都采取绥靖态度、支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中国这一全球主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地。他认为这是危险的。今天的世界情形和几十年前还一样吗？马前卒公开同右翼“民粹”运动为伍，无非是公开暴露了其从泛左翼跳到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嘴脸。当然我早已预言过了：佐野学、锅山贞亲的“一国社会主义”乃至“天皇社会主义”，就是即将参选人大代表的马前卒大将的未来。

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是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是随历史而发展的哲学。马前卒一方面强调这些事实，一方面却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这适足令人发笑。

我不禁想问马前卒先生：请您作为一个工程师回答我，什么是力学最本质的东西呢？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坚持从亚里士多德等人发展至今的力学，并在这种力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你可以根据“变化的世界”来批判和扬弃旧的力学，一如伽利略扬弃亚里士多德、量子力学扬弃牛顿力学等等；但是，你怎么能够一方面对古来的一切力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又幻想从“力学最本质的东西”出发去创造新力学呢？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个力学家会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工程师会这样做，只有宗教家才会这么干：就像路德、加尔文、哈里发易伯拉欣或是其他任何托古改制的宗教家那样要求人们“回到本质”去。是啊，毫无疑问，马前卒根本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科学，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宗教。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马前卒一切有关“本质”和“政治正确”的讨论本来是根本用不着看了。别说他只是摘取了《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算他给《资本论》作了注也是在胡说八道。沿用近年来网络上的一个用语，马前卒可以认为是一个“本质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同“本质棒婊”、“本质苏粉”和“本质姨淆家”一样，是将修正主义发展到了反讽的程度。

不过虽然如此，我依旧认为马前卒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根据马前卒的说法，“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据说任何哲学，只要“宣称”自己要达成“人的自由发展”这个目标，又使用“改造物质社会”的办法，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剩下的就是“下一个层面的结构”问题了，无非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布朗基、蒲鲁东也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发展”，也试图用少数人密谋建立革命政府或是小生产者建立合作社的方法“改造物质社会”来实现这一目标，难道他们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相同？到了20世纪，罗斯巴德、安兰德之流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宣称自己也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准备通过将物质社会改造成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难道他们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更有甚者，刘仲敬之流还宣称要通过“一切权力归土豪”、投降“具有武德的蛮族”、接受盎撒神族殖民一万年等各种物质的办法来建立“华夏自由同盟”咧，难道阿姨学也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嘛？从他们自己的反动阶级立场出发，这些学说哪一个不是比马大将您老的修正主义更“解释得通”呢？要不然，也不至于有这么多信徒。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原来马前卒的修正主义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学说是一丘之貉。

值得一提的是，马前卒从空想社会主义出发，至唯物主义而止，除丢掉辩证法之

外，主要的是去掉了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基础：政治经济学。从上下文来看，去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也十分明显，那就是马前卒力图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为资本主义的永远统治效劳。

四、世界在变，唯心主义者不变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前卒在给“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下了一个极端荒谬的定义之后，又表示说："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东西，都是下一个层面的结构，都要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批判，看看是否有利于这个基本目标，是否在科学规律上讲得通。如果讲不通，你就不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如果过去讲得通，现在讲不通，那就要抛弃，否则就成了另一种激起反感的“政治正确”。"可是如何加以检验呢？马前卒大将立刻表示："从这个角度出发，不管传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反正我自己能解释通很多我的修正主义。"好一个“不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看”，“我自己能解释通”啊。到了“手电筒照自己”的时候，马前卒大将就和上述的布朗基、蒲鲁东、罗斯巴德、安兰德、刘阿姨等各种大湿一样，来了一个“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能解释得通”就好了。请问，你自己是哪什么东西解释的呢？是实践，还是唯物主义，抑或是科学规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姨淆“阴沟洞里的钥匙不能在史料学的路灯下去寻找”、“发明历史不需要史料而需要构建”。显然，马前卒大将的姨淆教义学得比较精深，因此到了他自己这里就不需要任何实践、不需要任何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科学规律，尤其不需要任何作为客观社会实在的阶级立场，只管自己“构建”一番就是了。这是什么主义呢？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
在这个主观唯心主义之下，构建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1、市场经济至少在可期望的将来，未必不能和社会主义共容=资本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共容；
2、社会主义或许也要允许某些企业有独立的利益，也要有自己的创业公司和投资公司=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存在资本、存在私有制、存在资本市场（顺便一提，存在着市场、存在着私有制的社会用“人类的自由”作为标准该怎样来检验呢？估计马大将得引入“剥削的自由”、“奴役自由”了）；
3、下一次革命未必就要走传统上的暴力革命道路，也未必需要列宁式的政党=资本主义可以自然长入社会主义；
4、否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5、因为“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发福利就是“政治正确”=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永远保留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6、工会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利用无组织、无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劳动预备军来攻击有组织、有阶级觉悟

的工人；
7、工会罢工虽然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但只能算是封建主义的反击=把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会）与小资产阶级的封建行会混为一谈，对于生产关系完全无知；
8、现在信息流通快了，封建主义的反抗只能激发全社会的抵制，不能作为主流方式=否认行业同盟罢工、跨国总罢工、政治罢工的存在。
马前卒大将的这些“构建”难道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吗？倒不如说，到处都散发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资产阶级反共派别的臭味：最落后的部分接近于美国的劳动骑士团，最先进的部分也不超过支联站的全向东。可见，不是“世界变了”，而是修正主义者“不变”。诸如马大将之流的存在，除了让我再度重复列宁那句“先进的O洲，落后的X洲”之叹外，只能让人感到资产阶级的垂死与没落：他们竟然在反共方面也没有更多的理论可发明的了。

五、满口谬论的“导师”+愚昧盲从的“群众”=泛左教团的未来

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在《幼稚病》一文中描绘了第二国际崩溃之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混乱状况。当时，由于无产阶级群众对其叛变了的修正主义领袖的空前失望，导致许多满口谬论新“领袖”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今，在空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之下，对于无法拯救危机的老领袖感到空前失望的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纷纷被在危机下谋求自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们打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什么人物呢？正如我在第二节所分析的那样，实际上是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这些领袖将带领各国的资产阶级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最后在世界大战中彻底毁灭自己。
看来，马前卒大将也力图成为这种新领袖之一，或至少是领袖身边的国师（和刘阿姨的游士建国路线真是完美匹配），而且已经开始预备将自己的泛左教团转型为这样一个社会法西斯主义教团了。将来是否会向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方面转向，还不可知。不读书、不学习、不实践、拒绝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反共前辈的智慧），闭门造车，用主观唯心主义的“勇气”和“精力”来重新发明轮子，最终建立起一套粗陋的世界模型，这就是马前卒大将和其他网络大湿（不分泛左还是右狗）的共同特征。从“不需要史料而需要直觉”的刘仲敬到“反正我自己能解释通很多我的修正主义”的马前卒，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领袖人物”。这些“领袖”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进行任何的社会实践，不是在实践中运用唯物主义来批判自己的“理论模型”。相反，是“包装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不歪曲的前提下，去感动更多的人，发起普遍的社会思考和研究”，是“脱离社会基本矛盾”去“进行革命的思想动员”，一言以蔽之就是“传教”！
诸位且看：马前卒在自己的文章里公开否认“脱离社会基本矛盾，去谈革命思想或者说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是“唯心主义”，理由是“思想的传播看做一种可以研究的物质运动”。可是市场营销的基础是存在基本的供需；脱离基本的供需，或者说脱离了“使用价值”，是不可能通过市场营销来实现价值的，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可是，马前卒却认为“革命思想”可以“脱离社会基本矛盾”来进行传播，“甚至可能和社会矛盾本身发挥的作用相当”。那么，“革命思想”本身的

唯物性从何而来呢？一个唯心主义思想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来加以研究，此时研究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是，这不能改变其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事实，更不能改变这一唯心主义思潮仍然具有社会存在作为某种社会基础的事实。马前卒现在公然否认这两个事实，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原形毕露嘛？

六、神棍的理论自信

从我在贵乎的第一个答案开始，我就强调说，马前卒一派的实质是“宗教的同心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马前卒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公开地否定阶级斗争，公开地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完全暴露了大众面前。他自比于崔顺实一流的邪教主，得意洋洋地在大众面前暴露了其为资产阶级充当理论家的真面目。对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如此而已。

马前卒之流的崛起，除了再一次凸显左圈的堕落之外，本身也说明了资本主义本身的空前危机。在这一空前危机的泰山压顶之下，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大有成为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之势；而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自动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了。从这个角度看，马前卒等人越是具有理论自信，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越深刻，因此其距离垮台也就越是接近了。

知道一些左圈历史的人都晓得，国家主义大祭司张宏良的理论自信到达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其垮台之日。马前卒会逃脱这个铁的历史规律吗？大家不妨在工作之余抬头看一看。

（驳）为什么我认为马前卒的一套不是马克思主义？

11/5/2016 尘沙

最近，马前卒发了一篇题为《马克思的“政治正确”，左翼社团的发展方向》的文章，公开表明立场说自己是修正主义，说什么历史上的革命家“同样是修正主义”。他号称已经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只是“历史上某个时代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案”。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前卒自以为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核心，是“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自由”和“唯物主义”。我们先看第一点，所谓以“人类自由”为目标。从《乌托邦》的作者古代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到近代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哪个不认为自己的目标是“人类自由”？甚至连一些反动派也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再想想马前卒所说的另一点，所谓“唯物主义”，所谓“科学方法”。现在有谁会说自己的一套“不科学”吗？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有好多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们自称的目标看起来都差不多，都说自己要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也几乎都说自己要按照科学方法办事。圣西门就说过，“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惟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存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真如马前卒所说，是什么“用改造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那么圣西门就也可以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接着我们要想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之所以有一种学说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必定是因为，马克思和他的同志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表述自己的新观点的。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段话是说，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直接动力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阶级对建立新社会负有使命，这种使命不是在道义上的，而是他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结论。人们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一个人，无论怎么吹嘘说要实现“人类自由”，标榜自己采用的是“科学方法”，只要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评论过去的社会主义时说，“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号称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根本区别。有些人把新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上层社会或自己搞的理想实验，比如傅里叶和欧文；也有人把它寄托在盗匪的行动上，

比如魏特林。只有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才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

我们再看看，马前卒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看看他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他说，“工会罢工虽然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但只能算是封建主义的反击”，又说，“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问题……不是说必然由这个群体引导革命，并创造共产主义。”这样，就是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总之，马前卒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说过；而马克思提出的独特观点，几乎全部被他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说得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驳）反对劳工权利的人也敢妄称马克思主义者？

11/7/2016 黑夜里的牛

早晨起来，友人发来一个链接。点开一看，原来又是马前卒在知乎上大放厥词。这满篇的反动错误言论，实在不免让马克思主义者们产生生理反应（非常严肃地说）。作为一个老朋友，有义务进行一点唯物主义的自由批判。文章里面错误很多，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讲完，我们就分多篇文章慢慢来说。今天先谈一谈马前卒关于工会、劳动法等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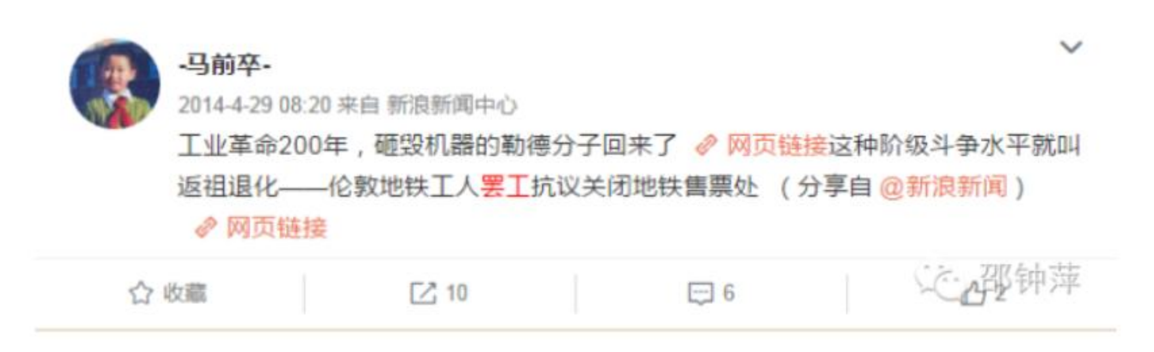
马前卒在文章里坦陈：

比如说我对工会评价不高，说工会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其他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罢工虽然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但只能算是封建主义的反击，过去各个地区之间交流不方便，作为局部的反抗方式还有效。现在信息流通快了，封建主义的反抗只能激发全社会的抵制，不能作为主流方式。同理，我对劳动法的大多数条款评价不高，说这是在实际上损害所有劳动阶级的利益，虽然也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

这段话说得比较模糊，对于不清楚马前卒具体观点的人来说，可能还会产生“好高大上啊”的感觉。基于唯物主义的理由，为了实事求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让各位“马督工”粉丝、反对者以及路人对马前卒本人的观点有更全面的了解。

首先谈谈工会和罢工问题。

反对工会和罢工，可以说是马前卒的一大特色。在微博上，他像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把罢工的工人叫做“卢德分子”。



工人们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呢，我们看看新闻的原文：

英国铁路、海运及运输工会(RMT)表示，这次罢工将持续 48 小时，一直到 30 日晚上 9 点。如果此次罢工仍不能使相关争议得到解决，工会成员将于 5 月 5 日起举行更大规模的 72 小时罢工。

这场劳资纠纷的起因是伦敦地铁公司决定推行“自动售票计划”，关闭所有 260 个地铁售票处，工会认为此举将使 960 名地铁工作人员失业。

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表示，这是一次无理和错误的罢工，将严重影响伦敦市民的生活。但英国铁路、海运及运输工会表示，卡梅伦应该要求伦敦市长约翰逊信守自己在竞选时作出的不关闭地铁售票窗口的承诺。

针对相关争议，伦敦地铁工人曾于今年 2 月举行罢工，此后劳资双方进行多次谈判，但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伦敦市长要关闭售票处，让工人们失业，工人们要求市长兑现承诺，但沟通无果，最后只能罢工。谁都知道，自动化机器是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而无产阶级如果要有力地回击，除了联合起来罢工，停止生产，没有别的手段。如果地铁工人继续服务，怎么对资本家施压。就地铁这种公共服务行业而言，停止运营不仅给资产阶级造成经济压力，而且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当然，罢工工人可以选择继续营业，但是允许乘客免费上车，由此让资本家或者政府蒙受经济损失。但是，这样做就极大地减少了自己对雇主的压力，家里有金库的资本家当然拖得起，没什么积蓄的工人拖得起吗？马前卒否定工人联合起来停止生产这种斗争手段，实际上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展开经济斗争。

马前卒从不屑于隐瞒自己反对工会和罢工的态度。比如说，去年印度大罢工时，马前卒就在某灌水群里，明目张胆地宣布自己支持莫迪，认为现代的共产党都是些封建行会，远不如自由资本主义进步：





传说 马前卒:

那群共产党其实代表行会势力



传说 马前卒:

反动的很



传说 马前卒:

类似于文革初期的保皇派



传说 马前卒:

保住已有的特权工资



传说 马前卒:

支持莫迪



马前卒之所以痛恨工会，是因为工会垄断了劳动。工会为了保持自己对劳动的垄断，就必须打击“罢工破坏者”。于是，马前卒认为工会就是行会，工会就是封建势力。

同样，马前卒同样会认为，西方高工资的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引进移民，也是封建主义。马前卒肯定认同资本家把工作从西方迁到东方，让西方工人阶级大量失业从而进一步压低工资的做法，因为这符合自由贸易啊，进步啊。

我们经常看到媒体说什么，此次大选让“白人蓝领工人阶级”浮出水面了。的确如此，特朗普这么扯还能有人支持他，除了 3K 党那些傻逼之外，主要就是他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工作外流等说法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当民主党政府还在那里玩弄失业率统计方法，构造“充分就业”的假象时，特朗普明确表示这是扯淡，当前真实失业率也许接近 20%了。当民主党政府还在忙着签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时，特朗普就说，正是这些贸易协定，让美国资本家能够把工厂迁到

墨西哥，然后把商品卖回美国，受伤的是美国工人。

如果说工人阶级在特朗普选上总统这件事上出了点力，那正好是说明了，工人是正常人。正常人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也就是工资。要谈工资，首先你得有一个工作。因此，工作问题是最首要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工人的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不起来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如何与资本家对抗呢？如何有力量不仅赢得单个的经济斗争，而且从立法层面巩固这些斗争成果呢？但是，如果单个工厂的工人都联合不起来，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呢？如果工人连罢工都不搞，又如何形成工厂内部的组织呢？

对此，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相信读者们都能看出来，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相比，多活了一百多年，用过电脑，混过论坛的马前卒丝毫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智慧。在新自由主义猖獗，劳工权利四处受到打压的当下，马前卒非但不鼓励工人展开经济斗争，反而否定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合法性，甚至认为这些斗争比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还要反动。尽管马前卒虚伪地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这番言论在内容和效果上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马前卒的观点，和法国大革命后刚一掌权就急急忙忙禁止工人罢工的资产阶级非常相似。法国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忽悠劳动群众起来反抗封建主，但是他们一上台，就颁布《勒·霞不列法》禁止工人罢工和结成工会，理由是工会就是行会垄断，禁止工会是保护贸易自由。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欧美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艰苦不懈的斗争埋葬了《勒·霞不列法》这样的反动法律，而目前又在进行着保卫这些法律的英勇的斗争。前卒竟然把两百年前资产阶级的可耻做法看做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实在是可笑之极。

如果把马前卒多年以前的言论和现在的言论做一番对比，可以发现，这个网络上的知名人士一直在远离马克思主义：
工人如果建立工会，用打断生产停滞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那么他们可以分享到利润；如果他们建立政权，将资本公有化，他们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当然这两种方式都与当今主流资本主义水火不容。
——马前卒《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之前的马前卒把工人的经济斗争看做是与革命斗争并列的一种斗争方式。而现在，他已经取消掉了这种斗争方式。那就意味着，只留下一种斗争方式，即革命斗争了。问题是，脱离经济斗争的革命斗争如何可能呢？当然，这自然会指向马前卒的另一大错误，我们以后会专门进行批判。

再谈一谈《劳动法》的问题。

马前卒在文章里说他“对劳动法的大多数条款评价不高”，却没有明说具体是指哪些条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权利无非罢工权，结社权，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等等。中国劳动法没有规定罢工权和结社权，所以主要的东西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了。难道说，马前卒对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不认同？

马前卒先批判劳动法是左倾盲动：



-马前卒-

2013-10-8 21:01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劳动法》的支持者最像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劳动法的的确令资本家受损，却没有为全体工人造福；反而剥夺多数工人，给少数资本密集行业工人加待遇。被剥夺的大多数人被无视了【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以强硬手段追求表面平等，实则破坏平等，阻碍进步。历史上一般称左倾盲动



收藏 | 16 | 15 | 2

劳动法有没有带来社会进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由读者自己来评判。如果你认同马前卒的观点，请不要再抱怨中国没有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如果你觉得八小时工作制多多少少给你带来了好处，请回去研究研究马前卒错在哪里。至于最低工资制度到底有利还是有弊，笔者作为一个老朋友曾经与马前卒在某 QQ 群里争论过。他觉得一定是弊大于利，所以应该反对最低工资制度。但是，推崇西方经济的马前卒似乎读书不仔细，人家教科书里面都专门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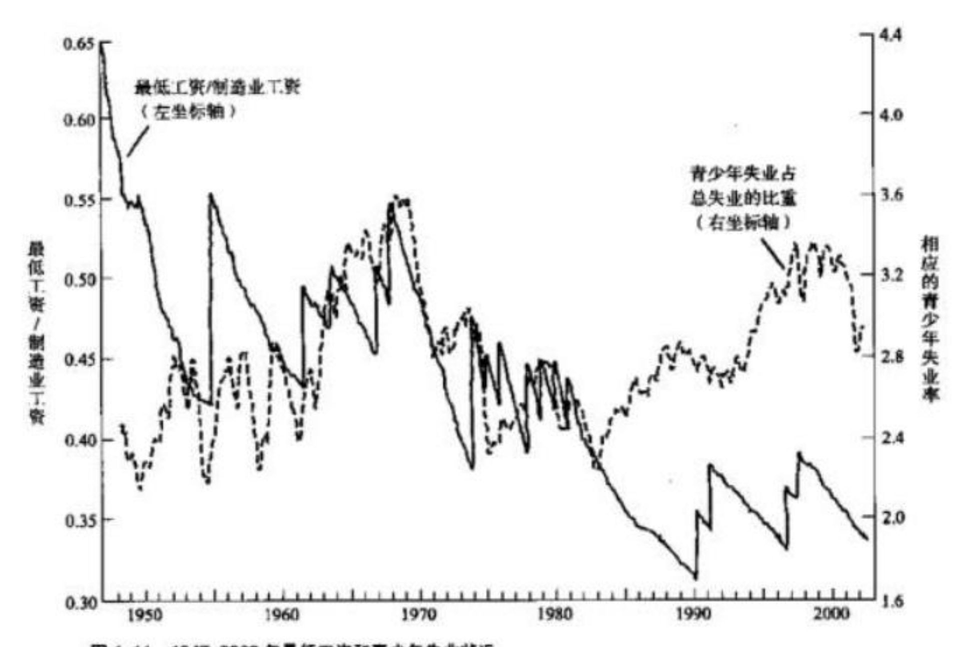


图 4–11 1947–2002 年最低工资和青少年失业状况

实线表明最低工资相对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的水平。注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最低工资相对于[illegible]工资是如何下降的。此外，虚线描述了青少年失业占总失业的比重，你发现这两条线之间的联系了吗[illegible]有关最低工资的争论告诉了我们什么？

运用供求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失业可能增加，而低技能劳工的就业可能减少。但具体程度有多大？低收入劳工的工资收入会受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可参照实证案例。

许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升 10%，只会使青少年就业量下降 1%~3%。而对于成年人的就业影响更小。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其就业效应接近于零，还有一些研究甚至认为就业会有所增加。因此，进一步研究著名经济学家所引用的数据可以看出，一些经济学家将较小影响视为“不重要”，而另一些则强调至少丧失了一些工作机会。图 4–12 的例子表明就业减少量（*M* 和 *E* 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大，但失业增加（如 *U* 线段所示）很显著。

图 4–11 呈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低工资水平和青少年失业状况的历史。随着劳工运动影响力的日益降低，最低工资水平与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比率从 1947 年的 65%降低到了 2003 年的 1/3 左右。在这段时期青少年失业率有缓慢上升的趋势。你可以去考查这个变化，看看你能否感受到最低工资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失业水平。这应该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最低工资对收入的影响。事实上每一项研究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对低工资劳工的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我们所引用的研究成果认为，价格弹性介于 0. 1–0. 3 之间。这导致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能够增加低收入劳工群体的收入。*按照前面所讲的弹性，最低工资增加 10%时，相关群体的收入会提高 7%~9%。图 4–12 表明，低收入工人的收入在总就业减少的情况下是如何上升的？这可以通过比较均衡点 *E* 和 *M* 下各自的收入矩形得到（参见本章末的问题 8e）。

然而，对收入的影响是导致人们在最低工资问题上观

可以看到，失业率低的时候最低工资也高，而失业率高的时候最低工资相对比较低。萨缪尔森这种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许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升 10%，只会使青少年就业量下降 1%-3%。而对于成年人的就业影响更小。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其就业效应接近于零，还有一些研究甚至认为就业会有所增加。”马前卒能否实证地证明下，最低工资对工人阶级有害呢？不知道读者们看到过没有，反正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提供过任何实证的证据。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说得这么肯定，不知道他的自信从哪里来的。

马前卒的一大本领是懂得伪装或者自我欺骗。分明是反对劳工权利的右派，却还要装作是一个鄙视工联主义的共产党人。他曾经在微博上批判劳动法是企图改良

资本主义：



-马前卒-

2013-10-6 21:50 来自 微博 weibo.com

共产主义者应该反《劳动法》（劳动安全部分除外）。从历史角度说，它反生产力；从阶级立场说，它鼓动部分工人对抗所有劳动者；从宣传角度说，它用假改良偷换社会主义概念，打击革命。真社会主义国家设劳动法，等于鼓励资本密集行业的工人敲诈全体工人。@少年中国评论 说的对【错在企图改良资本主义】



收藏 | 54 | 17 | 3



-马前卒-

2013-10-7 20:07 来自 微博 weibo.com

注意，劳动法的罪状不是改良，而是【企图改良】。结果是改劣，资本家的损失未转化为工人福利。还需要歧视、剥夺大多数工人才能为少数工人暂时加薪。

马前卒说，“劳动法错在企图改良资本主义”。OMG，难道我们这些尚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受苦的劳动者们，不应该试图对资本主义做一些改良吗？不应该试图限制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伤害吗？难道我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实现社会主义，要么是对剥削压迫忍气吞声？难道几百年的工人运动没有争取到任何对劳动者有利的改良？难道所有劳动立法都是既坑工人又坑资本家？

这些高明的先生们，似乎最最革命了。他们看不起这些改良斗争，在他们看来，这些斗争反正都没什么用嘛。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不同，承认改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全力支持改良斗争，同时坚决反对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马克思主义者不倦地进行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争取改良和利用改良，同时，无论在宣传、鼓动，还是在群众经济活动等等方面，任何超出改良主义范围的做法他们都不横加指责，而是予以支持，关切地加以发展。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取消派，却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存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纪律，宣扬改良主义，宣扬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只能瓦解工人运动。

——列宁 《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

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到罢工权和结社权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解放了呢？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认为，工人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组织起来，而要组织起来，就必须通过日常的经济斗争。脱离日常的斗争，任何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是空谈。当然，这绝不是说，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可以自动通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都在向我们说明，工人只有在先锋队的带领下，才能实现这一斗争，而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在日常斗争中站在工人一边带领他们前进，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适用了，还是马前卒先生压根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读者朋友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驳）工人阶级没有先进性？谬论！

11/19/2016 黑夜里的牛

马前卒在他那篇解释自己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工人阶级尤其是对产业工人先进性的彻底的否定。他这样说：
“尤其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问题，其实从列宁时代就开始放弃从无产阶级中寻找所谓的先进性和自发性了，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赞颂无产阶级尤其是所谓产业工人的先进性，只是因为19世纪早期最新的工业技术、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最具备反抗意识的人群集中于产业工人，而不是说必然由这个群体引导革命，并创造共产主义。明明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没有说一定要有19世纪概念上的无产阶级么。”

短短一段话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为了正本清源，不得不一句一句批判。读者们千万不要嫌我们啰嗦。

一、列宁放弃工人阶级是最先进阶级的观点了吗？
马前卒说“从列宁时代就开始放弃从无产阶级中寻找所谓的先进性和自发性了”。不知道他语出何处。如果是说列宁时代的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那的确已经放弃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列宁时代最伟大的革命者即列宁本人，却丝毫没有放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关于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尤其是工厂工人的先进性，列宁是这么说的：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如果把正在灭绝的农奴制经济残余撇开不谈，实质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在前一场合，这种剥削还被各种中世纪形式、各种政治上、法律上和习俗上的附加成分、各种狡猾手段所蒙蔽，妨碍劳动者和他们的思想家看出压在劳动者身上的制度的实质，妨碍他们看出哪里是出路和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制度。反之，在后一场合，剥削已经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

没有任何扰乱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们已经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必须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种目的在于满足最迫切的经济需要以改善本身物质状况的斗争，必然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必然会成为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的战争，即反对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到处都在压榨和压迫劳动者的那个阶级的战争。所以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为了使他们在有组织的坚忍不拔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代表作用，根本不必用什么“远景”来引诱他们，只要求简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由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工厂工人是最先进的战士，所以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应该紧紧围绕着工厂工人展开：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列宁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俄国革命的过程证明了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工人阶级一直是革命的先锋和主力。我们以 1905 年革命为例简要说明一下。

1904 年 12 月，位于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圣彼得堡各界认同罢工的民众不断增加，罢工人数攀升至八万人，拉开了 1905 年革命的序幕。1905 年爆发的俄国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俄国当时革命高潮的一个标志。这次大罢工从 10 月 6 日莫斯科——喀山铁路附属工厂的工人罢工开始，第二天，就席卷了莫斯科枢纽站的大多数铁路线，5 天后，全俄国十四条最大的铁路线全部瘫痪了。铁路工人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还向政府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召开以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制宪会议的要求。这正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普遍政治要求，因此也很快地获得全俄人民的支持。不久，各地工厂工人纷纷表示响应铁路工人的倡议，使这次罢工斗争很快地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中展开了。从莫斯科、彼得堡，一直到俄国最遥远的边疆；从产业工人、公用事业工人、邮电工人，一直到商店店员、家庭仆役等等，据估计，当时参加这次大罢工的工人人数不下 175 万人。由于大罢工的波及，国家政治生活也差不多已陷于瘫痪的状态，大多数国家机关都关了门，很多公务人员和民主知识分子也被卷进了运动，全国各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这样总结 1905 年革命中工人阶级的表现：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同专制制度进行了最坚决最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

1 月 9 日开始了革命，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无产阶级发动了 1905 年 12 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惨遭枪杀、鞭笞拷打的农民，从而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1905 年罢工工人约 300 万（如加上铁路员工、邮政职工等等大概有 400 万人），1906 年–100 万，1907 年–75 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的 1905 年罢工浪潮还远远没有消耗尽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力。例如在莫斯科工厂区，567000 工厂工人罢工 54 万人次，而在彼得堡工厂区，30 万工厂工人罢工达 100 万人次。可见，莫斯科区的工人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像彼得堡工人那样的顽强斗争精神。在里夫兰省（里加市）5 万工人罢工达 25 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 1905 年平均罢工 5 次以上。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 300 万，而且人数逐年都在增加，如果运动有 1905 年里加那样强大，那他们就能派出 1500 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同心协力。工人经常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从而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奋不顾身地同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障碍作斗争，首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ー地主。”

俄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国有一个列宁带领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深入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的叛卖行为，坚持在“无产阶级中寻找所谓的先进性和自发性”，坚决地走向群众，首先是走向工厂工人，然后是走向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终才赢得了胜利。马前卒谈列宁时代却不谈列宁的革命经验，不知道是因为无知，还是故意回避呢？恐怕更可能是因为后者。

二、马克思为什么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阶级？

马前卒说，“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赞颂无产阶级尤其是所谓产业工人的先进性，只是因为 19 世纪早期最新的工业技术、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最具备反抗意识的人群集中于产业工人，而不是说必然由这个群体引导革命，并创造共产主义。”

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朋友，一定会感到马前卒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差别很大。

《宣言》把社会中的人分为了各个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在这些阶级中，又分出了两个阵营。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就意味着推翻当前的资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革命阶级只能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中去找。《宣言》认为，在这一切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

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无产阶级这种革命性来自于，他们要获得解放，乃至只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生活改善，都必须要求消灭现存的财产关系，而不只是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19 世纪初的工人阶级是一年半载（少数积蓄多的可能长一点）不出卖劳动力就要饿死的雇佣奴隶。马克思看到了他们的革命潜力。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宁革命的时代，工人阶级仍然是不出卖劳动力就要饿死的雇佣奴隶。列宁也坚定地认为他们是最先进的阶级。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工人阶级依然是不出卖劳动力就要饿死（不饿死也是生活在无比悲惨的状况中，比如没有房子住）的雇佣奴隶。马前卒却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先进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必然引导革命，并创造共产主义！！！”
如果不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又是哪个阶级的斗争在创造共产主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斗争能创造共产主义？难道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能创造共产主义？难道小农的斗争能创造共产主义？莫非华尔街高管的斗争能创造共产主义？我们真想听马前卒先生好好说说。

列宁曾经这样驳斥这种谬论：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

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列宁《伟大的创举》）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经常会表现出来，比如工人阶级的“占厂”运动。老板欠薪跑路了，或者说老板准备搬迁，工人阶级通过与资方乃至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斗争，把工厂占下来自己运营。占厂的工人们没有像中国农村集体分家的农民那样，一人搬几块零件回家，而是团结在一起来进行生产。这说明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相比，更倾向建立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如果说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全社会占领工厂的话，那么占厂完全算得上是工人阶级在一个工厂之中搞“革命”。占厂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萌芽。

所有这一切， 对于马前卒先生来说，都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来宣布工人阶级不革命，不先进，不行的。谁行呢？是那些已经被马前卒感动了的或者将要被他感动的人么。

三、“19 世纪概念上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前卒说，“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没有说一定要有 19 世纪概念上的无产阶级么”。这话说得是非常含混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马前卒没说，我们不妨先听列宁的：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我们认同列宁的说法，那么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自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核心的位置了。

至于 19 世纪概念上的无产阶级，马前卒没有明说，我们也很难猜到到底是指啥。马前卒和他的“老朋友”都是 20 世纪生人，也没有太多发言权，这事还得听恩格斯的：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恩格斯加的注）

好了，我们知道什么是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了。到了 20 世纪，列宁有没有改变这一定义呢？没有，我们在前面的引文已经表明，列宁同样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劳动者。

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着的 21 世纪，大多数劳动者不也属于“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么？

马前卒经常写长文章，东拉西扯一大堆，不知道是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还是故意把读者绕晕，让人忘记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东西。就像是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本来很明白很清晰，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劳动者现状的一种唯物主义的反映，到了马前卒那里，就用“19 世纪概念的无产阶级”等稀奇古怪自己的都没搞清楚的词语来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似乎生怕读者原原本本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前卒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唯物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丝毫没有科学精神，值得读者朋友们警惕。

（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马前卒的历史唯心论

11/20/2016 黑夜里的牛

前面我们批判了马前卒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无产阶级先进性等问题的错误观点，揭露了马前卒反工人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信看过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都再也不会被马前卒所迷惑。因此，就政治上的批判而言，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过，关于马前卒深层次的理论错误，我们在前两篇批判文章中，只是稍微触及到，还没有展开进行分析和批判。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揭露马前卒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一、马前卒是怎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
就像一切民科一样，马前卒知道自己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细节上纠缠只会暴露自己不懂马克思的真面目，因此直接诉诸“本质”。他自然明白，只要定义好本质，其他细节就可以从这个被他定义的本质来展开说明了。果然很聪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探索，马前卒是这样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呢？其实说来也简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源头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每个穷人都可能萌发的狂想，简单地说就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希望大家幸福。但是，幸福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不说幸福，说自由，让每个人去选择自己的幸福。”

在这段话里，马前卒只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于是马前卒继续说：

“下一个问题是人和人的绝对自由必然有冲突，必须考虑到相互妥协，让相对的自由最大化，让每个人的自由都去保卫其他人的自由。所以最终共产主义凝结成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

读者们可以看出来，马前卒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是将问题变成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谁都知道，目标和本质完全不是同一个事情。两种不同的思想追求同一个目标，其本质却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追求，但是他们的思想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

马前卒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就往这个“目标”里塞一点别的东西。他知道自己这篇文章的主要读者应该是左派，而左派自然是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不在于目标不同，而在于实现目标的道路不同。

所以，马前卒开始谈到物质关系的改变，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分界线：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落实方式。我们的目标要求的是人类幸福，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充分自由地生活，这本来是一个心理状态。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个物质状态，决定于物质世界，所以我们要幸福，要自由，就必须改变整个人类社会，改变生产、分配、使用物质财富的方式，进而达到人类的幸福。”

“其他那些思想流派，都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坚持唯物主义到底…马克思主义没他们那么温情，没有那么上层次，坚持要从物质层面，用科学方法来推进社会进步，经常要革命，还要让很多人不痛快，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最后，马前卒把目标（自由社会）和实现目标的方法（改造物质社会）加在一起，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虽然马前卒没有使用本质这一字眼，但应该就是那个意思吧）：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

“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保证人的自由发展”——听起来好高大上。这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吗？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学过马哲的朋友都知道，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本质以其自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的。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使得马克思主义从先前的理论体系中脱胎而出的东西。

马前卒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讲起，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流派做对比，企图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但是，他既没有讲清楚空想社会主义，也没有弄明白科学社会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产生自空想社会主义但又不是空想社会主义，那区分这二者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什么，使得他们认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

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产生初期的最标志性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其中就包括空想社会主义。

首先，与马前卒无知地宣称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是每个穷人都可能萌发的狂想，简单地说就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希望大家幸福”不同，熟悉全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马克思恩格斯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深刻地懂得，善良的愿望实现不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只有通过整个社会的深刻的变动才能改变这个充满社会

冲突充满了罪恶的社会：

“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共产党宣言》）

批判现存社会，展望公有制的新社会，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比如，欧文在其著作中以非常尖锐地批判私有制，呼唤公有制。和马前卒一样，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了，无论宗教还是鸡汤都是没用的，要“用改造物质社会的方式去保证人的自由发展”：

“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所以人们应该欢迎新纪元的来临…私有财产对人类害处极大，以致往往把富人变成两脚兽…私有财产是我们知道的人类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发生战争的原因，它引起无数次的屠杀…目前，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由于贫困在全世界引起各种无法计算的罪行和灾难。它在原则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如同它在时间上不合乎理性一样。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出现…在正确组织起来的和有科学根据的财产公有制度下，人人都受同样的教育和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就不再有买卖婚姻或不平等的婚姻，不会再有学坏了的儿童，而现有制度所产生的一切邪恶将全部绝迹。”（欧文《新道德世界书》）

空想社会主义懂得，私有制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要消灭人类的苦难，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就必须消灭私有制。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群众的代表，但是并不认为这些被压迫群众是建立新社会的能动的因素：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共产党宣言》）

既然无产阶级不行，那怎么办呢？只好诉诸于“感动”，即像马前卒所说的那样，“包装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不歪曲的前提下，去感动更多的人，发起普遍的社会思考和研究。”设计出新的社会主义，创制各种社会计划，并且推广这些计划——这就是通向新社会的道路。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当然，那些尚未被“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思想所感动的工人们，如果胆敢发动斗争，那简直是太大逆不道。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共产党宣言》）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不在于实现人类自由需要物质变革，那么他们的差别在哪？有的人会认为，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所有制的变革，而空想社会主义拒绝暴力，走和平演变的道路，而且《宣言》中也是这么说的：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共产党宣言》）

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还存在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是坚决地采用暴力革命手段的，比如布朗基主义。马克思

“布朗基…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胜利的革命…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也就是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革命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他们不是把各个社会阶级看做是革命中冲突的各方，而是把（“被‘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思想’感动了的”）少数人组成的集团当做是革命的主体。

因此，马克思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价适用于绝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许德萨米算半个例外，因为他直接诉诸无产阶级的斗争，不过他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共产党宣言》）

马前卒认同革命手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没那么温情，

没有那么上层次，坚持要从物质层面，用科学方法来推进社会进步，经常要革命，还要让很多人不痛快，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马前卒之所以认同革命，是因为他比圣西门这些人多看了一百多年历史，革命是通向新社会的道路这一点早已经被数次无产阶级革命所证明。虽然他对革命的理解比 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但却仍然没有沾上马克思主义的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爆发和将要爆发的革命，是阶级的革命，而不是小团体小圈子的革命，造成革命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感动人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由社会”，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促使阶级斗争激烈化，不断冲击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斗争走向高潮的时刻，无产阶级群众会在其阶级先锋队的带领下夺取政权，完成政治革命，并且在政治革命后，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更新全部上层建筑，完成社会革命。这种对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解，是马前卒所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把革命看成是现存秩序冲突的产物，而不是被某种思想所感动的人所造成的一次政治行动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马克思要把无产阶级而不是少数人看做是革命的主体呢？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认识到了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思想取决于产生这种思想的物质关系，而一种思想的突然流行则取决于当时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变化与冲突。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这里的无主体当然不是指即使在革命中，群众也不是主动地创造历史，而是说，阶级的群众之所以站出来干预历史创造历史，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社会模型”，也不是他们被“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的思想所感动，而是物质关系中的矛盾所造成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危机导致革命，不堪忍受的生活推动着群众参加革命。所以，列宁才说：

“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

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马恩列斯毛会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即阶级群众所参与的斗争。因为强调群众的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必然的结论。列宁曾经批判俄国民粹派分子只是把各阶级群众看做是带领和发展的对象：

“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到了这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思想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认为思想和国家等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所造成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将会结束阶级社会的历史，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在于这一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思想家的社会发展目标（自由社会），不在于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条件（公有制），不在于提出通向新社会的政治行动（暴力革命），而在于认识到历史发展是社会矛盾所推动的，认识到革命是社会矛盾的产物。认识到干革命的是阶级，而不是少数个人。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非阶级的个人或者团体的力量是无法与阶级的力量所抗衡的。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代表无产阶级阶级的利益，不与无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结合，就不可能干预历史。

三、马前卒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

我们纠正了马前卒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错误总结，现在该回过头来分析一下马前卒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与马前卒自我标榜的唯物主义相反，马前卒的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引用了马前卒若干年前写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

“工人如果建立工会，用打断生产停滞的威胁来阻止其他廉价劳动力的竞争，那么他们可以分享到利润；如果他们建立政权，将资本公有化，他们可以占有全部利润，当然这两种方式都与当今主流资本主义水火不容。”——马前卒《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我们在文章里质疑了，马前卒取消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后，脱离经济斗争的工人阶级如何举行政治革命。马前卒似乎已经不再认为革命是某个阶级所发动的，而是少数人组成的社会集团所发动的:

“由于教育扩张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之余开始考虑社会模型，开始对整个社会有一定认识，很有可能在下一次革命中，革命思想本身的动员阶段会更长，甚至可能和社会矛盾本身发挥的作用相当。”

马前卒不想把话说死，所以用了“很可能”，“甚至可能”等字眼。不过，结合他之前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等一系列的文章和灌水群里的言论来看，其实马前卒本人对此是非常肯定的。

记得七八年前，马前卒还跟我们讲工人阶级的重要性，讲自己准备花半年时间到工人中间做点调研什么的。到了三四年前，马前卒就开始大讲体力工人不行了，要被机器人代替了之类的胡话。到了现在，马前卒居然公然否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否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实际上已经不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了。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通过人的行动来实现的，上层建筑的更迭需要人的行动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之处就在于，人们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推动下，归根结底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才进行革命的。重要的地方不仅在于人们要革命，还在于人们为什么革命，在于革命的这一想法产生的物质原因。马前卒显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导致无产阶级举行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无产阶级显然就具有先进性了。马前卒看重那些思考社会模型的人，似乎这些人能代替已经不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模型又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某些先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前卒）想出来的。既然如此，伟大历史变革不正是靠思想造成的了吗？

思想创造历史，观念造成革命——这就是马前卒唯心主义思想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对 19 世纪的马前卒们的斗争中形成的。

有人会说，列宁也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啊。为什么不说列宁是唯心主义。

因为在列宁看来，革命的理论总是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产生，革命理论的产生是因为被压迫阶级需要这一理论来指导他们的行动。革命理论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思考社会模型，而是为了告诉无产阶级如何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分析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阐明国家和政党的本质，然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制定本阶级解放的战略和策略。

列宁曾以异常凝练的语言谈到这一点：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

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成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是告诉工人阶级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向工人阶级指明他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马前卒则是宣布工人阶级没有前途，最好的命运不过是被那些懂得"社会模型"，能用"唯物主义和自由社会"感动人的群体所拯救。难道二者之间的差别还不够大吗？

不少人都指出了，中国新时期的左翼是一团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有思想从"左派"中分化出去。民族主义，改良主义，"正道"等等，都逐步地远离实际上不断激进化不断回归马克思主义回归无产阶级立场的传统左圈。混合物正在解体，或者说已经解体了。现在自称"修正"的知乎大神马前卒及其粉丝，就是这一混合物解体之后，分离出来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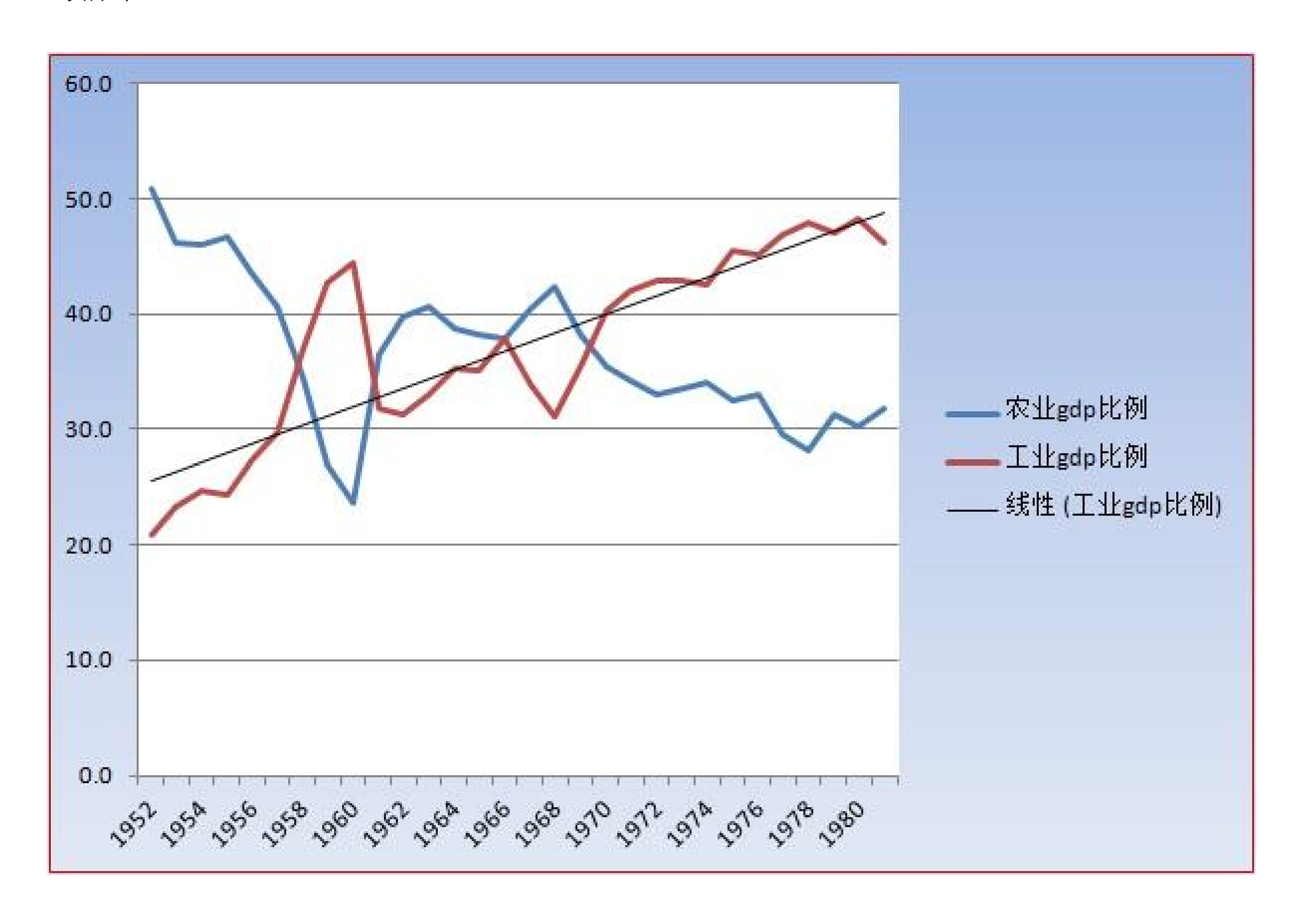
马前卒的堕落变质绝不是一种偶然。在无产阶级斗争受到压制而不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潜力的时代，（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解除了他们参与工人阶级现实斗争的压力。英雄史观，唯心史观又正好符合这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的精神需要。他们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站在革命左翼乃至改良左翼的现实斗争之外，以"先进""新潮"自居，相互感动，相信自己的言谈正在创造历史。

马前卒已经通过自己的各种言论向马克思主义，向左圈告别了。左圈也应该向他告别，应该让他摘掉马克思主义的面具。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自我麻痹。他们应该知道，批走了这个马前卒，又会冒出来另一个马前卒。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跟各种各样的马前卒们展开一次又一次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最终的胜利为止。

好了，我们的批判到此为止。希望被马前卒所迷惑的青年们，都能够坚决地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谬）迈步从头越：纪念 50 年前中国工业社会的开端

马前卒



1-7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Composi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Data in this table are calculated at current prices.

单位：% (%)

年份 Year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第一产业 Primary Industry	第二产业 Secondary Industry			第三产业 Tertiary Industry		
				工业 Industry	建筑业 Construction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Transport, Storage and Post	批发和零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1952	100.0	51.0	20.9	17.6	3.2	28.2	4.3	10.3
1953	100.0	46.3	23.4	19.8	3.5	30.4	4.2	12.4
1954	100.0	46.0	24.6	21.5	3.1	29.3	4.4	12.4
1955	100.0	46.6	24.4	21.0	3.4	29.0	4.3	11.5
1956	100.0	43.5	27.3	21.8	5.4	29.2	4.5	11.2
1957	100.0	40.6	29.6	25.3	4.3	29.8	4.6	10.9
1958	100.0	34.4	37.0	31.7	5.3	28.7	5.4	9.2
1959	100.0	26.9	42.7	37.4	5.3	30.4	6.5	9.0
1960	100.0	23.6	44.5	39.0	5.5	31.9	7.1	8.3
1961	100.0	36.5	31.9	29.7	2.2	31.7	5.7	7.9
1962	100.0	39.7	31.2	28.3	2.9	29.1	5.0	5.9
1963	100.0	40.6	33.0	29.6	3.4	26.4	4.4	5.2
1964	100.0	38.7	35.3	31.7	3.6	26.0	4.0	5.6
1965	100.0	38.3	35.1	31.8	3.2	26.7	4.5	6.1
1966	100.0	37.8	37.9	34.6	3.3	24.3	4.5	7.1
1967	100.0	40.5	33.9	30.6	3.3	25.7	4.1	7.8
1968	100.0	42.4	31.1	28.3	2.7	26.6	4.1	7.3
1969	100.0	38.2	35.4	32.2	3.2	26.4	4.4	7.7
1970	100.0	35.4	40.3	36.6	3.7	24.3	4.4	7.2
1971	100.0	34.2	42.0	38.0	4.0	23.8	4.5	6.7
1972	100.0	33.0	42.8	39.1	3.7	24.2	4.9	7.0
1973	100.0	33.5	42.9	39.2	3.7	23.6	4.8	7.0
1974	100.0	34.0	42.5	38.6	3.9	23.5	4.7	6.7
1975	100.0	32.5	45.5	41.3	4.2	22.0	4.9	5.3
1976	100.0	32.9	45.2	40.7	4.5	21.9	5.0	4.5
1977	100.0	29.5	46.9	42.6	4.2	23.6	5.1	6.1
1978	100.0	28.2	47.9	44.1	3.8	23.9	5.0	6.6
1979	100.0	31.3	47.1	43.6	3.5	21.6	4.8	4.9
1980	100.0	30.2	48.2	43.9	4.3	21.6	4.7	4.3

开头两张图表就是本文 90%的内容。忽视因为政治动员而产生的暂时波折，1966 年的夏天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异常重大的转折点——工业经济终于永久性地压倒了农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即便以千年为单位来描述历史，1966 年也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时刻。

中学政治书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个要建立发达工业社会的国家，显然需要一套适合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然而，先进制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先行一个多世纪的欧美列强尚且要打两次世界大战，在血流漂杵中确立新的“政治正确”，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当然不能指望凭空得到理想化的上层建筑。客观上，一个源于封建时代造反求生，致力于向农业社会动员资源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集团带领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大路——即便它并不适应自己召唤出来的工业时代。

想让新社会自己孕育一套新体制，解决分工和效率问题，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事情。所以，在年龄已经明显超出中国人平均寿命之后，当年的图书管理员急切地要对一个源于农业社会造反体制的运动做大手术，希望用个人力量去发动工业人口，击破既有体制的惯性：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然而，有些事是急不得的。适合工业社会的新制度只能从工业社会内部萌发，所以老人耐心地等待着工业社会一步步成长，看着新中国的少年们读小学、读中学……心里摆着着自己的生命倒计时日历。终于，在第一代新中国小学生从大学毕业那年，在中国工业经济压过农业经济的一刻，老人打出了鲁迅一代辛亥青年的旗帜。号召青年们重新思考政权的组织方式，重新考虑国家权力的逻辑。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966 年肯定还不是最合适的转型时间点，因为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远远压倒人力密集度，工业经济超越农业，不等于工业人口数量超过农业人口。总的来说，占据优越分配地位的少数工业人口并不欢迎变革，甚至不希望农民的子女和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本能地反对任何新的尝试，结果就是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运动阻力越大。但老人觉得自己未必还有另一个 17 年去等待，所以他在 73 岁作出了人生最艰难的决定——向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惊天功业宣战：
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五十寒暑过去，弹指一挥间，工业人口终于成了中国社会的主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上层建筑的落后是阻碍下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当年借机反对文化变革的极少数人依旧在阻挡历史的车轮。新一代年轻人看到了阶层日趋固化，看到了少年时的梦逐渐渺茫，回首一望故乡也消逝在工业化的烟尘之中。如何设计新时代终于成了最严肃、最急迫的现实问题。青年人的焦虑正应了老人的低声预言：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继承遗产并不是件简单事情，以伟大导师力拔群山之能，第二件事做了十年也不过是推动一点点。然而艰难不是停下来的理由，因为在工业生产力冲击之下，整个国家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停下来的选择。语文课本告诉我们：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那个憨憨的老头也写过类似的文字：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注："憨老头"的形象请看下面的视频：（张广天）

（驳）2016 年 5 月 16 日

傅友德

值此《5・16 通知》发表 50 周年之际，又见到了马尔乌斯的大毒草，令人不驳不快。
迈步从头越：纪念 50 年前中国工业社会的开端 - 马前卒的文章 - 知乎专栏

开头两张图表就是本文 90%的内容。忽视因为政治动员而产生的暂时波折，1966 年的夏天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异常重大的转折点——工业经济终于永久性地压倒了农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即便以千年为单位来描述历史，1966 年也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时刻。
光看百分比，不一定足以说明问题。所谓“工业经济终于永久性地压倒了农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云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作为论据是并不充分的。

首先，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并未完成工业化，至少当时的官方观点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中共十大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一九八〇年 以前， 建成 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 在 一九八〇年 以前 实现 上述的 第一步设想 打下 更牢固的 基础 。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 今后的 十年 ，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 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
————《四届人大工作报告 （1975 年 1 月）》
。。。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不高的，基本上还是 畜力耕种 和 手工劳动 。…农业生产的这种状况，同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矛盾。…
。。。一九七三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一。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建立起来了，过去自己不会设计和制造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现在能独立地设计和制造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已 初步 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打下 了牢固的 基础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为 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 而努力。
。。。。。。在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下，大庆的道路日益深入人心，“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大庆式的企业不断涌现。这必将加快

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 促进 我国社会主义 工业化 的实现。
————《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 年 6 月第 1 版

截止 1976 年，第一共和国为 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第一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 “巨大成就”；第一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之中，正处于 “农业国”向“工业国”逐步靠近之时，已接近蛹将化蝶的飞跃时期；但终究只是“接近”，而没有完成，否则就用不着讲“为 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 而努力”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按照毛泽东时代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工业化不仅包括建立城市工业体系，还包括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不完成，就不能说完成了工业化。

第五讲 社会主义的农业和工业
一、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首先，必须以农业为出发点，把农业放在首位，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尽快地改变农业生产的条件，使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样，才能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可靠的基础。
其次，必须围绕农业的需要发展工业，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要求 社会主义 工业化 必须主要以 农业现代化 为目标，根据支援农业的需要，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结构；要求重工业部门…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于各地农业特点和农业迫切需要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水利电力设备等生产资料；要求在工业内部，正确处理好主机和配件、制造和修理等关系，保证农机配件的供应，做好农机修理工作，以充分发挥农业机械设备的作用。同时，也要求轻工业部门积极为农村提供价廉物美的日用工业品，尽量地节约农业原料，开辟使用工业原料的途径，以减轻农业的负担。…工业支援农业的过程，就是工业本身不断发展的过程。…
…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只有农业搞好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那种认为“支农吃亏”、“与已无关”的思想是错误的，必须彻底纠正。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处理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是一个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就是把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把完成工业现代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同盟军作用结合起来，从而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我们必须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的重要意义。必须彻底

批判刘少奇一类所推行的“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二、 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充分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促进社会主义 工业化 的发展，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巩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就要求实现 农业 机械化 。。。。。。。

。。。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还是不高的，基本上还是畜力耕种和手工劳动。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都比较低，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不高，经济作物的比重较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生产的这种状况，同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巩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加速农业技术改造， 逐步实现 农业机械化 的伟大历史任务。

实现农业机械化，就是要求把社会主义农业建立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也就是说，农、林，牧、副、渔等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工作，统统使用机器，并大量地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实现农业机械化，必将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是我国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之后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三、 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呢？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是什么呢？毛主席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 解决 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 农业国 变成了先进的 工业国 ，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部门结构齐全，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这个工业体系必须是独立的，即主要是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力更生地生产各种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他工业产品，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需要，满足人民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

这个工业体系必须是比较完整的，即工业部门结构比较齐全，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特别是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都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

这个工业体系必须是现代化的，即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武装起来，在生产工艺上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呢？实现工业化有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一条是依赖或者掠夺外国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走的是后一条道路。。。。。。。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制定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结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实现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主要内容就是：
第一，在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加快重工业的步伐，实行农、轻、重并举的方针。
毛主席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必须抓好重工业的建设，否则。。。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实现。。。但是，重工业的较快发展，要受到国民经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受农业，其次是受轻工业的制约。所以，重工业的较快发展，不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抛开轻工业这个相应的条件，而孤立地去发展。。。。
第二，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多搞中小型企业的方针。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利用地方的资源和潜力，发展地方工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毛主席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好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地方工业体系的建立不能脱离全国工业体系的要求，而地方工业体系的建立又能促进全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把建立全国工业体系同建立地方工业体系正确地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积极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但是，发展大型企业是要受一些条件限制的。而举办中小型企业，不仅具有投资少、建设易、收效快等优点，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闲置设备和资源，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办工业。因此，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多搞中小型企业，是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力量，多快好省地进行工业建设的重要方针。
第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并举的方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生产建设上要尽量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即洋法生产。但是，我国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土法生产是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从具体情况出发，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伟大创造。因此，土洋并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实行土洋并举的方针，并不排除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而是要把学习外国的东西同自己的创造结合起来，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从土到洋，逐步发展，不断提高，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既符合技术发展的规律，又体现了党的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进行工业建设的正确方针。

————《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 年 6 月第 1 版）

引用了这么些材料，应该是足以说明问题了。

当然，马前卒一派基于工业党的立场，一贯是轻视、鄙视"三农"的。然而不管你是否愿意，不管你主观上多么希望"压倒农业"，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重视农业，工业迟早是会受到"惩罚"的。

与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的第一共和国相反，第二共和国在总设计师上台后全面推行了分田单干（当然，大包干的推广，本身也证明了当时的天朝并未完成农业机械化，也即并未完成工业化，否则就是要资本主义化也该采取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的模式），解散了人民公社，使初具社会化生产规模、处于机械化进程之中的农业经济陷于瓦解，倒退至“畜力耕种和手工劳动”为主的或“附有一定机器耕作”的小生产，并沉重了打击了天朝的大型农机工业（譬如，1980 年一拖的“东方红”大型履带拖拉机产量达到 2。45 万台，次年就跌至 1。2 万台），迫使各大型农机企业不得不转弯调头，将个体运输户等私营经济确定为主要服务对象，着重生产中小型、特别是小型拖拉机产品。
1992 年以后，大型农机产量一度猛然上升，大型农机企业似乎迎来了转机。然而细究其因，却似乎与农村、农业并无太多关联，更主要的，可能由于当时南方开发热极大地刺激了大型工程机械的市场需求，由此带动了大型推土机、拖拉机的产销量急速上升。这个昙花一现的局面过后，大型农机企业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又陷入长期困境。
大型农机工业的凋敝，又必然导致钢材、轴承、橡胶、电子、电气、化工、煤电能源、冶炼铸造、交通运输等关联配套行业多米诺骨牌式的全线衰退。因此可以说，除去其它因素以外，1990 年代中期的下岗大潮，追本溯源与分田单干不无关系。
覆巢之下无完卵，既然大包干导致了农业领域的生产力倒退，那么工业领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直到进入本世纪以后，以 2004 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颁布为标志，天朝的农机化进程在中断多年后终于得以重启。然而此时，天朝的农机工业已经被国际资本渗透得相当厉害了，，尤其是大型农机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所垄断。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在天朝的其它若干工业部门中同样是攻城掠地，凭借手中的各种专利权和大宗商品定价权，也拥有了相当的实际控制力。总的来说，尽管天朝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已经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在其经济中控制力的自动消失，不管表面上的工业规模如何庞大，天朝仍然不过是在列强中垫底的存在。

所谓工业党，无非是代表了城市工业资产阶级说话，既然如此，不管其表面上如何带有“左翼”色彩，仍然不能摆脱这一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狭隘眼界事实上还有数典忘祖的本质：众所周知，建立起全球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恰恰是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英国农业资产阶级。

马尔乌斯的阶级偏见，还暴露在他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拥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上：

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当然不能指望凭空得到理想化的上层建筑。客观上，一个源于封建时代造反求生，致力于向农业社会动员资源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集团带领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大路——即便它并不适应自己召唤出来的工业时代
然而，这无非又是工业党的资产阶级式的傲慢罢了。

1949 年以前的旧天朝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什么单纯的“封建时代”。既然如此，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就具有根本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特点（所谓“封建时代造反求生”）的特点。

至于“国家资本主义政治集团”云云，不过是工业党分子的以己度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无非只是所有制改造时期用于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过渡措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6），特别是资本家领取定息时间的截止（1966），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早已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非为利润而生产，其生产不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何来“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些基本的 ABC 对工业党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流派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秘密，他们总是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臆想为“国家资本主义”。

既然如此，所谓“它并不适应自己召唤出来的工业时代”云云，无非是工业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时的狂妄而已。更何况，这个结论不但不符合事实，甚至都不能够自圆其说：任谁都知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恰恰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才诞生的。难道一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才诞生的生产关系，竟然还不能够“适应工业时代”吗？

马尔乌斯继续混淆视听地胡说道：

1966 年肯定还不是最合适的转型时间点，因为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远远压倒人力密集度，工业经济超越农业，不等于工业人口数量超过农业人口。总的来说，占据优越分配地位的少数工业人口并不欢迎变革，甚至不希望农民的子女和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本能地反对任何新的尝试，结果就是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运动阻力越大。但老人觉得自己未必还有另一个 17 年去等待，所以他在 73 岁作出了人生最艰难的决定——向自己过去半个世纪的惊天功业宣战。

首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而不是因为什么“占据优越分配地位的少数工业人口并不欢迎变革，甚至不希望农民的子女和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歪曲为所谓“分配上占据优越地位的少数工业人口”与“农民子弟”的矛盾，这无非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当然可能颇合某些人的胃口）。按马尔乌斯的逻辑，莫非那些被社队干部调进城市拿工分打人的战斗队或是湖南道县的所谓“贫下中农法院”才是运动主力了？事实刚好相反，组织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是被在当时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批评和制止的，更多地时候（虽然并非总是如此）这恰恰是保派对付造派手段。

这里顺便指出，第一共和国除了有计划的招工之外，是将农民自发流入城市的倾向视为应当加以制止的东西。这倒并不是因为自五和自由派臆想中的所谓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剪刀差（恰恰相反，剪刀差在第一共和国一直是努力加以缩小并基本消灭了的东西），而是为了防止农村自身走向凋敝（正如如今突出的三农问题那样），当时的宣传媒介（譬如电影之类）恰恰是批判农民子弟在进城后的“忘本”，强调“乡亲们还等着你回去改变家乡的山山水水”（大意），毕竟，都想着往城里跑，农村又由谁来建设？当时的方针恰恰是由城市工业支持农村，逐渐完成农业机械化，发展社队工业，也即由农村在由城市帮助下实现自身

工业化的途径逐渐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由城市去“压倒”农村，工业去“压倒”农业，工业和农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协作、竞赛的关系。

当然据我们所知，工业党们基于其资本主义逻辑，恰恰是对如今农村的日益凋敝喜闻乐见的，甚至视之为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
煞有介事地装作同情作为个体的“农民子女境遇”（马尔乌斯对“阶层固化”的抱怨，无非也仍然着眼于资本主义式的“个人奋斗”），而对作为整体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境遇默不作声甚至对其困境幸灾乐祸，这归根结底是由工业党的资本主义立场所决定的。毕竟，只有农村凋敝了，工业资产阶级才能够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劳动后备军么。
“（作为整体的）农村是否有救？是否要救？”马列毛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工业党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帮助农村，不重视农业，城市工业也迟早会为此买单。

马尔乌斯还信口胡说道：

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运动阻力越大。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一月风暴”后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掌权的上海且不论，东北三省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势力强大的地方。文革中“运动阻力”最大的莫过于广西，这个地方的“工业化程度”很高么？当然，我们不是唯生产力论者，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继续革命就一定搞得好，只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谓“工业化程度”对此不起决定作用罢了。

毕竟，只要稍具马列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决定运动阻力的，应该是这个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本身。当然了，马尔乌斯要固守机械唯物史观，那我们也毫无办法。

最后引用主席的诗：

清平乐 视察 1971 年 8 月
南巡万里， 不觉忆古帝。 威加海内有余风，秦皇，隋炀，康熙。
彼辈功业为己， 我今操劳社稷， 踏破官僚机器，挥斥资产阶级 。
主席的遗产，正是旨在“挥斥资产阶级”，不是为了让“工业党”们加入资产阶级行列而准备的，不是为了使将来的资产者的上升更方便，而是最终消灭阶级。

（谬）用中学知识建模，理解医保涨价问题

马平 2016-01-14

国务院前天发出文件，提出了新的医疗保险政策：国务院：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

城乡医保指的是没有稳定工作的那些人，本来是没有医保的。后来经济发达了，允许他们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也享受医保。不够的部分由政府出钱补上。现在政府依然要补贴这部分人口，但必须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

十天前还有另一个新闻：财政部长楼继伟《求是》撰文透露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楼部长的新闻则表明，职工医保这一块也要多收钱了，过去退休的人不用交钱直接享受医保，将来可能也得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补给医保基金。总而言之，从个人视角来看，享受医疗保险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我能想象普通民众看到这两则新闻的心情。但政府为何要在新年气氛里急着宣布如此煞风景的政策？我对医疗和社保行业都不算内行，下面我用初中学到的算术知识梳理一下逻辑。

首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 10%的财富（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 60 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 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 10%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 100 元（算着方便），有 50 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 50 元用来个人消费。这 50 元中，又有 10 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 40 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每年每人 50 元的投资。如果我们假设投资回报率是 20%（一个产业升级很快的社会），那么第二年的社会财富生产就是 110 元，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 10%。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中，这意味着第二年的人均消费是 55 元，其中 11 元用于支付医疗保险。即医疗开支也增加了 10%。

医疗开支的增加势必带来平均寿命的增加，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社会的人均寿命因此增加了 1 年，平均死亡年龄变成了 61 岁。于是民众代表和政府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应该持续这个趋势。于是提出了一个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 0.5 岁的平均年龄。

听起来这是个比较轻松的任务，因为医疗投入年年指数增长，从 11 元增长到 12.1、13.31、14.64……而平均年龄的提高指标却始终不变，所以难度应该不大。

但是，现实不是玩游戏。要注意到前面的模型有一个假设——医疗开支和平均年龄无关，即 61 岁的人和 59 岁、30 岁的人都需要同样的医疗开支；把平均寿命从 60 岁提高到 61 岁，难度和 65 岁提升到 66 岁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显然和现实偏离甚远。

从生物学来看，人是一种设计寿命只有 30 多岁的生物，到了中年就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60 岁以后器官磨损已经不可逆，维持生命所需的成本急剧上升，多少钱都能填进去。到了 100 岁左右，无条件维持生命的费用已经迅速接近天文数字，可以打败任何固定额度的经济投入。

当然，医疗费用的增长也不含糊，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指数增加。如果每年的增长率是 10%，7 年就能翻番，25 年就能变成十倍。这种增长能填满医疗投入这个无底洞吗？

很遗憾，不能，因为在所有医疗开支中，人力成本占用的比例极高。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各系统之间的作用至今不能用标准化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所以诊断、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经验。手术虽然引进了一定的机械化、电子化辅助，但也依然需要复杂训练的外科医生和护士亲自操作。最后的配药、用药也需要药剂师把关，护士操作，不能完全信赖机器。一个老医生凭直觉做出的判断，往往要比年轻医生借助仪器达成的结果更准确。一个成熟的卫生系统，可能会有一半的成本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的工资。从我的日常体验来看，患者们也承认医疗系统的核心是人，否则名医和大医院的门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排队求诊了。

医生和护士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如果全社会的工资以指数增长，他们的收入也必须同步增长。在前面的模型中，医疗投入虽然每年增长 10%，但社会平均工资也每年增长 10%，即能雇佣的医护人员总量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指数增长的医疗投入不能明显提高医疗服务的数量，更高的医疗需求必须靠医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拉动。如果一定要短期内迅速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就必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雇佣更多的医务人员。中国每年做统计年鉴，社会服务方面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每千人的医生比例。建国初期这个数字只有 0.6-0.7，现在逐步上升到 1.7 左右，这这也必然意味着医疗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让所有人都觉得“看病越来越贵”。

既然医生的收入也要指数增长，那么在平均寿命增长导致医疗需求上升的时候，等比例的医疗开支肯定无法完全填平这个大坑（除非像当前政策这样压制医护合法收入）。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回到最初的模型，回顾一下那个貌似轻松的目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 100 元（也是我随便写的），有 50 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 50 元用来个人消费。这

50 元中，又有 10 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 40 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 0.5 岁的平均年龄。】

这个指标如果是全社会的政治指标，在遇到障碍时就必须牺牲其他方面来完成。现在医疗开支占个人消费的 20%，全社会总开支的 10%。如果大家不愿意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不愿意把 20%的消费比例提高到 25%……30%，那就只能在用于全社会投资的那 50%里面打主意了。比如说，过去 50%的财富用来投资，现在降低到 40%，用于医疗的投资就能凭空翻一番，而不影响日常消费。

当然，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日常消费没有变，医疗水平提高了，必然有某些利益受到了损害。具体到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速被压低了。如果投资回报率保持 20%不变，投资率从 50%降低到 40%，经济增长率就从 10%下降到 8%。

10%和 8%有什么区别？从短期内看几乎没区别。但从长期来看，医疗费用的增速也会跟着经济总量下降。但这个“长期”还是很长的。从同样的起点出发，如果采用 10%经济增长、1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要将近 40 年才能追平 8%经济增长、2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这个周期几乎可以和人的生命相比了，要知道 40 年前还是文革年代呢。所以，一旦提高医疗水平这个福利指标被上升为政治任务，政府和民众都很容易选择降低投资来换取眼前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至于几十年后的事情……谁在乎呢？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因为眼前的安逸而放过你。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掉进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搞错了福利的本质。福利是经济增长的赠品，而不是社会调控的直接目标。一旦福利增长成为不可置疑的政治目标，就会逐渐侵蚀社会的发展潜力。而经济增速越下降，民众对福利的诉求就越高，政府发福利维稳的压力也越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耗尽社会的增长动力，把经济拖入停滞。

正如前面所说，医疗福利和其他福利不同，非常依赖于人力，很难因为经济的指数增长而显著提升。所以，随人均寿命提高而增长的医疗需求非常“危险”，是所有福利中最容易压低投资率的一项。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如此呢？

就我的回忆，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周围大多数老人（其实也只是 60 多岁）的死因往往是模糊的“吐血”、“摔坏了”、“喝酒死了”、“一口气没上来”……而不是明确的“肺癌”、“脑溢血”、“肝硬化”。到了 90 年代依然如此，直到 21 世纪，县城和乡镇上的老人才逐渐有了明确死因，乃至在去世前数年就开始知道自己的病情，有针对性的治疗或缓解。这反应的就是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以及医疗费用占 GDP 比例从 3%逐步上升到 5.2%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正规医疗的支持，人均寿命从 60 多岁逐步上升到 70 多岁。尤其是在胡温执政后期，随着城乡医保和新农合的全面推行，中国 90%以上的家庭都敢于走进现代化医院的大门（虽然还需要一定的决心），拒绝在 70 岁的年纪等死。

然而，就我对周围普通中国人的观察，大多数人一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医疗开支相对提升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认为预期寿命的提升理所当然的要持续。虽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70 多岁，但许多有能力、有良好医保的家庭会在老人 70 多岁生病的时候依然不采取保守疗法，而是信心十足地动手术，做积极治疗。当然，这并不耽误他们抱怨医疗费用（自行负担的很少一部分）太高，在涌向少数大城市医院的同时，想方设法逃避医疗费用。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进步，但**人道主义如果被当成一个必须实现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不可能持续**。2010 年之后的福利扩张，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和工业繁荣，是政府单方面推动的结果。政府的高比例补贴暂时支撑了福利，提高了医疗消费需求，却没有让民众意识到这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负担。就在很多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支撑福利开支的同时，房价的上涨也饱受诟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福利，乃至完全免除普通人的医疗支出。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低保、城乡医保和新农合保险全面铺开的头几年，一方面居民还没有习惯于使用自己的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上下，足以用增长来掩盖问题。等到货币刺激政策效果逐渐退潮，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一起停滞，在过去 10 年间快速扩张的福利经费就逐渐滑向寅吃卯粮的境地：

经济参考网-医保基金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

【基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支出增长速度的倾向从 2011 年开始逐渐显现。2011 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5539 亿元，支出 4431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8.6%和 25.2%。收入略高于支出。2012 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6939 亿元，支出 554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5.3%和 25.1%，两者基本持平。截至 2013 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8248 亿元，支出 6801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8.9%和 22.7%，收入增幅开始低于支出增幅。

收支增速水平的变化必然影响基金的可持续性，对此《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 2014》预测，2017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 2024 年就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 7353 亿元的严重赤字。】

而这并不是最紧张的日子，因为从人均年龄和就医习惯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利用医保系统赋予自己的福利。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中国的医院之所以还没有瘫痪，只能说中国老百姓还是太淳朴（无知）了。可以预计，接下来几年，中国的医保开支还会急剧上升。医保和社保基金的破产可能比预计的日期更早到来。

怎么办？

钱不够花，就要从其他地方挪过来。有人说加税，也有人说划拨国企股权，用分

红填补社会福利这个大坑。但无论哪一种选择，本质上都是减少长期投资来维持福利：

山东国企改革探索：30%股权划社保

【该省将山东能源集团(Shandong Energy Group)、山东机场有限公司(Shandong Airport Ltd)以及山东盐业集团(Shandong Salt)三家国企 30%的股权——总价值 33 亿元人民币（合 5.32 亿美元）——划转到了省社保基金。省政府表示，最终将计划对所有 471 家省属国企进行类似的股权划拨。】

这样的手段作为暂时的调控可以考虑，如果成为长期国策……中等收入陷阱在向我们招手。实际上，考虑到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的双重黑洞，可以说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模型：

【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 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 60 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 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 10%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前面的讨论仅仅考虑了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的问题，就已经模拟了现在的医保危机。解释了第一则新闻的背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但现实生活中还有退休问题。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60 岁退休，不再参与财富生产，这意味着之后的医保投入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老人身体健康，对亲人来说当然是个慰藉，对全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有进无出的财务"黑洞"。

更要命的是，退休医保开支具有"自我提升"的性质。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许多福利给一次就够了，唯独花在退休医保上的每一块钱，都在为将来制造更大的开支"——延长退休者的寿命意味着付出更多的退休金，付出更多的医疗开支。就算用医疗手段根除了某项疾病，减少了眼下的护理开支，自然规律也一定会在 10 年后或更久的未来重新把类似的开支带回来。所以，一旦把退休问题引入我们的模型，问题只会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了财政部长新年伊始的的另一个表态：楼继伟透露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当然，我完全能想象普通中国人对政府此举的愤怒心态。两则新闻下面的网友表态是这样的：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楼继伟透露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国家控制财政支出，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部政策调整为何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为网友短视、自私。毕竟寿命的延长也意味着他们 50 年后还会生活在这个国家，没理由他们会希望长期的经济增长减速。为了解

释这个问题，我必须引入前面那个模型中忽视的另一个参数：贫富差距。

【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 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 60 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 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 10%的经济增长率】

在一个贫富差距很低，政府廉洁高效、公民参政路线清晰的社会里。社会保险的功能仅限于平摊风险和储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重大疾病，每个人都会衰老，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存起一些财富用于全社会投资，需要时再取出。即社保本质上是每个人自己的钱，只是在时间和概率上出现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人均寿命越长，普通人会越理智地考虑社保政策，支持全社会的长期投资。不会随便要求提高眼前的福利标准。至少政府可以通过解释和科普来避免政策遭到全面抵制。

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明显，统一的国家社保和医疗保险就将同时具备“劫富济贫”的作用。一方面社保会通过税收从企业和国家获得支持，另一方面社保对于富人和穷人的性价比完全不一样。富人缴纳 5 倍的社保，获得的回报可能只有穷人的 2-3 倍。在这种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会认为削减福利是给富人减负，给穷人增压，从而激烈反对任何降低社保（包括医保）标准的政策。政府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或是减少换届风险，只能年年调高社保标准，直到财政崩溃。欧洲经济停滞，希腊、委内瑞拉国家破产，都是类似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报告称中国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

【近 30 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初的 0.3 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0.45 以上。而据 PS2012 资料估算，2012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 0.49，大大超出 0.4 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顶端 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 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左右。】

这就是新的社保政策招来一片骂声的原因。

进一步说，贫富差距大、政府腐败，意味着平民不信任富人和政府主导的投资，不相信这些投资会在长期改善全社会的福利。虽然大多数富人的财富的确被用用于投资而不是奢侈消费，虽然政府也的确能把大多数税款用于修建基础设施，但从平民的视角看来，富人的奢侈消费、官员的腐败和特权都说明他们投资的的不可信。与其让他们积攒财富进行投资，还不如眼下就尽可能多切分一些社会财富发福利。再加上中国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参政路线，官方文宣机构水平极其低下，平民根本不会相信政府和企业说的“长期发展战略”，只会对眼下增加福利感兴趣。

这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无论你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怎么看，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平等就无法通过激进政策来提高效率；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平民参与政治讨论，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疏离感已经在消耗国家的潜力了。

当然我不是说大锅饭最好，民粹主义万岁，但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在 21 世纪重建新型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更清晰、更合理的平民参政体制。否则现代化之路一定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往一个貌似温馨的中等收入陷阱。

放下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谈，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性障碍，社保政策可以做出怎样的调整呢？作为一个财政学的外行，让我批判一下现行政策还凑合，让我提方案……我只能说几条直观的看法。

首先，延迟退休势在必行。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随着平均教育年限的增加，60 岁退休可能意味着劳动时间在整个寿命中低于一半。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最终来源，那么锁定退休年龄反而是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旧规则——人生的主要任务是劳动。所以，可以根据财政测算，设定一个人均寿命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公式，**每当人均寿命增加，就按照一定比例延后退休年龄**。当然，为了增加选择自由，也不妨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即在一定年龄后，越晚退休拿到的退休金比例越高，从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人积极创造财富。

其次，医保也可以采取弹性政策，在提高个人自付比例的同时，让不同的人购买不同层次的保险。毕竟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态度可能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年轻时自在一些很值得，有人觉得寿命长一些更重要。有的人可能希望用余生换一次浪漫的旅游，有的人或许愿意在养老院的走廊里聊天到 90 岁。如果采取统一的医保政策，在同一个基金下提供卫生服务，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非自愿地补贴另外一些人，也不利于公平和效率。所以，不妨在提供托底政府医保的同时，提供多种医保套餐供选择。**用市场规律来控制医保的无限制增长**。

本次国务院提出的医保改革意见在建议增加个人缴费额的同时，也提到了引入多种商业保险。当然，我觉得完全可以由国有公司提供商业保险。

国务院发文：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把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发展和深化医改全局，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突出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强化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不过，在提供更多医保选择的同时，对医疗市场本身倒要加强管制。因为这是一个不透明的市场，购买者并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东西（这一点和菜市场完全不同），更无法分辨各种产品的质量。给予患者太多的自由，必然会导致少数大医院爆满，普通医院无人问津；给予医院和医生太多的自由，势必会出现过度消费和强买强卖。为了避免赵本山卖拐成为医疗市场的典型案例，应该对医疗广告、医药代表、患者的就医意愿给予行政管制，成立专门的政府医疗中介以审查所有医疗交易。现在这种少数主任级医生年入数百万（源于医药代表），大多数普通医生拿低工资苦捱岁月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制止。

还有，现在中国负责全民健身工作的机构是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卫生工作的是卫

生部，但实际上，这本来是同一份工作才对。全民健身意味着给国家，给医保基金省钱，与之相比，商业体育的少许利润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群众体育工作和卫生工作拆分进行，结果就是体育界醉心于商业体育，鼓励十万个需要锻炼的人坐着看，22 个需要休息的人拼命跑（还没跑好）；而卫生部门只在医院上下功夫，潜意识里觉得患者（用户）多了是好事儿。或许可以把两个部门合二为一，甚至让医保基金的管理方负责全民健身运动，举办基层体育竞赛，为优胜者减免保险费来鼓励全民健身。由于大多数需要锻炼的人正处于工作年龄，全民健身的意义可不仅仅限于节约医保开支。

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必须优先考虑全社会角度的“开源节流”，优先发展那些能提高劳动能力、增加残疾人工作机会的技术。那些**仅仅能延长生命，不能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应的技术**，那些**罕见病的治疗技术固然也有用，但在政府补贴的排行榜上必须靠后站**。否则早晚政府会掏不出任何钱补贴卫生部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用新技术分担医生的工作。正如前面所说，只要不改变诊断依然靠经验，治疗靠双手的手工劳作现状，医疗福利增长将永远滞后于其他福利。必须用专家系统减轻专家的脑力劳动，用精密器械减少外科医生的培训时间，用机器人替代护士，才能让医疗服务像其他行业那样跟上经济的指数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医保相对短板的问题。当然，这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进步，不是医疗部门能独立作出的产业升级。同时患者也必须在心理上接受新技术，相信科学而不是“传统”，才能培育出卫生部门的产业革命。

回过头来看前面的几个观点，貌似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当重合。比如说弹性退休金制度、自由选择医保不搞一刀切、增加个人的医保缴费比例，都的确和新自由主义有类似之处。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实施这些激烈改革的前提是大幅减少贫富差距，消灭或减少阶级矛盾，然后才可以考虑为公民提供选择自由、促进全社会效率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选择却忽视了平等前提，这既是我和他们的差异，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落入社保陷阱的重要原因。

可能还会有人质疑我上述观点的道德性，比如**驱使 60 岁以上的老人劳动，比如说减少对罕见病的国家补贴**，提高社保个人缴费额度等等。但道德本来就不是为一个变化的世界设计的，许多道德的形成时期和今天的现实大相径庭，与其等着这些“道德”拖垮社会保险体系文明沦丧，不如我们早点修订一下这些所谓的道德原则。

比如说，大多数古代民族固然不依赖老人的劳动，但自古以来，也从未有过今天这种十亿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的太平盛世，没有 60 岁老人普遍行动自如的社会健康水准。如果把生命的最后七分之一算作老年，60 岁的健康人本来也只能算中年人，当然应该参加劳动去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把“老年”的标准进一步向后推。既然大多数人类活到原始人的几倍寿命已经打破了“自然状态”，就不要指望我们可以通过因循守旧过的更好。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变规则的话，就是“天道酬勤”——崇拜劳动永远不会错。

（驳）不但不读书，也没有屁股

明道经纬文嘉禾

就一些具体问题，马前卒的东西也未必不能看，比如某些知乎答案，比如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重点在于根本的格局感问题。

其实当年我老以为督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当年北朝贴了秋火批马前卒《大目标》的文章，然后督工自嘲道“（此文）论点是靠谱的，这是一本准反动书籍。”

不过后面 yca 分裂事件，爆出来的东西推翻了我的想法。

坑灰未冷山东乱，督工原来不读书。

少年中国学会决裂的时候暴露过点马前卒在群里的聊天记录（略）

他以为萨缪尔森《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全部我劝他好好砍掉重练再说。居然把入门书拿出来说哎呀我看了入门书了我还能写得比他更好，我现在已经是著名经济学者了。更白痴的是把资本论这样的巨著和萨缪尔森的这种入门书相提并论。

然后截图里还有关于产业升级的。来看他的一个实例：马平：用中学知识建模，理解医保涨价问题。

原来马督工对产业升级的理解之一种，就是譬如说医疗产业在不断升级过程中必须暂时而且要永久地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为代价，这真是奇妙的闻所未闻的壮举，果然是小生产者马克思所无法理解的，当然谁能理解就让它理解去吧。

就这点对马经的认识（还是胡说八道），也好意思叫“共产主义者”？

啊，其实秋火批马前卒的文章还可以拿出来用下：
现在应该来认真清算工业党这个新词语了。在我看来，“工业党”这个词的树立，当然有一定现实性，因为西方的“去工业化”和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曾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词出现在当代，并非处于中国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而是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展了半个多世纪还在高速发展、向世界头号工业强国问鼎的阶段，那么它实质上是中国新生的本土资产阶级的一把利刃，试图为本土资产阶级的前进劈开左右两边的“荆棘杂草”，也意味着大力矮化、丑化、妖魔化被压迫阶级里期盼社会变革的各个势力流派。（不过其实这把利刃还有点遮遮掩掩，在许多语句上它还不是那么自信，带有很明显的自我辩护防御性质、甚至有一点悲情色彩，还借助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语式，这些思想特点都反映了新生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年少稚嫩，但气焰倒是很大的。）
我彻底反对“工业党”的提法和思路：第一，该提法暗示其他的社会变革期待者

都忽略工业文明的价值，好像唯有他们才是脚踏实地地重视了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实际上许多工人阶级的政治派别，都不可能忽略工业文明的价值和成果，因为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存在本身就维系于工业文明，只有改进它而不是解散它，工人阶级才可能谈得上美好未来。所以"工业党"的思路首先意味着一个圈套，你进了这个圈套跟他们辩论"是否应该承认工业的价值"那就上当了，因为所有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派都决不否认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工业文明。而自认左派的诸位，未必要提供全套社会规划方案，夺权后的工人阶级必定可以尝试着学习运作经济与自我管理；以为左派现在就应该包办替代将来工人阶级，把基本社会制度都设计好，那是马前卒之类工业党知识分子自以为最能笼络小知青年的想法。第二，"工业党"只关心工业文明进展，或者更坦白地说只关心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工业文明物质利益，而不关心工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工业生产者及运作者——工人阶级的现在与未来的物质利益。"工业党"的新丁杜建国曾说郭台铭的加薪壮举正有赖于富士康的经济技术进步，这是彻底脱离工人的混帐知识分子的谎言，——去问问任何一个 2010 年以前入职至今还在的富士康产线员工，谁能找出一个认为富士康薪资真的大有提高的工人？"工业党"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他们的盲点：以为企业好、员工就会好。或者把"企业好、员工才可能好"的"可能性"当成了决定性的现实，但新生代工人比"工业党"更讲究现实主义：工人是不会为空头支票买单的。美国欧洲的工业文明早在一百年前就为全体工人过上幸福日子创造了完全的"可能性"——但这个空头支票至今也没有实现，只化为占领运动的回声了。第三，"工业党"只是通过一群国家谋臣智囊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自说自话"，对工人阶级毫无意义。南方有无数工人在工业技术雄厚的大型工厂里打工劳动，如果不是通过工人自己的斗争，企望什么"工业党"的歌功颂德或与各路工业老板同甘共苦、分忧解难，除了多几个马屁精，那是不会换来任何工人集体好处的。

双城：马前卒的屁股已经完全地歪了

就他所说的过度医疗而言，在普通参保的人中根本不存在。医保保险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完全不足以达到让一个将死的人维持生命的程度。实际上过度医疗更多的是那些全额保险的人，他们少部分人占了医疗资源的大多数。

比如说我老丈人，他一不舒服就去医院，每次住院一个星期左右，一年下来花十万左右，而且他这样的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我还知道有人已经植物人了，天天躺在医院维持生命，因为他在医院里可以全额报销，而且每个月有退休金。如果死了子女就拿不到他的退休金了。与这些人相比，医保的过度医疗简直可以忽略。

医保还有个问题是跑冒滴漏。所有的医保药店都刷医保卡卖保健品、日用品，基本上都可以按诈骗罪抓起来。但是现在医保的钱不够了，首先想的却是让大家多交钱，为什么不去煞住诈骗风呢？我只能猜他们跟骗保的有利益关系了。

另外老职工以前没交过多少医保，现在却从医保中拿钱，那么政府是否应当为他们把医保补上呢？政府该出的钱却赖着，反倒扯什么过度福利，是不是太扯了点？

马前卒不简单，体制内外一肩挑

既是少年中国的实际领导人，又是观察者网的主将；到底是代表左翼小资打入体制内，还是代表体制内收编小资左翼？

这是现实版的 21 世纪网络小资谍战剧啊，各位且耐心长期观察。

李必达

虽然就笔者的观察，这个平等前提只怕有些薛定谔的嫌疑，但毕竟说明马前卒是认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的。

至于解决方案和新自由主义重合，则体现了马前卒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维度上的割裂。他在认识世界方面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但是在改造世界方面却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新自由主义。这可能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识世界体现了“民族”的一面，改造世界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一面；也可能是由于他在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上没能突破欧美话语体系的局限。

（谬）为了保住中国最古老的产业，可能得消灭家庭养蚕

马前卒工作室

“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一期项目在嵊州正式投产。只需 200 名车间工人，就可以年产 1 万吨鲜茧。按照 2017 年的数据，1 万吨是陕西一个省的蚕茧年产量。用传统方法，需要 10 万名蚕农在自家精工细作一整年，才能造出这一万吨蚕茧。而该企业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年产 4 万吨鲜茧”——2017 年全国鲜茧产量约 55 万吨。

新闻看似是企业宣传，但很有气魄地提到了一句：“数千年来传统养蚕模式被颠覆”。这话的确不算夸大，因为养蚕纺绸的确是中国最古老的（非农）产业，以至于被定义为黄帝妻子嫘祖的发明。

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是最早的养蚕国家，而且几乎是垄断了丝绸供应的国家，从罗马、波斯、阿拉伯、奥斯曼等十几个帝国吸取巨额（金银）顺差。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这笔巨大财富的基础始终是农户分散养蚕，今天也不例外。现在为什么要“颠覆”它？

1 真 • 技术活

蚕，字面意思是“天虫”——生活在树上（不落地）的结茧虫。一枚直径在 1 毫米左右的蚕卵，从孵化到生长、吐丝，最后变成一颗蚕茧需要 40 天。这期间，蚕的体重增加 1 万倍。因为生长太快，蚕的表皮跟不上身体的生长速度，因此蚕每吃一段时间桑叶，就要休眠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动，然后蜕皮。每完成一次“休眠-蜕皮”，“蚕龄”就增长一岁。一般的家蚕要经历“四眠”，到五龄后一周吐丝结茧。

和棉花、水稻这类农作物相比，养蚕的周期很短。但毕竟蚕是一种听不懂人类命令的低等生物，而且被强行赋予了额外的生存目标（结出又大又白的茧子）。所以，蚕农必须非常精确地控制蚕的生长环境，以提高蚕茧的数量和质量，同时避免“负担太重”的蚕中途死亡。

养蚕从种桑树开始，每亩桑田可以采叶 150 公斤。蚕卵产在纸上，以“张”为单位，一张蚕卵可以孵化出大约 2。5 万只蚕蚁。养大这些小蚕，需要 650 公斤桑叶。650/150=4。3 亩地，一般蚕农至少要养 4、5 张蚕种才有赚头。即一个蚕农至少要对应 20 亩桑田。

但桑叶不是简单地扔给蚕就算。小蚕要吃嫩叶，大蚕要吃大叶，不同时期要挑着采。桑叶干燥，蚕不吃；桑叶潮湿，蚕腹泻，必须根据蚕的不同需求供应不同的套餐。但桑叶屯 12 小时就会发酵变质，蚕吃了会生病。如果桑叶被其他虫蛀了或是被粪便污染，蚕吃了也会大规模死亡。到了吐丝前夕，蚕胃口大开，消耗掉一生中 75%的桑叶，采桑效率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数倍。这些陷阱都绕

过了，还得考虑控制食物投入，让蚕发育整齐，利于统一管理，批量结茧。

喂食也只是养蚕的麻烦之一。作为一种被人类培育到“变态”的脆弱小虫，蚕的生命非常脆弱。尤其是休眠的蚕格外虚弱，必须对温度、湿度严格控制。春蚕和秋蚕不一样，小蚕和大蚕也不一样。什么时候铲蚕沙？什么时候上簇结茧？茧会不会被蚕排泄物染色？一丝都不能松懈。此外，蚕的生长密度远远超出自然界水平，几万只脆弱的蚕宝宝同处一室，相互感染的概率很大，蚕室、蚕具都需要每天消毒。

这些经验，大多数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型。近年虽然推广养蚕新技术，但不过是普及小蚕共育、统防统消、省力化蚕台、方格簇等改良。农户中，能够买得起切桑机、自动喷粉机、机动喷雾机就要算“高科技养蚕”了。中国每年几十万吨的丝绸产量，基础依然是和嫘祖时代差不多的农户分散养蚕。

从各地报道看，养蚕“大户”，基本都是夫妻店，一年养 20 几张蚕种已经精疲力尽。农户养蚕的极限是一位四川宁南县的好汉。2012 年一年，他养蚕 120 张，年收入 20 万。但根据这位 85 后小伙子的自述，他的养殖模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小农经济——借鉴流水线工作，雇临时工帮忙采桑、喂蚕、收茧，计件付酬。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按照我的这种生产模式，这样的规模可能就是极限了。必须建设统一的标准化厂房。”

2 先进在哪里

四川小伙多年的梦想，最近终于由中国企业实现。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养蚕工厂化的新闻，他们要么是改造了蚕台，可以在单位面积内养更多蚕。要么是通过传感器系统，精确控制蚕室温度等物理条件。这次的养蚕工厂先进在哪里？

我们重新看看开头提到的新闻。几个词值得注意：“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

“人工饲料”，意味着统一采集桑叶，磨粉后储存。根据不同龄期的需要，用桑叶粉配制合适的饲料，而不是临时到树上找合适的桑叶。从此蚕的食品从“生鲜”改成了“罐头套餐”。显然后者更廉价，更安全。养蚕从此可以摆脱桑叶生长的影响，不用看天吃饭，全年不间断养蚕。

全年不间断养蚕，这完全改变了桑蚕业的生产规律。一般来说，我国养蚕条件最好的珠江流域，每年最多养 8 茬蚕。西部大开发以来，桑蚕业向西部转移。2017 年，全国 50%以上的蚕茧产自广西，但那里的自然条件每年只能支持两季蚕。现在工厂化养殖，这些限制统统没有了。

当采桑和气候不再是问题，大规模集中养殖才有可能普遍推广。最新的养蚕工厂里，气流、气温、湿度等环境指标靠智能化调控；饲养密度超过传统方法几十倍；产量已超过传统饲养平均量；茧丝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5A 级以上。如果类似的工厂修上几十座，对中国丝绸产业当然是好消息，但 4000 年来的蚕农职业恐怕也

不会再有生存空间。

然而，桑蚕业的现代化和蚕农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早在 150 年前，几千年来的小农桑蚕业就已经开始消亡，中国丝绸业因为落后于时代，几乎被完全摧垮。眼下的产业化，并非激进变革，而是拖了很久的补课。

3 丝绸之国兴衰

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源起国，生丝和丝绸产业称霸世界。但在 19 世纪末的 40 年间，日本丝绸业全面超越中国。1873 年，中国生丝出口量是日本的 7 倍；1905 年以后，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丝产地；到 1930 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已经是中国的 3 倍。可以说，日本连续发动侵略中国战争，军费却未使政府破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拿到了国际生丝供应权。

日本茧丝行业崛起的原因正是产业化和工业化。

日本从 1869 年开始重视生丝业，政府层面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派人从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当时的桑蚕大国学习经验技术。光是对中国的观察和报道，就编成了 40 册。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日本改善肥料让桑树四季长叶，而中国长三角的蚕业还在沿用古法。日本统一收购蚕茧、集中干燥储存、分级分类控制品质、打开海外市场。中国桑蚕家庭散养、自行处理、质量参差不齐，政府、丝绸商完全靠盘剥蚕农获得利润。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改变桑蚕技术的努力，但最大的障碍不是日本炮舰，而是国内的封建制度。1881 年，手工业行会“锦纶行”的手织工人聚众几千人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 3 名丝厂工人。地方政府虽然镇压了暴动，但勒令所有丝厂停工，查封机器。理由是“机器与民争利”，夺走了手工业者的饭碗。中日的发展路线由此出现分野。

解放后，这样的局面也没能得到扭转。日本 1964 年成功实验人工饲料养蚕，全国推广蚕 1-3 龄用人工饲料喂养，4-5 龄用桑叶喂养。而中国要到 1974 年才成功实验人工饲料全龄养蚕。随后人民公社解体，桑蚕业也随之回到了小农经济水平。在这次改用人工饲料之前，最新的论文，是 2010 年江苏如东县开展人工饲料养蚕实验。该实验 2014 年初见成果，可惜成本高企，研究成果还停留在科研阶段。如果不是今年浙江企业受困于蚕丝价格大起大落，自掏腰包搞科研，中国人工饲料养蚕技术可能还要酝酿到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

养蚕业如此，缫丝行业也不乐观。中国缫丝企业里，至今还在使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借鉴日本机型改制的“自动缫”。

桑蚕技术如此，中国生丝出口乃至丝绸行业处境当然不会好。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外贸结构改变，茧丝产业迅速萎缩。中国重回茧丝行业老大的位置，并持续至今。到 2013 年，全球生丝产量 15 万吨，日本的贡献只有 25 吨。这一年中国生产了 12。5 万吨，占全球 82%，印度第二 1。9 万吨，第三名巴西 440 吨。

但就是这个数量不及中国零头的巴西，以农场制经营保障了产量和品质，在蚕丝长度和纯净度等标准上都超越中国，拿下了奢侈品牌爱马仕的大单——相传爱马仕从不直接采用中国生丝，除非中国出口巴西后，再转运到欧洲。

所以，中国丝绸行业的产量虽然还好，但多年来只能在面料代工等低附加值环节赚钱。而且因为家庭养殖技术低，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丝绸的地位甚至不如同样是家庭化生产的“泰丝”。

2012 年两会上，中国丝绸企业代表就曾痛惜“到目前为止，国内大部分丝绸企业仍处于传统的生产模式。虽然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茧丝绸生产国，但我们的尖端技术和设备受控于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必须加快缫丝、制造、印染、后整理等环节的机械自动化、智能化的研发突破。”

如果中国丝绸行业自己不进行颠覆性改革，过去输给日本，今天输给巴西、泰国，未来还不定输给谁。国际市场可不问谁有几千年的传统。这次浙江企业开始用工业化改造桑蚕业，算是开了个好头。

（驳）工业党人的臆想和资本主义的逻辑

傅友德

在工业党人的拜物教中，“工厂化”、“机械化”、“大生产”并非是手段，而是一种目的。人们的生产活动不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获取价值，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业党人的上述拜物教。这就使得他们沉迷于种种幻想之中而无法自拔。

马前卒工作室的《为了保住中国最古老的产业，可能得消灭家庭养蚕》又是这一类工业党拜物教的奇思妙想之一。在介绍了一种“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之后，马前卒工作室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就开始危言耸听“如果中国丝绸行业自己不进行颠覆性改革，过去输给日本，今天输给巴西、泰国，未来还不定输给谁。国际市场可不问谁有几千年的传统。”+臆想“这次浙江企业开始用工业化改造桑蚕业，算是开了个好头。”

然而，仔细阅读我们发现，马前卒工作室的文章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按照马前卒工作室的说法，中国丝绸工业之所以“不振”，是因为坚持家庭养蚕；而只要是坚持家庭养蚕，则无论如何都是小农经济。但是，中国的蚕茧和丝绸产量，在 1970 年代末期已经超越了日本，以后直至今日也是全球第一，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也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说“不振”呢？

原来，马前卒工作室认为，中国的丝绸品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因此附加值还不如巴西、泰国等。为此，马前卒工作室还不惜引用网络谣言“相传，爱马仕从不直接采购中国生丝”（实则只要搜索一下百度即可发现反例：南通-海安鑫缘集团生丝直供爱马仕_中国江苏网；骄傲！爱马仕、LV 国际大牌用的生丝是绵阳产的，就在城市新中心……）。何况，既然巴西“以农场制经营保障了产量和品质”（巴西的农场制实为封建残余浓厚的当代种植园制），为何巴西的丝绸工业每年仅能生产几百吨丝绸、难望中国项背呢？如果说日本的丝绸工业在中国丝绸大量输出之下衰败是因为所谓的“经济结构转型”，那么巴西农场主总不会是因为有钱不想赚才不扩大生产吧。至于泰国的例子就更可笑，因为马前卒工作室自己也承认泰国丝绸“同样是家庭化生产”（实质上日本丝绸工业鼎盛时期的蚕茧也还是家庭化生产的）。

至于缫丝行业中国“关键技术受制于日本、意大利”，那么就要问一下马前卒工作室了：如果说蚕茧技术不佳怪家庭化生产“小农经济”，那么缫丝行业完全是工业化的，为什么缫丝厂的资本家还在用 70—80 年代日本技术的机器呢？类似的问题之后还会不断出现。

在养蚕业方面，马前卒工作室花费浓墨重彩，描写了一幅“中国人坚守古法，在日本产业化养蚕面前一溃千里”的图景。可是，按照马前卒工作室的定义，家庭化生产就是“小农经济”，那么日本“统一收购蚕茧、集中干燥储存、分级分类

控制品质、打开海外市场”（实质上还有统一育种等等）的模式跟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的中国并无本质区别。如此一来，怎样论证“解放后，这样的局面也没能得到扭转”呢？只好把“普及小蚕共育、统防统消、省力化蚕台、方格簇、切桑机、自动喷粉机、机动喷雾机”等等“改良”全数无视掉，一言以蔽之为“大多数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型”、“基础依然是和嫘祖时代差不多的农户分散养蚕”，而单独将人工饲料喂养拿出来说事，即“日本 1964 年成功实验人工饲料养蚕，全国推广蚕 1-3 龄用人工饲料喂养，4-5 龄用桑叶喂养。而中国要到 1974 年才成功实验人工饲料全龄养蚕”。这一逻辑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日本农户即便使用人工饲料喂养，不也还是“基础依然是和嫘祖时代差不多的农户分散养蚕”么？

日本仓井宽的养蚕经营概况 www.doc88.com
【1970 年代日本的“养蚕模范”仓井宽一家，年养蚕 220 张，投入家庭内劳动力 3。7 人，每年雇佣临时工约 200 工（一人一日劳动为一工），本质上跟马前卒工作室报道的“四川宁南县的好汉”模式类似，只是规模还稍大（可见“按照我的这种生产模式，这样的规模可能就是极限了”的估计完全错误）。此外，上文还透露，1970 年代在日本“养蚕 30 张以上”即为养蚕大户，和马前卒工作室所谓当代中国“各地养蚕大户多是夫妻店，养蚕 20 多张”类似。由此可见，马前卒工作室所吹捧的日本养蚕业黄金时期的经营模式跟当代中国无甚差别。】

既然我们已经证明日本养蚕业鼎盛时期的经营模式跟今天的中国没什么不同，再加上泰国的例子，即可证明马前卒工作室全文的立论完全是基于一种虚幻的工业拜物教。但是，对于马前卒工作室夸大人工饲料养蚕技术重要性这一点，还可以给予更多的反驳。马前卒工作室把中国的人工饲料养蚕说得一团漆黑，说什么“在这次改用人工饲料之前，最新的论文，是 2010 年江苏如东县开展人工饲料养蚕实验。该实验 2014 年初见成果，可惜成本高企，研究成果还停留在科研阶段。如果不是今年浙江企业受困于蚕丝价格大起大落，自掏腰包搞科研，中国人工饲料养蚕技术可能还要酝酿到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可是，我们随便一搜，就发现，实质上（马前卒工作室所谓日本 1964 年推广的）“小蚕人工饲料应用已经在局部地区推广”：

小蚕人工饲料共育技术推广 8 年 助农增收近千万元 mp.weixin.qq.com
【如东县从 2010 年推广小蚕人工饲料共育技术，并未“停留在科研阶段”，而是已经在农户中全面铺开，至 2018 年共养蚕 12000 多张，可生产生丝近 200 吨。应该说已经实现产业化。】
海宁市首批人工饲料蚕结茧上市 jiuban.moa.gov.cn
小蚕人工饲料共育收蚁啦 mp.weixin.qq.com
【类似的技术在海宁等地也已经投入产业化经营。】
大蚕低成本人工饲料试验--《蚕桑通报》2017 年 01 期 www.cnki.com.cn

真正由于“成本高企”导致推广受阻而“停留在科研阶段”的是“大蚕人工饲料喂养”，马前卒工作室所报道的“全龄人工饲料工厂化养蚕”则是“大蚕人工饲料喂养”迈向产业化的一个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是直到最近才有类似的尝试，“拖了很久的补课”云云完全是工业党人的一种臆想：

日本正在掀起一场“蚕业革命”，或许能改变这项传统产业 tech.sina.com.cn

其实，任谁也知道，人工饲料养蚕技术发展不仅仅是取决于养蚕的农户，还取决于饲料工业、取决于营养学、生物学基础研究等等，日本领先于中国点出这个科技树是不足为奇的。日本最初点出这一科技，实际上也不是为了推广（而是为了对蚕展开营养学研究），实验成功后的推广速度也并不像马前卒工作室暗示的那样迅速。

日本家蚕人工饲料的实用化与普及 www.doc88.com
【日本大约是在 1970 年代中期才开始在农户间推广小蚕人工饲料喂养技术，到 1980 年代末日本全国丝茧中采用这一技术的只有 35%、规模化经营的种茧里也不过 45%。此时距离 1964 年全龄蚕人工饲料喂养实验成功已有 20 多年了。】

为什么大蚕人工饲料喂养技术迟迟难以推广？为什么小蚕人工饲料养殖技术的推广花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为什么中国小蚕人工饲料养殖技术首先从东部传统的蚕区（而非现在养蚕业的主要基地西南蚕区）推广开来？甚至于为什么车间化养蚕最早也在这一地区出现？日本产业化、高技术的养蚕业为什么在 1970 年代以后反而竞争不过中国在马前卒工作室看来“落后”的养蚕业从而发生萎缩呢？

实质上逻辑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技术是否推广，并不在于它是否“先进”、“工业化”、“有利于大规模生产”等等，甚至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成熟”，而是取决于且仅取决于其利润率。如果（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等因素）某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那么它就足以淘汰“先进”的生产方式。具体到人工饲料养殖技术，马前卒也给出了它难以推广的原因，那就是“成本高企”：人工饲料养殖技术可以节省人工等费用，同时提高产品的价格，但是饲料本身又会带来较高的成本，因此未必能够取得较高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它难以推广就不足为奇了；也只有到东部地区的人工成本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小蚕人工饲料喂养技术才能够在如东等地推广开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车间化养蚕尽管能够节省人工，但在电力等方面成本显然就更高了，它能不能够淘汰蚕农取决于最终的利润率；否则，尽管它自动化程度较高，也有可能像日本过去诸多全自动生产线被中国半自动生产线打败那样，反而被蚕农所淘汰。

本来，如果单纯是从丝绸工业史角度回应马前卒工作室这篇一如既往堆砌谎言的臆想，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想分析一下马前卒工作室将其臆想推广到社会层面的高雅言论：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改变桑蚕技术的努力，但最大的障碍不是日本炮舰，而是国内的封建制度。1881 年，手工业行会“锦纶行”的手织工人聚众几千人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 3 名丝厂工人。地方政府虽然镇压了暴动，但勒令所有丝厂停工，查封机器。理由是“机器与民争利”，夺走了手工业者的饭碗。中日的发展路线由此出现分野。

历史上，清廷（此时已经在进行所谓“洋务运动”的）地方政府查封机器的理由并非是“机器与民争利”，而是“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平民不得私擅购置”（参考《中国现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一文）。马前卒工作室显然是将 1890 年代广东另一次设置私营缫丝厂的失败尝试时官府驳词中间的“商民设立机器缫丝专利病民”移花接木到了 1881 年。这样做，无非是试图制造一种“清廷代表行会里的手工业者压制工业党”的印象，虽然实质上清廷分明是以“只许我做工业党”的立场查封机器的。

有关裕昌厚丝厂究竟得罪了哪些势力，最终结局如何，本文不想跑题去分析，大家可以自行参考中国现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然而我还注意到了另一文章，似乎是马前卒工作室文章的来源之一：

近代丝绸业的中日较量-新闻频道-和讯网　news.hexun.com

这篇文章吹捧“明治政府上下一心”发展丝绸工业。然而我们知道“上下一心”是不可能的，缫丝厂制造土壤、水质、空气、噪音等污染，有损于农业，导致地价下跌，必然引发附近地主和农民的不满；与手工业者争夺原材料和市场，最终导致手工业者破产，必然导致手工业者及其行会势力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明治日本也是存在的，从客观上就不可能“一心”，表面上的所谓“上下一心”无非是明治政府用武力镇压营造出来的，一如明治政府拿公帑育成产业后又搞官业下放让官人和巨商瓜分产业的“殖产兴业”。这篇文章事实上吹嘘的是明治政权为资产阶级充当后盾压制其他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与之相比，马前卒工作室单方面强调手工业者阻碍工业化，甚至认为行会的阻拦而不是日本的侵略才是导致中国丝绸工业无法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请问广东省的蚕茧产量从 1920 年代初高峰的 150 万担衰落到 1949 年的 10 万担也是行会而不是日本炮舰造成的吗？马前卒工作室诸如此类“劳动人民阻碍工业当人拜物教有罪”的神论非止一端。同资产阶级翼赞明治政权的文章相比，更显其非理性和反动性。这大概是由于资产阶级尚且能够理解经济活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利润率，而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工业化”、“机械化”、“大生产”等等，因而能够对事物有着比较接近常人刊发的见解。

诸如马前卒工作室之流工业党的离奇意识形态，本身是基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而诞生的一种上层建筑。可是，它形而上学地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的某些特征加以神化而膜拜，把这些用来实现资本循环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误认为是目的本身，具有牺牲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为其拜物教符号服务的趋势，从而有可能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产生破坏作用，一如中世纪经院神学和程朱理学可能反过来破坏封建经济本身一样。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过程。

（谬）独山县、社会化抚养，“左翼标杆”马前卒

睡前消息 139 期企业的力量真的如此之大了吗？大资本的游说集团和旋转门。和事实相比，顶级谣言的力量可以忽略。欢迎收看第二年的睡前消息。



（驳）习艺所与蛋卷

张程初号机

资本从来不在乎你骂不骂它，如果骂它能给它带来流量，他甚至巴不得你天天骂他。就比如 B 站做的后浪引起骂声一片，然而因此带来的批评恶搞流量，却让 B 站偷着乐，压根不会去管这些黑后浪的言论一样。就算是资本论这种刨祖坟的著作，只要能畅销，资本家也一样拼命卖。资本真正在乎的是你准备采取啥实际行动。结果督工谈了一个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最后告诉你，大家应该去关注人大代表的选举，这种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的号召。而比如面对豫章书院这种问题，督工不去谈如何抓出幕后黑手，反而说豫章书院和柏剑老师的长跑班性质是一样的，最后来一句不痛不痒的又空洞无比的推动社会化抚养就一笔带过了。上述这样的言论根本不会给他和他的观视频栏目带来任何风险。因为没有人会感受到实际的威胁。懂了吗，督工对人家的真正底线在哪其实门清，一个栏目的人指着他吃饭，做视频之前如何又有爆点，又不至于真的把自己作死，你以为人家不评估的？一帮吃饱了撑着的人说督工拿自己饭碗冲塔，肉麻吹捧一番，顺便再把黑督工的人讽刺成无能键政壬，呵呵，本键政壬就一以贯之的黑督工，并且最近做这豫章书院的事情差不多快真的把自己弄进去，督工敢跟我一起玩吗？

杜若致遠

“敢冲塔”，而且“拿自己饭碗冲塔”，对面批评他的则是“无能键政壬”，这些说法实在没有一个是张程自己发明的。所以我当时看到张程的回答，觉得很自然，这就是针对当时的舆情发的，到了这里反倒是张程成为了黑暗揣测、阴阳怪气的小人。

然而这才过去几天？纵有退潮，遗迹亦斑斑可见。

远到马前卒数年以来哪怕仅仅在知乎活动的经历，近及这一个星期以内相关问题的讨论动态，在这里大发慷慨的济济冠带，原来表现出：他们对这一切丝毫都不曾了解过。不要说新闻，就是知乎的新消息也不熟悉，却来高谈阔论。这，倒的确显出自媒体的必要了。最近还有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我国调查记者今已少见，令人忿恨伤感。然而可以指出的是，这不但是由于管制，也因为调查记者的深度报告周期长、内容多，在市场上竞争不过自媒体的缘故。有许多报社，“权”不曾弄垮他，“钱”的问题已经迫他吃散伙饭了。蒋能杰导演率领团队辛苦摄制了《矿民、马夫、尘肺病》，根本没有市场，他们也没打算取悦市场，免费发放资源，结果又有多少人看了？

旁的话不用讲太多。我还想要指出二点。

第一，张程本人是真的有所作为的，在他这个回答已经提及了。

第二，从张程的发言来看，他对《睡前消息》提供的产品是满意的，这一点毫无隐瞒：你如果要问我督工的视频内容本身有没有意义，那当然是有意义的，把地方债问题广而告之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是给当地做旅游宣传和招商引资宣传，难道就没人发现视频里面很多地方像旅游宣传片吗？所以我不但口头觉得视频内容有意义，而且我自己也转了视频

他批评的是这个产品造成一种不副实的形象，而团队本身是坦然接受，甚至暗示、

引导。
马前卒团队的视频做的不错，这一点哪怕是昔日马前卒在知乎上的顽强论敌如白头豕也不吝赞美。而根据上面指出的情况受众情况，资本确实总能在市场经济中精明的接住狗盘子，他的这种视频也可说是满足了当前网络知识阶层的需要。可这是马前卒之荣，还是网络知识阶层之耻？动机的揣度或许难免落到自由心证，我姑且不去谈他，单从其产品来说：
第一，《睡前消息》无调查之功，至少比传统媒体行业的记者要差得远，主要是会编已经报道的新闻甚至是旧闻，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
第二，其所着重的议论，从社会化抚养到关注人大选举，不是汗漫不实，就是空疏无当，其实还不如没有的，只又充作一个消遣。如社会化抚养（读作：习艺所，或者用中国更常见的：豫章书院），更是祸心之包藏昭然可见，背后一套逻辑实则是潦草凑泊、不成东西。这方面的批评也有很多，总的批判，张程与白头豕就颇有见地。如果多了解一些马前卒先生，熟悉他的“隐微写作”，疑心到马记视频上也不为过了。不过我似乎指望得太多了。对知乎上的各位，确实，只要什么消息能传播得广一些，已属功德无量。

已注销

很简单，马前卒的工业化就是一切为原始积累服务。想一想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其实就明白了。而这个剥夺抚养权要和延迟退休一块儿来看，其实都是为了工业的原始积累创造条件而剥夺抚养权，当然，是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比如当年工业强国的英国，就曾经实行过《济贫法》。而所谓济贫法，其中有规定就是把贫困儿童和青少年收容到贫民习艺所，然后把孩子们送到济贫学校里去。而在当时的英国，所谓在习艺所里学习劳动，和把孩子送到监狱里参加强制劳动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英国当时的济贫所，又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

而至于这种习艺所为什么被称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我们大可以看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是怎么描述的：

1834 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

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支持公立办学，当然支持国家出资给每个孩子接受平等而公正的教育，当然支持给所有孩子一样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但是，社会主义绝不去剥夺家庭的抚养权。相反社会主义还要把已经被资本剥夺的抚养权交还给孩子的父母。

因为，恰恰是企业的剥削，资本的压榨，让孩子的父母们失去了抚养孩子的能力，也失去了抚养孩子的欲望，失去了照顾孩子的时间和金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从源头，即从资本自身的残酷性来解决。如果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所谓收回“不称职的父母”的抚养权，不过是为了加速资本积累的更残酷的手段。

而今天的企业家们总是嫌孩子们太娇气了，太娇生惯养了，或者是被放养久了，太不服管了。总之，资本家觉得孩子们不是一个好的螺丝钉，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喊着要接受父母们的抚养权，而这一切都并不是为了孩子们好，尽管他们口口声称这是为了孩子们好，但实际上不过是要好好地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螺丝钉而已，为了更方便地压榨他们的价值而已。这就跟当时颁布济贫法的英国一样，他们绝口不谈是这个制度造成了失业，这个制度制造了贫穷。只是大声呼唤着“贫穷就是犯罪！穷人就是罪犯！”

而我们可以看看马前卒在谈抚养权的下面的一段话：

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生了一胎就觉得压力大，生二胎就觉得影响生活质量，所以生育率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很多人生了孩子也没有能力好好教育，甚至连不虐待都做不到。这几年连续有新闻出来，说大凉山那边的孩子出来做童工，做格斗表演，被政府送回去之后又出来，就是因为那边的父母根本没法送他们正常上学读书。2017 年还有好几个新闻，都是父母在公开场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拍下来报给警察，警察批评教育之后只能继续让这些不负责的父母把孩子带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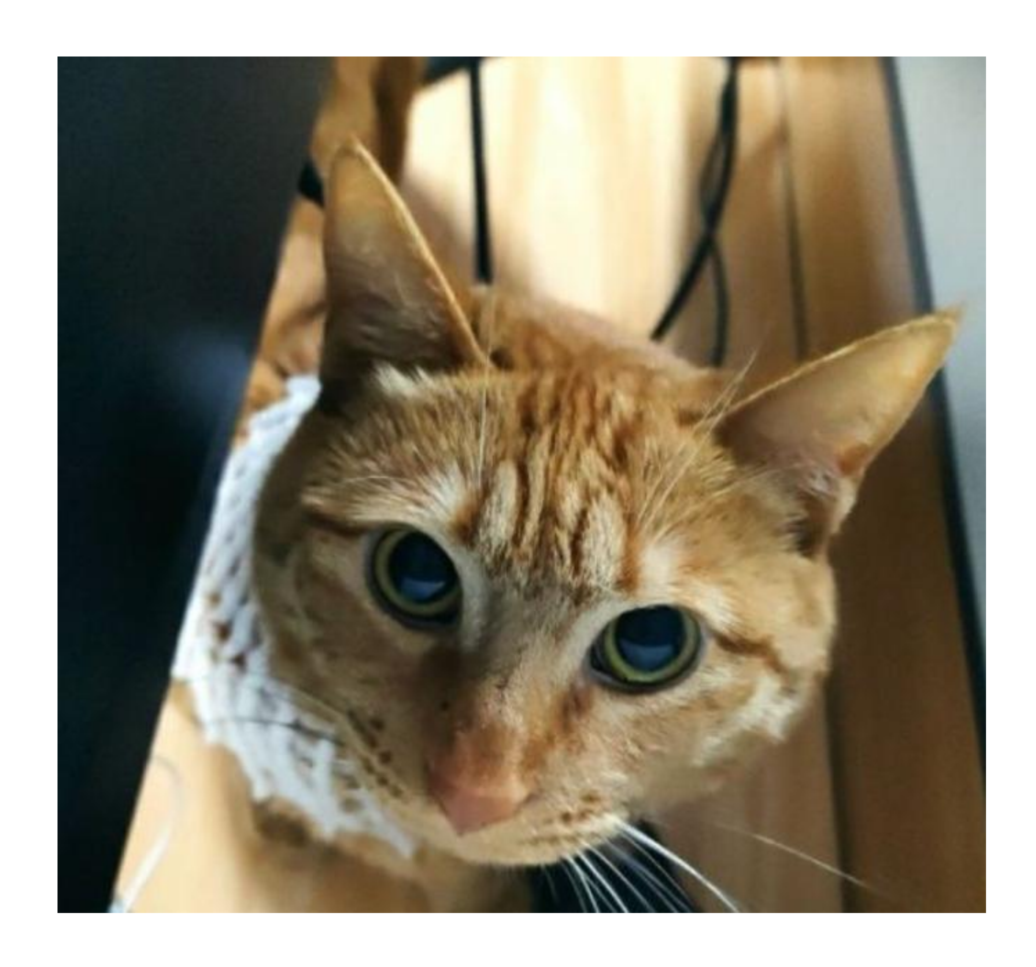
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越来越没有能力承担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中国需要尽快建立社会化抚养制度，需要剥夺很多父母的抚养权，下一代孩子可能会有很高比例在家庭之外长大。这样才能保证新一代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在这段话里，马前卒避而不谈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不去讨论为什么孩子的父母们没有能力和时间去教育孩子。反而绞尽脑汁地为了解决“活的资本”的问题，即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提出了马前卒自己的济贫法主张！可见，马前卒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的本末倒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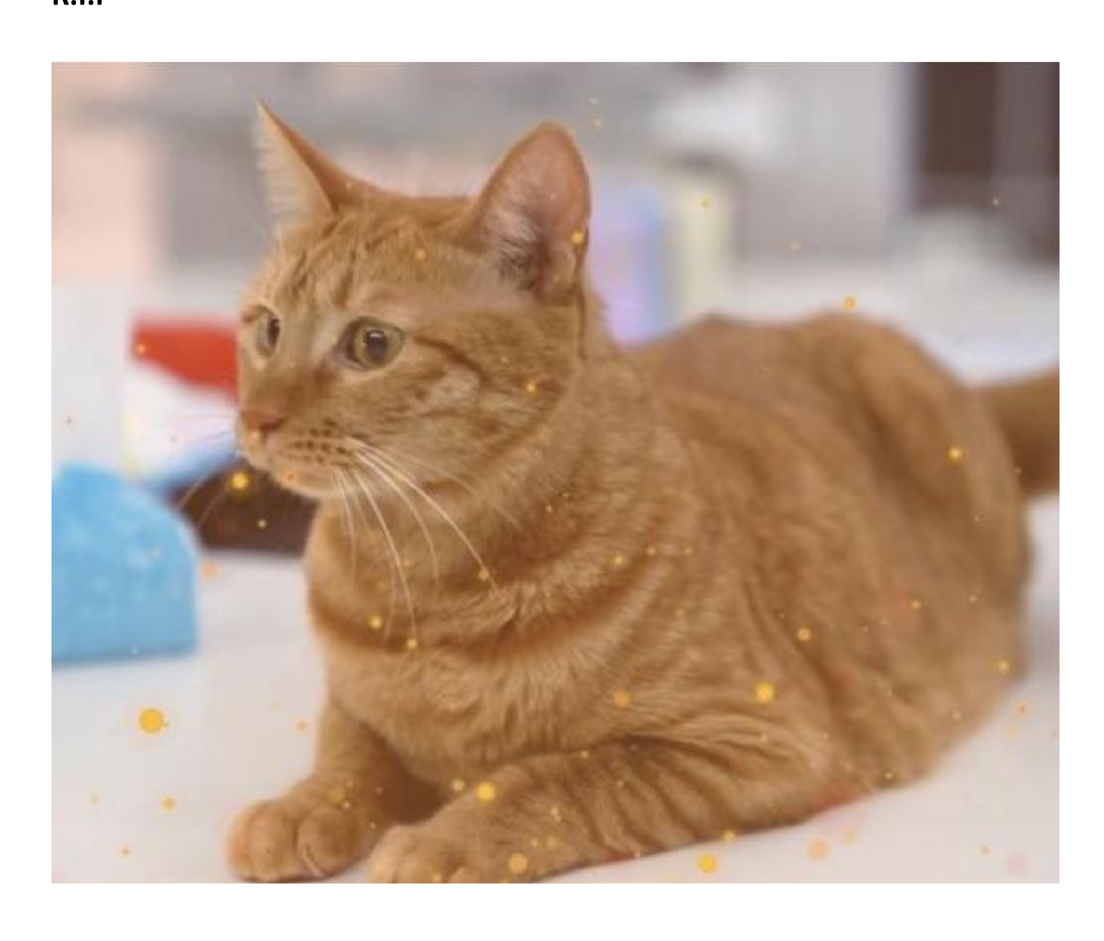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马前卒真是太现代了！他发明了新的现代传统，而这个现代传统就真实的存在于 19 世纪的英国！

狗熊吃麦片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阐述里，【家庭】不是一个亲情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不是指父母，子女，互相好不好，管不管的过来，而是指父母子女之间稳固的财产关系和继承关系，构建成了社会的最近本单元，并衍生出整个经济体系。
所谓消灭家庭，不是拆散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剥夺某人的抚养权之类扯淡，而是从经济上消亡家庭财产，财产继承，这样子女的教育自然成为了【公共事务】，因为子女不再在经济上附庸于你，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珍宝，马恩是从济贫院和习艺所时代过来的，他们能不知道在还存在经济附庸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化抚养是什么破事？
而到了睡前消息，所谓社会化抚养不就是个大号的寄宿制福利院吗，父母们大大方方承认没有能力，时间，经济去照顾子女，往里面一扔了事，至于福利院好不好，这谁关心啊，反正自己 996 之后是一点照顾子女的心情都没有了，他不会想这个大号福利院里面的也是和他一样的社畜，会不会有心情对别人子女更好，扔就完事。
这种社会化抚养和社会主义有啥关系？难道是因为名字里都有社会两个字吗？
在家庭经济关系还没消亡的时候，先把家庭亲情关系拆解了，这倒是个新鲜事，相当于脑袋要向前，但是下半身要向后，这人还能不能活下去就只能看天意了。
我倒是有个问题，在学前这个亲情关系培养最重要的时期，把孩子扔这种大号福利院，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你们考虑过没有，每天 996 回家爽是爽了，过几年扔回来一个各种意义上的【陌生人】，仅靠血缘这种的名义关系，还会促成家长继续对孩子投入教育资源吗？这样演化几代，怕是社会崩解指日可待啊。
啥，你说这社会化抚养是针对底层的？
那资本家太几把爽了，没有了家庭观念的原子化社畜，每个都是原子化螺丝钉，工厂化产出，定向培育，从小思想灌输，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R.I.P



（谬）工人不加班就与先进生产力分离

如何评价219期《睡前消息》？

睡前消息，问题收集器 答案播放机

105 人赞同了该回答

所有指望严格执行劳动法的人都应该回答一个问题。

现有工资5000，实际工作时间12小时。为了符合劳动法，直接改成基本工资2000，加班费3000，你的选择是：

1 离职，工资侮辱我了，我绝不给这种公司打工。

2 很嗨，老板维护法律尊严，和我站在一个立场上。

3 改不改都不影响我的选择，一回事。

当然还有第四种选择：我们好好讨论阶级斗争呢，你为啥要让我讨论具体问题！

这里的工资可能是5000，50000，500000，总之你可以三选一，自己不知道怎么选，也可以明年校招看看互联网大企业是不是招不到人了。

马克思的历史经验比我们少了100多年，但起码他懂市场规律，知道，所有搞“面包最高限价”的政权都没混出什么结果来。

马克思之所以要说服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希望人不当朝三暮四的猴子，也不当隔屏搔痒的笨猫。

← 详情



马督工

51分钟前 · 2.5万浏览

＋关注

讨厌这些“不为社会造福”的企业很简单，打车只打传统出租车，装网约平台的不要。吃饭坚决自己上门，外卖平台不要。买菜只去菜市场，任何APP不用，自然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不靠倾销补贴也能淘汰一个行业，说明这个行业根本就不该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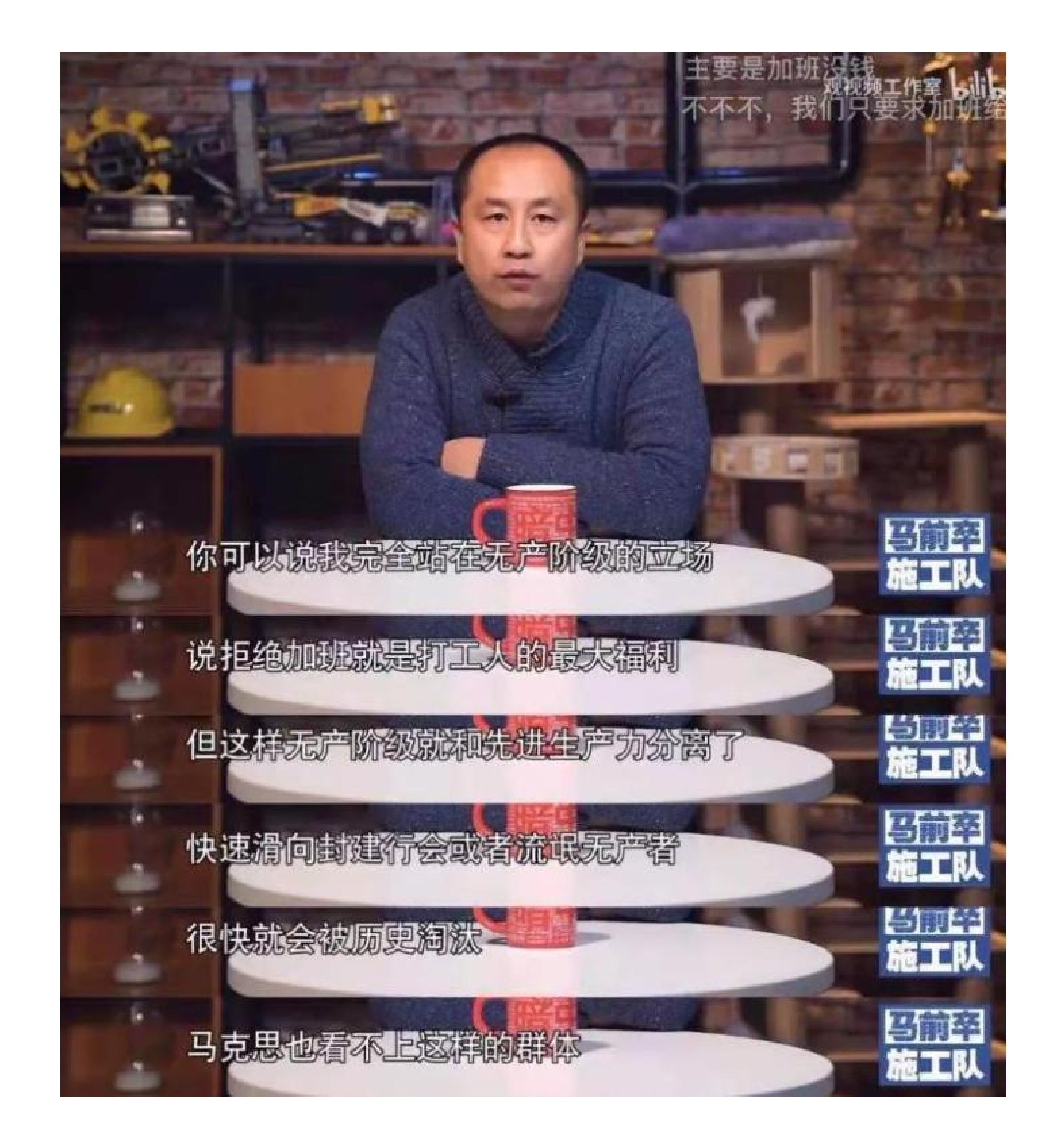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自己聊聊去菜市场买菜的经历，过去打车的经历，尤其是西安这种城市。

@观视频工作室

本期陆铭老师提到，近一段时间，有几家企业出道的频率有点点高，又是买菜又是996的，号称是什么“科技”、“创新”云云。这种企业既不搞科研，也不为社会造福，就是为了多拿多占国家和社会的资源而已。陆铭老师说，我们中西部还有那么多同胞还没完全脱贫就业，正需要工作的时候，企业不考虑正外部性，拿了补贴急着推动像“机器换人”这种操作，这不是给脱贫工作添堵嘛？#一勺思想# #陆铭#

观视频工作室 bilibili

转发　评论　点赞



网友评论

主动寻求加班是因为底薪太低，底薪太低是制度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这样的制度目的就是让你不得不主动加班。996ICU 开始这个问题我提过不止 10 遍了。
环卫工人要是再广州能拿 6000 底薪，你看他们主动不主动要求加班。
更极端的例子：保险。卖保险签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代理合同，原因是什么？难道是遵守劳动法影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既然提到环卫工人，为什么环卫工人收入低他马前卒心里没点批数吗？
环卫工人的工资，从政府拨款开始，逐级承包，每一层都插手捞一点，捞到最后就的和最低工资差不多的数字，这还没完，最后那一级还时刻想着再捞一点，通过定位手环和各种莫名其妙的罚款，有的是方法。
还有睡前消息这个回答，简直就是搞笑：
规则要是老板来定，还要法律干什么？合着你老板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其他人

都得听你的？
老板想定什么规则就定什么规则？他以为他是谁？法律还得人大开个会呢。
月薪 5000 工作 12 小时，这个具体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法律强制规定月薪 5000 工作 8 小时，如果老板敢违法，罚的他倾家荡产。
否则下一个问题就会是：
现有工资5000，实际工作时间14小时。为了符合劳动法，直接改成基本工资2000，加班费 3000。
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以前珠三角很多采取计件工资制的厂，老板会精准的调节每件产品对应的工资，让员工工资总是保持在一个定值，比如一个产品绩效 50/件，你做 100 个产品这拿 5000，于是下个月你做 120 件就能拿 6000 了？
想得美，一开始确实可以让你拿 6000，但当大部分工人能做到每个月 120 件的时候，老板会在下个月把单件的绩效计为 40，你做 120 件，拿 4800。
想拿 6000？多干活啊。

马前卒作为公司老板，自己凌晨加班赶出来的重磅文章，自然是先给自己一个理由，然后再来解释这个理由。补充 1 句，本期这种半夜鸡叫式的赶稿行为，翻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说不上什么马逆本性暴露，无非是他凌晨喝着麒麟一番榨，打着帝国 2 重置版，一心搞个大暴论，杠精上脑，非要和主流意见对着干，结果自然就是被批判一翻。

补充：工作人员静静结婚之后第三天就回去加班。

（驳）鞭策工人卖命，是马督工的职责

作者：网友火箭军

拼多多 23 岁女员工深夜猝死，刺痛了互联网，全网掀起一波波声讨加班、“过劳死”的怒潮。

为资本枕戈待旦的狗腿子也闻风而动、蜂拥而上，一边伸卷三寸口条，把吸血公司舔得“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一边挥舞精神皮鞭，狂抽底层劳工。

工业党头牌马前卒也不甘落后，急吼吼地跳出来，捧出了为资本家尽孝的观视频《打工人不想猝死，就要比拼多多更快》。

观视频工作室

+关注

今天 08:40 来自 微博 weibo.com

【打工人不想猝死，就要比拼多多更快】#睡前消息# 去年有位朋友发现，提到国家大趋势的时候，观众非常乐观，评论和弹幕一片欢腾；但是说到具体社会问题，气氛立刻转为压抑，出现浓厚的怀旧和颓废情绪。最近的拼多多事件再次证实了这条规律。今天，督工从拼多多的话题开始，悼念22岁的早逝打工人，聊聊所有打工人的未来。 观视频工作室的微博视频

无需瓜民总结，马前卒自己点睛：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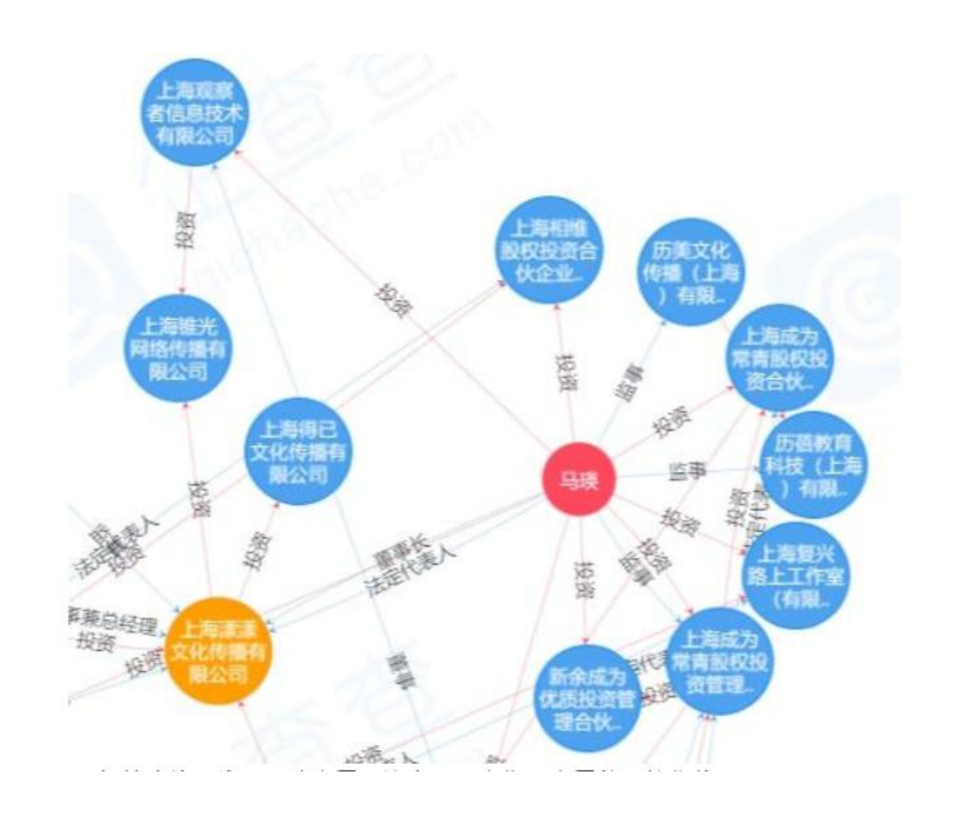
对无产者来说，还有比这更通俗易懂更简明精练的《资本论》译本吗？

爱国“左翼”马前卒翻车了，不知是否史诗级，但是，有很多之前相信马前卒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看穿了”“失望了”，是肯定的。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工业党的星辰大海，从未没飘过一叶无产阶级的小船;工业党的宏大叙事，一直在用无产阶级的肉来充实，一直在用无产阶级的血来润色。

马前卒从坦胸露背到赤身裸体，只是量变不是质变。始终如一的是他的假马克思主义嘴脸，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资本家走狗本色。



马前卒在《马平：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中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

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世界性强国的历史。英法是最早的工业国，可以占最好的市场和殖民地。美国和苏联来的晚，在一定程度上就要靠人均资源。

但是这些道路我们都走不通。学英国没那个时间，学美苏的话人均资源太少。

这里先引用一个细节，准确地预言了中国发展要靠人力资源：因为中国最丰富，最可依靠的资源就是人。

发展到今天，人均 GDP 和收入今年都超过了俄罗斯，东部几个省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们把本国的劳动力卖了还不错的价钱，换来了产业升级需要的物资。

划重点："这意味着我们把本国的劳动力卖了还不错的价钱，换来了产业升级需要的物资。"

为马前卒鼓掌吧。

这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不拼殖民地，不拼人均资源，只拼劳动力。

马前卒进一步深刻："勤劳必须和工业结合才有意义"。——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劳动凝结到工业品中出售，才能为资本创造巨量的剩余价值。

马前卒的工业化大目标也浮出水面，延续中国过去的经济奇迹，继续剥削中国劳动力。

“中国容不得慢，慢下来血更多！”“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危害性也更大。”(马前卒)

马前卒从未骗过打工人，他光明正大地给打工人指出了两条道路——要么成为“发展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落后的牺牲品”，一个前途——牺牲品。

马前卒又名马督工，即：拎着精神皮鞭监督工人卖身的“拿摩温”，一边出卖自己的灵魂，一边出卖无产阶级的身体。

认马督工为兄弟的打工人，不过是被马前卒卖了还在替马督工数钱而已。

本来，22 岁女工成为拼多多发展的牺牲品，正是马督工鞭策万千劳工的的励志人设。然而却招到互联网的一致声讨。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马督工若不跳出来反击这种“我懒我有理”之极左 8 小时工作制流毒回潮，那还叫 TMD 神马督工？

马督工上面这段话也是他的陈年老调：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必需品，否则就得搞终身雇佣和高福利，比如许多亏损国企，比如说现在经济停滞的日本。但这条路显然是死胡同。(马前卒)

高福利养懒汉，高福利拖累经济，这种滥调，在欧洲主权危机暴发之后，就成为了全球资本媒体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一致口径。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口黑锅。

马督工操作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马家功夫”，打出“闪电五连鞭”，连抽了封建行会和流氓无产者。

不错，马克思批判封建行会小生产是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落后的生产方式，认为流氓无产者是比产业工人落后的群体。但是，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产业工人拒绝加班就会滑向(还特么“快速滑向”)封建行会或者流氓无产者呢？

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延长了工作日，因此，不仅剥夺了人类正常的道德和物质发展和活动条件，从而导致人类劳动力的恶化，而且还导致这种劳动力本身的过早衰竭和死亡。”

1866 年，马克思创建的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自己支配，八小时休息”的口号。

恩格斯曾经这样批判流氓无产者：

“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显然，导师对流氓无产者的批判，仅限于他们被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而资本的乏走狗马前卒，也在批判流氓无产者甘心被资本收买，去干马督工压迫劳工之类的反动勾当，这特么的不是在恶搞吧？

马克思看不起封建行会和流氓无产者，倒是很看得起资本家的走狗，是吧？

没猜错的话，马督工正在学习马保国掌门，向快手网红路线转型。对他的变色功夫，我是相当佩服坚定看好的。

马督工的本家掌门马保国，总结了马家功夫的精髓——“没有套路，只有散手”。

马督工显然已深谙马家功夫之精髓，把马克思主义体系修成了断章取义的散手，想吃哪块就割哪块的分割零揪。

总之，工业党头牌马前卒不问姓资姓社，实则铁杆姓资;马前卒披着马克思主义羊皮，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绑上资本的战车，源源不断地给资本家奉献剩余价值。

（驳）马前卒的先进生产力

子午按：观网马前卒在睡前消息 219 期发表了一段暴论，“拒绝加班……无产阶级就和先进生产力分离了”。

视频中，马前卒还贡献了一个金句：“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在前几天的文章中笔者顺带提及了此事，工业党们的逻辑其实就是“无产阶级都不想加班，还想高工资，民族工业怎么保持成本优势？又怎么跟西方帝国竞争？还怎么星辰大海？”

上面的截图来自网友后台留言，网友希望笔者就此谈一谈，对于工业党的陈词滥调笔者很久没有看了，也没什么新鲜“创意”的，但这样的“陈词滥调”的确误导了很多爱国青年。

笔者的朋友白头豕专门写了一篇反驳文字，通过本号在公众号平台发布，标题为笔者所加，供网友们思考讨论。正文内容已在知乎答题“如何看待睡前消息 219 期”下面发出，欢迎知乎网友关注“白头豕”。

作者：白头豕

马前卒䌽错得离谱，也暴露了他之所以成为“工业党”，因为一贯以来既不懂科学，也不懂科学社会主义。

最核心一点，互联网公司 996 和 “生产效率”一丁点关系没有。认为增加工时就能带来先进生产力，完全是对技术、科学社会主义的无知。

一、社区团购大战不是先进生产力

首先，拼多多之所以加班，并非源自提升生产力的动机，而是源自竞争。竞争的对象是资本青睐的“社区团购”新战场，竞争的目标是抢占供应链和 C 端市场、从而抢占融资，进一步打败竞争对手实现垄断。

而推行“社区团购战略”，产研运也只是工具人，核心竞争力是巨量资本（地推，宣传，整合供应链），形成所谓的“社区团头商业模式闭环”靠的是金融手段。否则社区团购的天下应该是早期创立和深耕社区的初创（兴盛优选等），而不是中途杀出的美团优选、橙心优选和拼多多。

垄断代表先进生产力？垄断代表的是最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比起提高生产效率而言，干死竞争对手才是最优先的。

拼多多、美团、滴滴、菜鸟等先后杀入社区团购，是资本主义无序竞争的典型示范。假设社区团购的程序真的能提升生产效率，赶工做四套、十套、一百套烂系统有必要吗？社区团购系统快速过剩，然后在资本泡沫吹破后灰飞烟灭。过度竞

争、过剩生产的代价，就让大量工人失业、供应商破产来承担，而资本风险像 ofo、p2p 一样通过金融系统层层转嫁给普通百姓。

社区团购或许是生产力发展方向，但社区团购大战不是。这是经济领域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牺牲打工人的健康和前途，以打工人为炮灰的不义战争。最后极少数公司员工得到高回报，就像战胜国的侵略者一样，而打工人整体的利益严重受损。

二、快速形成垄断不是为了生产力，而是为了无序竞争获胜

大量巨头涌入社区团购，面向竞品编程（抄袭竞争对手的系统和方案），是为了更快提高生产力吗？不是。社区消费生产力的提升早一点，晚一点，不影响国计民生，不是造原子弹。相反，生产力提升过程对社会秩序的颠覆和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稳步消化这一代价，才关系到国计民生。

你说中国修建水利工程是不是利国利民？可五风时期为了修水库争政绩，到土地撂荒、用暴力强迫劳力上工地。于是毛老师说：

> “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
> “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 “不要承虚名而受实祸”
> “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现在社区团购号称能颠覆几亿城市人口的菜篮子，对小商贩市场的大规模兼并。那被颠覆的人怎么办？谁来承担他们转型的经济代价、社会代价？

说白了，社区团购大战就是靠巨量资本的无节制竞争（低价促销）去快速赢得垄断，而把转型过程的风险和代价转嫁给政府和人民承担。

未来社区团购的模式能不能赚钱还有疑虑，不赚钱的话，资本直接撤走就是了（所谓退出机制）。而被破坏的小商贩经济朝夕之间是无法恢复的。P2P 就是例子，带来生产力进步了吗？

三、疯狂加班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是为了超额积累剩余价值

马前卒和一些回答，都主张程序员的劳动不是可以通过加人来提高的，部分人拿出《人月神话》做例子。这又是典型的不动脑筋。

论单个功能点，人月神话是合理的，如同怀胎十月，无法通过增加人力来解决。但社区团购系统的开发是单个功能点吗？恐怕同时进行好几十，好几百个功能点吧。更不用说随时涌现的大量 bug 还需要修复。

加人当然能够解决多功能平行开发的问题，要横向拆分都解决不了，架构师就德不配位了，还先进生产力？小作坊生产力吧？所以现在人力市场最火的是在线教育和社区团购，美团优选、橙心优选等都在放宽要求拼命招人、挖人。甚至不惜涨薪几成、周末加班双薪……多么无知才认为加班不加人？

马前卒说的沟通成本问题更是荒谬。正是因为软件工程协作沟通成本高，所以才容易出现“单点依赖”，掌握关键信息的人成为多方依赖对象，导致整体进度阻塞在单点上。怎么解决？当然是加人来解决啊？而且就像加数据库、加消息队列、加服务器一样，人才储备要做到 “冗备”，主从、无主化、异地多活……

靠大量加班把关键节点集中在几个高度疲惫的个体身上，他生病倒下了、干不动离职了，项目怎么推进？新人接手的成本多高？只有白目才认为沟通成本高的解决方案是“单点依赖”！

拼命加班根本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是为了赶进度竞争之外，做出更好看的收益报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每年就节省了几十万的运营成本（除了薪酬，还要加上工位、IT、资产占用、后勤管理）。然后账目全都做到利润率上，账目越好看，资本越高兴，融资的额度就越高、对手的生存几率就越小……自己才更有赢得垄断的机会。

所以拼命加班最大的好处，就是用超额的剩余价值剥削，来对冲烧钱侵略的巨大成本。别忘记了，到了公司上市之前，还要再裁好几拨人的，毕竟软件行业是重工业，产研离职了，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丢服务器上就能运转，资本积累越多，越排斥人力。

四、个体拼命加班无法提高生产力，只是提高剥削率

资本的利润从哪里来？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生产效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提高剥削的比例。

说互联网公司 996 加班能提高生产力，就好比说周扒皮半夜鸡叫能让农民变超人一样扯淡。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越是加班，劳动效率就越低。

之所以加班让劳动效率降低，产出还能提高，是因为 996 的软件企业都在堆人力做毫无效率的低级重复劳动而已！

软件行业是最先进的生产领域，因为可以通过不断封装实现生产力的指数提升。想要提升生产效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投资时间。具体而言，培训工程师的技术能力，多做抽象封装，增加自动化测试，多写开发文档，多做 code review，允许工程方案上试错…… 脑子累得一团浆糊的程序员，能写出好的代码来？

试问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尤其是 996 的互联网公司，哪一家的代码不是屎山屎海？原因很简单，为了竞争而快快快……根本没把时间投资在工程质量上啊。

你都读了人月神话了，知道一个 200 工时的项目无法靠堆人来加快进度，那要提升工程质量就需要投资 400 工时，而竞争对手屎一样的代码早你一个迭代周期上线了。你要屎山还是要火箭？

没有劳动效率的提升，只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它不会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只会日益拉大贫富差距。否则农业社会进一步倒退为奴隶社会，生产力不是提高更多吗？马前卒真的毫无常识。

极低工程效率堆砌出来的代码，会导致递归式的开发。每增加一个新功能，之前的 N 个功能都可能受影响、出 bug，要各种连锁修改。当系统太烂，开发效率降低到 N * N 之后，程序员们就会选择重构，用 N 倍的时间把整个项目重写一遍。而在资本无序竞争的前提下，等你要重构代码时，竞争对手基本都死绝了！

所以最本质的原因是资本逐利。当资本需要的利润，可以通过延长工时来获得时，它就没有投资生产效率的动机。于是垄断资本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反而带来技术的倒退，让第三世界为发达国家充当血汗工厂。

恰恰是工人斗争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才有动机通过自动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升生产力，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者降低维护成本。

无产阶级在生产力上的先进性从来不是体现在爱好加班上，而是当劳动主体化后，拥有强烈的动机推动生产效率的进步。新中国许多技术进步，都源于一线工人的创新。相反资本为了维护剩余价值，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甚至让它倒退。就像化石能源巨头阻碍新能源技术普及，互联网 996 公司也在阻止程序员对优秀工程质量投资。

五、劳动者需要加班来提高生产效率是鬼打墙

马前卒为了按时加班有利于生产力提高，提出了工作之外学习论。打工人要跟上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不都是打工人打出来的吗？），工作时间之外还需要学习成长。

试问产研 996，十一点下班，睡醒第一件事就是上班，一天工作 12 到 14 个小时，除了工作中积累的重复劳动经验，还有什么时间用来学习？ 且不谈高龄程序员连陪小孩的时间都没有，低龄程序员加起班来连男女朋友亲热的精力都没有了好么？

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恋爱、抚养、锻炼身体、休息甚至按时用餐都因为超长加班顾不上了。马前卒却劝你还要学习，否则赶不上企业？？

很明显企业的策略就是，通过加班极端压榨产研的产出，不投资他们的成长；而把技术进步交给更年轻的一代（人口红利），等到产研年龄过 35，凡是没能达到专业高度的就淘汰（361、不续合同）；换一批技术更新，年龄更轻的新生代。软件行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越年轻技术栈越新是必然的。

而对于产研而言，最差情况是 996 还在睡前、上下班通勤中学习技术；其次是 8 小时工作制，剥夺业余时间学习新技术；再好一点是企业投资 20% 的时间，让员工在工作日里有组织地学习新技术；最好是专门从事新技术的研究（所谓科学家）。

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就需要更高效率的工作状态，而不是更疲惫的重复劳动，更不是在加班中异化到仇恨代码、天天想着删库跑路 “吾与汝协亡”……加班越少越好。又逼人加班，又逼人成长来摆脱加班，不是鬼打墙吗？

六、没有绝对的生产力进步，只有属于谁的生产力进步

马前卒之流的“工业党”，总在暗示有一个绝对的“生产力”，而且是可以通过超额剥削积累的方式来发展的，当它充分发展之后一切社会问题烟消云散。

脱离生产关系来谈生产力就是耍流氓。

当生产力掌握在劳动者手里，原本要 100 个小时的工作变成 10 个小时完成，我们可以多出 90 个小时用来创造更多的东西，或是提升技术，或是享受生活。

当生产力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原本要 100 个小时的工作变成 10 个小时完成，他们会 10 个人中开除 9 个人，让剩下的一个人继续 996 承担所有的工作。

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美好的生活，还可以用来造毒气房高效率屠杀，可以用来造算法做外卖骑手的牢笼，可以做电子监工检视员工离开工位时间、闲聊时间、拉屎时间。更可悲的是，大数据时代，是劳动者用自己 996 的加班生产出来的 “数据”，养大了取代劳动者的 “算法”，让他们失业下岗。

马前卒通过鼓吹加班必要性（工人喜欢加班因为工资更高，却不谈工人为何要加班来维持基本生计），对于外行人而言是说提升了生产力，而实际上只是在巩固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而已。

当这个生产关系通过积累剩余不断发展壮大，让人类的贫富差距不断创下文明史的最高，它将投资到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投资到巩固剥削的秩序？这与主观意志、良心道德毫无关系，因为没有良心的资本一定会在无序竞争中吞并掉有良心的资本，这才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经济逻辑。

马前卒总在暗示有朝一日无产阶级可以把血腥积累的生产力“抢”过来（通过国家机器来分配），就通过剥削先辈完成了先进生产力建设。就像在鼓吹印第安人给欧洲强盗做奴隶一样，美洲大陆经济强盛起来了，怎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越来越高效了呢？

要推动有利于劳动者的生产力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劳动者自身的斗争，因为斗争，只有斗争，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唯一能听懂的语言。

（谬）背弃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不会保佑你

马前卒

年底整理文稿，看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19 岁男子因侮辱成吉思汗画像被内蒙法院判刑一年

现年 19 岁的宁夏籍被告人罗某某系银川市某蒙古餐厅服务员，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经常在“快手”APP 软件内发送小视频。为增加其“快手”视频点击量，今年 5 月 20 日 17 时许，被告人罗某某醉酒后，拍摄了一段脚踩成吉思汗画像的视频，并上传到互联网上。

2 小时后，罗某某在网友的提醒下，删除了该视频，但该视频已被人转发到“脸书”及微信群内。据悉，这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部分群众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严惩涉事人员。有评论称，该行为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在国内造成异常恶劣的政治影响。

2017 年 12 月 4 日、12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罗某某侮辱成吉思汗挂像案开庭审理。12 月 12 日，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当地第一起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案件，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http://news.ifeng.com/a/20171211/54072628_0.shtml

杀手成古寺住持 勾引尼姑私奔

千年古刹枫亭西隐寺微信公众号的信息更新，定格在了 2017 年 11 月 17 日，停更的原因是，该寺丧失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资格。

谁也不会想到，这座始建于宋淳祐五年(公元 1245 年)，一度香火鼎盛、僧人云集的千年古刹，竟因为住持出家前杀人潜逃、出家后勾引尼姑私奔并与之成婚生儿育女，而被当地民族宗教局收回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11 月 29 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公安局对外通报，该局破获一起 22 年前的故意杀人案，案犯是枫亭西隐寺住持释真机。

在我看来，在这两则新闻中，政府深层次的行事逻辑是一样的——惩罚破坏精神形象的人或机构。踩成吉思汗像，破坏了一部分蒙古族公民的精神偶像；主持曾经犯过重罪，这家寺院不适合再代表佛教；都要由政府出面纠正。

我不反对政府替公民的精神生活操心，毕竟人民幸福是政府最高目标。但问题在于，政府直接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这种操作方式完全违反新中国的“国本”——唯物主义精神。

所谓唯物主义，就是不承认有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要改变人的精神世界，必须要从物质世界入手，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他的思想，让他获得满意和尊严。即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唯物主义前提下，如果希望人们互助互爱，共同繁荣，政府就应该建立一系列制度，先是确保绝大多数公民存在共同利益，然后让尊重共同利益的人得奖励，不尊重共同利益的人受惩罚。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予公民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选择或发明各种物质-精神生活，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才是政府对所有公民的精神生活最大的促进。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唯物主义路线呢？

因为选择唯心主义路线的“后患”无穷，政府就算把自己累死，也不会让所有人满意。

比如说，有公民不喜欢某个历史（传说）人物（如成吉思汗、汉武帝、李鸿章、三皇五帝），那就由他评判好了，否则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后人互相攻击，难道也要政府给个结论？完颜皇族的后人难道不能对成吉思汗表示一点情绪？黄帝和蚩尤的恩怨要不要在 21 世纪来个了断？

又比如说，有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拉面教）领袖头领犯罪，那就应该依法处置这个人，但只要不是集体犯罪，就没理由要求整个寺院关闭——地方政府和国企领导人犯罪都很常见，为什么不让整个机关或者企业停业整顿？难道寺院的道德纯洁性比政府和国企还高吗？以至于要动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清理门户？以后其他宗教提出类似要求怎么办？

上述麻烦的来源是唯心主义的特性。唯心主义的评判标准是每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而“纯”精神是没有统一衡量标准的，所以唯心主义者必然四分五裂。宗教和宗教之间，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乃至于 AKB48、SNH48 粉丝内部都是尖锐对立。可以说，唯心主义即意味着思想上的“永恒封建社会”，你讨好了一部分，必然会有另一部分人不满，至少也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我猜，政府也是能预料到这些麻烦的，但为什么政府还要走唯心主义路线呢？

因为唯物主义路线必然要同时做好两件大事：革命与民主。

前面说过，唯物主义路线首先要确定社会的共同利益。革命就是要对旧社会说“不”，打碎利益尖锐对立的社会结构，然后调整财产和权利，让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物质利益。

现代社会每时每刻还会产生无数的矛盾，否定社会秩序。民主就是要对新社会说“是”，以民主程序制定规则，解决这些矛盾，避免矛盾再次撕裂社会。

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缺乏民主，结果把说“不”的革命变成了只许民众说“是”的表演，等到革命传统制造的合法性耗尽轰然倒塌（如苏联）。而有民主传统的地方往往拒绝革命，结果是在缺乏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搞民

主，把说“是”的民主变成了各社会集团在仇恨中彼此说“不”的可操控游戏（如台湾）。

无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意味着民主和革命同时成为虚幻。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走世俗唯物主义路线，坚持把现实“说清楚”，必然是越搞越乱，既否定不了过去，也肯定不了当下。所以各国统治者不约而同地向唯心主义路线转向，企图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神话来维护社会稳定，为现有秩序提供合法性。这就是宗教领袖和民族主义风潮经常受到政府支持鼓励的原因。

当然，统治者也不是什么唯心主义思想都支持，他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可控、副作用较小，似乎和世俗统治秩序能“同路”的，希望他们能在把现实的水“搅混”的同时回避唯物主义路线的艰难。所以政府总是喜欢区分“正教”和“邪教”，动不动还要出手给宗教清理门户；国家机关为某些民族主义运动撑腰，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世界上最不能讲“道理”的组织，就是唯心主义组织。因为它们存在的基础并不是有严格界定、可以客观讨论的物质世界秩序；而是少数核心人员把持、无从证实（伪）的教义或神话。如果缺乏神话，他们随时可以编一套新的出来用。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沈松侨
http://www.kaiwind.com/anticult/xingao/2017/201706/08/t20170608_5320393.shtml

而在唯心主义组织内部，因为精神世界无从测量，也往往是越极端、越偏执的领导者越有影响力，越容易取得运动的主导权。尤其是这些教义和神话意味着现实利益的时候，主导者更有动力去制造一波又一波的“纯洁化”运动。所以，唯心主义组织总是得寸进尺，从不满足于既有的社会契约或利益分配，总想主导一切。这就是我经常喜欢说的一个概念：

【所有的宗教都是老牌邪教；所有的邪教都是经验不足的正（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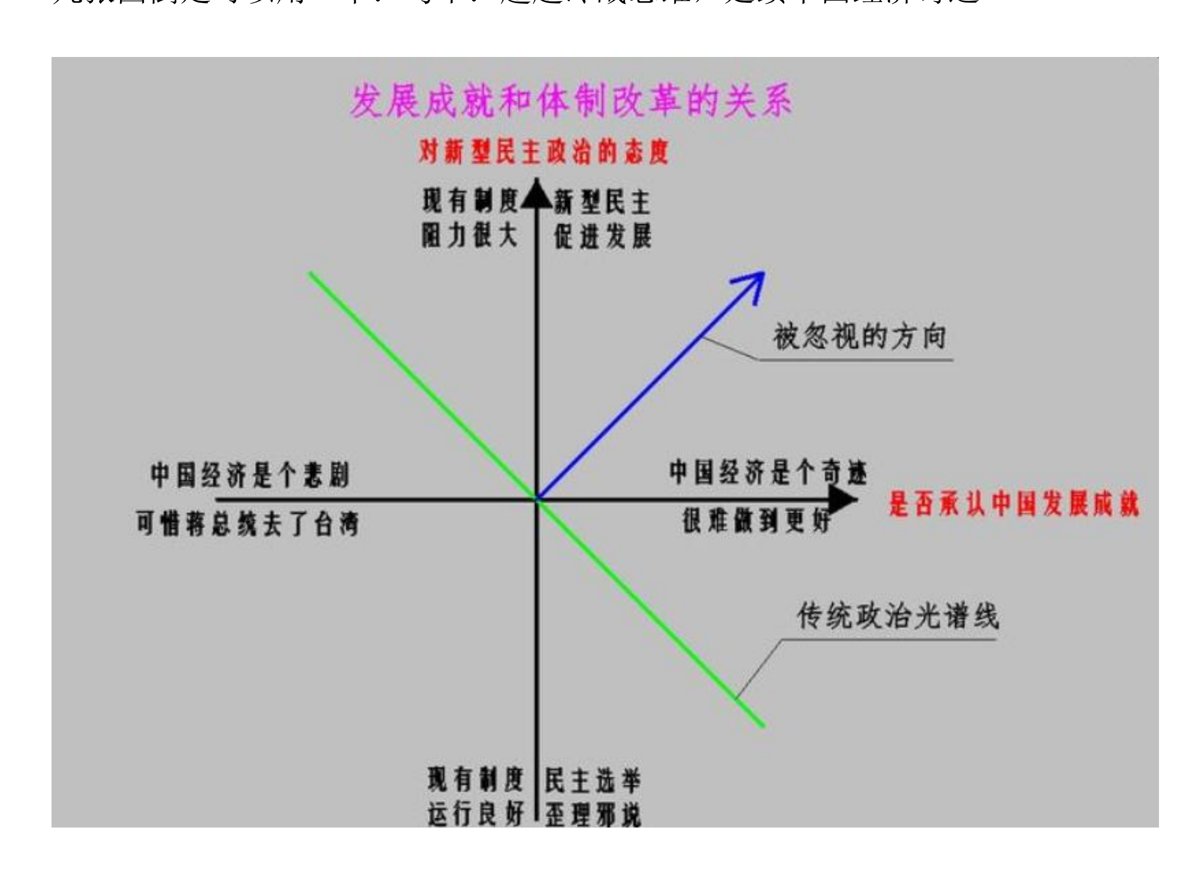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借助唯心主义路线维稳或搞动员，是一条玩火之路，或者更严重一些，是在木房子里点火取暖，非常容易引火烧身。冷战结束快 30 年了，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要么是“政治正确”导致的经济摩擦力加大，要么是宗教-族群冲突导致社会动荡，要么兼而有之，根据前面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可以归为唯心主义路线失控。政府眼下利用民族（种族、地域）主义，和宗教领袖合作，向他们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许可以缓解短期问题，长期看来，必然是抱薪救火。所以我在说文章开头的两个新闻不能轻视。

前面我提到，唯心主义意味着思想上的封建制。所以，只有现实中的封建社会才需要和唯心主义结合，搞政教合一或是民族压迫。但即便在纯正的农牧业封建时代，封建社会也不是一个稳定结构——扩张的时候大家都开心，分封的地盘都是各自的增量。一旦扩张遇到边界，封建主义立刻就会导致中央权威瓦解和内战。周天子和蒙古帝国的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21 世纪的现代社会必须极力禁止唯心主义思潮干预现实的社会运行，必须保证社会纯粹的世俗化，具体来说，就是让革命传统和民主秩序相结合，不给唯心主义思潮提供任何需求。革命和民主好比现代社会的两条腿，砍掉哪一条也站不稳。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被写进宪法的国家，这本来就是所有公民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具体怎么做呢？这事儿不好说太细，等眼下这个时代碰壁再说吧。不过我之前有几张图倒是可以用一下：马平：超越冷战思维，延续中国经济奇迹



二维政治坐标系示意图

政府调控强度

大政府 | 强计划

可尝试方向

小集团专政
控制舆论

大众参与决策
舆论放开

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

传统政治光谱线

小政府 | 自由市场

年底了，天大的问题也得留给下一年，祝各位元旦假期愉快！

（驳）就马前卒先生“背弃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不会保佑你”一文的几点想法

天王云国度

最近拜读了 @马前卒先生的“背弃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不会保佑你”一文，此文引起了知乎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此我也是思绪万千。我不过是千军万马中一无名小卒，对于哲学、政治本无涉猎，随意评议他人是肤浅的，但想到唯有智慧之门是没有门槛、欢迎所有人的，我便开始动笔，以飨各位。我在这里不是单纯地评论这篇文章，而是就此文来评论以马前卒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哲学。本文主要由对原文的引用、自己的想法和原文的评论三部分组成，欢迎大家建议批评！

我关注@马前卒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以前他许多见解是鞭辟入里的。这篇“背弃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也不会保佑你”（以下简称“背”一文）则是具有标志性的，它标志了死亡与诞生：即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探求者”的死亡和一个半庸俗唯物主义者的诞生。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和背景图时是提心吊胆的，读完后发现自己所担忧的果然成真了。

马前卒先生写过许多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我一直以为这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早已有定论：革命的法兰西授予境内犹太人公民权及拿破仑对这一政策的延续，使人们开始以政治的国家建立共同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血统、文化的家族和民族建立，20 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对这一新秩序的反动罢了，所以它才会失败得如此彻底；拿破仑战争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也激发了受侵略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反抗之，使得这一主义和原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确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实践只是在近代国家为单位的秩序基础上，意图将人类进一步整合为以全世界为单位的共同体（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老生常谈，马前卒先生早就提过了。

但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情况则复杂得多，以阶级、国家、民族和宗教（这里的“民族和宗教”是一个概念）这三条坐标轴，中国的人们展现了他们光怪陆离的思想：阶级史观者认为阶级是唯一真实的，而国家、民族则是虚假、欺骗性的概念；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由此再去细化讨论民族是无意义的，而阶级则是破坏国家团结的宣传战术；狭义民族主义者以“主体民族”为绪，提出国家只能由汉族这一“主体民族”领导，而他们把当今中国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执政党的“阶级史观”。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下面详述，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背”一文。

我不反对政府替公民的精神生活操心，毕竟人民幸福是政府最高目标。但问题在于，政府直接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这种操作方式完全违反新中国的“国本”——唯物主义精神。

马前卒先生在列举完两个事实后的第一个议论段便自相矛盾，那就是：如果“政府直接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是不对的，那么把“唯物主义精神”立为“国本”，

是不是“政府直接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呢？要知道“国本”不仅仅是统治者自己的事，它必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统治的社会。对此，我们姑且认为是马前卒先生修辞不当的缘故，我们接下来看。

所谓唯物主义，就是不承认有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

这句话很对——如果去掉最后“力量”两个字的话。所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哪怕只学过政府编纂的马原教材，都会知道社会意识的一个特性：相对独立性，“相对”是因为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独立性”则是在承认前者的前提下，社会意识的变化又不一定与社会存在的变化相同步，且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话不严谨，只是为了通俗说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特征）。“不承认有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道德、文化、宗教在历史上会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有人说这句话是在强调物质的第一性，这种辩解毫无意义，因为除了物质，“精神力量”别无落脚点，它最终是要在物质上生效的。故我们便无法得出这个结论：

要改变人的精神世界，必须要从物质世界入手，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他的思想，让他获得满意和尊严。

准确来讲，物质手段和精神力量应在解决这一问题中同时进行，而不是分出先后，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对不可分割的联系决定了物质与精神手段要“双管齐下”。以我国的革命为例，到底是“推翻反动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统治”为先，还是“改变工农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为先？历史表明，成功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不是等待资本主义自行衰亡，而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一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边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也只有两手硬，才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又比如说，有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拉面教）领袖头领犯罪，那就应该依法处置这个人，但只要不是集体犯罪，就没理由要求整个寺院关闭——地方政府和国企领导人犯罪都很常见，为什么不让整个机关或者企业停业整顿？难道寺院的道德纯洁性比政府和国企还高吗？以至于要动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清理门户？以后其他宗教提出类似要求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承认，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现代社会的官僚机器是更加体系化的，是相互制约更强的，而不是像封建时期那样大权独揽，这决定了现代的政府行为更加科学，所以单纯用“恣意专断”来评价政府是轻率的，我们必须要挖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枫亭西隐寺”的事我不清楚，暂且不论，但“侮辱成吉思汗画像”的事，我想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概括：

有个人掌灯走在路上，路边是一堆烟花爆竹，一旁的守卫怕路人的灯火点燃了烟火引发爆炸，便上前灭掉了路人的灯，路人因为灯灭了看不见道路，于是便大骂那个守卫。

守卫的错误不是他熄了路人的灯，而是他从来没想过把烟花爆竹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换句话说，伊金霍洛旗政府不应该通过“以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来“平民愤”，而应该学会分析并解决“成吉思汗崇拜”这一不正常的社会“民意”！而马前卒先生则告诉我们：这事什么也不用做，是对的吗？

上述麻烦的来源是唯心主义的特性。唯心主义的评判标准是每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而“纯”精神是没有统一衡量标准的，所以唯心主义者必然四分五裂。

把“唯心主义”换成“唯物主义”，你会发现这句话也成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评价”本来就是意识范畴中的概念，不能说唯心主义的评判标准是每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你唯物主义的评判标准就是物质世界，这是荒唐的。至于“所以唯心主义者必然四分五裂”，须知马克思、恩格斯与巴枯宁，列宁与考茨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他们都以“唯物主义者”自诩，并指责论敌背叛了唯物主义，正如同宗教的各教派相互指责对方为“异端”，我们是不是要说“唯物主义者必然四分五裂”呢？正因为人与人的评价“没有统一衡量标准”，导致了思想的差异和多样性，进而导致思想间的对抗。评价一个思想是否符合唯物主义，不是靠虔诚也不是靠雄辩，靠的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是否成功，这个评价标准是客观存在的。

宗教和宗教之间，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乃至于 AKB48、SNH48 粉丝内部都是尖锐对立。可以说，唯心主义即意味着思想上的“永恒封建社会”，你讨好了一部分，必然会有另一部分人不满，至少也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我并不知道封建社会如何脱离其经济基础而仅在思想上存在，但通观全文我确定，马前卒先生在有意否认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他看来，面对这些问题是“麻烦”的。试问如果侮辱的不是成吉思汗，而是革命先烈，这个问题还嫌“麻烦”吗？很难想象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会这么说。

唯物主义路线必然要同时做好两件大事：革命与民主。

这句话很突兀不是吗？按照马前卒先生前文的观点，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物质世界入手，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地位，进而改变他的思想，让他获得满意和尊严”，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均衡财富分配，而不是在上层建筑范畴中的“革命”、“民主”找办法，这是南辕北辙。对于这个子命题论述，本应是全文最出彩之处，但是抱歉，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这段论述既没有详细解释“革命与民主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不是其他事物），没有具体论述“革命与民主的应然状态”（只是泛泛而谈），也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统治者“企图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神话来维护社会稳定”（无法解释欧美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为何存在）。前文存在的问题，在这里进一步暴露了出来：片面强调唯心主义组织为“少数核心人员把持”，却无视其产生和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称宗教“往往是越极端、越偏执的领导者越有影响力，越容易取得运动的主导权”（按这个论调，基督教社会今天都应该天天烧女巫）；不做任何具体分析，把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笼统归咎于“唯心主义”；最后更是罔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原则，生造出了“思想上的封建制”这个莫

名其妙的概念，那请问为什么消灭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会存在唯心主义呢？在一系列诊断下，马前卒先生搞出这样的药方：

所以，21 世纪的现代社会必须极力禁止唯心主义思潮干预现实的社会运行，必须保证社会纯粹的世俗化，具体来说，就是让革命传统和民主秩序相结合，不给唯心主义思潮提供任何需求。革命和民主好比现代社会的两条腿，砍掉哪一条也站不稳。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思想被写进宪法的国家，这本来就是所有公民的任务。

且不论这和前文“政府直接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是违反国本的”之间的抵牾，我想请教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前卒先生，马列主义对于宗教的论述您有认真读过吗？在您看来，依靠现有的力量，果真能根除唯心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吗？要知道，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背”一文在结构上最大的缺陷在于“论点先行，论述附会”。本来只要事实充分、逻辑严谨，论点与论述只是顺序问题，但“背”一文这两点一个也没做到，所以许多网友读了以后不知所云。最终马前卒没能提供任何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我想是时候对马前卒们一个初步的评价了。让我们回到最初对“三种观念”的论述中来吧：

狭义民族主义者，我们通常称之为“皇汉”，他们无法用传统史观清楚解释当前政权的胜利，即一个以外国理论为指导的政党的胜利，是恢复中华，还是以夷变夏；也不能明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华裔的身份，是同胞还是汉奸，难道世界上还有天生的叛徒吗？狭义民族主义者，他们往往会沦为本族统治阶级的牺牲品。

国家主义者将国家神圣化，而无视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有必要，统治阶级甚至会主动卖国求荣：梯也尔之于法国、白匪军之于俄国、清政府之于中国，皆是如此，这使得“国家至上”这一国家主义的支柱成了笑料。

那么阶级史观者就是正确的吗？事实上他们混淆了对国家、民族、宗教等观念的“应然”与“实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是从其历史与本质所做的论断，并不是说这些观念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在这里管他们叫“阶级史观者”而非“唯物史观者”。第二国际的解散、中国脱离第三国际独立自主并革命成功，都反映了国家、民族这些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合理性，要建立起一个无国界、不分民族、不需要宗教的理想世界，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步一步进行，调动起上述这些观念中一切积极因素，而不是主观地泯灭这些观念的影响。

马前卒等人拼命标榜自己“唯物主义者”的身份，抛弃主观能动性而大谈特谈“物质决定意识”，因为皇帝是独眼龙，徐娘就光化了半面妆见人，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列宁曾说：“当然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马前卒把“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断滥用到方法论里，那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否定精神的第一性不是否定精神，相反是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利用精神

力量，精神所能发挥的作用绝不逊色于物质，但它确实是受物质制约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

督公在上，难得遇到能沟通的话题。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在我看来都应该改名。叫做信物主义和信心主义。因为思想只有物，难免痛苦，现实世界难免让人失望不满。如果思想只有心，难免会随心所欲心外无物。两种极端的思想，都只会妨碍人个体层面的全面性和精确性。造成分裂之人格。唯物主义者缺乏心灵的抚慰容易戾气冲天；唯心主义者缺乏融入世界的踏实容易想入非非；为什么要"唯一"呢？信就可以了。心物两通皆可运用，融会贯通知行合一，才是圆满的人格。期盼回音。谢谢。

无疑这正是落入的马前卒的思维陷阱中了，马前卒并不信仰唯物主义，或者说，他只信仰"马前卒特色唯物主义"，这个"特色主义"要对"精神"的领地进行围剿，以建立起一个思想上的"纯粹物质王国"，并把这个王国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冠名。这和那些唯心主义污蔑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如出一辙：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沉迷物质无视精神的"宗教"，宣称唯物主义必然导致人类德行败坏，然后以一个救世主的姿态假惺惺地来"感化"世人。

与此相对的则是另一种错误观点，这里先放出来，就不再赘述了：精神力量存在吗？存在就是唯物的，我党好像一直很推崇精神力量。

对此，有网友对"马前卒特色唯物主义"提出了质疑：我就问一句，凭什么唯物主义不是宗教。就你唯物牛逼吗？

没错，就是宗教，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前卒以信誓旦旦的语气把主观能动性的功能一棒子打死，去宣扬他的"特色唯物主义"，谁都不能质疑他对精神的否定，不然就是"唯心主义者"，是"伪马克思主义者"，这条铁律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不容试探的。如此"唯物主义"的结果，就是运用"唯物主义"，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去反对科学研究。文革时期的文章：相对论批判_古马_新浪博客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可证伪性，是的，你可以用一切方式，甚至包括神学，去证明唯物主义是错的，这听起来很扯淡，但在唯物主义看来，神学本来就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扭曲认识。从这个角度讲，唯物主义的信仰不是信仰，探求、实践才是信仰，这便是唯物主义与宗教的区别。

马前卒等人常常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又在忽视这个事实：为什么人们宁愿消耗大量资源、毁坏大量物质财富，而去进行一场战争、一场暴力革命。美国著名史学家杜兰特夫妇（Durant，Will & Ariel ）在他们的小册子《历史的教训》中这样谈马克思："他（马克思）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我当时在文章里写道：这看似是对马克思的质疑，却在无意中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的内在逻辑。相比于杜兰特夫妇，马前卒对历史的认识连业余都算不上，按照他的"唯物主义"，既然战争与革命会导致物质财富总量的大量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么它

们对人类发展就是毫无用处的，即使它们改变了物质资料的占有结构，但改良和改革显然同样能做到且能做的更好。马前卒等人的文章里倒少不了对革命者的赞美，但当我们拿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言论认真比照后，不难发现他们的精神分裂。

有人称马前卒是“革命者”，但革命最怕的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一面鼓动旁人暴动，一面却给国家主义阵营做爪牙。这样的“革命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革命或抗争陷入低谷期时跳出来向大家宣扬“唯生产力论”，贬低运动的意义；在革命或抗争稍有起色时却又以苦大仇深的“潜伏者”的姿态，企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和果实。他们获得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不是在切实分析各种因素及其联系后做出可行决策，而是扯着嗓子谈“阶级”，谈他们的“唯物主义”，去“泯灭”国家、民族、宗教等等，末了还不忘感慨“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在完成“唯物主义者”的包装后，马前卒等人并没有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急匆匆地“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不是信条”的旗号，却在做着同过去修正主义没区别的举动，说白了他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颠覆马克思主义。手段形形色色，但大体可分为两种，就是放大错误和“制造”错误。

我们也承认，马克思不是超越历史的，他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后人的验证与发展，但马前卒们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我们权且当他们真的发现了局限），显然不是为了这个。

且不说论述有没有逻辑，但就其治学态度，我们就不得不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退一万步讲，即使马克思没有充分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及其意义，也不能妄断“《资本论》真的是太罗嗦了”，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贯穿了整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工业革命，马克思从来是高度重视、高度评价的。你可以说因为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以他用以论证的事实依据会很单薄，但这根本不能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错的！

“制造”错误，除了无限放大，马前卒等人也在用歪曲事实和原文、伪造数据的手段来附会自己的理论，这种情况很多，下面这篇文章讲的更直观些，到此，挂“唯物主义”羊头的“马”家店彻底破产了。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一死一生”。所谓的死亡，更确切讲是马脚包不住了，马前卒们的哲学或许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在里面，这不妨碍我们扬弃它。而为什么说“半庸俗唯物主义者的诞生”，是因为在否定意识及其作用后，马前卒们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一些问题，为了坚持他们的“唯物主义”，他们终究会模仿庸俗唯物主义把意识当作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液汁”，去模糊存在与意识的界限。

作为一种思想和一种实践，社会主义会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取得巨大突破吗？谁都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突破绝不是“马前卒特色唯物主义”。

就先到这里，我要去准备小说了，谢谢各位看完这篇文章。

（谬）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特大毒草）

马前卒

一 刚刚学会吃

大家好，欢迎来到番禺路。如果大家是从延安西路方向过来的，会路过一家卖柳州螺蛳粉的小店，是我经常吃夜宵的地方。自从 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上映，螺蛳粉就成了柳州的城市名片，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广西螺蛳粉店。上个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派我去柳州采访，我在当地专门调查了螺蛳粉的历史。

关于螺蛳粉的起源，当地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工厂食堂给夜班工人提供夜宵发明的；有说是工人电影院散场后大排档老板为了迅速煮粉发明的；有说是很多外地人半夜下火车要吃饭，小店老板只剩下螺蛳汤和米粉，临时拼凑出来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螺蛳粉肯定不是什么古代食品，也不是家庭厨房里面的创造，而是现代餐饮企业为了快速批量制作而发明的快餐。

反过来看，其实螺蛳粉天生就有做优秀快餐的潜质。

首先，它用的是干切粉，不是湿粉，主要原料好运输；其次，把螺蛳预先煮化在汤里，油水和味道很足，便于快速制作油水很足的热汤粉；第三，配料是腐竹、酸笋、酸菜、花生米，和一小把青菜，大多数配料比较耐储存。这几条优点都接近于方便面。所以，柳州螺蛳粉占领全国市场，一半是靠开店，一半是袋装的方便面式销售。柳州卖给全国的袋装螺蛳粉，去年销售额超过 30 亿。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历史有多长呢？上面的叙述说了，先有现代社会的市场需求，然后才有螺蛳粉这种食品，它的历史不会太长。三四种关于螺蛳粉起源的说法，最远也就追溯到 70 年代末，比我大不了几岁。

再看其他城市的标志性食品，其实大多数历史也并不长。

比如说河南烩面，1956 年出现在郑州，是饭店公私合营之后，为了批量制作热汤面而发明的。

武汉热干面，是 1930 年左右发明的，饭店老板每天做面条的半成品，做少了不够，做多了会粘在一起，他就想办法在面条上拌了一些油和芝麻酱，结果大受欢迎，成了今天可以代表武汉人的特色食品。

螺蛳粉、热干面、河南烩面，这几种食品的共同点是工艺简单，可以预先储备大量半成品，随着市场需求快速制作。从地理上说，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诞生在铁路枢纽。武汉、柳州、郑州，都是解放前的铁路节点，都是后来跨省大铁路局的驻地。20 世纪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铁路，只有铁路才能带来现代社会和

流动人口，所以铁路枢纽最容易诞生符合我们现代人口味的美食。河南烩面没有诞生在洛阳或者开封，而是诞生在 20 世纪形成的铁路枢纽郑州，就很说明问题了。

和这几种食品类似的，还有中国四大名鸡。德州扒鸡、河南道口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符离集烧鸡，每种鸡对应一个近代铁路要地，不是铁路交叉点就是需要停下来换车头的路局分界点。它们的口味虽然有差异，但都是含水量低，容易携带，能长时间保存的肉食，原料都是鸡肉这种最廉价的肉类。这和螺蛳粉、热干面一样，都是中国铁路时代的食品。

圆点：郑州 武汉 柳州。五角星对应”四大名鸡“—— 黄色标记见后文

但是，我们注意一下上面的提到的所有食品，他们有个共同特点，缺乏新鲜蔬菜。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代铁路食品没有新鲜蔬菜呢？因为蔬菜和大多数水果并不适合铁路运输。铁路只能沿着固定的线路走，没法及时搜集分散生产的蔬菜。就算上了车，一个车皮经常要一两个星期才到地方，蔬菜往往也坏了，80 年代之前城市供应大白菜是要国家领导人过问的大事。所以，20 世纪的铁路枢纽不缺流动人口，不缺粮食，不缺咸菜和调味品，但新鲜蔬菜的供应比较差。中国流动人口要在交通枢纽吃到蔬菜比例高的美食，得等到公路时代。

公路时代美食的代表就是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出现的新疆大盘鸡。

大盘鸡的正确称呼是沙湾大盘鸡。沙湾县一头是乌鲁木齐，一头是克拉玛依，夹在新疆最大城市和大油田之间。2010 年之前，克拉玛依没有铁路，所以沙湾县的公路交通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很早就能解决蔬菜运输问题。前面我提到过，鸡肉是最廉价的肉类，这鸡肉再加上青椒、土豆、洋葱、辣椒，就是我们熟悉的新疆大盘鸡。大盘鸡沿着公路普及到全国的过程，与中国变成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的发展历程是重合的。

南面是天山。冰雪融水浇灌的蔬果，和中国罕见密度的公路交通共同造就了大盘鸡。

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走在街上看到的民间美食，相当大一部分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为什么呢？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铁路和轮船出现之前，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提供需求，也就没有多少面向平民的饭店和食品。

鸦片战争之前，就连咸菜这种容易运输，容易储存的的东西，都是各地自己吃自己。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轮船进了长江，武汉和上海出现了现代工商业，有了流动人口，形成了沿长江的食品市场，这才有了榨菜。1898 年，毛泽东 5 岁了，蒋介石已经读了好几年私塾，涪陵的企业才腌出第一坛榨菜，但是有上海和武汉这两个大市场支持，再加上后来的铁路网，到了 1940 年，涪陵榨菜已经是全国性的快餐食品。这东西和德州扒鸡、热干面一样，都是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典型食品。

最近几十年出现大量美食的原因还有原料的运输。前面说了大盘鸡的例子，我再说一个例子，大家猜猜河南的王守义十三香是哪年出现的？是 1959 年，比武汉长江大桥晚两年。几千年来，因为交通不便，香料只要离开产地，到别的气候带都是奢侈品。现在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京广铁路，第一次把中国南北连接起来，北方人也能廉价获得南方香料了，所以在京广线上的驻马店出现了廉价的混合食品香料。（上面的黄色标记点）

当然王守义家族不承认这一点，坚持说自己的香料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我也不想去考证。反正之前他们的家族配方没改变中国人的食谱，1959 年卖一毛钱一包的王守义十三香才是大众调味料的起点，现在一两包装的十三香也不过几块钱。这毫无疑问是工业化社会制造的美食。（补充一句，兰州拉面出现于 1915 年，刚好是兰州黄河铁桥出现后）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农业社会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讲究美食。人总是要先吃饱再谈口味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盐和油脂，其他一切美食都没有意义。1998 年我上大学，有个贫困山区出来的室友，他在读大学之前一直认为方便面是奢侈品，算得上美食，就是因为方便面能快速满足粮食、盐和油脂的需求。

再举两个例子，我家在燕山深处的平泉县，特产是蘑菇，全县 40 多万人，一年生产 50 万吨蘑菇。但是过去粮食少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蘑菇好吃，因为蘑菇热量低啊，没吃饱之前谁有心情搞这个吃。后来我去辽宁营口市，那里把皮皮虾叫虾爬子，当地人说，60 年代粮食不够吃，最穷的人家才去海边搞点虾爬子。为什么穷人才吃皮皮虾？因为皮皮虾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都很低，在没吃饱之前去捞皮皮虾，耗费的能量得不偿失。在那个时代，最好的美食就是粮食、油脂和盐的组合，典型的例子是猪油拌饭。今天还有人拿这个当美食吗？

此外，那时候中国煤产量很低，绝大多数农民家里是没有炉子的，只有一个煮饭加取暖的大灶，所以就算有油，炒菜也是奢侈品。直到我小时候，80 年代，周围的农民说弄几个炒菜，也必然是家里有贵客要来了。各地真正能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民间菜系，主要就是炖菜，比如东北的猪肉炖粉条。

最后再补充一点，古代没有味精，能提供鲜味的东西只有老母鸡和海鲜熬的浓缩汤。普通的人家和饭店用不起这么昂贵的调味料，只有以山东孔府菜为代表的高端鲁菜才会用足够的母鸡汤和海味来制造美食。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体会过鲜味，也就是谷氨酸钠的味道。

等到中国人富起来，粮食，油和盐普及、普通人家也能用煤气灶和味精，中国人对美食的概念和农业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川菜取代鲁菜，成为中国街头的主流菜系。因为川菜用火多，用海鲜少，用鸡汤提味的菜不多，最适应煤气灶和味精时代的操作水平和饮食习惯，比较刺激的味道也适应平民的需求。

川菜取代鲁菜，不仅仅是因为川菜适应新时代。实际上，和前面提到的德州扒鸡，武汉热干面一样，大多数川菜也是最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比如说鱼香肉丝、夫妻肺片、酸辣粉、麻辣火锅、重庆小面都是民国年间才有，比在座很多人的祖父

还年轻。麻辣香锅、万州烤鱼，这都是 21 世纪才出现的菜，出现的时候我都快大学毕业了。川菜也同样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能排挤贵族时代的鲁菜。

中国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多熟悉的食品都是最近 100 年乃至几十年才出现呢？我可以用小学算术来解答这个问题——3000 年历史，相对最近 100 年是几十倍的优势；但现代社会的人口总数比古代大多数时间多几十倍，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也要高个几十倍。

如果我们接受下面这个粗略的公式：

人口总数 x 能享受美食的人口比例 x 历史长度=美食积累

那么，现代社会两个几十倍乘起来，当然压倒古代几十倍的时间优势。这还没考虑过烹饪工具进步对美食的影响呢。

所以最近几代人的饮食文化积累比之前几千年更多，所以当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农业社会完全割裂，《舌尖上的中国》虽然拼命渲染“传统美食”，但我们当代人舌尖上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比我们的父母还年轻。

二 历史的重量

上面那个算术计算，我们可以推广一下，用来估算全部的文化遗产：

总人口 x 能参与文化活动的比例 x 时间=文化积累

这里我先请大家估算一下，从出现文明开始，到 21 世纪，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共生活过多少人？

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但我看过几个全世界的数据，认为自古以来一共出生过 800-1000 亿人。

而无论哪朝哪代，中国文明大致上都是全球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所以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总数大概是 200 亿。反过来说，我们按 5000 年文明算，25 岁一代人，一共是 200 代人，200 亿除以 200 代，是一亿人，每代人一亿，这数字只多不少，所以 200 亿的总数应该也是偏多的。

这 200 亿中，有多少人在新中国生活过呢？我这里也有个估算。中国人均寿命是 70 多岁，建国到现在是 69 年，所以，建国时已经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去世了；建国时没出生的人，现在大多数还活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的中国人总数，大致就是现在的人口加上建国时的人口，约为 20 亿。和自古以来的 200 亿中国人相比，大概是 1 比 10 的关系。

但是，很显然，创造和传承文化的比例，不能按 1:10 来算，别的不说，新中国这 20 亿人，受过教育的比例，，肯定要比之前的 180 亿高一个数量级。而创造文化产品的能力基本和受教育比例成正比的。所以仅仅是教育一项，20 亿人就能打平之前的 180 亿。更不要说现代的教育比古代强的多，现代人在学校之外接

受文化产品的数量，吸收知识的数量也比古代多了十倍不止。粗略地估算一下，在我们总的文化遗产里面，新中国起码要占一半。

我猜会有人质疑我，说古代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怎么能比呢？李白杜甫怎么能和现代这些小学生相提并论呢？对此我也不争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很多东西没法量化比较的。但我还是能找一些证据。

我现在住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地方过去叫唯亭镇，在苏州乃至全国都是文化发达的地方。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清朝道光年间，一个镇就有自己的地方志，总编是一个翰林，这经济文化水平至少相当于内地的普通县城，甚至是府城。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部地方志，摘抄了一些被记到地方志上的诗词，应该算是本地文人的高水平作品：

王鏊《唯亭》：

早朝时去晚朝回，陆市巴城迤逦来。咫尺唯亭看又过，人生行止信悠哉。

陈元素《送何仲先移家唯亭》：

周亲与我更芳邻，徙宅超然远市尘。路出东门船似马，湖当前岸浪如银。

谁能父子相师友，岂少贤豪互主宾。潮到此亭曾有谶，知君才不让前人。

李汾《唯亭》：

晓市争先集，唯亭水陆通。一江分上下，两庙划西东。

烟火千家爨，斜阳孤客篷。昔贤图八景，风雅有谁同。

查诜《武顺王祠》：

英姿飒爽镇三吴，日照唯亭庙貌孤。欲把美人配名将，中山祠在莫愁湖。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些诗。抛开文体的区别，我觉得文采、用词和立意，也就是中学生流水账水平，还不能是写作文特别好的那种。和这种诗词最像的，应该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走廊上挂着的那些诗词，是那些参加工作后才补习到中学水平的老干部作品。我觉得这是古代一般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之所以我们觉得古人文化水平高，是因为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日常的作品流传不下来而已。

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我之前算过一个比例，清朝后期三四亿人口，每年生产 2 万秀才；我们现在十三四亿人口，是清朝的四倍，本土博士和海归博士加起来每年七八万的样子，也是清朝的四倍。换句话说，按照人口比例算，今天的博士大概相当于古代的秀才。

但是呢，我们知道，秀才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底层，99%的秀才最多只能算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不能创造新的文化成就。我们今天正好相反，作为博士，你必须

通过论文和实验，给人类增加一些之前没有的知识，换句话说每个博士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之前有一组图片，分析博士的定义，我觉得很贴切：

本科、硕士和博士到底有什么区别？画个圈圈告诉你！

这说明，古代社会只有在所有知识分子都创造文化的情况下，才可能接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效率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呢？不说百分之一，就算千里选一的古代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做出一点前人没做过的成就。我说最近这 20 亿人的文化积累和之前 180 亿相当，实际上还是给我们的祖先留面子了。

我再拿几个数据来看看：

咱们国家有个传统，统一的朝代不仅仅要写历史，还要把已知的书籍收集归类，编成“类书”出版，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文化成果汇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的《永乐大典》不到 4 亿字；清朝的《四库全书》8 亿字；《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名字气魄很大，1。6 亿字。

一亿字是什么概念呢？年底的时候知乎给我发了一个统计数字，我这一年在知乎写了 160 万字，读了 9800 万字，差一点不到一亿。当然我大多数阅读就是快速泛读，但这也说明，如果不要求精读的话，我用十几年时间可以读完清代之前的大多数文化遗产，至少一辈子总能读完。这也符合我对《四库全书》的直接感受——我老家承德避暑山庄有个文津阁，装有完整的一套《四库全书》，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的照片，应该可以对古代文化积累数量有一个直观认识：

在这里住一辈子，看完应该不难。

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东西就这么一点，这说明一个问题——古代人对之前的文化遗产的了解，比如说明朝人对唐朝的了解，肯定不如我们。现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全国都有上百个专职研究者，比如说宋史研究会，全国仅理事就三四十人，全国 500 多会员，开一次年会要讨论几百篇论文。这比古代编史书的人还要多得多，除了宋朝人自己，最了解宋朝的时代就是现在，而不是元明清任何一朝。

怎么说研究的更透呢？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古代最大的收藏家是皇帝，尤其是那种活得长，喜欢展示自己文化水平的皇帝。清朝乾隆皇帝收集了不计其数的书画，其中最好的一部分被搬到台湾去了。结果最近几十年慢慢翻出来研究，发现他收藏的宋朝书画，一多半是假的，著名的那张富春山居图，皇家当真品收藏的那张，现在研究起来也多半不是真的。所以说，就算比对历史了解，也是古人不如现在。所以我认为，如果以 1900 年为界，之后积累的文化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完全压倒之前几千年。

三 我是谁？

前面对文化遗产的“计算”怎么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

我们人是社会动物，而社会又是通过道德、法律等文化产品搭建起来的。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体现在我们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定义一个“我是谁”的概念。

设想一下，你在陌生的社交场合被人要求介绍自己。你怎么介绍？显然不会是名字加身份证号码，那是面对警察盘问才会干的事情。你会说我是某某的儿子，某个学校的校友，某个游戏的玩家，这才是你定义自己的方式。而我和在座各位，面对整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自我定义——中国人。

但这个最普遍的定义，却是个很新的概念。我妈妈年轻时在山区当乡村教师，经常科普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是中国人”。在那之前的几千年，大多数人不仅不知道这个概念，甚至不认为“我是哪国人”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包含了现代社会才有的两重文化背景。第一个是全球视角，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和中国并列的国家；第二个是国民意识，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明确的互动。古代的老百姓第一不知道世界格局，第二不觉得国家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换个皇帝自己还是一样生活，除非有时候活不下去主动换个皇帝。但就算李自成当了皇帝，几十年过后日子还是一样，所以古代老百姓几乎不会问自己是哪国人。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侵略，传统的儒家社会和封建军阀抵抗不了帝国主义，我们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我们从此也有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行性。最激烈的一次入侵是 20 世纪日本的入侵，现代中国的文化概念就是从这次战争中开始形成的。到现在我们的国歌还是抗战期间的电影配乐；歌词还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说的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外部压力迫使我们团结起来，建立强大的军队，建立发达的工业，成为帝国主义不敢再侵略的现代国家。但这个需求只是描述了现代化社会的硬件，并没有具体解释“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文化内涵。我们还是要回答，我们在文化上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彼此认为是同胞？是不是因为一些更古老的因素？

中国人的定义中，肯定包含一些古老的因素，比如说中文方块字。但是更多的文化符号其实出现很近，和川菜的历史差不多。比如说“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之前，并不是中国人的代名词。炎帝黄帝虽然在三皇五帝的序列里面是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最多也就是一部分帝王和世家大族宣称自己有炎黄血脉，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认这个祖宗的想法。就算朱元璋祭黄帝，文字中也没有一丝一毫认祖宗的意思。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祭文

皇帝谨遣中书管勾甘，敢昭告於黄帝轩辕氏：

朕生後世，为民於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烝民主，神功圣德，垂法至今。朕兴百神之祀，考君陵墓於此，然相去年岁极远；观经典所载，虽切慕於心，奈禀生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神，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其鉴纳焉！尚飨！

（祭文更像是对优秀”同行“的致敬）

但是，1900 年前后，大家都知道清朝要亡了，一部分革命党要用黄帝子孙的身份激发汉族的民族主义，推翻清朝；还有一部分革命党和改良派想用炎黄子孙的旗号来打造一个中华民族，把少数民族定义成黄帝子孙的分支，不止要统一汉族地区，还要继承清朝和历代王朝的边疆遗产。这才有了炎黄子孙的概念。1912 年，民国建立第一年，孙中山就派人祭祀黄帝陵，开启了现代国家祭黄帝的先例。

孙中山和之后的国共两党祭皇陵，和历代祭黄帝陵是有区别的。之前祭黄帝陵，是把他当成比较古老的帝王和神灵，和其他神仙或者古代帝王的祭祀相比，并不特别突出。民国祭黄帝陵的时候，放弃了历朝历代大多数祭祀，专门祭黄帝陵，而且要声称这是中国人的始祖。这才在 20 世纪打造了炎黄子孙的概念。后来抗战前期，国共两党轮番去祭祀，并不是因为他们真信，而是两党都想借这个来证明自己是孙中山的后继者，拥有领导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合法性。1944 年，日本发动最后一波大进攻，打得国民党差点放弃重庆，在这一片混乱中，国民党政府没忘了改地名，把过去的中部县，改成现在的黄陵县，也是在文化上标志自己是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

除了炎黄子孙的概念，我们还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但实际上，古代的龙是水神，是皇家的代表，但从来没有做中国人祖先的说法。一直到了 1978 年，因为中美建交，台北的国民党政权感觉自己被美国抛弃了，一片混乱，台湾音乐人侯德健想重新表述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写了《龙的传人》这首歌，这才有了龙的传人的概念。1988 年是龙年，侯德健被邀请到春晚唱这首歌，这个概念才在大陆扎根。

在大陆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侯德健在 1988 年龙年春晚

这说明，认谁当祖先，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清末的革命党选了大禹，选了伏羲当始祖；如果侯德健写了不一样的歌词，我们今天也会有另一番说法。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概念也不会因此改变。说明我们今天界定中国人并不是依赖这些 20 世纪才发明的文化符号。

那么到底中国人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从反面论述这个问题：

我们平时骂人，有一个常用句式是：“XXX 你不是人！”。但我们都知道，骂人改变不了别人的 DNA，从生物学角度说这句话毫无意义。那么这句话其实是从社会学角度说的，说的是对方不遵守伦理道德底线，比如说偷了别人的养老钱，已经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从这句话反推出来，就是说，人的定义来自于统一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定义就是指你遵守这个国家的主流伦理道德。我们这一群人赞赏什么、反对什么、讲段子嘲笑什么、大致上有一个统一的共识，然后彼此才会认为对方是中国人。

但是呢，道德本身是依附于生活方式的。抗日战争打完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有工商业城市，有传统农业地区，有大批的牧民，还有很多停留在原始社会边缘的渔猎民族。地域差异、阶级差异和民族差异比很多国家之间的差异还大得多。所以我说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概念在文化上只能说有了一个雏形，还不能说完全形成。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先是修了全国统一的铁路网公路网，然后尽可能拉平了全国的收入水平，又派了上千万教师下乡开设学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中国人”这个概念，打造了一个接近于统一的价值观。到了 70 年代我母亲下乡当教师的时候，“中国人”这个文化概念已经接近形成了。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概念最后确立是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是 80 年代到 21 世纪之间。80 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电视和农村电网的普及。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享受的文化产品都是不一样的。从 1983 年春节晚会开始，我们第一次做到了跨越地域、城乡、阶层，大多数人民共看一台戏；之后每年的春节晚会和流行电视剧都是对统一道德伦理的塑造。

我现在回忆一下，80 年代和 90 年代春晚印象最深刻的节目，除了特别的几首歌曲外，印象最深刻，最能在同龄人中制造共同语言的节目，就是那些生活化的小品相声。这些小品相声是要引导价值观的，要树立那些国家希望我们喜欢的形象，讽刺那些国家希望我们讨厌的东西。另一方面说，这些小品相声也要迎合大多数观众的想法，避免出现太大的社会争议。像《渴望》这些生活电视剧也和春节晚会有类似的效果。甚至大多数人接触四大名著，也是从按照现代人口味改变之后的电视剧开始的。经过电视节目十几年的引导和试探，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伦理，而且也相信外地人会有类似的想法，去全国哪个角落打工都不会有特别的陌生感。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在文化意义上站住了。

90 年代过去，就是 21 世纪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实际上是对 80-90 年代形成的中国文化概念进行了一次“复习”。过去电视只能单向传播信息，现在网络是双向的，能即时传播网民的想法。我们看看近年的互联网热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伦理和八卦新闻，比如说这几天最热的新闻就是全国人民一致谴责两个在高铁上堵门，拦着或者不让走的家庭。这个热度甚至压倒了天津滨海新区一次性砍掉 3000 亿的 GDP。类似的互联网新闻，每一次传播都在塑造中国文化，都在加强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

信息化时代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单价非常高，过去几十个人的小剧团就能从编剧到演出一条龙服务，红楼梦里贾府这样的豪门随随便便就能养个戏班子，自己排戏

自己看。现在文化工业需要几千几百人合作，还要投入上亿的资本，才能做出全国人觉得好看的电影或者综艺节目。至于文化工业的硬件，比如说手机，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和电视，开发一种有竞争力的品牌就更贵了，十亿的投资扔下去，可能还不够华为和京东方这种企业烧几个星期的。

第二个特点是文化产品的传播成本非常低。不管你几亿还是几十亿制作的电影，我如果看盗版，只要有根网线就能下载。就算是去电影院，去视频网站看，也花不了多少钱。手机和电脑虽然贵点，但是工薪阶层也买得起。

这制造了一个效果，就是有钱人再富，也没法为自己定做特别的文化产品和传播平台。比如说比尔盖茨或者马云再有钱，也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口味拍电影，或者是从头开发一款专用手机。而工薪阶层尽管穷，却也能买部智能手机或者电影票。我去年夏天采访滴滴公司的董事长程维，身家上百亿，周末也和我们一样玩王者荣耀。这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事情。我们国家的阶级差异尽管很大、越来越大，文化上却没有因此出现古代那种程度的割裂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前网络时代形成的统一伦理观、道德观和风俗，在网络时代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再加上最近几十年全国普及的螺蛳粉，热干面，川菜这些硬件，我们终于可以大概描述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怎么生活，怎么思考了。这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真实含义。

我说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的概念到了 20 世纪末才最终形成，听起来是耸人听闻。但大家细想一下，现在网民说起中国人的特征，比如说擅长搞工业，擅长经商，勤劳，这些自我认同是什么时候形成的？80 年代中期还不是这样呢。那时候从知识分子到平民，一致批判国民的小农思想的国家，认为要在工业和商业思维方面补课。再往前几十年，在人民公社搞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文报纸和外国报纸还一致批判中国农民不会种地，不如日本人擅长农业；在朝鲜战争之前，恐怕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真会打仗，能和欧美军队正面对抗。

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内涵，就是最近几十年形成的东西。搞清楚它的形成过程，我们才能讨论未来的命运。2010 年的时候，亨廷顿写了一本《谁是美国人？》，探讨美国人概念的文化内涵，我们这个国家比美国年轻的多，也弱的多，更应该经常问问自己："谁是中国人？"

水浒传里面，鲁智深临终前有一句话："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今天我改编一下，就是我这一部分的答案：现代大潮滚滚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四 人类的感受

下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人"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塑造的。为什么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呢？

首先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思考方式。

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在草原森林里打猎的猿猴，打猎采果子的生活持续了上百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是很弱的，只能让自己适应自然界的节奏。所以我们潜意识里认定，周围的环境不会变，父辈、祖父辈传下来的规矩是最合理的。那些不尊重现有规则的人很快就会被淘汰。

直到最近一万年，我们才进入农业时代，第一个农民到 21 世纪，之间仅仅隔着 300 到 400 代人。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让人类的基因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的大脑还没有适应一个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人说服，相信现有的规则有几千年几万年的传承。

其次是我们人类的视角问题。

人生只有几十年，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童年看到的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比如说我老家在山区，大米白面这样的细粮少，80 年代之前往往是出来工作才能用粮票买米面吃。农民在 90 年代之前的主食是玉米。小时候我周围的农民训斥孩子不好好读书，说的就是："考不上中专，一辈子在家吃棒子面！"。那时候我就认为，玉米是我家乡自古以来的食品，代表着贫穷和落后。直到我 20 多岁了，无意中听我父亲说，六十年代县里边派技术员下来，教农民种玉米，我们那边的主食才从高粱变成玉米。我大吃一惊，才意识到，玉米面对我父亲这一代人来说也是新事物，是比高粱更好吃，更有影响的新事物。

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和我们的生命相比还是长的。对现在的 90 后网民来说，统一的中国文化更是出生就看到的东西。很多人真心相信眼前这些中国文化标志，这些典型的中国生活方式有古老的传承，其实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遇到变化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认这是事物发展，而是喜欢往过去看，在历史上找一个样板，把变革说成复古。比如说西方近代的文化发展，被他们自己称作文艺复兴；王安石变法，说自己复兴的是《周礼》；到了近代，康有为要变法，首先要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这个习惯反应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买食品、买日用品的时候，喜欢买所谓那些所谓的皇家产品，古代的贡品。商家也会迎合我们这个需求，编造出很多半真半假的传说，把自己的产品和古代某个皇帝或者名人挂上关系。乾隆下江南，怕是给一万种地方食品找到了祖宗。

现代社会最容易被误认为是传统的东西，就是普通人和国家的联系。

古代皇权很难深入到乡村，农民主要是和地方的绅士地主打交道，和宗族打交道，很多农民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也没有和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来往，至于国家政策什么的，闻所未闻。反过来说，他也不会对皇帝，对政府有什么特别的忠诚感。

到了现代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国际上的军事和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迫使每个国家都去建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复杂的政府，直接动员每一个人的力量参与竞争。反过来，随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也逐渐意识到政府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对政府提要求，要政府对公民负责。

这种个人和政府的紧密联系，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新事物。但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却一定要把他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说这是从屈原、文天祥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在那个特定的反帝国主义时期，这种文化塑造是有作用的。但把历史作为案例分析的时候，我们不能 100%接受这些 20 世纪才制造出来的文化工具，必须知道哪些东西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产物，才能从历史里面学到有用的东西。

1942 年抗战低潮，郭沫若作为中国文化最高负责人排演话剧《屈原》可不是忽然关心战国史

五 进一步的变革

最近几十年，不管黑猫白猫，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这些 20 世纪的神话发挥了历史作用，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戳破它呢？我们坚持说 20 世纪的这些变革来自传统文化不好吗？

不行。

因为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冲击波，而是连续不断的变革过程。你把迎接现代化冲击波时期形成的一些临时文化结构说成传统文化，说成祖宗留下的改不了的东西，当下的问题可能应付过去了。下一波变革你怎么办？ 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要给大清朝变法，本来站在历史的最前列。但显然孔子不可能改两次制度，你最多只能用这套理论搞一次变法。等到历史进入下一个转折点，原来有进步作用的思想就成了社会绊脚石了。

从历史来看，康有为也的确被自己这套意识形态绕进去了，成了坚定的保皇党。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康有为就是策划者之一，半夜和张勋一起进宫把溥仪拉出来。后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还经常找溥仪磕头。我们不能像康有为那样，发明一套传统，然后被这套传统束缚住，被现代化的浪潮给甩下。

而且，把现代化早期这些文化变迁讲清楚，还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讨论，还涉及到打破利益集团的问题。任何社会结构，尤其是发明出来的临时社会结构都会逐渐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是最乐于看到现有结构永久保持下去的。如果我们不把历史说清楚，很容易就会被利益集团以保卫传统的名义拿走舆论主导权，最后让整个社会的发展停滞。

比如说中医，本身是个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混合体，里面的确有一些药方和治疗手段是有用的，在现代医学资源不够的时候，保留一部分中医，甚至政府出面推广一些标准化的中医教程，让赤脚医生带到农村去用，都是很有效的。但是，这种推广不是什么传统文化，而是现代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是用现代科学原理改造中医的尝试。当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以发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自豪感的名义去推广中医，实际上就是造了一个临时性的神话。

到了 21 世纪，现代医学资源已经很充足了。这时候应该做的是彻底重新评判中医，每个药方，每个理论都要和现代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监测才能使用，每个

中医都应该先学习现代的医学理论，然后再回头去发掘中医的有效部分。但是呢，一方面当年推广中医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神话；另一方面中医药行业形成了很大的利益集团，在学术圈和药品行业都有上百亿的好处。两者结合，结果是大多数中医药反而离现代医学体系越来越远。中药不经过严格的药物审查就能上市，中医不上医学院，跟着老师傅背古书也能开业，除了害人，实际上也毁了中医那些真正有效的部分。这种对传统医学的盲目崇拜，就是应该抛弃的现代神话。

除了中医之外，还有很多以传统的名义抵抗变革的运动，背后都不是真正的传统，而是现代化早期出现的临时现象。

比如说这些年以保护自然保护农民为名的反转基因运动，他们保护的是真正的自然物种吗？当然不是。要是在转基因技术之前都种天然物种，人类早就饿死了。我们在转基因技术出现之前，也对物种有很强的干预，比如说用辐射育种，制造随机变异，有一两项好处就拿出来推广，危险性比转基因大得多。而且有的转基因技术可以省下很多农药，不用转基因就要多用农药，这农药是天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但是这些用辐射育种，用农药杀虫的农业企业也是很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乐于看到有人以保护传统的名义反转基因。这种所谓的传统也必须打破。

又比如现在各家酒厂都要挖掘一点酒文化出来，既给自己的酒增加一点历史感，也为自己销售高度酒辩护。实际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很少喝的起酒，就算喝酒，也不是喝现在这种高度白酒。你用传统为理由，给所谓的酒文化辩护，本质上也是在保护特定集团的利益，危害中国人的健康。

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的喇嘛。他们也天天呼吁保护传统文化，呼吁大家不要打扰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让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发展。实际上呢，藏传佛教喇嘛全国到处跑，给各个社会阶层当心灵导师，这根本不是什么传统，而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迷茫，被这些喇嘛乘虚而入的表现。他们当然希望眼下这个状态能天长地久。他们让自己的同胞过落后的生活，是为了给自己的宗教地位增加神秘色彩，好到发达地区骗钱，让自己长久地过现代化生活。

西北这些伊斯兰教贵族也是一样。西北的回族宗教家族叫门宦，大多数门宦的历史也就延伸到清朝，有些甚至是民国年间才出现的，红军到西北的时候，新的门宦和老的门宦还在激烈内战呢。他们也说保护传统，保护的其实是民国战乱环境下，自己刚刚形成的封建权利。这些天天呼吁保护传统文化的人，自己最不传统。为了对抗他们，我们不能用神话对抗神话，不能用所谓的传统去对付传统。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留下了多少好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主动迎接了现代化。现在整个国家应该在现代化的旗号下继续前进。

上面说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具体到微观视角，每个家庭都有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不意外的话，这些“传统”也大多数是最近几代人刚刚形成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家庭要求孩子背弟子规，说这是传统文化。可实际上弟子规恰恰是儒家社会末期时候的作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流传，是传统社会解体前夕对自己绝望情绪的表达，完全不是传统文化经典。真要复兴，也复兴不到那个时候去。

我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现在多吃蛋白质，少吃碳水化合物减肥。我妈妈就反对我这个方案，坚持说五谷杂粮最养人，最适应中国人的肠胃。但实际上，天天吃饱粮食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是吃不饱的。我妈妈家里能有足够的粮食吃，也得是 70 年代了，她拿来反对我的传统，只是最几十年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不主动去破除那些近代神话，一味地尊重所谓的传统，现代生活是过不下去的。所以今天的标题就是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六 怎么办？

前面批了这么久的伪传统，现在该说保卫方案了。概括地说，就是无论真传统也好，假传统也罢，都没必要带上什么神秘主义光环。我们现在的生活，绝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是最近一二百年形成的，我们能发明这些文化，当然也能抛弃它们，也能再创造新的。就算是真的几千年传统文化，我们也得放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好好考察，看看是不是合适。

具体来说，我首先建议大家学点人类学。在我们研究历史，分析传统的时候，人类学可以给我们壮胆。

很多人都说要对历史有敬畏感，但再敬畏，人类的农业文明史也就一万年，历史的研究长度就这么多。再往前，就是史前时代，是我们人类作为生物生活的年代。人类学的定义就是从生物和文化两个角度观察人类。所以人类学的历史不仅包括最近一万年，还包括之前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年。前面说我妈妈坚持认为五谷杂粮最养人，我从人类学的角度就可以反驳她，说就算这是真传统，也是最近一万年的传统，之前上百万年我们都是杂食动物，专门吃某几类植物种子才是反传统。

这样看来，人类学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破除“自古以来”这四个字的神圣感，因为绝大多数社会学意义上的“自古以来”，说的都是农业社会的规矩。而人类学不仅研究的时间范围更长，而且还要探讨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探讨出来的规律可能比历史规律更有价值。

我之前读书看到一个故事，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殖民官员召见当地的土著，发现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地区的居民，越是习惯于弯腰屈膝，对官员毕恭毕敬；而那些原始丛林里刚出来的的居民就站的笔直，不认为殖民官员可以高人一等。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社会等级的概念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传统，而是几千年阶级社会制造出来的概念，是不配说“天经地义”的。进一步推理，将来的社会也不一定要有社会等级。马克思主义讲共产主义社会，要从原始共产主义讲起，不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值得向往，而是因为他想告诉我们，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不是我们的“本性”。有马克思这种思维，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传统。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我们上学时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前面用来分析中华民族，分析中国人这个概念用的工具。通过分析，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风浪看到本质，看到构成我们生活的大多数文化符号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承认这一点其实并不丢脸，美国人历史只有 200 多年，照样在过去 100 年引领世界。承认自己这个文明其实很新，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往前发展。实际上，100 年前的人已经把

这一点看的很透彻。梁启超那篇《少年中国说》现在应该还在中学课本里。梁启超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包袱扔下了，我们 21 世纪的人不能再重新捡起来。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

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

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一旦破除了对传统的敬畏感，扔下历史包袱，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去发明新的生活方式，解决我们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生了一胎就觉得压力大，生二胎就觉得影响生活质量，所以生育率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很多人生了孩子也没有能力好好教育，甚至连不虐待都做不到。这几年连续有新闻出来，说大凉山那边的孩子出来做童工，做格斗表演，被政府送回去之后又出来，就是因为那边的父母根本没法送他们正常上学读书。2017 年还有好几个新闻，都是父母在公开场合虐待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拍下来报给警察，警察批评教育之后只能继续让这些不负责的父母把孩子带回去。

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越来越没有能力承担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中国需要尽快建立社会化抚养制度，需要剥夺很多父母的抚养权，下一代孩子可能会有很高比例在家庭之外长大。这样才能保证新一代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但是呢，这样做势必要挑战家庭的神圣性，要打破几千年来的传统，要把监护权从直系亲属手里分出一部分来，肯定会有人质疑。但我认为，对下一代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有的孩子没机会被生出来，很多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哪怕仅仅是为我们的养老金着想，我们也得设计一套新的制度。家庭抚养孩子固然是几千年的传统，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本来也是个新事物，在中国普及不过是三四十年；儿童需要读书十几年才能融入社会，这也是社会对人类提出的新要求。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旧的制度出问题是必然的，就没必要非要以传统的名义维持下去。

说起养老金，整个中国现在都在担心老龄化问题。担心老人比例高了没人养老。可是，从我的角度看，根本没有老龄化问题啊？过去的人，四五十岁牙齿就坏了，皮肤上全是斑点，走路也不灵便，现在七十岁的老人满街跑，能跳广场舞能买菜，皮肤还很有光泽，这明明是年轻化啊，怎么反而成了社会问题呢？

所以说，问题就出在退休年龄上。过去的六十岁退休，是基于当时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六十岁的工人的确已经丧失大多数劳动能力了。现在六十岁的人这么健康，上班也不是做体力工作，完全应该多工作几年。我们把六十岁退休的“传统”看的太神圣化了，不太敢触动这个传统，这才会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中国现在大多数问题，都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用新制度解决。我们必须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社会条件变了，传统经验解决不了我们的大多数问题，才可能保持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2014 年的时候，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的很好，是我这些年看到最到位的文化评论，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南方周末 - 【文化解码】又到“制礼作乐”时

在今天被宣传炒作的“传统文化”中，却有不少与此背道而驰。这里姑举一例。近年我在不少寺观和修佛人家中都见到一本善书，是一个叫做上官玉华的人神游“地狱”的见闻录。这类小册子过去很常见，内容也很相近，但此书妙在，作者宣称地狱新加盖了一层：是专为整容者准备的！整容当然不值得鼓励，但既未加害旁人，便不是为非作歹，何以如此惊动地下当局？向“善士”请教，答案也很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整容的人对自己容貌不满，即是不孝！逻辑虽然怪异，还真不能说于“传统”无据。此书在一些老人中似颇流行，但这理由，多数年轻人就难以接受。此类“传统”除了使代际隔阂进一步拉大外，“善士”们以“地狱”对付价值观不同的人，也平添了一分暴戾之气：法海不是要把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吗？但他自己中了魔。威权政治有时正是一些“普通人”所造，尽管他们自己常受威权力量的迫害。然而，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是不会吸取法海的教训的。

我当然不是否定传统，相反，我深信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一定会带我们突破今日困局。但继承传统，也应有创造性的转换。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文化转型，都是因应新社会环境需要的结果。我仍相信，仁义礼智信具有普世性的永恒价值，能为今日多数浑浑噩噩的人灌注一种生命的意义，惟其在具体方面应如何表现，尚待探索。按过去讲法，“制礼作乐”是圣人所为；而今日的“圣人”即是“人民”，“新礼乐”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缓步形成，绝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强迫成就。但无论如何，一个文化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复古”，则其已经死去——好在这绝非事实。

七 主动出击

南方周末那篇文章用“制礼作乐”四个字形容我们新制度的创建。我很喜欢这个描述，因为这四个字里面有主动出击的意思。不是社会出了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主动给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现代人思考问题应有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去说考虑社会应该怎么运转，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要是每个人都只会说“不”，有可能越是反传统，社会就越容易进入停滞状态。

比如说一群人去吃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都不愿意点菜，都说随便，这个饭可能就吃不成了。因为“随便”的意思不是真随便，而是说你们点，我不满意就保留

最终否决权。每个人只争夺否决权的时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愿意出来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后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饿坏了才能吃上饭。

美国现在就处于大家都说“随便”的状态。1997 年出来的动画片《南方公园》，现在已经连续火了 20 年了。为什么火呢？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在片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段子。这个片子看似非常反传统，调侃社会上的一切。调侃言论自由，也反对言论控制；反对政治正确，也反对政治不正确；嘲笑别人的信仰，也嘲笑那些反对信仰自由的人；反对非法移民，也反对驱赶移民。

《南方公园》这部动画片就代表了美国现在的政治局势，每一派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都通过给别人挑错来提高自己的支持率。结果呢？结果美国选特朗普上台了，选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最保守的总统，在全球化问题上大幅度后退。我看这就是美国衰落的转折点

美国再衰落，现在也是世界霸主，也比我们富裕好多倍。中国社会需要的发展速度比美国高，需要进行的社会转型要比美国多很多倍。所以美国可以接受一个保守化的总统，停下来喘口气，中国就必须不断搞制度创新。所以，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只会说不，希望新一代中国人都了解一下各种社会政策的运行成本，对社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说今天看到城管赶小贩，骂政府粗暴执法；明天堵在街上，骂政府连一条街都管不好。

刚才我说了，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世界上很多国家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长期管理社会的，抓住一两个敏感的点去挑逗民众的愤怒情绪，让大家在反对某件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民众反对来反对去，貌似输出了很多政治诉求，最后一看，政治诉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还是那些人，还是几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团。台湾省已经在这个陷阱里出不来了，中国大陆千万不能掉进这种政治陷阱。一定要主动创造一套新制度，保卫好我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反核电反到用爱发电，等于什么意见也没表达么！

对于中国的前景，我是比较乐观的，至少和其他国家相比，我更看好中国。我的英文水平虽然不好，但在媒体工作，也经常有机会看到外国网民的政治讨论。我感觉，在人文社科方面，在政治讨论方面，中国网民的平均深度超过任何一个大国。我猜，这和我们几十年来唯物主义教育有关，和我们大家都要上无聊的政治课有关，更和中国发展快，在我们眼前演示了大量社会学案例多有关系。接下来我希望中国能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主动去建造一套适合 21 世纪生产力水平的制度。

八 工业化的迷茫

对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前面理性的分析很多了，最后我从感性角度说几句。

我知道很多人坚持传统，反对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因为利益，也不是因为他坚信过去几千年的传统很重要，更是因为他在这些现有的生活方式上投入了感情。因

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变化很慢的人。我喜欢骑自行车到处逛，但是因为我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没有变速车，到现在我也骑 80 年代那种直梁车，没有变速器。我开汽车也喜欢手动挡，每次开自动挡都想踩离合器，都觉得自动挡不像一辆汽车。甚至坐火车的时候，我都怀念过去有缝钢轨叮叮当当的声音，觉得车轮吵闹一点才睡得着。现在我回忆自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生活，想起来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温馨，美好，稳定。

但是，你问我要不要回到 80 年代的世界上去生活，我会坚定地说不要，除了年龄之外什么都不要回去（观众表示，难道发际线也不想回去么？我无言以对）。因为理性记忆告诉我，那时候和 2018 年比，不仅仅是物质条件有差距，信息沟通水平和个人发展机会也天差地别。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里，用尽全力解决自己最基本的现代化生活条件，就算有能力，有想法，也找不到地方去展现，去表达。对于已经习惯了 21 世纪信息时代的人来说，前网络时代简直就是一个大监狱。

明明知道过去的时光实际上并不美好，为什么我们还经常怀旧呢？我每次怀旧情绪过去，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和几十年前相比，现代社会在物质上有很多进步，但是变化也太快，很多机会我们还没来得及抓住就过去了。失望的时候，我们就期待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安慰自己，希望让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退路”。比如那些小时候熟悉的生活。我们从中间挑出美好的一面慢慢回忆，体会“传统”生活的美好，可能心情就慢慢好了。这种感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木心的一首诗：

《从前慢》 木心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每年我都要在不同的网络社区上看到这首诗至少十次。现代人很喜欢用这首诗来赞美传统，赞美过去的好时光。我承认，木心的文字很美，但稍微推敲一下，就能发现矛盾。

这首诗提到了铁路，提到了邮件，提到了给早班火车服务的豆浆店。这应该是20世纪中期的一小镇，对应的是木心的年轻时代。在木心的回忆里，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小城居民彼此都认识，安定的生活会天长日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都知道，通了火车的小镇，设了邮局的小镇，在20世纪哪有什么安定的生活。解放前这样的小镇免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被日本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军和解放军来来回回的占领。就算不打仗，这样的小镇我也很熟悉，因为通了火车，有了邮局，它在文化上完全附属于最近的大城市，大城市流行什么，这里用不了几个月也会仿效，而且年轻人都想离开这里出去。每隔十几年，整个小镇的面貌就会彻底变化，让你彻底认不出来。

要是让小镇居民的生活停在某一年，最先出来抗议的就是这些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因为他们已经通过铁路和邮局认识了外面的大世界，绝对不甘心被外面的世界甩下。贾樟柯的电影《站台》真实展现了80年代小镇社会的崩塌，我推荐大家看看。

就是木心自己，20多岁的时候也跑出去闯了大上海，80年代又去了美国，晚年才回到小镇定居。他之所以在这里住的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已经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能随时在两种生活之间切换，才会欣赏小镇安定的生活。如果让他重新过一遍人生，我保证他20多岁还会去上海，还会去美国。

所以说，怀旧情绪很美好，但绝对不是我们放弃变化的理由。我们越是怀旧，就越应该到将来去找我们的梦想，不能被工业化早期的生活限制住。就算有一天我们老了，也像木心那样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也不能拦着年轻人打破貌似稳定的生活，设计一个新的社会。

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态度。木心写上面那首诗，差不多是70多岁吧，毛泽东73岁的时候，按说也可以像木心那样，找个自己熟悉的地方安度晚年了。但是，他发现，前半生建立的那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临时工程，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平息战乱的临时工程，并不是工业化社会真正的样子。

同样是在毛主席73岁的时候，中国工业gdp第一次稳定地超过农业gdp，在新中国受教育的第一代学生也从小学读到了大学毕业。所以他发动了一场叫文化XXX的运动，想让这些在新社会成长的人去尝试一下新文化，让他们自己决定未来的中国应该怎么发展。毛泽东对自己的想法有一个精辟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理解，这句话展开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的快，文化和制度也得快速跟上去，否则掌握新生产力的人就要造你的反，就要推出新制度。

在这之前，毛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有一个预言，他说：

（欧美发达国家）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注意他上下文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先说 50 年到 100 年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再说 50 年代到 100 年之间的社会制度会天翻地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是社会制度变革最根本的原因。

毛主席是 1962 年做预言的，那么 50 年到 100 年就是 2012 年到 2062 年。2012 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应验了一半预言。我相信毛主席的逻辑性，后一半的预言应该也会应验，中国的社会制度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了，天翻地覆并不一定是往前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有点混乱，很多人搞不清楚当前社会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总想以传统的名义往后走，拒绝让社会变革跟上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影响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保卫现代生活。

这个保卫现代生活，包含两重意思。在演讲的前半部分，我举了一些例子，让大家看到，社会上的大多数所谓“传统”，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发明的新文化。很多人要坚持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代生活，我们要认清现代化进程的本来面貌。

第二层含义，就是希望大家能超出历史看历史，客观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既然传统可以随时制造，也应该可以随时抛弃，创造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会遇到无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为这些新问题打造一些新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制度的变化跟上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有未来的现代生活。这个现代化的未来，是当代中国人最值得保卫的东西。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8 年 1 月 13 日讲稿整理，与现场略有出入

（马逆给大毒草施肥）

作者：马前卒

首先我得强调一下，哥那篇讲稿写了两万字，没有一句是废话，每个标点符号都有针对性，都有预见性。比如说下面这段话就概括、回应了这个问题下 60%的文字。

> 比如说一群人去吃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都不愿意点菜，都说随便，这个饭可能就吃不成了。因为“随便”的意思不是真随便，而是说你们点，我不满意就保留最终否决权。每个人只争夺否决权的时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愿意出来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后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饿坏了才能吃上饭。
>
> ……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世界上很多国家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长期管理社会的，抓住一两个敏感的点去挑逗民众的愤怒情绪，让大家在反对某件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民众反对来反对去，貌似输出了很多政治诉求，最后一看，政治诉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还是那些人，还是几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团。

所以，这个回答本来可以不写。但看在大家热情洋溢地写了 500 回答的份上，一句话不说也不好，所以再多说几句。

首先，接着上面的话头说。很多朋友看到少数民族在家庭里传递自己的信仰就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然也不会为此做什么），觉得政府无能。听说有人建议政府普遍审查抚养资格，不合格的要剥夺，前面的骂声无缝切换，继续嘴炮表达自己的义愤和社会责任——比如下面这位兄弟：

> 谁敢动我儿女， 老子跟他拼命。就这么简单。我无产阶级。没房没车没钱，社畜一只。但起码未来的子女亲情、家庭温暖还是可以期待的。
>
> 在这个国家无产者失去了生育权， 现在又有败类精赵想要剥夺无产者的抚养权。
>
> 现在的人生还很长，如果以后得了什么要命的病，我已经知道最后该怎么发挥余热了。

类似的兄弟还有几百个，懒得一一列举了。这里我只想说，你们各位怕不是对现代社会有什么误解，居然以为自己面对国家机器配说“拼命”，居然以为自己面对下一代的教育有立场说“拼命”。虽然我知道你们也无非是嘴炮玩玩，但误会还是要纠正一下。

这么说吧，未来社会，某位老兄拿出戒尺，在家里逼孩子背《弟子规》，背不下来顺手抡了一家伙，不巧被擦窗工看到了，直接掏出手机报警，20 分钟后特警敲门查水表，不答应就直接破门而入，身后还有医生和记者。经过检查身体，发

现过去三天孩子起码被抡了十下戒尺，伤痕赫然在目……这时候我倒想看看你对特警拼命的勇气何在，骂街的立场是什么。

接着上面那个场景，不反抗，乖乖认错，上补习班，或许几个月后你还能和自己的孩子聊聊天。要是坚持放嘴炮要“拼命”保护自己的所谓抚养权，坐牢丢工作不说，你这辈子怕是要被带上电子项圈，任何时候都不得在自己的孩子 50 公里内生活了。否则的话，国家看着自己的（未成年）公民挨打而无动于衷，这现代社会的“现代”又如何体现？

未成年公民也是公民，也有安全生活，顺利成长，跟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列表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家庭和上一代家长能单独承担这项任务。实际上，正是因为不信任家长的能力，《义务教育法》已经剥夺了父母在工作日留孩子在家的权利，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不行。不服？不服憋着。

与之类似，将来的国家还会干预你打孩子乃至骂孩子的权利；干预你带孩子出门，自己却在马路边睡觉的权利；干预你每天晚上让孩子复习到 12 点的权利；干预你用苦难“磨炼”孩子的权利；干预你自己给孩子开药方的权利；干预你带着孩子过马路玩手机的权利……至于向孩子传教，让孩子坐副驾驶位，把孩子扔给行动不便的老人，甚至在孩子面前说粗话、闯红灯、玩血腥游戏、逃票、公众场合吸烟，长时间不和孩子对话，这些行为过去无足轻重，以后都会引发警察上门，都会让法官判你的刑，乃至斟酌你是否有资格养孩子。因为每个公民和国家之间都有责任和义务，国家保护未成年公民，不需要通过“家长”这个中介。

我看了一下目前近 500 回答，所有反对我的回答都很相似——从父母的角度指责我侵犯亲情，从个人的角度指责我为（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劳动力，就是没人从孩子角度谈权利。换句话说，他们觉得孩子是家长的附属品，不需要单独拿出来谈权利，只在孩子被国家“抢走”的时候，才想到孩子也是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必须和国家家算经济账。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孩子是家庭私有财产，国家怎么敢碰？

抱歉，国家在大问题上的确要算账，比如说你培养一个低素质劳动力，国家要为此买单。但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孩子的权利啊——健康长大成人，熟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了解现代社会的各个部分，毕业后迅速融入社会，这样的公民当然是国家的税源；但成为这样的公民，更是孩子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既然社会有主流生活方式，任何阻碍孩子融入这个主流生活方式的人或组织都必须被推开。的确，“家长”的资格不需要预先审批，但不用批准不等于事后不审查啊。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力，就得付出代价。

我看了一下回答，不止一个人给我举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孩子被带走的例子，说这是殖民者的罪恶，现代不能重演。但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在西部山区发现一个类似的原始部落，政府难道不能出手干预？不能把他们的孩子放到寄宿学校适应现代社会？就看着他们的后代继续打猎、钻木取火，当一辈子文盲，三四十岁就死掉？抱歉，现代国家不能拿自己的公民当博物馆展品，再有趣的展品也不行，上一个这么干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政权。

说实话，在 21 世纪的中国，小家庭的教育能力比土著居民强不到哪里去，我大学毕业才 16 年，已经辅导不了小学生的很多课程了。所以国家首先拿走了工作日的白天时间，不允许你这时候享受什么“亲子乐趣”。接下来，孩子的课余时间国家也得干预。要是哪个家长笃信什么“电磁辐射有害”，不许自己的孩子放学后接触任何电子产品，这在 20 年前不是问题，在今后就是要警察来敲打的错误。你还别以为我这个例子很奇葩，串联起来阻止孩子打疫苗的家长都千千万万，国家要敲打的地方多着呢。。

欧时：法国“下狠手”普及疫苗 不接种父母受罚　news.163.com

当然，阻碍孩子成长发展的因素也分主观和客观。有的家长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要逼孩子在家读经，不许上学，这样的家长就要上门训诫，不悔改就得先处罚再剥夺抚养权。有的家长客观上没有能力妥善抚养，国家干预应该主要体现为帮扶。比如说我在上海、在西安的住处，附近都有一些小摊贩无力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条街上几十个卖水果、卖菜、做门窗的小店铺，学龄前的孩子就在电锯、水果刀和玻璃板之间奔跑玩耍，父母都没空看他们一眼。这样的孩子白天就得由国家收拢起来，到公立托儿所去生活，晚上父母有空看顾才能送回来，否则平添的危险谁负责？我知道工作的时候偶尔抬头看到孩子玩耍也是一种享受，但享受不能以增加公民的危险为代价。

这么说，帮扶为主，训诫处罚为辅，按说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应该乐于接受才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剥夺”这么吓人的词呢？

因为必须讲清楚抚养下一代的主体是谁。从公民的角度，授权是毫无疑问的——谁有能力抚养我成为一个社会人，谁就应该是抚养我的主体。所以，21 世纪的今天，这个主体就是国家，而不是沿袭传统的家族或者家庭。上个世纪的革命，我们剥夺了族长执行家法的“自然权利”，这个世纪，国家当然要把终极抚养权拿在手里，家长只是在国家默许下代行而已，任何不合格的表现都会导致国家收回这个权力，否则就是对（未成年）公民不负责。

从细节上说，之所以要说明白抚养主体问题，也是为了明确责任，避免事故。比如说，公办幼儿园白天把小贩的孩子带走，这期间出了任何问题，政府要负责，当事人是要受惩处的。但如果是父母自己带孩子，疏于照顾，孩子出现死伤，按照目前的规则没有任何责任——依照古代习惯法，孩子是父母的附属财产，当然不需要父母负责。没人负责，就会有疏漏，就会人命关天的。

前几天有个新闻，一个女人不用心照顾孩子，在公交车上撞伤了要公交公司负责，围攻公交站，结果录像回放是她自己撞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样的父母没人去追究责任，这样的事故没人总结经验教训，客观效果就是孩子的死伤比率会大大提升。从下一代的安全角度出发，我们也得要补充剥夺抚养权的法律。

母亲不慎致孩子撞公交扶手 家属驾车围堵公交车

反过来说，法律不允许暂时拿走父母的抚养权和监护权，结果就是国家（学校）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什么都不做，乡村学校就成了监狱，上千万孩

子只能接受这种无责任的虐待，最后全社会买单是小事，他们自己人格发育出问题才是大事。这我之前就写过：

> 学校既要教知识，又要接过父母们实际上放弃的监护权，还不能使用暴力，最后还得应付考试压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准监狱。至于孩子们因此损失的社会经验，因此产生的梦想偏差，没有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
> 学校把学生 24 小时圈起来，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是对留守学生比例过高的消极反应。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权的父母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把监护权转交学校。但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却不会因此放弃向学校高额索赔的权利。学校没有管理权，又必须为学生的活动负全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防守，用课程填满学生的时间，用围墙限制学生的活动，从而规避最大风险。
>
> 打个比方，这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要求医生对医疗事故负责，却不承诺严格按医嘱服药。那么，处方上多半只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医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烦。至于治病的事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权责合一才能办好事。公立教育要承担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培养责任，当然也要拿到抚养权和监护权，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孩子进行奖励和管束，才可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我看这问题下面很多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包揽教育，我很好奇他每天能拿出多少分钟陪孩子聊天，很好奇他希望孩子在白天的八小时学校生活中面对什么样的教育。如果监狱中学就能满足他的期许，这样的父母还是早点剥夺监护权的好。

还有，现在孩子出了事故，赔偿款和捐款是给父母和直系亲属的。传统上我们相信父母和亲属会用好这笔钱，尽量让孩子将来的生活接近于正常人。但不用到别处，就在知乎上，我天天就能看到 1000 个抱怨父母偏心的回答和评论，凭什么我们相信父母和其他亲戚能用好这笔钱？国家拥有监护权，就能过问赔偿款的用途，必要的时候先换成国债，分批支付受害者的生活成本，这才是最大限度的尊重受害人的福利。

眼下，21 世纪已经过了 1/6，我们的法律和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 20 世纪，某些人的观点还停在 19 世纪，这就是我演讲指出的最大问题。鲁迅当年说“救救孩子”，我说“保卫现代生活”，都是说社会软硬件跟不上时代。但我和鲁迅并不是想指控具体某人或者这个问题下的回答者要害孩子，他们不配去害谁。下一代融入 21 世纪社会的最大障碍是体制，而我建议要改的也是制度。

这个问题下，我还看到有人炫耀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说父母没法抚养孩子，是因为工资太低，高了自然没问题。我承认，世界上很多问题和阶级有关，但还有很多逻辑问题和阶级无关。

如果收入高了就能让父母包揽孩子的教育，不用政府插手。那么城市中产的收入，扣除房贷和房租，也比农民工多不少，这样的家庭应该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孩子，应该更喜欢生育啊，可事实是这个阶层的生育愿望最低。2017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彻底平均到每个人，再翻一番，你们就肯生二胎吗？欧美的福利尚且解决不了生育意愿下降问题，凭什么中国就可以用一家一户的努力去解决？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出生人口为 1723 万人，比上年减少 63 万人。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专家纷纷预测 2017 年将是生育高峰，但 2017 年出生人口数据表明，许多专家高估了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是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而且许多职业女性担心生育二孩会导致职位变动或影响职务升迁，加剧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真正的矛盾在于，家庭教育是一种效率很低的模式。父母再加上老人帮忙，照顾一个孩子，就算用上计算机，你也是个体户。学校再搞小班教学，5 个老师对付 30 个孩子总没问题，也能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也是标准化生产。所以过去就算是官宦人家，也很少给孩子单独请教师，而是联合全族之力开家塾。现在 21 世纪了，术业有专攻，孩子从外语到计算机，再到体育和社会实践，都得专业人员来完成，家庭教育想用几个外行的灌输让孩子得到正面发展，说事倍功半都是轻的。既然大家都吃“纯天然食品”必然出现饥荒，追求全面的“家庭抚养权”也必然以累死家长打死孩子而告终。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拿幼儿园和学校的事故说事。问题在于，世界上哪有不出事的地方。问题在于尽量降低未成年人的事故率，而不是追求完美。现在大多数农村儿童的照顾水平能达到红黄蓝幼儿园的一半，儿童意外事故率都会大大下降；反过来说，如果坚持全面的家庭抚养，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乐意为当前每年几十万死伤儿童负责？我猜这些人眼里根本没有这几十万生命吧。

> 一项由“全球儿童安全网络”（中国）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共同进行的调查显示，儿童伤害在调查人群中总发生率为 16。5%，从年龄上看，1-5 岁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最高。从受伤的场所看，最易发生意外伤害的场所是家里，占总意外伤害发生例数的 43。2%。

所以，还是前面的观点，责任和权利必须对应，而且终极监护人必须是国家。国家可能不完美，但他会随时惩戒违规的教养人员，甚至对潜在的教育威胁都要先下手为强。前几天那个堵高铁门的女人是小学教导主任，事情一曝光就被停职处分了。有谁听说因为类似事件剥夺过家长的抚养权？眼下别的改革不说，最起码要考核家长的道德标准，否则一面高喊家长对孩子的作用最大，一面不考核家长的道德教育水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至于杨永信和豫章书院这样的地方，恰恰证明了父母对儿童的无限支配权多么可怕。父母只要授权，子女被送到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都不用承担责任，国家就

算发现也只能批评教育，不能剥夺抚养权。你们猜猜，这些父母把孩子带回家之后，孩子的日子会不会更好过？

还有几个自封无产阶级斗士说了，这是让无产阶级永远当无产阶级啊，抚养权归国家，培养的都是无产阶级，有钱人去贵族学校，继续当统治阶级。我就不理解了，国家不接手那些留守儿童的抚养，难道阶级流动性反而会上升吗？现在国家没有全面接手抚养权，难道王思聪的地位就不稳了？

全方位覆盖的公立教育，恰恰是把那些过的没人样的孩子提升到“人”的水平，我知道这会威胁一些已经“有人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但你也不能拒绝“冰花男孩”这样的孩子和你的宝贝娃娃竞争啊。更何况国家为了对抚养权负责，全方位铺开公立教育，就得加税。有钱人交税更多，同时有钱人的孩子去读私立学校（当然也得国家审批），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国家补贴，这明明是穷人受益。除了那些希望面对留守儿童获取优越性的小资产阶级外，我看不出这里谁的利益受损了。

最后，还是回到我演讲中的观点——子女需要完善的教养，父母亲自施加教养，恰恰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刚刚出现的新鲜事物。农业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是哥哥姐姐拉扯，死伤率极高；土改之前，富人家的孩子也是家族教养，庶子往往一两年见不到亲生父亲。小家庭单独养育孩子，这是新中国在 60 年代形成的临时状态。

所以，几百个回答放嘴炮，号称什么“拼命”保卫亲情，实际上都是在为我的演讲做注释——这些人拒绝现代化，不是因为传统，恰恰是被现代化早期的临时社会结构卡住了。他们以为自己身披中世纪的附魔盔甲，和 21 世纪的新魔鬼作战，实际上身上的铠甲不过是 20 世纪凑合生产的塑料玩具，这要是能赢……我还不如相信袁世凯祭孔之后传位子孙万代呢。

> 作为一个 80 年代初出生的县城居民，我周围的同龄人如果没有留在县城，几乎有 100%会在婚前同居试婚；我认识的 90 后，起码一半以上可以接受婚姻与生育脱钩，坦然未婚生子的也并不罕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进步，说明在家庭生活方面，年轻人已经学会了使用超出父辈的自由权利。不意外的话，这个趋势将在一代人之后导致核心家庭的解体，彻底摧毁上一代人的家庭道德观。到那时候，基于核心家庭父母的少年儿童教育势必要更多地转向社会，抚养社会化的需求和动力也会越来越强大。我前面的建议只是希望社会主动地去迎接这个浪潮而已。
>
> 教育成本的增加，也和工业化社会越来越复杂有关系。农业社会的孩子只需要跟着父母下田干活，就能学会基本的谋生技能；50 年代要想出来工作就得读过小学；70 年代中学文凭也未必够用；21 世纪又普及了大学教育。这是因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的起点是不会变的，都是一张白纸式的婴儿，我们必须用越来越长、越来越艰难的学习来达到进入成人社会的门槛。
>
> 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一旦学习历程低于平均水平，就有可能

在阶级分化严重的成人世界中沉沦到底，所以教育投入上不封顶，成了家庭财富的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希望国家来承担一部分成本，还希望能让自己接近中产生活，放弃一部分抚养权利是必然结果。你可以对这个事实有看法，但不能一边抱怨生（养）不起孩子，一边抱怨政府管的太多，因为世上永远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其实把孩子放在集体中养育，这在几十年前就不罕见。作为一个大型国企双职工的子女，我在一两岁就被送到了企业附属的托儿所；读中学的时候，我大多数课余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打个招呼就住在朋友的房间。我在同学-朋友这个圈子内塑造那部分“自我”，恐怕比在家庭塑造的部分还要多一些。再加上那个年代教育中渗透的集体主义气氛，可以说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社会化了。等到我离开家乡去读大学，放假时怀念的“故乡”，60%的含义是我曾经的朋友圈，即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同龄人。这应该也算一种“集体抚养”吧。

当然，这种放任型的集体抚养是有弊端的。比如说青少年自己拉帮结伙组织活动固然快乐，但也经常制造冲突，还往往会制造少年黑帮。现在的父母也绝对承受不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伤亡率。所以我建议直接由公立学校出手，为少年提供足够的组织和娱乐活动选项，免得他们在夹缝中自发走向畸形的方向。

（驳）夸夸其谈、勃然大怒到孤芳自赏：也谈马前卒和他的“现代化”

天王云国度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答案，我在少年中国评论读者群问了一句：

任马一体：我还是想问三个问题
任马一体：首先，抚养机构所花费的所有费用，以及我们新增加的养老费用，由谁来负担？应该怎么负担？
没想到 @马前卒亲自来回答：

马前卒：收税啊
马前卒：不收税哪来的钱 帝国主义抢外国吗
任马一体：很好，怎么收
马前卒：加呗，当然是加
马前卒：现在不加税 过 20 年加税搞劳动力培训 翻番收
马前卒：所得税加 20% 继续累进
马前卒：没啥不好
和我预期的一样，于是我便继续追问：

任马一体：好，孩子们是享受同样的待遇，我说的没错吧
任马一体：那么待遇一样，凭什么收税要实行累进？
马前卒：因为要向富人收税啊
马前卒：谁规定收税还要考虑什么的
马前卒：收税就是全国花
到这儿我感觉自己优势很大。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加 20%所得税可不是闹着玩，引起强烈反弹是必然的。这还是“一刀切”所有孩子都统一抚养的设想，如果抚养的范围仅限于“无抚养能力”和“被褫夺抚养权”的家庭，那些纳税人就更加振振有词：凭什么用自己的钱（而且是那么大一笔钱）去便宜别人？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他们，不但改革很难进行，甚至会引发财富外流：改国籍现在来说并不是很难，我国目前的软硬件并不比欧美好，却要收高出欧美的税，为什么不改国籍？

任马一体：最关键的是，你拿什么说服他们？
马前卒：应该做的事情 和怎么做是两回事
任马一体：你是不是以为他们不会改投门路
马前卒：修宪你都不敢顶一个字的嘴
马前卒：收税算什么
任马一体：你在回避问题
马前卒：做不成 等着社会崩溃呗
马前卒：谁规定大大能做成所有事的

马前卒：做不成就倒台 历史上倒的多了 不多一个
做不成，等着社会崩溃呗……做不成就倒台，历史上倒的多了，不多一个……在下彻底输了。

任马一体：马前卒，这就是你捍卫现代化的方式？
马前卒：列宁也不指望沙俄真现代化啊
马前卒：但他也得说什么是现代化
（以上对话均为实录，无任何更改）

你很难想象马前卒对自己的主张是那么不负责任，且不论其手段是否合法得当，对于改革失败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如此轻描淡写。也难怪，一个连家庭伦理的意义都要全盘否定的人，怎么能指望他的主张能利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阶级？我早就说过：

只要“社会化抚养”改革大业一成，至于它所带来的问题，马前卒根本不在乎：反正当年拆分国企、大下岗你们都不敢吱声，现在你们都绝后了，又能奈我何！
马前卒所说的「社会化抚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任何支持马前卒“社会化抚养”的人，大家都可以问这样三个问题，来判断他们的用意：

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是在怎么收税？低收入者不收税，高收入者收累进税？每个人的孩子享受的明明是同质的待遇，怎么他们的父母税务负担却不一样呢？凭什么？

第二，就算这笔款子收上来，我们要怎么保证税款不被贪污挪用、工作人员能够尽职尽责呢？

最后，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真的能打破“家庭”，从而消灭因继承而引发的社会不公吗？还记得那些“慈善基金会”吗？

三个问题回答不上来或者含糊其辞，他们的想法就不可信。

以往抚养的成本是隐藏在每个家庭自身消费中的，而养老也是由子女的道德性义务负责大部分的，这个费用与收益我们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量化估算，但大家都是接受现状的，“家庭”这个单位的存在是我们当前民法存在的基础。但是一旦实行“社会化抚养”就会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就是我前面讲的三个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其次因为家庭的弱化，相关的法律尤其是民法该如何适应新局势，继承、赡养义务、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这些都会因为亲子间关系的疏远而变质。

马前卒在答案里罔顾事实，不惜拼命抹黑家庭抚养，把家长的抚养权妖魔化为一种“合法侵害子女的权利”，以靠近自己的主张。其实无论他如何片面列举，都无法否认：当前家庭抚养的规模远大于抚养所等其他地方。要证明社会化抚养优于家庭抚养，就要把规模作为分母来计算，而且家庭抚养中的受害规模往往是一两个孩子，而像携程、红黄蓝的受害规模则大至整个抚养机构！我们怎么能把希

望寄托给一个尚未经受充分考验的事物呢？
从细节上说，之所以要说明白抚养主体问题，也是为了明确责任，避免事故。比如说，公办幼儿园白天把小贩的孩子带走，这期间出了任何问题，政府要负责，当事人是要受惩处的。但如果是父母自己带孩子，疏于照顾，孩子出现死伤，按照目前的规则没有任何责任——依照古代习惯法，孩子是父母的附属财产，当然不需要父母负责。没人负责，就会有疏漏，就会人命关天的。
……
权责合一才能办好事。公立教育要承担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培养责任，当然也要拿到抚养权和监护权，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孩子进行奖励和管束，才可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
事实真的如马前卒说的这样吗？在我国《民法总则》中第 34-38 条明确规定了法定代理人（这里面包括儿童监护人）的义务、责任、撤销资格情形、撤销后义务和资格恢复情形，单行法则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也在积极处理儿童侵害案件。而马前卒竟然说“按照目前的规则没有任何责任”，真是胡说八道！

此外马前卒声称“社会化抚养”能“权责合一”，能够保证“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我在这里要提个醒：畏惧惩罚不一定会促使抚养机构保护儿童，有时反而会更糟。大家或许不知道有的抚养、赡养机构通过往食物投放安眠药，使孩子、老人嗜睡的事情，但是大家一定知道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马前卒本人也有过评论，为了怕惹麻烦，工作人员反而会用恐吓、强制甚至虐待的方法以实现剥夺孩子们的自由，“保障”孩子们的安全，这样就好吗？这只是把看得见的侵害换成了很难被发现的心理上、自由上的侵害罢了！

如果收入高了就能让父母包揽孩子的教育，不用政府插手。那么城市中产的收入，扣除房贷和房租，也比农民工多不少，这样的家庭应该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孩子，应该更喜欢生育啊，可事实是这个阶层的生育愿望最低。2017 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25974 元，彻底平均到每个人，再翻一番，你们就肯生二胎吗？欧美的福利尚且解决不了生育意愿下降问题，凭什么中国就可以用一家一户的努力去解决？
马前卒费尽心思证明当前的状况与工人阶级的待遇恶化无关，可是劳动保障，保障的仅仅是收入吗？现在的企业都完全做到了 8 小时工作制了吗？许多企业因为职工怀孕便要把人家一脚踢开，马前卒你真的看不见？你竟然还好意思说什么“很多逻辑问题和阶级无关”。

调查显示：1-5 岁儿童在家里最容易发生意外伤害_大申网_腾讯网

接着马前卒又拿这个把板子拍在家长屁股上，要我说，没用。但凡认真看过这篇文章就会发现，1-5 岁儿童在家里最容易发生意外伤害，原因主要在于幼儿本身身心发展不成熟易受伤害，而不是因为家长的缺位和侵害。“从受伤的场所看，最易发生意外伤害的场所是家里，占总意外伤害发生例数的 43。2%。”单单的孤证不足以证明家庭抚养的失败，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同样地，把孩子一天里在不同场合的时间做分母，由此得来的结果才能有证明力。我知道有人会质问我义务教育是怎么回事，那跟马前卒所提倡的根本不一样。义

务教育产生的时候绝大多数群众是都承认有文化很重要，他们无法像学校那样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对义务教育是拥护的，这就有了群众基础。而且就教育这一点，政府是有比较完善可行的考察指标的，这让义务教育的质量有了保证。按照现在政府的效率、透明度、公信力，加上最近曝光的事件，群众诚然无力自己抚养孩子，可是也总不能把孩子送进一个没有保障的地方吧！没有群众基础，主张是断然无法推行的。

还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是考虑富人，是不是见不得底层得利？问题是马前卒推行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改革就必须在和平环境下协调各方的利益，否则就是失败。马前卒对于他的“社会化抚养”，不列出成败之可能，不提具体实施方案，不讲应急政策，一味危言耸听、装腔作势，鼓动别人“文攻武卫”，哪里是来讨论严肃问题的！

如果是我，我认为对于当下局势，应该：

从根源上，我们必须要加强《工会法》、《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保证劳动者的收入、福利保障和自由，解放工会，使之能有力与资方抗衡；继续适当拉开个人所得税，实现有效的再分配。

在直接方面，除了加强道德宣传，也要完善褫夺不适格监护人资格的法律程序，并建设好小规模的相关抚养机构；开设专项资金，资助贫困家庭的儿童；运用政党力量，在社区、农村开展初步的互助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开通公众监督渠道，保证上述举措能够落实。

只有实现抚养压力缓和、社会法治化提高、民主监督的前提，我们才能在公共抚养机构、社区抚养互助组织、农村抚养互助组织三者基础上进行稳健的、尝试性的“社会化抚养”改革。

我知道有人会批判我的方案平平无奇，我也素来不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人，但是我能保证我的方案相较前一个所面临的阻力要少、要轻，换句话说，如果这套方案不能实施，那马前卒也同样不会成功。须知“重病下猛药”的改革，向来以失败告终。

有人为马前卒开脱说什么“社会化抚养只是演讲的一小部分，那么不要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这个论调实际上等于默认马前卒主张的失败，古语云“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小问题”暴露了马前卒的种种问题，面对人们的质问和批评，马前卒非但没有反思自己在理论、态度上的不足，反而怒气冲冲，自吹自擂什么“哥那篇讲稿写了两万字，没有一句是废话，每个标点符号都有针对性，都有预见性”，让人哭笑不得。我衷心希望马前卒先生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他所得来的声望、得来的声援和支持，都是人民给予的；失去人民，他将一无所有。

我知道大家有许多人讨厌“宏大叙事”这个词，大家已然把它等同于“政治洗脑”和“编造神话”了，美国的 Eric X.Li 在他的演讲中宣称“ Let us draw to a close this

era of meta-narratives”，中国的马前卒也宣称“世界上很多问题和阶级有关，但还有很多逻辑问题和阶级无关”。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想说，“宏大叙事”诞生的目的，其一是为了撇掉干扰视线的种种杂质，以勾勒出一个简明的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发展史，“从伊甸园到末日审判”、“雅利安民族对世界的驯化”、“民主战胜专制终结历史”、“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不同的叙事被人加工成一门“学科”，又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探寻未来的出路；其二它是一面旗帜，它侧面反映出一个集团共同的世界观和主张，并把更多的“朋友”团结在同一旗帜下。我不敢妄断那种叙事是真理那种是谬误，不过我想，对于 Eric X.Li 和马前卒的言论，一个清醒的无产者是不会轻易听信、不会放松警惕的；至于资本家，他们的想法无所谓，在一个地位如日中天的时代，他们完全享有自由选择权。

现在，我尝试为大家描述这样一个“宏大叙事”。

提到“现代化”，我们往往会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而提到工业革命，我们又不能不说说珍妮纺织机，这种机器一次可以搞定多个纺锭，也因此被恩格斯誉为“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但在珍妮机和她的“姐妹”被推广的同时，英国有许多手工场主和小商贩因此破产，也有许多工人因此失业，于是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用袭击工厂和摧毁机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深信，只要把这些害人的机器全砸了，就又能回到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了。运动从 1811 年愈演愈烈，从骚乱发展为武装暴动，规模也逐渐覆盖到英国全境，这场运动史称“卢德运动”。

今天我们往往批判卢德分子的愚蠢，然而设身处地地思考：他们在工业革命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土地被夺去建厂房，饭碗被机器砸掉。衣服能便宜一些？但是自己已经没有钱去购买了**——怎么能要求人去保卫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呢？**日本学者小木曾雪菜说过*（我瞎编的）*：

>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如此先进的生产力。有了能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两件快乐事情重合在一起。而这两份快乐，又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得到的，本该是像梦境一般幸福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先进生产力给底层带来的不是福音，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工作条件、菲薄的工资，《摩登时代》的喜剧场景并不比现实更荒唐，最关键的是，这些“低素质劳动力”终将被更加高科技的机器所淘汰，彻底一无所有。

生产力变革不是近现代的特有产物，精耕细作取代刀耕火种和采猎、铁质农具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建，这些都是古人的创造发明，它们为人类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历史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给所有人带来伤害，让大多数人愈加贫穷，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生产进步与“美好生活”成了一对不可兼得的冤家对头，我们可以把这种悖论叫做“卢德陷阱”。**

工业化的进程没有因卢德分子的意愿而改变，**但是人们的抗争方式却改变了，不再打砸机器，而是采取和平罢工、示威的方式表达经济乃至政治上的诉求。**请记住这一刻，因为从这一刻，人们终于开始理性看待科技。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这一点，但理性态度和组织斗争还不足以支撑起一场成功、彻底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理论来引导。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如何跳出“卢德陷阱”这一难题而诞生的，也就是说要实现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既要先进的生产力，又要保证它惠及绝大多数人，我们会在下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卢德陷阱”的影响已不仅限于经济，在思想与政治方面人们也在接受类似的拷问。随着 19 世纪的来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能回避近代化的潮流，且必须要做出抉择：洋人的朝廷还是疯狂的拳民；腐败的巴列维王朝还是反动的霍梅尼教权集团；西方的傀儡还是强人的独裁——要么拥抱进步然后粉身碎骨，要么蜷缩在名为“落后”的土坟里苟安。

我看到大多数人是这样回答的：

> 法国大革命给人民带来了自由、博爱、平等，带来了民主共和国；
> 而义和团则愚蠢、迷信、反智、残忍，是暴民，是一群土匪，是专制政权的走狗。

我想提醒大家两件事。一，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先后经历了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政权频频更迭，在他人眼中简直是灾难，当时大多数欧洲人都在拿法国做反面教材而非学习榜样，这种对平民运动的恐惧感也使得欧洲精英在进行社会改良与革命时不敢发动群众，延缓了共和的步伐，连身为法国人的托克维尔也对大革命毫不留情地批评。二，关于义和团，我还是原来的意见，这些拳民都是受外国侵略者欺侮的农民，有的已经被资本主义挤压至破产，火车、轮船这些东西除了让洋人更好地欺压他们，不能给农民带来一丁点好处，你不能要求他们去保卫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而且义和拳最初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恰恰是反抗清王朝的，到了八国联军侵华，农民们反而改变策略，“扶清灭洋”，专心抗击外国侵略。

如果我们拿着上面那个答案的思路，用今天去评价当时，那无异于是在说“儿子决定老子”。“卢德陷阱”下的人只有两种选择，除非有破局之策，不然都是顾此失彼。现代化的本质不是奢侈品、夜总会或脱衣女郎，正如它不是螺蛳粉、热干面或河南烩面一样，**它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新变化，是阶级的灭亡、诞生及地位变更**，处于不同阶级的人对于社会变化，要么努力改变阶级成分，要么做出有利本阶级的举措，这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是规律。**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一门科学而不是别的，那就要利用规律实现目标，而非试图修改规律。**所以一味归咎于卢德分子、拳民、霍梅尼分子没有意义，就像老农祈求上苍要或不要下雨、下雪、放晴，总有蠢人觉得“催眠疗法”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连趋利避害都不懂的人竟然是最明智的。

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国也陷进了这个陷阱：到底是冒着重蹈法国覆辙的危险实现社会变革，还是在农奴制和“小爸爸”的统治下继续当野蛮人？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二世、斯托雷平、克伦斯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走出这一困境，但无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一战末期，俄国濒临崩溃，打赢世界大战可能会在分赃大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人民早已不堪重负。布尔什维克的登场，**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共产党人对试图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学说的实践，获得第一次成功**，或许红军外战无能内战有罪，或许列宁是德国间谍，但总之，俄罗斯人民终于不是旁观和被动选择，而是作为独立力量去决定历史，最起码能凭他们自己的利益决定宣战与媾和。

有的人永远不懂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现代化”的头号敌人：本来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废奴改革，工商业不断发展，政治上也不断向君主立宪靠拢（二月革命后则成了纯粹的“民主共和国”），“现代化”的必备要素，咱大俄罗斯一应俱全，最重要的，只要再坚持 1 年，俄罗斯就会赢得一战，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布尔什维克没有像克伦斯基那样让全俄罗斯人团结一心，争取星辰大海，反而趁机搞内乱，最后与外国人签订卖国条约，无数公民遭受屠戮和追杀，辛勤得来的财富被掠夺，哎呦呦，是灾难，是浩劫！**如果我们的眼光离开了居于绝大多数的人民，无疑会下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在毁灭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所以他们叫“圣人”尼古拉二世，叫“民主之父”克伦斯基，叫“无畏上将”高尔察克，而只会叫**“不指望沙俄真现代化”的列宁**。（马前卒把列宁塑造成一个投机家，但真正的投机家正是他自己）

不妨再举一个类似的：1949 年后的中国。战后的中国满目疮痍，人民苦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经历了诸多挫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消灭了绝大多数文盲，国民基本实现温饱，终于成为一个工业部门齐全、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今天的地位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密不可分。

但是我们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中国地域广袤、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是工业非常落后，人口整体质量也很低，这样一个国家其实最适合简单、大规模的下游加工业，但中国浪费更多的成本用于教育，浪费更多的成本自己搞科研。这件事在改革开放初暴露得尤为显著：在全球化大潮面前，所谓的前三十年的奋斗，工业不如西方先进，科技不如西方发达，武器不如西方精良，人民生活更是远不如西方丰富，甚至还用军队与核武器让闭关锁国固化——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拒抗了最合理的国际分工，用于自给自足的高额投入还不如去买、去租国外更先进的成果。**是的，如果不提这期间工农翻身、人民当家作主，完全可以认定她的存在与行为阻碍了全球一体化的进步。**

承认吧：剥去“人”这个根本因素，不做由谁实施、为谁实施的考量，那么“现代化”就是痴人说梦。所以马前卒说“列宁也不指望沙俄真现代化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文章指出他“精神分裂”。

传统上的卢德主义已成为历史，但它的徒子徒孙仍存于世：反“全球化”、极端环保主义、反转基因……在给这些运动加上“反智”标签时，扪心自问，它们果真一点合理性都没有吗？全球化加速了新殖民主义；环境污染问题始终存在；即

便有许多证据证明反基因技术的安全，掌握这项技术的大集团也不尽然令人信任。我们常把保皇党、法西斯、霍梅尼分子、叶利钦们称作“反动派”，这些反动派是仅靠孤家寡人上位的吗？非也，他们无一不是抓住了人民的某些情绪，通过利用和欺骗人民篡夺果实。即使最反动的集团，也知道应该用最先进的武器、最广泛的宣传媒体、最高效的融资手段、最稳固的组织形式来武装自己——外表上他们与进步一方并无二致，**并不存在真实的“反现代化”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以绝大多数为主体的现代化”，换句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卢德主义”消亡的宏大叙事。**

我们把眼光放回马前卒的演讲，说实话其中事实性错误、逻辑问题之多，我已无需赘言，不如从他所谓的“一破一立”上入手：“传统”和“现代化”究竟是什么。

抛去错误的论据、信口胡诌的量化公式和偏颇的举例，演讲稿前四部分似乎想告诉我们：**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和发展，不是从旧事物脱胎的，而是“说有，就有了”**，新食品的出现、文化的发展、集体认同的产生，不是长年累月逐渐塑造成的，而是工业化一来，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要讨论马前卒的这个论点，我们就要从两个角度分析：历史与哲学。

马前卒一开始忽略了：螺蛳粉最早源于 70 年代，但是中国人对切粉和螺蛳的食用历史恐怕远早于此；河南烩面、武汉热干面的诞生也不能不谈面条上千年的发展史；同样，十三香虽然是一种“新事物”，但是人类对香辛料的探索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剖析发现许多“新事物”只是旧有事物的一种新组合。**如此浅显的事实马前卒不明白吗？并不是，只是这样将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就是**现代化非但没有摧毁传统，反而在延续甚至复活传统。**

我没有信口开河。从广度上，农业社会的低识字率把文化限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即“士族”）里，士族通过控制下层民众而不是亲自参与来影响社会；工业社会则不然，庞大的市民阶层和便捷廉价的信息传播方式让大多数人有机会接触到古代的典籍，除此之外大机器生产也大大降低了器物成本，这是汉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土壤，无论是狂热度、动员力还是规模，士族完败于现在的汉民族主义者。那么古人会在深度上胜过我们吗？古人从史书上了解到“白起坑杀赵卒”、“项羽火烧阿房宫”，但是经过考古我们发现：四十万降卒不是被活埋而是被处死后埋掉的；阿房宫当时只有地基，项羽烧的应该是咸阳宫。动辄“尧舜禹汤”的古人，去问问他们殷商的文字、服饰、建筑，他们大概一无所知，但是通过现代考古学和金石研究，我们发现了殷墟、甲骨文和一个灿烂的青铜文明。**真的，诚如马前卒所言，没有比现代人更了解历史的了。**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崇古”？

人的身体并不强于其他动物，却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强大适应力，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实践，人类通过它与自然界建立联系，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以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注：手稿里“无机的身体”共出现 4 次，集中围绕“劳动异化”阐述）*劳动并不是“一次性”过程，它不但需要人类一代

代不间断地进行，且劳动本身也在一步步进化，这个过程要靠代际经验与知识的传承，进步必然要以扬弃前人为基础，加以改进并付诸实践，传承后再次加以扬弃并实践，周而复始。**如果人通过自然界“延长身体”，那么同样可以说他是通过传承来“延长寿命”**。而且除了生产技术，人类史上的社会制度、道德习俗、文化等大多也能追溯其源头而非凭空而生，**任何一个对人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该否认“传承”的意义。**

儒家推崇周公，文艺复兴推崇古希腊、古罗马，康有为推崇孔子，这三者真的是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吗？不，儒家追求的是周公时期的尊卑有序，人文主义者追求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性解放，维新派则想利用孔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无非是想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用“昨天”的元素去解决“今天”的问题、构建“明天”。“昨天”就是“昨天”，大环境变了，就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复古”，**我们继承的是传统的元素，而非传统本身。**

是的，元素，这就涉及到哲学，具体来讲就是**同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是否可以割裂，忒修斯悖论**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一个事物里的要素不断改变，直到面目全非，这样是否就能成为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是否定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不存在形而上学概念中一成不变的事物，只要处于同一发展过程的轨道上，前后两者就不可割裂，所以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历史分析法探寻社会的本质。反过来，**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了旧事物合理的因素**，新颖的东西不一定好，古老的东西也不一定坏，绝不能轻易给它们贴标签。如果历史果真无足轻重，那么历史分析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代化”又是什么？魅力十足的高科技，宏伟的工业设备，壮观的标准化生产以及便捷、舒适、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马前卒竭尽辞藻为我们描绘现代化“乐园”，与所有工业党一样，他将一切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技术进步，并宣称一切问题都可以由技术发展解决，工业成果将惠及所有人。

分析工业党语境下的“现代化”，必然要从“技术”这个工业党思想的核心入手，首先我们引入一个模型：**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简单来说是购买生产资料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比重，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企业主会改进技术，以期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剩余价值剥削率，如此以来 C：V 会·下降。**技术本身在资本中不占任何比重，但它通过调整资本有机构成为资本家牟利，因此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个杠杆看作是资本的一部分。**

这不是 Happy End，技术总会从少数企业传播到全行业中，技术优势不复存在，产品利润会跌到比技术改进前更低的水平；因为产品市场有限，企业会大幅裁员以降低成本，再生产环节初端的劳动者同时也是终端的消费者，失业人口上升使本来有限的市场进一步萎缩。扩大的生产规模与扩大的相对过剩人口的结果就是经济循环崩溃，经济危机爆发，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卢德陷阱”，**最终的最终，无人胜利，包括统治阶级**。

有人说：你说的太抽象、太苍白，那不妨讲几个贴近生活的。我们说外卖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有谁认真考虑过外卖小哥的处境？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吃外

卖，有天晚上我下楼去拿外卖，当时是冬天，天气非常冷，外卖小哥一边守在搁着保温箱的电动车旁，一边给客户打电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天气都是这样。再说说端游，这是许多人的消遣方式，但一个网络游戏，在开发期需要程序员写代码，运营期要维护员随时准备排除故障，他们工作压力之大，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马前卒会说，这些人的生活最起码比以前好——是啊，反正那些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也是这么说的。实际上，雾霾、酸雨、毒品、暴恐、职业病、过劳死，这些无一不是拜现代化所赐，现在的商品倒是琳琅满目，但除去生活必需品又有多少我们能负担的起的呢？再看看圈地运动和马克思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彷徨于刀俎鱼肉的我们又怎么敢说：今天的生活比过去更好！

马前卒还振振有词地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文化上却没有因此出现古代那种程度的割裂现象”，甚至还举了几个企业家“亲民”的例子，真的是这样吗？是，程维和我们一样玩王者荣耀，马云也和我们一样吃方便面，但是他们同样也有能力在维也纳听音乐会，在百老汇看歌剧，我们呢？贫富差距不是体现在“档次”上，而是体现在自由上——**没错，两个阶级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因为统治阶级有了更多的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自由却在不断被削减。**最明显的是教育，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许多家庭将无法负担子女的学费，孩子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上升途径，不公被进一步固化。

马前卒在第五节洋洋洒洒罗列了一些东西作为他攻击的靶子，试图让我们相信保守的“利益集团”是当前社会进步最大的阻碍。仔细想想，要是大家都能负担的起高昂的医疗费，又有多少人会坚持看中医？只不过健康甚至生命也成了一种商品，根据消费水平分出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葛兰素史克丑闻和莆田系医院，难道也要怪在中医头上？至于转基因，你们真的以为农民如此愚昧吗？不过是找一个能保住饭碗的借口罢了——他们是最老道的投机家。知乎上的诸位，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当你们对“反乌托邦”和“赛博朋克”津津乐道的时候，难道不也是怀着一种对未来的不信任感么？去唤醒装睡的人是枉然的，正如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不见得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属性，其同样可以被用于对抗既得利益集团。**

知乎上的诸位，你们大多是小市民阶层，过的是小康生活，有足够的富余让自己和后代接受教育，所以你们自然支持马前卒的想法，并管他叫“左派”，但是在厂房、在工地、在农村，那些进退两难汗流浃背的劳动者，如果他们听见马前卒说“保卫我们的现代化生活”，心中会做何感想？一切成果都与穷苦大众无缘，你又怎能要求他们保卫一个对自己百无一用的东西呢！**况且，资产阶级何尝不在为保卫他们的“现代化”生活而机关算尽：从机关枪、毒气到核弹，从宪警、审查制度到电椅，这统统是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被用于铲除一切与资产阶级作对的人，这又何曾要我们来保卫！**

到最后面对大家的质疑，马前卒更是张牙舞爪、勃然大怒，恫吓起我们来了，什么“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什么“居然以为自己面对国家机器配说‘拼命’”，一幅钦差大臣的面孔。马前卒说特朗普是美国人选出的最保守的总统，“是美国衰落的转折点”，殊不知 1933 年的希特勒也是用同样的口吻煽动人心的，你们不喜欢特朗普，可谁又能保证不会招来一个希特勒？当然这是选举制国家，无选举制的国家是丝毫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当然马前卒也表扬听他话的人，说什么“在人

文社科方面，在政治讨论方面，中国网民的平均深度超过任何一个大国”，那么连自由获取信息都做不到的我们，又是怎样在深度上胜过别人的呢？靠防火墙不成？被封闭蒙蔽眼睛的自我良好感罢了。

马前卒以唯物主义者自封，却要多数人迁就他来实现抱负，不可不谓一大笑话。他从来不提如何让大众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分享成果，只是在那大吼大叫道“不支持我你们没好日子过”，这其实还是“英雄史观”在作怪。工业党只强调工业化需要“牺牲”与“阵痛”，却绝口不提工业化的红利到哪去了，脱离“人”这个核心，将作为手段的“工业”当成目的与追求，谁死谁活我不在乎，只要我的机器还在，明天就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本旨在为全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工业党，到现在竟成了一种新世纪的拜物教，宗教把幻想寄托给神灵与来世，工业党则寄托给科技与明天。**

马前卒鼓吹“现代化”，却不明白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模式是“民主政治”，他沉迷于用专制手段解决问题，这本身是无益的。试问蒋介石拥有庞大的军队、精良的武器，为什么照样在红军面前一败涂地？利益上的人心向背罢了，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翻身做主，给了工农兵应有的地位，即便物质上居于下风，仍不失为一支现代化军队，这同样适用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马前卒对异议者不是劝导和团结，而是打压甚至是肉体消灭，终将寸步难行，沦落到孤芳自赏的地步。

我想再强调一次，传统或许不合时宜，但不一定就是糟粕。雷锋只有在前三十年才是学习榜样，在今天没被讹钱就不错了；同样赖宁只有在集体主义年代才是小英雄，在今天只能是“烤肉”。“扔下历史包袱”、“积极进取”，用专制手段铲除异己，最符合马前卒理想中的集团不是别的，正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共产党。

是的，这些共产党员轻而易举地就“破除了对传统的敬畏感”，抛弃了红军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光荣传统，开始“与国际接轨”，变得贪污腐败、鲜廉寡耻了起来。他们忘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转而创造了许多花里胡哨的新名词，并美其名曰“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这些空洞的词汇根本无法引起群众和基层党员的共鸣，只会将“背叛”这个事实昭告天下。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顶峰，他执政后期好大喜功，一门心思想要别人阿谀奉承他，就是这样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僚，竟然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一直当到死，为苏联的灭亡掘开了墓道。诸位，难道我们也要重蹈苏联人的覆辙么？

“你说了那么多，却连一个方案都没提出来，所以你不如马前卒。”朋友们，我承认我没有什么奇谋妙策，马前卒，粉丝近 40 万的知乎大 V，他或许是一股动力，或许是一片机器里的刨花；至于我，那就更微不足道了，连我获赞最多的那篇文章，都是拜马前卒点赞所赐。**但决定未来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更不是马前卒，是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不征求人民意见，又凭什么说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呢？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该承认人民群众才是最有智慧的吗？

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去，“卢德陷阱”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劳动异化”是马克思早年的思想概念，后期不再提及，但依然不乏参考价值）：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分离，从而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成果除了维持生命的糊口，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他们在劳动时和机

器、原材料一样，都是“现代化”的工具。只要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相的分离状态一直存在，“现代化”就同绝大多数有不可避免的矛盾，除非我们能消灭“劳动异化”，直视现代化成果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拿着“今天比昨天过的好”去搪塞问题，这就必然要确认人民做主体而非作为手段的“工业化”，寄希望于人民，让人民决定，靠人民实施，由人民分享。**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让人民被动选择，更不是剥夺他们的选择权，而是引导人民主动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消灭异化，共享果实，实现共产主义。**

（3 月 1 日更新）

> 这篇文章原本是要在“上”一文之后发出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推迟到现在，真是抱歉。在拜读原文的过程中我总能找出一连串的反驳点，但是一旦写成文章，就要用通顺的逻辑把这些反驳点串联起来，并形成新的理论，此外遣词用句、查阅资料也花了一些时间，尽管最后的结果很粗糙，但还是从中获益许多，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 马前卒有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在反恐方面，但他容易走极端，采用一种方法就必然要放弃另一种，如果马前卒能多懂得辩证，那他的理论会完善很多。我加过“少年中国评论读者群”，马前卒在里面不是群管理员，待人平和，也从未见过他对别人语言攻击，事实上我更愿意称他为“任先生”:我蔑视马前卒，但敬重任先生。马前卒是混蛋、是大老板后面的跟屁虫；任先生却和我们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公民。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发泄私怨，而是要打倒马前卒，解救任先生。

（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马克思同志是凡人——200 周年诞辰纪念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序　在中国“德意志大学”谈马克思

大家好，咱们同济是一所德国人创建的大学，“同济”就是上海话读出的“德意志”。对于德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我们应该比其他人更关心一些。

在所有德国人中，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现在管理中国的这个政权，理论上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方向。宪法近万字只提到了 6 个人名，马克思就是其中之一。

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出生，距今 200 年零十一天。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时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现在 2238 年，中间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11 个统一政权，平均每个朝代的延续时间就是 200 年。以中国历史的节奏来说，2018 年和马克思诞辰整整隔了一个时代。

马克思 1883 年去世，24 年后同济大学才建立，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庆 111 周年校庆了。这么长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很难通过个人感性认识去理解今天和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有什么不一样。而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学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必须先通过数据和案例去理性认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才能理解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一。马克思的世界

1 世界的尺度

马克思出生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精确的人口统计，一般认为世界人口在 1810 年左右超过 10 亿，1890 年达到 15 亿，在马克思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里，全世界人口都是 10 亿出头。

欧洲的数据稍微准确一些，1850 年，马克思 32 岁，欧洲人口大概是 2。7 亿，每个国家人口大概是几千万到几百万。1860 年，法国人口 3700 万，最发达的英国不到 3000 万，普鲁士人口 1800 万，未来的德国人口 4000 万左右（不算奥地利）；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人口 6000 多万。

这意味着，从人口来说，马克思时代的地球，差不多就相当于过去十几年的中国；而马克思生活的欧洲，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区，比如说华东或者华南几个省；每个主要的欧洲国家相当于现在中国一个省或者一个直辖市。

但是，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 19 世纪欧洲比拟成现代中国的一

个大区。因为其中现代社会的成分太少了。

马克思年轻的时候，欧洲只有伦敦人口超过 100 万，接下来是巴黎，正在从 50 万向 100 万增长。到他去世前几年，欧洲终于有了四个帝国首都的人口达到了百万级，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其他的城市，即便是莫斯科、罗马、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城市也只有几十万人，放在今天的中国算是较大的县级市、较小的地级市。剩下大多数欧洲人口，当时不是农民就是几千、几万人口的小镇居民。可以说，马克思中年时期，不考虑质量只看人口数量，整个欧洲比较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现在中东部一个小省，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只相当于现在中国一个地级市。

从地理空间上说，马克思时代的世界又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马克思 55 岁那年，欧洲有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代表了当时人类所能想象的旅行速度极限。现在，协和号飞机可以用 30 个小时环绕地球。从旅行速度看，马克思时代的地球，在尺度上比比我们熟悉的地球大几十倍，表面积则是几百上千倍。除了西欧少数通铁路地区之外，

在距离尺度上，大家可以把马克思时代的地球想象成土星或者木星。
回头看看前面的数据。马克思时代世界人口十几亿；最先进的欧洲，现代社会规模比当前中国一个地级市大不了多少；绝大多数地球表面都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通过，只有极少数现代化地区有火车和蒸汽船。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几千个知识分子写信投稿进行思想交流，就会主导大多数识字阶层的舆论；几个交通节点发生革命，会改变整个大陆的历史走向；而百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被几万个造反者占据，毫无疑问会震动全球。理解这些数据，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眼中的世界，理解塑造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那些历史事件。

2 现代社会的黎明

青年马克思看到的的世界如此落后，马克思主义却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一直到现在还能指导我们这个工业化国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因为马克思赶上了工业革命。

一般意义上的工业革命从 1780 年开始，马克思的父亲生于 1782 年，算是工业革命的同龄人。但在一个没有铁路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传播起来都很缓慢。1800 年之前，工业革命还没有进入欧洲大陆，在马克思长大之前，他父亲也只是听说遥远的英国有一些新东西，但绝对想不到这些东西会改变整个欧洲乃至世界。

到了马克思出生之前 3 年，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鲁尔地区划归普鲁士，杜伊斯堡附近才开始有现代工业萌芽，也就是后来的鲁尔工业区。1824 年马克思 6 岁，莱茵河上出现了第一艘蒸汽船；1825 年马克思 8 岁，英国出现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835 年马克思 17 岁，德国开始修铁路；1837 年马克思 19 岁，摩尔斯制造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3 年马克思 25 岁，全德国有 70 万产业工人，分散在十几个中等城市和几十个小城市。这期间马克思沿着莱茵河去波恩读大学，坐着马车去柏林和耶拿读博士，看到的就是蒸汽机和铁路逐渐进入传统农业

世界的场景。

我做个未必恰当但是很形象的比喻，17 岁时进入德国的铁路，就相当于我这个 80 后，九十年代去大连看到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他 19 岁那年出现的电报机，就是我和同龄人读大学才开始接触的互联网。他 25 岁那年旅行中看到的几十万产业工人，好比 90 后在 2015 年的一二线城市看到满大街程序员。想想我们怎样从习惯付现金到手机付钱买东西，怎么从绿皮火车到适应高铁和 12306 网站，就能稍微体会一点马克思当年看到火车和电报局的心情。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拿破仑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突破不了英国的海军封锁。纳尔逊在 1805 年干掉了全部法国舰队，依靠的是 20 多艘战列舰，全都是木帆船。马克思 41 岁那年，法国人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铁甲船。但是马克思 65 岁去世的时候，德国给北洋水师造了两艘主力舰，镇远号、定远号，马上要交付了。比较这两种军舰的外形，也能体会这期间工业社会的变化。

除了技术进步，马克思身边的政治节奏也在逐渐提速。纳尔逊海军胜利后十年，1815 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然后被流放到小岛上，1821 年去世。我们可以想象，马克思 3 岁的时候，会从父母口中听到拿破仑这个名字，虽然他还不懂为什么这个人死了是大事。

到了 1848 年，30 岁的马克思正在写共产党宣言，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回来了，他先当选法国总统，然后当了法国皇帝。1870 年，马克思 52 岁，路易-波拿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退位，导致巴黎公社出现。1873 年，路易-波拿巴在伦敦死掉。这一年马克思才 55 岁。

注意，拿破仑三世当皇帝和他叔叔不同，不仅仅是靠政变，更是靠全民公决和资本家的支持，如果说老拿破仑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社会的皇帝，路易-波拿巴已经几乎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客了。他建立的帝国有一个政治相当自由的议会，修了一万多公里铁路来巩固国家，还和空想社会者搞合作，马克思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王子复辟帝国，更是法国社会的一次大转型。

同样级别的转型，在古代社会往往要几百年上千年时间，但 50 多岁的马克思就能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也是工业革命后才普及的政治节奏。类似的事情看得多了，马克思不仅体会到了工业社会的政治变化规律，还完全丢掉了农业社会居民对国家政权的本能敬畏。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

下面我用图片来描述一下马克思时代的世界：

对于这些画面，最简单的描述就是蒸汽朋克风格，一个所有人都看到机器即将征服世界，但是农业社会尚未消亡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很能打架的青年人穿着传统服装，寻求新社会的发展方向，我决定借用中国人熟悉的电影截图来做个对照，希望能帮助各位理解中青年马克思的心理状态。

从物质来说，我们的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塑造的。马克思生在一个没有铁路的世界，但他在少年时看到了现代世界的黎明，少年和青年时代目睹了工业革命从一颗种子变成一颗树苗，老年时代看到它长成一棵大树，这期间整个世界的政治周期都因为工业而加快。所以马克思虽然生在农业时代，但能针对工业社会的矛盾提出一套社会学理论，一直到今天还有活力。甚至可以说，因为看到了工业社会从无到有成长的过程，他对工业社会的理解，可能比我们这些出生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更深刻。

3 俯瞰世界的第一代人

马克思的父亲出生之前，有一个历时 300 多年的地理大发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1750 年-1800 年的欧洲，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大洲，还通过帆船和火炮的优势，控制了很多海外领土。但是，在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眼里，欧洲的统治者和成吉思汗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蒙古骑兵骑马，欧洲人用帆船罢了。帆船是木头和帆布，当时的火炮是一根比较精密的管子，都是农业文明一眼就能看清原理的手工业品。欧洲人工业革命之前，并不能用这些东西和其他文明拉开代差，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不觉得欧洲人比自己强。

比如说奥斯曼土耳其被欧洲压制最惨，但依然经常给欧洲强国的军队制造惊喜。1807 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开战，5000 陆军登陆埃及，被一个地方军阀阿里给赶下海；海军炮轰君士坦丁堡，被火炮给打回去了。其中一门 1464 年造的旧炮还击沉了英国军舰。可见即便是最强的欧洲国家，这个时候也不能对传统强国掉以轻心。

军事上拉不开差距，各国在文化上当然更看不起欧洲人。中国人觉得欧洲人是蛮夷，其他的文明也经常会得出这个显而易见的判断。1830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当地人就发现，法国农民士兵的识字率很低，远远不如自己，认定这是一群枪炮还不错的蛮子。

之所以欧洲人不能绝对领先世界，根源在于经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有一个粗略的统计表，把世界各国的人均手工业和工业水平合在一起计算，我给大家贴一下。可以看到，1750 年的时候，欧洲只有英国对世界平均水平略有优势，到了 1800 年，欧洲也没有明显超出中国和印度。在马克思父亲那一代人看来，欧洲远远还谈不上是世界的中心，考虑问题的时候最多是把美洲纳入考虑，没有主动替世界思考未来的自觉性。

但是，从 1800 年开始，欧洲，尤其是欧洲西北角的地区，开始超越世界。蒸汽机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让欧洲人很方便地把货物和军队送到全世界，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商品，典型例子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用蒸汽机拖着大炮打进长江，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是蒸汽机第一次应用于战争。

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马克思 24 岁，之后马克思还为鸦片战争写了评论文章。所以，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自己居住的地区压倒了全球，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虽然马克思一辈子西面最远去过英国，往东只去过奥地利，往南只

到过非洲海岸，但他很自信地给全世界提出新时代的理论。之前的人要么不敢这么想，要么是基于错误的判断这么想，马克思是第一代基于正确认识，替整个世界考虑未来的人类。所以说，指导现代社会的思想出现在马克思这一代人，有很强的必然性。

4 新旧时代之间

前面分析了欧洲的历史地位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定位。接下来我们看看马克思在欧洲内部的视角。

首先我们看看马克思家乡的地理位置。在欧洲地图上找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最好记的方式就是先找卢森堡这个小国。他家离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德国四国边境都只有几十公里。然后我们看自然地理，特里尔在莱茵河的支流上，铁路不发达的时候，河流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到出海口对面就是英国。可以说，在工业革命早期，马克思的家乡和所有工业区都是邻居。而他成年后的绝大多数时间，也正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这几个国家度过。

另外，他家在莱茵河西侧，而德国大多数领土在莱茵河东边。很容易被法国军队快速占领。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一开始，1794 年，特里尔就是法国领土，到 1815，马克思出生前 3 年才划归普鲁士。马克思的父亲是在法国管理下读中学，成为地方精英的。所以，马克思童年体会到的的政治气氛，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进步主义气氛。而他成年以后，大多数时间住在伦敦、巴黎这两个最大的现代城市，体会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和生活。

但终其一生，马克思在文化上都自认为是德国人。他知道自己的国家相对英国法国比利时都很落后，应该通过革命来改造。所以，德国革命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他最初的几个著名信徒，倍倍尔和拉萨尔都是德国人。

1848 年革命是马克思唯一亲自参与过的革命。那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贫民革命和知识分子的激进运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开会，在比利时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在巴黎伦敦搞革命的打算，很快就一起回到德国。马克思办《新莱茵报》，鼓吹用民主和革命塑造一个新德国，还参加了新政权的筹备组织；恩格斯亲自和几百志愿军参加战斗，准备打出一个新德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国之前，刚刚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很清楚德国还没有工业化，自己参与的不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为工业资本主义开路的革命。但他和恩格斯依然毫无保留地投入战斗。失败后被赶到英国和法国。

后来，恩格斯总结 19 世纪的欧洲，说典型的现代经济案例是英国，典型的现代政治案例是法国。他们两个 1848 年冒生命危险做的事情，就是把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引到自己的国家，改变相对落后的社会。可以说，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诞生在最先进的国家，而是诞生在先进社会和落后社会的边界上，从一开始就有给落后国家带来跨越性发展的意图。这样的行为和思想，非常类似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比如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中

国的共产主义者学马克思，不仅仅学了思想，在行动上也学习了马克思亲自做出的榜样。

5 穷人和富豪之间

马克思主义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要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个人的经济生活。

马克思生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虽然说富豪很勉强，但也算中产的顶层了。1830年他 12 岁，进入特里尔中学。这个学校听起来像是大众教育，实际上是个非常精英化的大学预科班，他所在的班上只有 32 个学生，大多数天主教出身的要进神学院当神父，新教出身的要当律师或医生，没一个打算当普通劳动者。马克思家里是改信新教的犹太人，他父亲希望马克思子承父业当律师。后来，马克思的岳父是特里尔政府的顾问官，他妻子的哥哥是普鲁士王国的内政部长，但在马克思结婚的时候，当地人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

1835 年，马克思开始读大学，先去波恩，然后转到柏林，最后在耶拿大学读博士，这期间他父亲来信，抱怨马克思一年花 700 塔勒太多了。塔勒是银币，和我们国家的一块大洋差不多，马克思这一年花掉 700 银元，换算成当时的收入，差不多是 10 个工人的年工资。现在中国一个蓝领工人一年赚 6 万，马克思读大学一年就花了五六十万，相当惊人。就这么一大笔生活费，他还因为做衣服买书欠了一些钱，毕业后也没还掉，被人追债。

离开德国后，马克思的收入和开支也远远超过平均水平。他母亲去世，给了他差不多 7000 塔勒的遗产。他给美国报纸写稿子，每周两篇，每篇一英镑，坚持写的话每年 100 英镑，仅仅这部分稿费就相当于两个最好的工程师的年收入。当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是恩格斯这个有钱人不断资助。我有个朋友做过精辟的总结：经济上说，马克思是恩格斯养的门客；但思想上恰好反过来。

恩格斯收入高的时候，会给马克思一年 350 英镑的稳定汇款，少的时候，每年也会给差不多 100 英镑。马克思的收入折算到现在，起码每年 35 万，好的年份可能有一二百万，完全可以支持马克思全家过非常富裕的生活。

然而，各种资料都表明，马克思的家庭经常处于破产乃至欠债状态。他妻子结婚的嫁妆有些银餐具，多次进当铺，最后也没拿回来。他给恩格斯写信，和其他朋友聊天，经常说家里连续吃了一星期的面包和土豆，有的时候全家病倒都没钱请医生。每隔几年，房东就会来驱赶马克思一次。前面提到他母亲去世留下 7000 大洋的遗产，马克思拿这笔钱还债之后，居然没剩下多少。

如此丰厚的收入，却总是要破产，和马克思为人大方，经常拿钱参与政治活动有关系，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他和妻子都不会理财，不会量入为出。有钱的时候，马克思给自己的几个女儿请一个意大利语教师，一个法语教师，一个美术教师和一个音乐教师，都是上门授课。没钱的时候，他会考虑让未成年的孩子去工厂干活赚生活费。有一次，马克思收到稿费，勉强还了欠肉铺老板的钱，还没清理蔬

菜店的赊账，就敢于分期付款买钢琴。马克思和妻子前后生了 6 个孩子，但由于间歇性破产，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就算那个时候医疗水平低，相对马克思的收入来说，这个婴儿死亡率也太高了。

收入达到了顶级中产水平，但经常破产，说明马克思的实际生活水平波动极大。某些时候可能和富豪阶层差不多，另外一些时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水平。这种大起大落，让我想起一个中国历史人物：曹雪芹。

我们都说红楼梦写的好，不像小时代那样可笑，因为曹雪芹真的体会过贵族家庭生活，也见过这个贵族家庭败落的过程。从顶层社会沉到底层，或者从底层爬到顶层，这种是非常罕见的社会体验，等于给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开了一个剖面，足以支持他写出时代的缩影。

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马克思一辈子起起落落十几次，等于把 19 世纪社会按时间切了十几个剖面观测，整个 19 世纪，有类似体验的人我不敢说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我们经常说，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不能做实验。但马克思证明，他可以用体验代替实验，对工业社会的阶级问题做出最深刻的观测。这种体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二 为什么是马克思

1 唯物主义

前面我分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条件。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这个问题应该让最了解马克思的人来回答。中国大多数版本的教科书，中学语文都选入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演讲。我贴一下原文，大家回忆一下。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把马克思毕生的发现总结为两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至于恩格斯自己喜欢谈论的哲学尤其是辩证法，一个字都没有提。可见恩格斯这个评价非常精炼，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部分最准确的总结。

那么，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呢？首先要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变动的，比如说某个帝国灭亡，某个宗教兴起，某个城市衰落，这都是历史的变化。但是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这都是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大多数古人不相信这些东西会变动，认为宗教或者帝国是永恒的，至少会把罗马、洛阳、巴比伦这些帝国符号看成不变的

权力中心。罗马帝国灭亡了几百年，东罗马和西罗马的主教还是比其他地区的主教地位高。

还有的人知道历史在变动，但认为之上还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在起作用。很多人就认为罗马帝国灭亡，是因为罗马人丧失了道德。中国也一样，《尚书》有一篇《汤誓》——商讨伐夏的宣言，原文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到了周国讨伐商，又写了一个《牧誓》——在牧野开战前的宣言，原文是：“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这都是指责对方的统治者不遵守道德，不敬重神灵，自己要代表上天来惩罚。到了明朝，施耐庵写水浒传，还是离不开“替天行道”四个字。

马克思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社会变动首先意味着各制度和社会集团的竞争，而决定竞争胜负的是物质力量。物质力量来自于人类的生产，从长期来看，哪种制度更能促进生产，能动员出足够的物质力量参与竞争，哪种制度就会取胜。

我们知道，马克思不是工程师，也不是农业专家，他并没有从技术细节出发，告诉我们怎么详细设计一种最优秀的制度。实际上，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思想就不是一个直接输出答案的思想。马克思说能促进物质力量的制度会赢，但你让他预言什么样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他又说这要交给历史竞争去选择，胜利的制度肯定是能促进物质生产的那一种，似乎两面的话都说了，很有算命先生的风格。

这时我们再回顾一下恩格斯的演讲。他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提到的第一个人名是达尔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达尔文的理论是什么？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什么是“适者”？生存下来的就是适应环境的物种。哪一种物种会繁衍下去？答案不是“更高”、“更壮”、“更灵活”，依然是一句模糊的“适应环境的生物”。这是一个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像的“循环论证”，只解释，不输出结果。

达尔文在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既不知道什么是基因，也不知道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甚至不会用生物学指导自己优生优育，结果娶了表妹，生了好几个畸形子女。但我们依然认为达尔文开创了生物学的新时代。这不是因为达尔文搞出了杂交水稻，而是因为他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自然环境解释了物种乃至人类为什么会存在，不需要上帝这个超出自然界的精神力量搞创造，逻辑也很完整。所以神学界觉得天塌下来了，科学界获得了一个可以用理性去分析的新天地。

理性分析一个事物，是我们主动利用这个事物的前提，注意我说的是主动利用。达尔文之前的人类已经把狼驯化成了狗，把野草驯化成了庄稼，但从未有人意识到要用干预进化的方式创造新物种。现在达尔文去世不过 100 多年，我们吃的粮食几乎都是最近几十年培育的新品种，我们能吃到足够的豆油要靠转基因大豆，我们吃的猪也不是传统的黑猪，这虽然不都是达尔文的功劳，但都离不开达尔文的思想。

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类似。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也在不断进步，但那是人类随机试错的结果，代价很大。马克思告诉人类，无论是国家、政党，还是宗教、军队，

本质上都是人类社会物质竞争的产物。甚至道德和文化也会因为物质力量的变动而变动。他剥掉了所有社会制度和团体的神圣性，告诉大家，社会制度和火柴、蒸汽机一样，都是可以改造的工具。有了这个认识，人类才有可能主动推动制度变革，才可能用好社会制度这个最重要的工具。

2 唯物主义是革命的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和进化论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本身没有特殊的立场。但对于 19 世纪和之后的革命者来说，它的几个推论非常有用。这是一个让革命者思考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的理论。

首先，旧制度不能再用道德优越感和神圣光环吓唬人了。过去的国王炫耀自己的血统，政客炫耀自己的道德，贵族炫耀自己天性高尚，都可以用来加强制度合法性，现在统统一文不值。马克思出生前 20 多年，法国革命者明明已经夺权了，但只要国王考虑第三等级的诉求，还是打算留着国王管理国家。国王后来死掉，是因为他自己打算叛逃。马克思之后的革命者，只要打了胜仗，必然要让国王下台，必然要清洗贵族集团，留一条命算是仁慈。

其次，这个理论告诉革命者，建立一个新社会不能靠美好的愿望，而是要搭建一套更有竞争力的制度，仅仅有善意和道德是没用的。如果新社会的经济不如旧社会，军事不如旧社会，就算造反的时候再有正义性，也一定会把政权还给旧制度。这一点清楚地解释了历史上造反和复辟的循环，告诉新的革命者怎么避免这一点。

第三，马克思论证，旧制度要灭亡，往往是因为生产力变化。旧制度适应的是原来的低生产力水平，新的生产力会在旧社会外部制造压力，内部制造矛盾。革命者要推翻旧制度，就要基于生产力变革找到矛盾爆发的点。比如说帝国主义入侵，或者新兴的社会集团不满，这都是革命的动力和好机会。反过来说，有矛盾，有斗争，社会才有进步。

第四，生产力发展和矛盾最终都体现于人。旧社会的矛盾，往往体现在那些接近新兴生产力的社会集团周围。这样的社会集团不仅愿意参与推翻旧制度，还很有可能创造更符合生产力水平的新制度。所以，革命必须依靠先进的社会集团，发动先进的社会集团。

这四个推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同样冷漠，既不谈道德，也不讲感情，也没有许诺自由平等。但是，对于革命者来说，无论你信不信，规律都会发挥作用。自古以来，人类就想飞上天，获得在三维空间运动的自由。但愿望本身什么都改变不了。只有研究物理学，知道物理规律允许哪些事情，不允许哪些事情，我们才能造出飞行器，在物理定律限制的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问题也一样，越是研究规律，尊重规律，人类离理想化的社会就越近。

这些推论最著名的应用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和 19 世纪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对底层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心，对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政权有本能的

仇恨，对革命后的社会有无条件的乐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感情能改变社会，所以，1848 年全欧洲革命失败之后，他把大多数时间放到了图书馆，专心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在 1867 年出版了资本论，那年马克思 49 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大家都有所了解，在中国读中学必然会接触这部分知识。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简单地说，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发现技术进步往往并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发现很多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还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发现工人和破产的小生产者开始向往新社会。

马克思认为，这些事实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资本主义不能容纳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依靠剩余价值产生利润，但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必然会需求相对不足。所以，生产越扩大，危机就越频繁，利润率下降就越明显，最后出现总崩溃。抓住这个矛盾，就能借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创造新社会。

由谁创造新社会呢，当然是那些能控制新生产力，又没有被接纳进统治集团的产业工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创建一种新社会，以公有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充分释放资本主义束缚的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从社会学模型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事实证明，这套理论很成功。20 世纪，马克思的继承者有的走上彻底的革命路线，建立了新中国和苏联，有的希望在现有的政权框架内逐步改良，在十几个发达国家成立了很有影响力的社会党。所以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第二大成就。但是，必须先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框架，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者说，让其他 19 世纪的革命者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做研究，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还是比唯物主义历史观差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原话，我认为恩格斯也认为唯物主义史观比政治经济学更基础，更重要。

But that is not all。 Marx also discovered the special law of motion governing the present-da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bourgeois society that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has created。

我和恩格斯的观点差不多，如果让我尽量简短地概况马克思理论，那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句话。这个词已经包含了足够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可以为 20 世纪和以后的革命提供依据。毕竟在马克思之前、之后，都不缺乏对底层有足够同情心的革命者，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革命者才开始用科学精神去探讨手段和目标，把自发的阶级斗争变成建设新社会的动力，人类才有可能在科学基础上去设计新社会。

由于社会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我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现，和人类学会用火，发明蒸汽机一样伟大，都是人类掌握规律，利用规律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江湖地位。

3 马克思属于 19 世纪

我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发现这个规律的马克思不是独一无二的天才。我前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描述 19 世纪和马克思的个人情况，就是想告诉大家，唯物历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时代变化让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剧烈变动，其次是因为马克思自己的生活经历比较独特，看到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各个阶级的生活。这些条件凑在一起，马克思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

但是，历史条件和生活体验都不是马克思能垄断的东西，如果马克思年轻的时候生一场大病，脑子坏掉了，19 世纪也会有其他聪明人发现这个规律。1894 年，恩格斯去世前一年，他给一个大学生写信，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 1850 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这里提到的“基佐”，就是 1847 年把马克思驱逐到比利时的法国首相。1848 年革命，基佐被赶下台，法国共和派又欢迎马克思回巴黎。这个基佐，在政治上虽然很保守，但他在马克思读小学的时候写了几本历史书，明确指出法国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认为从农奴阶层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是“法国文明中最有活力，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基佐认为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开战要夺权，结束是因为议会制度和世袭君主达成了联盟。这已经很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雏形了。

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乐意读法国首相写的历史书，也相信很多人不比马克思笨。如果马克思动作慢一点，恐怕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发明人就不是他了。这种事情在 19 世纪很常见。华莱士发现进化论，仅仅比达尔文晚了 10 年。由于达尔文担心引发争议，最后他俩是一起宣读论文的。 1876 年 2 月 14 日，贝尔去美国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同一天也有别人申请电话专利，仅仅比贝尔慢了 2 个小时。我相信，马克思比其他历史学者快不了几年。

在 19 世纪的历次革命中，马克思也不是举足轻重的领导者。1848 年他 30 岁，和恩格斯一起给共产主义同盟写了《共产党宣言》，听起来在当时就是大事。但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当时只是 400 人的小团体，其中 300 人是德国流亡到外国的革命者。所以，共产党宣言最初只是小圈子里的一份德文宣传品，到了 1850 年翻译成英文后才开始广泛流传。写完《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被德国西部资产阶级推举成民主派代言人，算是一个地区宣传部长；恩格斯在德国南部，给一支 800 人左右的志愿军当副官，算是个副团级干部。在 1848 年全欧洲都革命的大背景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不能算革命领导人。

而且 1848 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仅有的一次直接革命经历了。到了 1870 年巴黎公社，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崇秘密团体的布朗基主义者，以及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布朗基没等到巴黎公社成立，就被政府军抓了，还是被缺席选举为公社委员；蒲

鲁东在巴黎公社之前 6 年就死了，但在巴黎公社 64 个委员中，他的信徒占三分之一。至于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委员，最多也就是个位数。当时巴黎公社考虑过邀请很多人来帮忙，甚至还邀请过意大利的加里波第指挥军队，但肯定没提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 20 世纪中苏两国渲染出来的。

马克思真正发挥明显影响力的组织，是 1864 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际。但是，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各方面妥协了一个“所有派别都满意的纲领”，换句话说就是没什么纲领。即便在这么一个松散的组织里，马克思也只是总委员会 50 个委员中间的一个。当然，马克思名气比较大，被选进负责编写章程的 9 人小委员会，但也不能说马克思对第一国际有主导权。只能说马克思对中欧地区的一些工人派别影响力很大。

到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已经名存实亡，1876 年自行解散。1877 以后，马克思中枢神经紊乱，参加公共活动越来越少了。从整个 19 世纪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无可替代的革命灵魂人物。后来苏联和中国的宣传往往过于夸大了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革命的影响。

甚至在革命形势判断方面，马克思也不算成功。总的来说，他一直期盼的全面革命始终没有到来，他对底层工人阶级的判断也有很大失误。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观察到的阶级冲突，看到的那些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现代工厂的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者和新兴的技术阶层。手工业者担心自己被现代工业淘汰，所以反资本主义；技术阶层觉得贵族和资本家不接纳自己，所以想改造资本主义。这两种人的知识水平都高于产业工人，所以组织性强，战斗力强。在工业化走到一半，旧的等级还没有被打破的时候，这两种人和产业工人站在一起，的确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建立新社会的希望越来越强。

到了 19 世纪后期，虽然产业工人总数已经从几百万上升到一两千万，但是传统的手工业者大多数被消灭，技术阶层也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承认，实际上蓝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革命意愿反而有下降。所以马克思期盼的阶级革命反而越来越弱。直到列宁发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概念，用一个精英团队替代了曾经的工匠，才重新推进了革命。

但是，这类失误其实可以忽略。因为马克思代表 19 世纪第一代工业社会，给出了划时代的社会学思考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社会学结论，马克思自己的具体结论存在失误，就像第一个学会用火的人不小心把肉烤焦了，完全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相信你们也会赞同这一点。我只是提醒各位，马克思的伟大，是整个 19 世纪人类进步的结果，是全人类的的光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厉害，绝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他个人的天才创造。

4 中国与马克思

马克思时代，欧洲和美国比东方领先了一二百年，马克思参与组建第一国际的时候，中国还没见过火车。马克思考虑解散第一国际的时候，中国政府正在琢磨怎

么拆掉唯一的淞沪铁路。所以，这带来了一个错觉，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太先进了，不适合落后的中国，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适合先进工业国的马克思主义，变成适合落后农业国的山寨版本。

从前面的分析看，这个想法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后面那些具体推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说只适合工业社会。

其次，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行动来说，他们对德国革命付出的精力是最多的，而德国当时相对英法是落后国家。从创作《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致力于把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引入落后国家。晚年马克思又把注意力转到俄国的土地问题上，认真地探讨过唯物历史观在落后国家的应用。

所以说，从出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反而非常适合落后国家，适合分析农业社会。早在苏联成立之前，中国的革命者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就是孙中山。

大家应该知道，1896 年，光绪 22 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外交官秘密逮捕过一次。清朝公使打算以送精神病人回国的名义，把他绑回国杀头。后来使馆的仆人走漏风声，英国首相觉得清朝在自己的领土上抓人不可容忍，逼着清朝使馆放人。1896 年 10 月 23 号，孙中山被放出来，捡了一条命。

接下来半年，孙中山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大英图书馆。他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的作品，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目前看来没有其他中国人比他更早。1903 年，孙中山督促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研究马克思，当年，留学生团体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君武翻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听这标题就是真读进去了。里面有一句话："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可以说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又过了两年，1905 年孙中山到比利时会见第二国际主席，见面的时候孙中山就说自己学习马克思。虽然孙中山此时的认识还很粗糙，但有两个点远远超出了其他中国人。一是要用马克思式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二是中国革命必然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混合体。

同期中国其他的造反者还在编造黄帝炎帝的种族神话，或是搞黑社会性质的会党。孙中山虽然也不排斥他们，但通过学马克思，能拿出一套貌似合理的现代社会组织方案，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革命领袖。凭借马克思理论的支持，孙中山在国外能说服见识过现代社会的华侨出钱出命，回国就能当大总统。

接下来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人在 1920 年前后研究马克思理论。这时候十月革命已经爆发，苏联还没成立，他们很大程度上接受的还是从西欧传来的原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结合了苏联成功经验的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把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理论的第一位，而对政治经济学这些相对具体的结论表示谨慎探讨。

这里我重点说说毛泽东。从年龄和地位来说，1920 年的毛泽东比李大钊陈独秀要小半代人，但他也是建党一代，是在苏联成立之前就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除了跟着李大钊读书，还从罗章龙翻译组那里读一手翻译资料。蔡和森到了法国留学，和毛泽东频繁通信，讨论的也是最正宗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毛泽东在农村做的那些社会调查，比如寻乌调查，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就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史观，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寻乌调查（全文） - 客家新闻网

但是，毕竟 1922 年后，苏联是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是个大国，所以苏联经验主导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陈独秀乃至毛泽东这些建党干部逐渐边缘化，苏联回来的学生一度主导了革命，就是经常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往往是在培训下被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像毛泽东他们那样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推论，包括在苏联环境下的应用都僵化吸收，拿到中国生搬硬套，喜欢用哲学语言诡辩。所谓马克思主义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这种评价往往是针对这些苏联培训的干部说的。

1935 年后，毛泽东重新控制了局面，在保留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同时，用自己相对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现状分析目标和手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点点积攒力量，终于在 1949 年夺取全国胜利。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虽然是在山沟里搞，却是一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而且不用加“中国特色”这个定语。倒是那群苏联留学生过多强调俄国特色了。

和中国革命相比，列宁搞十月革命有一定偶然性，没有毛泽东这么长的酝酿期，实际上并没有沉下心慢慢研究目标和手段，就趁乱夺权了。其他小国搞共产主义革命，要么像越南那样依赖于中苏支持，要么像古巴那样开始没想好自己干什么。如果以是否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革命为标志，我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中国人当前享受的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场唯物主义历史观学术活动开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必要纪念马克思的原因。

三 马克思和 21 世纪

1 退潮

19 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掀起了最大的革命浪潮。从马克思主义推出来的三个预言，经济危机摧毁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撕裂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建立新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起码实现了一半，只是无产阶级夺权被列宁改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夺权。

但是，现在已经是 2018 年了，从 21 世纪的视角回头看 20 世纪革命，必须承认上一波马克思主义革命已经退潮了。退潮的原因也很符合唯物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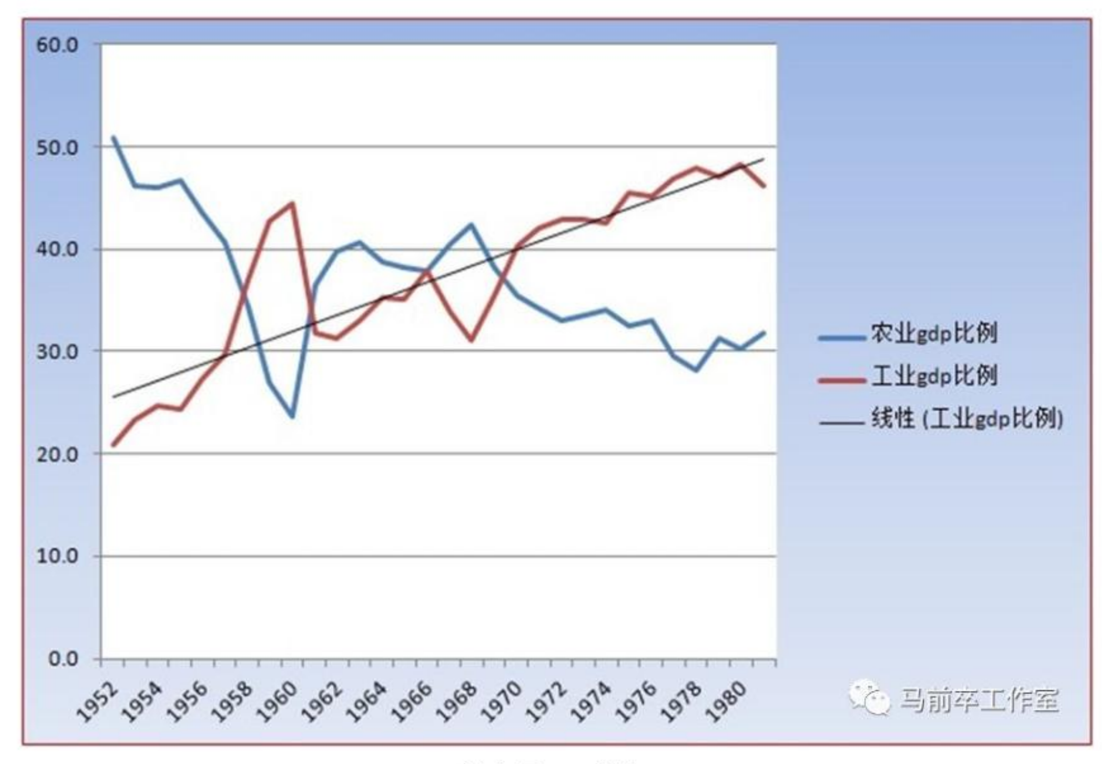
马克思论证过，革命不仅仅要动员群众破坏旧社会，还要打造一个生产力更发达的新社会，这个任务要通过先进的阶级来完成。列宁发现，产业工人似乎不像马

克思预期的那样有战斗力和先进性，于是组织了先锋队来增强战斗力。这是苏联和中国成功的经验。

但在成功夺权之后，中苏都发现，先锋队并不是能跟着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而是一个静态的官僚集团。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个一次性的机构，很难随着生产力进步而变化。

具体来说，一个静态先锋队可以针对旧社会最明显的坏处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在俄国提高了社会凝聚力，让苏联打赢世界大战；在中国解除了半殖民地身份，提供了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一旦旧社会被消灭，先锋队没有办法跟上新的生产力，也没法解决先锋队专政制造的新矛盾。先锋队只能以不断扩大规模，争取把外部问题变成内部问题。等到扩大到不能再扩，2000 万党员的苏联就没了。

和苏联相比，毛泽东亲自操作过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而且作为第一代建党、建国的领导人，执政到建国后 20 多年，所以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先锋队专政的问题。1966 年的今天，建国后第一代知识青年刚刚走向社会，中国的工业 gdp 刚刚赶上农业 gdp，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新的运动，想避免先锋队一次性使用的问题。这件事过去也有 50 多年了。



新中国GDP增长

半个世纪后，我们回过头看毛泽东这场二次革命，事实证明也是不成功的。这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既不能追上先进生产力，也没法解决工业化社会的新矛盾。毛实际上只是在先锋队革命的大背景下，搞了一个山寨版本的小先锋队二次革命，稍微缓解了一下矛盾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源上切断问题，只是让问题更复杂了。

所以，在 20 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逐渐退潮，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哪个社会继续谈论革命，更没有哪个政府指望搞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这是我们眼前看到的现实。

2 继续退潮

我说现在马克思主义继续退潮，很多人可能不信，说现在明明正在风头上。对于这种观点，我首先建议大家去看中学课本。我读书的时候，初中有思想政治课，要教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现在的初中生只有思想品德课——这是我们的小学教材。高中倒是还有思想政治课，但我刚刚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电子课本，马克思主义部分都在选修，这比任何宣传都能说明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另外，最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口号往往是要读马克思主义真经。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宗教，把马克思主义当经书来读，就是要句句都当真理。马克思只是个科学家，怎么可能句句都是真理。越是读经，越容易陷到具体结论里面，错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

其次，真要是读经，也不能读一部分，忽略另外一部分。比如说，马克思作为一个媒体人，最激烈反对的东西就是新闻管制。马克思有一篇著名的作品《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样的经，我们不能读，也不敢否定，只能无视，实在是很尴尬的事情。

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的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所做的那样，干脆让御用的哥萨克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本人越来越被树立成一个不可侵犯，不可取代的神。眼下很流行写历史穿越小说，常见的情节就是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提前把重大的科学发

现拿出来，成为一代名人。各位如果写一部小说，穿越到几百年前，把牛顿或者高斯杀掉，顶替他们发表科学成果，这样的书是可以发表的。但如果你说穿越到200年前的德国，干掉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去搞一套唯物主义理论，发表一套政治经济学，你说这样的小说能不能在中国公开发表？我猜是不能的。

为什么牛顿可以被杀掉，马克思不行？因为我们公认牛顿是科学家，科学理论谁发表都一样。马克思要是被杀掉了，没准就会影响哪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即便在小说里也不能乱写。但实际上，这种不可侵犯的形象恰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挖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所以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继续衰落的标志。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一部可以去直接干预马克思生活的穿越连续剧，这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复兴了。

3 退到马克思再前进

马克思主义退潮，一个主要原因是生产力进步太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许多细节设计完全不适应现实。比如说马克思肯定想不到有一天蓝领劳动力会被机器人逐渐取代，也想象不了美国中央银行用纸币给全世界提供需求，更想象不了网络游戏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产业。

但这也不是新鲜事，我前面说了，不用等到21世纪，19世纪后期，马克思的很多设想就出问题了，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参与自己期盼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这并未妨碍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指导十几亿人搞革命，同时影响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是因为应用性推论的错误，不会影响理论核心的正确性。比如说达尔文在19世纪也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发现进化论的同时，认为生物的遗传性状是可以混合的，认为白猫和黑猫放在一起会生出灰色的猫；达尔文还认为遗传因子可以通过身体传递，要是把每一代的牛角锯掉，繁衍几代后，小牛的角也会出问题。实际上，达尔文还真的把白兔的血输到灰兔子里面，看看灰兔子能否生出白兔子。这些观点现在看来都很荒谬，但丝毫不影响生物学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快速发展，现在已经要接近物理学的地位了。

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其他星球发现一个生物群体，既没有DNA，也没有线粒体，我们几十年来所有的技术积累统统要重新开始，是不是达尔文就没有用了呢？恰恰相反，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稳定的物种，我们就可以用进化论思想来分析这些生物是怎么形成的，甚至还能基本确定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是否有一个创造者，是否有一个“上帝”。

与之类似，马克思主义最不怕的问题就是生产力背景变化。只要我们批判继承马克思以来所有的革命实践，抛弃足够多的推论，用最基本，最可靠的唯物主义原理匹配当前复杂的现实。社会学也可以像生物学这样得到发展。

在演讲的最后，我还是引用两句领袖语录，如果有朝一日各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我希望你们也能以这样的态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毛泽东 1961 年

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 1938 年

（驳）原版马克思？

夏三月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把毛泽东吹成了“原版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吹成了“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里，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1】在毛泽东那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与马恩的态度截然不同。【2】
毛泽东将雇农视为农村无产阶级，这在马恩全集里是找也找不到的，发明人得追溯到列宁。还用了个词叫“半无产阶级”，在马恩全集里更是找也找不到的，发明人得追溯到列宁。因为无论是“农村无产阶级”还是“半无产阶级”，都不过是为了分化“小资产阶级”，寻找革命动力罢了。【3】只有农民问题严重的国家的革命者才能切身体会这些概念的必要。
今年，汪晖教授发表《十月的预言与危机》，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高度评价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马前卒则说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接受的还是从西欧传来的原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结合了苏联成功经验的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甚至“以是否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革命为标志，我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不知这是怎样的错位呢？
毛泽东看见的马克思主义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可以说，青年毛泽东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十月革命，他在思潮激荡中接受了俄国革命的理想、手段和目标，从没有“退到马克思再前进”过。
【1】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共产党宣言》）
【2】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3】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 年）

白头豕

马前卒最近这些文章都在讲同一件事。 就是要修正马克思主义。 这篇演讲看起来内容非常多，其实也就三点:
名为介绍马克思生平，实则在各种暗示他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我们当代人看得多。用他的话说，“马克思属于 19 世纪”。
马克思没能力真正实践马克思主义 （ 理论里缺乏应用性) ，而是毛等人真正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倒过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约束后人的实践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衰退的现象和原因之一，就是教条主义者越来越多。
这次只想谈谈马前卒的观点本身。抛开马前卒演讲里大量错误的逻辑，错误的事例，都不谈了。因为这些错误太多，谈它们会冲淡主题。
就谈一点，马前卒是在反教条主义吗？
反教条主义，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话语里的政治正确。 教条主义给中苏革命都带来过巨大代价，列宁，毛主席都反过教条主义，而且结合时代和民族特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空泛地谈“反教条主义”是没有错的。
然而马前卒不是反教条主义。 因为他真正要发展的自己的那套理论，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些我应该都说过了。
马前卒对马克思的真实态度是批判，并怀有很高的优越感（ 当你批判一个历史巨人时，总会觉得自己比巨人牛逼多了）。
不过，总结的好不等于有用。拿“马恩列斯毛说过……”当论据，把我批判一番，最后证明马恩列斯毛是对的，这种循环论证有什么意义？马克思眼看诞辰 200 周年了，历史局限性比起欧文圣西门固然是少一些，但也严重的一塌糊涂。不狠狠批判继承，怎么拿得出手呢？马克思的书，连工业革命概念都没有，连“看得见的手”都基本没见过，要是在他面前没点优越感，我看也没必要读马克思。
---- 马前卒
这次他以纪念马克思 200 周年为题目，为自己批判马克思建立“批判自由”合法性，又憋着不轻易暴露优越感，已经憋的很艰难了。
不过这没什么。真正的关键在于，马前卒自己的理论，反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点，被列宁和毛泽东继承的点。
（系统批马论）这篇文章把马前卒自己在理论上，彻底反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几个点总结出来。 所以他反的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说真诚的托派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前卒是反马的。
当然，“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本质是啥，观点历来是截然不同的。站在马前卒的角度看，也可能是反对马前卒的人，从来没有抓住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而从我个人的角度看，马前卒名义上化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先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苏联人完善出来的那套 将一切都归结于生产力的“唯生产力历史进步论”，赋予先知合法性的唯心主义 (设计论)，以及和法西斯很接近的“先锋队专政理论”。 至于最后一点，@江津的梅菲斯特走得比马前卒更要远一些。
这种做法是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其实这个问题列宁早就解决过了。在列宁批判“修正主义者”的时代，当时的修正主义者就是打着"反教条" 的名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列宁反反复复嘲笑这些修正主义者使用的"反教条","批评自由" 的借口。
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
---- 列宁<怎么办>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只要看看列宁最有名的小册子之一，<怎么办> 的第一节就行了。
所以“修正主义”这个词，起源是个嘲讽。被嘲讽并不是“修正”行为本身。是列宁嘲讽那些实质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名义上却不得不自称在“修正”马克

思主义，只能憋屈地做两面派。
所以@江津的梅菲斯特，当你自豪地说所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修正主义者，其实因为常识的不足，踩了地雷，反而让“修正主义者”这个反讽词成为谶语，揭露了你们的问题所在。
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
---- 列宁<怎么办>
下次记住了，“修正主义者”作为政治术语，不是明指 (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 ，而是个反讽 (反马却不得不自称修正)，别再往自己脸上贴这个标签了。
问题在于，本质上反对马克思的"修正主义者"，为何一直都要用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呢？
这也不新鲜。自从中苏革命成功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内核颠覆的现代修正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显学，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起构成反共支柱。颠覆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非常多，马前卒为代表的工业党只是其中一支，而且是非常老的一支，没多大新意。但是吧，漫威的超级英雄也诞生了快一个世纪了，不是还能拍 21 世纪的复仇者联盟吗？
我理解，“修正主义者”们，从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学习，到自行理解，到实质反对，是有其自然的发展轨迹的。他们如果话语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政治经济基础上否定了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一直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这一点大家肯定不会陌生。
有这种需求的买家很多，所以"修正主义者" 的学术事业一定会越来越辉煌，这点毋庸置疑。
好了，最后我想说，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贡献是质变，虽然可以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修正”地更完善，但不会过时。尤其不会因为牛顿和爱因斯坦没有用过智能手机，没有坐过高铁，没有吃过麻辣香锅，就导致万有引力或者相对论过时。
希望世界上的民科再接再厉，作为正统的物理学者，早日用万没引力和绝对论来修正和发展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成果。

（驳）张程评马前卒

缘起

我向来是不愿意评价马前卒的，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与我正如两条平行轨道上的列车，他是媒体人、工科人文爱好者、万能答主，具体到他在知乎上的学术作风，除了无所不知的本领以外，他的文章或答案一般具有以下三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特点：

1、无论回答什么问题，篇幅一定要长，大约最好以超过一万字为宜；

2、无论回答什么问题，一定要扯到多个领域的知识（当然每个领域绝不深入），或者至少要从一个宏大的背景切入，让读者震撼陶醉于督工琳琅满目、金玉其外的知识殿堂；

3、配图一定要多——中学教科书插图那种。

所以，我实在与督工很难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平时也很乐见于督工不断在大V涨粉收智商税的路上愈跑愈欢，但是这次督工跑到同济大学去蹭马克思200年诞辰的热度，把自己包装成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由此发表一篇让人大跌眼镜的议论来作为开设工作室的广告，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要晒一晒“督工的新衣”了。

第一部分 马氏文通

督工的演讲温情脉脉，一上来就通过德意志—同济的谐音套近乎，把纪念马克思定义为“德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还非常鸡贼地为后文的叙述埋下了伏笔。

整篇演讲看下来，发现督工的一个立论前提就是，马克思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19世纪的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不是几年前乔纳森·斯珀伯写的《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的翻版么？当然，我们这样说可能会冤枉督工，因为斯珀伯毕竟是孜孜研读MEGA手稿的，马督工显然做不到。所以，我们姑且把这些内容都算作督工自己的发明吧！马督工说，马克思出生距今二百年零十一天，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时间。理由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11个统一政权，平均每个朝代的延续时间就是200年。马督工显然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比统一时间要长，任何情况下都使用平均大法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马督工这短短一段话，就暴露了自己的斗筲无知和偷换概念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我们纪念马克思，是纪念他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而是在他去世以后，才真正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拿工人阶级的生活来说，连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都是在1917年才首先在苏俄立法，到1919年，在一战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才

被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具体到各国普遍落实，那就更靠后了。然而到了二战以后，乃至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时，世界上就已经出现了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在社会主义的压迫性竞争下纷纷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大幅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其实是在 20 世纪，而且是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重塑后的世界。事实上，在 19 世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并没有完全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地位，而是到了 20 世纪更加成熟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神兵利器。马前卒逻辑的极度混乱在于，他在“马克思属于 19 世纪”这一标题下，谈的都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并没有太受重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马克思在 20 世纪的巨大影响，内容本身构成对标题的绝妙否定——原来马克思不属于 19 世纪，属于 20 世纪。马督工拿马克思出生的时间作为起点，迫不及待地切入一大段毫无意义的证明世界 200 年巨大变化的量化分析（请对照上文提到的督工三个拿手好戏），除了趁机施展自己惯用的断烂朝报式的图表把戏外，还为了故意误导读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背景离今天已经有 200 年的“遥远历史”。这种庸人式的“广博”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其次，马督工把时间的长短看作固定不变的消极静态范畴，庸俗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暴露无遗。时间是什么？时间是衡量变化的尺度。马克思明确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恩全集》第一版第 47 卷）时间不仅是一般物质存在的形式，又有特殊性，时间在本质上是以实践的、人类活动中的自由的形式存在着的。中国有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古社会，乃至明、清这样享国二百多年的统一朝代，从人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角度来讲，变化相对来说是很小的。而 19 世纪以来的 200 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程度，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人类的时钟突然从“静止状态”进入飞速转动的状态，对于人的发展来说，时间是大大加快了。马前卒一方面对近 200 年人类社会的变化大书特书，一方面却不把这种变化看作是衡量时间的一种尺度，这种典型的庸俗唯物主义认识论，贯穿全篇，也贯穿于马前卒的各种论调。马前卒不但自己使用，还处处信心满满地向大家推销这种“唯物论”。然而这种低能的劣质产品，马克思早就有过定评，“这是一种蔑视人的哲学”。

从上面这一个例子中，我们归纳出督工用以指导整篇文章的两大认识方法——一是“两百年时间漫长论”，二是“马式庸俗唯物论”。这两大方法在全文中不厌其烦也让人不胜其烦地表现出来。

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点是，马前卒以马克思在文化上是德国人，关心德国革命，来暗示马克思是一个爱国者。马克思的确关心德国革命，但那恰恰不是因为马克

思热爱祖国，而是马克思认为普鲁士是当时欧洲最反动的势力。马克思在被普鲁士驱逐出境后，曾向特利尔警察局提出过申请，然而申请的内容竟然是要求移民美国。遭到拒绝后，马克思索性变成了无国籍人士、世界公民。可以说，在普鲁士看来，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跑路党”、“逆向民族主义分子”，只要看过马克思著作和文章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普鲁士极尽嘲讽厌恶之能事。除了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外，最典型的要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法德比较的文字：

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

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仍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

正象在罗马的百神庙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孽。**这个空前未有的折衷主义又特别得到了德国国王的政治的，审美的饕餮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以他本身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前卒从马克思“关心自己国家的革命”得出结论说：“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诞生在最先进的国家，而是诞生在先进社会和落后社会的边界上，从一开始就有给落后国家带来跨越性发展的意图。”原来马克思不但是一个民族主义爱国者，而且孜孜以求的目的是自己祖国的跨越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马克思不是从对现实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考察和批判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而是为了“意图”给自己国家带来跨越性发展来创造理论，这种逻辑，可谓跟马前卒在其臭名昭著“保卫现代生活”一文中提出的“不断创造”论一脉相承，可见马前卒先生的唯物论一方面“庸俗”，一方面又是头足倒置的“精致艺术品”。

马前卒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无知，主要是由于其对哲学一无所知，还一贯蔑视辩证法，把马克思看成和他一样的庸俗唯物论者造成的。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确说过德国需要彻底革命，“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但是，马克思的前提是“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马克思当时对于德国革命的态度，从整个 40 年代马克思的几部哲学文本，即《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便可以得到答案。当然督工多半是看不懂任何哲学文本的，以至于连引用的勇气也没有。马克思 40 年代从哲学上论证

共产主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观点，这些都是理解他对德国革命态度的钥匙。

国家的完成，就是国家表明自己是国家，并且不理会自己成员信奉的宗教。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不像鲍威尔那样对犹太人说，你们不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反，我们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不用完全地、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论犹太人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德国连被批判的水准都达不到，连起码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都没有完成。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日渐形成，无产阶级的解放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开始承认独占在国内的主权，并给它以对外的统治权。**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无耻的实践。”因此，“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并且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构成人的本质，德国人如果不从“人的解放”出发去进行革命，甚至不可能完成“政治解放”。因此，马克思对德国革命彻底性的论述，是出于人的现实关系在哲学上的批判性考察，与帮助德国跨越式发展风马牛不相及。

此外，从 1841 年《博士论文》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完成了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哲学上的批判以后，马克思才转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研究。起点便是《哲学的贫困》中对于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因此，马前卒口中“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在自己成熟起来以后，就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考察上，不再帮着马前卒先生“关注祖国的跨越式发展”了。

第二部分 马前卒分不清什么是成果，什么是方法论

马前卒先生由于非常担心大家学习马克思陷入教条主义、宗教主义的态度，

所以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工具，是方法论。可是他自己却把马克思的两大学术成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前卒还莫名其妙地把后者说成政治经济学）当成是方法论本身，这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恩格斯把马克思毕生的发现总结为两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至于恩格斯自己喜欢谈论的哲学尤其是辩证法，一个字都没有提。——马前卒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说革命的辩证法，是他认识世界的根本工具，或者最重要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是运用这一方法论得出的具体成果。马前卒先生连起码的方法论和成果的区别都分辨不清，倒是挺让人理解他为什么对哲学思辨深恶痛绝的原因了。马前卒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成果，看作是马克思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活体验直观反映的结果，而不需要任何认识论工具作为中介。“首先是因为时代变化让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剧烈变动，其次是因为马克思自己的生活经历比较独特，看到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和各个阶级的生活。这些条件凑在一起，马克思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康德早就说过，感性、知性、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层次，马克思如果不首先完成对认识论工具的批判性改造，就算面对再多的经验材料和时代感性，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总体的历史观。而马前卒之流的低下水平，正是在于他们不认为社会直观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完成对自身的扬弃。哲学思维的重要性在于彻底抛弃对对象进行考察时的纯粹直观。例如，关于历史的现实性这个问题，现在的历史学只会把它还原成史料所表述的简单现实性，但是思辨的哲学会告诉你，所谓历史的现实性，是把它看作一种活动，看作一种有差别的活动。因为没有差别的东西是无限的，而无限的东西是非现实的。

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及用以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得不揪着马耳朵再次普及一下起码的常识，马克思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正是从在哲学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开始的。最初的两个范畴，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制度。不是思想决定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决定于现存的思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政治解放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

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规定了他的政治关系，即他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因为人民生活的这种组织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它们同国家整体的分离，把它们建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还是政治的，虽然是封建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说，这些机能和条件使个体同国家整体分隔开来，把他的同业公会对国家整体的特殊关系变成他自己对人民生活的普遍关系，使他的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他的普遍的活动和地位。国家统一体，作为这种组织的结果，也像国家统一体的意识、意志和活动即普遍国家权力一样，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后来总结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阿尔都塞虽然反对“颠倒说”（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只是将它头足颠倒过来而已），强调“多元决定”，但是也恰恰是为了更加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革命性意义。

马克思在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后，又将其运用于改造旧的唯物论，最终发展出自己的终极认识论武器——唯物辩证法。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也正是马前卒自己的问题所在）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终形成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而这本书，正是从《神圣家族》以来马克思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总清算，并且通过全新的辩证法，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由此可见，马前卒一方面肯定唯物史观这一具体成果，一方面却否定成果由以产生的方法论前提，并且把成果本身当成方法论是多么荒谬。

关于马克思所创造的这种革命的辩证法的方法论地位，卢卡奇说的最好："现在对任何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成为一种时髦。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辩证方法的本质在于——从这种立场来看——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个别的环节不是机械的总体的部件，而是在个别的环节中隐藏着从其本身发展出总体的全部丰富内容的可能性。"

（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发现剩余价值学说

同样地，马克思也是将唯物辩证法为认识武器，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才得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最初是从人与自身、与他人、与对象、与世界普遍异化的角度出发的。这是偏重于哲学的论证。但是后来，马克思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商品"这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抽象的要素出发，在商品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加入新的环节和规定，最终形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而剩余价值，正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对自己等价交换原则的辩证否定。

等价形式的特点：1、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2、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3、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资本论》第一卷）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同上）

同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运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同上）

我在最近发表的《57-58年经济学手稿导读》的系列文章中，对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运用有如下考察：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这其实一点也不玄乎,马克思尤其是继承自黑格尔现象学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教会你如何去分析错综复杂的事物,如何严格区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界限和层级，如何用严格的推理去导出事物发展的必然环节和结果。这些正是在教科书上完全看不见的。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方法，就叫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什么是具体，什么是抽象？其实真正的具体，跟我们生活中理解的不一样，具体之所以是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比如你看到一个美女，你说她是白富美，是女神，或者说某个人是丑逼，loser，好像很直接，很具体，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种抽象。再比如，老百姓看电视剧喜欢脸谱化地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这也是一种抽象。因为作为描述一个人来说，这些规定太单一了，你从中只能得到一个空洞的概念，除此之外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因为它还没有把这个人的内在丰富性,他身上存在的很多种规定加进去。黑格尔(G. W. F. Hegel）就写过一篇文章叫《谁抽象地思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这篇文章，黑格尔在文章里面举了个例子，他说，“且说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太太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强壮的、俏皮的、逗趣的男子呢。人们却认为这种说法骇人听闻:什么？凶手俏皮？怎么能想入非非，说凶手俏皮呢？你们大概比凶手也好不了多少吧！这是上流社会道德败坏的表现！深通世道人心的牧师也许会这样补充一句。……在凶手身上，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煞了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的本质……这就叫做抽象思维。”所以说真正的具体，其实是在你展开了对象的许多种规定以后，得到的一个结果，表现为在思维中进行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起点。虽然说它在直观上面是起点，就好像你天天都在直观上看到商业的过程，但是你并不能真正理解它。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怎么进行研

究的呢？它是从最基本也是最抽象的要素商品出发，然后逐渐把一个一个的具体规定往里面加，最终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就像细胞构成器官，器官再构成人一样。人是一种具体，但他其实是你研究的结果，所以叫做抽象上升到具体，具体是在你的思维过程中再现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马克思在得出两大成果过程中这些显而易见、一以贯之的方法论逻辑，即革命辩证法的逻辑，马前卒由于自己智识水平的低下，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几本含有哲学内容的马克思原著，是不可能懂得的。比如他污蔑马克思说，“马克思说能促进物质力量的制度会赢，但你让他预言什么样的制度能促进生产力？他又说这要交给历史竞争去选择，胜利的制度肯定是能促进物质生产的那一种，似乎两面的话都说了，很有算命先生的风格。”马前卒还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学说，歪曲为社会领域的达尔文主义，歪曲成进化论，歪曲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完全无视马克思一再反对将达尔文主义的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马前卒一方面假惺惺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方面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贬低为不但循环论证，而且和他一样无根浮萍式的伪科学，任何认真读过书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

（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是还原论和物质决定论

首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从来不是庸俗的还原论，也不是马前卒工业党式的物质决定论。马克思认为推动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或客观方面，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或主观方面，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人们的革命性的实践，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马克思认为马前卒之流的庸俗唯物论、物质决定论是“蔑视人的哲学”，原因正在于此。上文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引证了相关的内容，其实这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论点。他从来不是一个物质决定论者：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体系束缚他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博士论文》）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提出的答案在于使哲学变为实践。这实践具有它的客观的结构上的前提，那就是认为现实是“过程的集合体”。……只有当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是出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的将来之间的中介。因此，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是说它们是互相“符合”，互相“反映”。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在评论这种贫瘠的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时候说，“这基本上是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水准。马克思不这样思考世界。马克思探讨认识论并不这样，他讲对复杂社会有机体进行认识的时候，需要采取普照光的方法，从后思索的方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人体解剖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现在这样坏的声誉，就是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造成的。”（聂锦芳《重写马哲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制度必然能更好的促进社会财富的发展，但从没有像马前卒这种庸俗唯物论者认为的那样，社会财富单单指物质力量。马克思认为从长远来看，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是用“胜者为王”这种废话来描述未来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制度的吗？当然不是。马克思是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为什么会必然辩证否定自身的角度来推论未来社会的。这就表现在，随着交换价值和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有两种东西会越来越不成为财富的尺度。第一，在生产的过程中，随着科学的运用程度越来越高，直接劳动就越来越不成为财富的尺度：

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的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第二，随着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鸿沟越来越大，交换价值也越来越不成为财富的尺度。马前卒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时，根本不懂马克思所论述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在于固定资本比率的不断提高，而单个产品的利润与它的效用之间愈来愈不匹配。他胡扯什么“生产越扩大，危机就越频繁，利润率下降就越明显，最后出现总崩溃。”一个既不懂马克思的哲学，又不

懂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人来谈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和悲剧效果在相当程度上是统一的。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
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同上）

这就是马克思所推论的未来更能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社会状态，白纸黑字俱在，我们能够容忍马前卒这种丑类行骗欺世、谬种流传吗？

（四）神圣光环是如何消失的？

马前卒还莫名其妙地把“旧制度不能再用道德优越感和神圣光环吓唬人”归结为唯物史观的影响。这与其说是给予唯物史观“过多的荣誉，不如说是过多的侮辱”。因为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运用唯物史观论述过，旧制度的“道德、血统、神圣性”等等失去光环，恰恰是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发展的功劳。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人的身份属性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交易主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货币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从属性的纽带，包括贵族与平民之间借以区分的血统、教养这些差别事实上都被打破了，每个人好像都是独立自由地互相接触，并且在这种自由接触中互相交换。这是唯物史观起码的论点，是对资本主义既成社会现实的分析，马前卒怎么能随便借花献佛呢？

（五）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唯物史观

马前卒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后面那些具体推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说只适合工业社会。”于是这里向我们暴露出，马前卒不但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具体成果的区别，也分不清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这种对于范畴逻辑的极度无知，生动展示了什么叫“工科式迫真唯物论——督工的里技”。

马克思主义除了唯物辩证法这一总的方法论以外，还有很多下位的方法论，例如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抽象上升到具体、普照光法的方法论。（见《政

治经济学导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整个人类历史所得出的总体结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他用于研究交换价值发展和成熟时期的社会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将社会性、历史性的因素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紧密联结对应的方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真的只适用于“工业社会”。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实行所有关系的真正社会化，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真正而具体的自我认识才成为可能。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自我认识。但它作为方法论，只有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时，才是完全的真理。不能盲目推广套用到一切社会形态上。马克思在《导言》中就说：“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自然界限曾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形式之中，并对人的所有社会表现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涉及真正的经济范畴时曾多次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分工的发展、剩余劳动的各种形式、地租的各种形式等等。恩格斯还在好些地方补充说，把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整个地用在原始社会阶段上是错误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关系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用“物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的范畴加以区分的：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它们的不发达程度与自身相适应的那种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性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一项历史学成果，后者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成、发展的一种方法论。马前卒不但把两者混为一谈，而且对其中任何一个

都不了解，又怎能不从头错到尾呢？

马前卒的负分革命史

马前卒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上一塌糊涂，在他最喜欢谈论的近代革命史方面，水平也可以用负分来形容，这篇演讲稿就是一个绝好的样本。我们仅列举其中一些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来晒一晒万能答主的真实水平：

1、马前卒说，孙中山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因此成为革命领袖。凭借马克思理论的支持，在国外能说服华侨捐钱卖命，回国能当大总统。1905 年孙中山到比利时会见第二国际主席，虽然此时的认识还很粗糙，但有两个点远远超出了其他中国人。一是要用马克思式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社会；二是中国革命必然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混合体。

纠谬：我们来看看 1905 年 5 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同志首先扼要的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这里没有过多谈民权主义方面的内容，而是说了民族和民生两点。关于民生方面，“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并提出了财产税的方针。也就是采用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来调和社会阶级关系。接下来孙中山说到了中国行会的好处，说中国工人因为行会的原因，境遇比其他国家好得多。“穷人很少，富人更少。”“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最后孙中山索性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条件。“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一直认为，采用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阶级革命，实现阶级调和，马前卒说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必然是民族独立和阶级革命的混合体，跟孙中山的本意完全不符。孙中山这个时候甚至还分不清楚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民主社主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等等的区别，认为只不过是方法上有区别，因此把他们统称为社会主义，并从此开始把社会主义看做他的三民主义的一部分，既反映了他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他当时也根本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顶多只是视作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1906 年 11 月孙中山复鲁赛尔函（鲁赛尔，原名叫苏济洛夫斯基，是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中，再次强调中国可以绕开西方弊端的有利条件，并且提出了“中国是一个清一色的贫穷国家”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发展出“大贫小贫”论。还指出了民权革命与民生主义的先后秩序。也就是认为**中国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不是经济的性质。”**同年 12 月 2 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演说。提出的观点包括：**民生主义就是“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社会革命。”**孙中山要是真的像马前卒说的那样，拿马克思主义来做

华侨的宣传动员工作，宣传阶级革命，下场怎么样，看看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元老们的态度就知道了。

2、马前卒说，毛泽东除了跟着李大钊读书，还从罗章龙翻译组那里读一手翻译资料。蔡和森到了法国留学，和毛泽东频繁通信，讨论的也是最正宗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毛泽东在农村做的那些社会调查，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纠谬：（1）李大钊帮毛泽东介绍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但毛泽东并没有跟着李大钊读书。（2）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回到湖南又搞湖南自治运动，他最终成为共产主义者，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陈独秀。而他自己当时读的马克思著作只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自述》）第一代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们受到苏俄的影响都是第一位的，对于马克思原著的了解，普遍停留在比较粗浅的状态。也就留法学生如蔡和森等人更加精通一些，马前卒认为毛读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就掌握了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没有受苏联影响，显然又是在创造历史。（3）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的阶级分析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吗？显然不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农民的定位就和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完全不同。毛泽东还自创了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以及半无产阶级的概念（也有可能是受列宁相关著作的启发，但不能确证），而正是由于他创建雇农等于无产阶级的概念，才建构起在农村开展革命的合法性。他对于阶级的理解，也与马克思明显不同。乃至于建国后到文革期间，发展出“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这些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即阶级是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相联系）明显不同的阶级概念。即使是在他的早期，我们这里也可以引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被删掉的原始文本来说明他的阶级观：**“无论那一个国内，大概地说，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

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1）半自耕农（2）半益农（3）贫农（4）手业工工人（5）店员（6）小贩，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颇大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 “所谓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一要紧的地位。”（《农民运动参考书》）

这就是马前卒口中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3、马前卒说，1935年后，毛泽东重新控制了局面，在保留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同时，用自己相对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虽然是在山沟里搞，却是一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而且不用加“中国特色”这个定语。

纠谬：（1）毛泽东重新控制局面是在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不是1935年。（2）关于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是首先由列宁和斯大林加以论述，并且由毛泽东在中国加以丰富完善的。（3）就算按照马前卒的定义，纯正指的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毛的革命是不用加“中国特色”纯马克思主义革命吗？毛泽东革命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党建理论有一部分是毛自创，有一部分来自苏联，但显然并不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武装斗争是一切革命所共有的形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样没有具体论述过。至于统一战线，则完全是毛自由发挥的结果，且收效最大。我们知道，中共力量发展最为迅速，并且为统一全国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而抗日战争时期恰恰是中共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时期。首先就表现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委曲易帜，中共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保证，即停止暴动、改编苏维埃和红军、在特区实行民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计划是与张杨等军阀实行西北大联合，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因为西安事变后遭到苏联的反对而作罢。（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在抗战期间，得益于中共对统一战线的灵活运用，以及放弃阶级革命后，对于中间势力的极力拉拢，中共的实力和威望不断上升。但这一时期，中共政策也同样受到苏联方面的巨大影响。在1939年9月初德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对波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很快于10日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电。中共中央据此提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

“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宣传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中共的态度，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再次因为苏联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战争爆发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告诉全党称：“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

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正式参战，则未必在中共的期望之中。这是因

为，就在一年之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过：抗战“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并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使国民党占尽优势。（《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毛泽东这时明显没有表现出一年以前那样的强烈担心。

在《大西洋宪章》出台后，由于相信《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理由改变此前对于美、英政府的敌视或怀疑的态度，也促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人可以“与英、美好好合作，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合作”。中共中央相信战后的中国只能是走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与各党派合作和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它既不是少数人专政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考虑到这种情况，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领导人，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深感自己有可能像欧洲得到英国援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也能够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

事情很清楚，美国出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绝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要想得到其支持，就必须突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现实政策的民主性。因为“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也向他们本国抱有成见的人民说，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的政纲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党”，并“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必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中共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

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转见《党史通讯》1983 年第 20-21 期）。中共在此期间，一度真的将改掉共产党的党名提上议事日程。

通过对抗战期间中共和毛泽东策略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1939 年秋天，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苏维埃革命失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重新崛起的反复与实践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经验做过一次理论总结，归纳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没有直接提到阶级斗争问题，而且还把统一战线放在了中国革命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中共克敌制胜三大法宝的首位。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更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江西苏区时期，亦即“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错误政策，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换言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奠定自身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共历史上的成败和它的统战工作有无和好坏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极其密切。中共事业的成长，基本上取决于它争取到的力量有多大。当它放弃甚至排斥统战政策的时候，就会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被强大的敌对力量压倒；当它统战政策较为片面，既防又堵的时候，敌对的力量就会加强，自身成长的步幅就会变小，危机的情况就会增多；只有当它真正争取并团结了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得到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拥护的时候，它的事业发展才会比较顺利。当中共把自己的力量基础仅仅限制在工农阶级的时候，它的挫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工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实际上战争年代中共很少能影响到工人，当时农村根据地的范围又很有限，对农民的政策还要再受阶级划分的局限。这样，真正能够取得的农民拥护者数量，相对全国人口来说，也非常有限。这也是胡绳特别强调中国两头小中间大的原因。他的观点是，除了国共两党外，包括资产阶级和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也包括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其实都是中间势力。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取得了舆论和民意，谁就取得了政治优势，也就容易战胜对手。（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历史显然不是马前卒所说的，毛的革命是不用加“中国特色”的最典型马克思主义革命。事实上自始至终，毛泽东在策略、思想、方法、理论上，来源于马克思的都甚少，毛泽东自己也很少读马克思的原著，因为他不喜欢大部头，在他的思想中来源于列宁、斯大林的部分，乃至恩格斯的

部分，都要远远超过马克思本人。马前卒试图割裂毛式革命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论证毛是马克思的纯正传人，恰恰正好颠倒了历史事实。

4、马前卒说，和中国革命相比，列宁搞十月革命有一定的偶然性，没有毛泽东这么长的酝酿期，实际上并没有沉下心慢慢研究目标和手段。

纠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十年的革命史表示不服，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前二十年期间对俄国社会所作的详细调查和分析不服。事实上，列宁同志 23 岁（1893 年）写的《论所谓市场问题》在调查研究的精细度上，比之《寻乌调查》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来，学习一下马前卒先生的插图大法：

5、马前卒评价文革说，我们回过头看毛泽东这场二次革命，事实证明也是不成功的。这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既不能追上先进生产力，也没法解决工业化社会的新矛盾。毛实际上只是在先锋队革命的大背景下，搞了一个山寨版本的小先锋队二次革命，稍微缓解了一下矛盾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源上切断问题，只是让问题更复杂了。

纠谬：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只是作为一个打开文革突破口的尖刀，文革的设想并不是要让学生来当一个山寨版先锋队，而是要通过废除代理人式的官僚统治，探索让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道路。早在文革之前，毛便指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67 年一月风暴后，毛泽东又指出，上海的经验搞得好，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接管政权。随后全国陆续效仿夺权，但最终效果，均不如上海理想，大部分地方政权最终还是不在左派手里。

以上海为例，1967 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 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 4 名。1970 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05 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 43 名。1971 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 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 名市委常委工人占 4 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 1970 年起，派出 100 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 1974 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 10713 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 4142 人，其中进党委者 189 人。

文革期间，进行了直接民主的大量实验，除了肯定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外，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政权，政权中除吸收工人造反团体外，还有大量不脱产的劳动者担任了从公社到中央一级的领导职务，以此实现群众在各级政权中的直接监督。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组织工宣队进驻学校、单位等上层建筑，管理学校，搞教育革命，其间包括师生关系的改革，考试制度的改革，实行农村医疗革命，力图缩小三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单位的直接民主改革，工厂的计划规章、经济核算、监督领导、研发制造等各项环节，均成立了工人领导小组，施行三结合制度，广泛成立工人理论组、批判组，以此来探索群众直接管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科教等种种上层建筑的经验。

马前卒在演讲最后偷换概念说，20 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逐渐退潮，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哪个社会继续谈论革命，更没有哪个政府指望搞阶级斗争来发动群众。然而事实上，20 世纪后半期退潮的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传统革命模式，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退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探讨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它是着眼于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药丸的，也就是解决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革命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论证，作为一种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学术思想观点，从来没有退潮过。只不过在苏东和一共模式失败后，大家一时找不到新的理论来指导如何革命罢了。马前卒拿中国中学教材中马克思内容的减少，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继续退潮的证明，也未免过于可笑了。这不过是中国革命失败后造成的一种持续的结果，在革命失败的那一刻，马克思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就已经归零了，只不过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慢慢抹掉而已，甚至时不时还会精分表演一番，前几天纪念 200 周年活动不就正是吗？马前卒分不清狗肉的“生与死”，又何以能分辨出羊皮的“真与假”呢！

最后，我们也引用一句领袖语录，来概括一下马前卒先生的辛苦演讲吧：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状态的准确晴雨表，正如狗是测度天候的准确晴雨表一样。——马克思《集权问题》，1842 年

（谬）赞美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宣言》与根本生产力

《共产党宣言》1872 年序言里边有两句话特别重要，我不得不先读一遍：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已修改；“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 173 年之后重新看这个判断，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工业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资产阶级内部会分化成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资本集团。无产阶级也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尤其是作为中间技术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会支持不同的阵营，比如说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是以封建军官团作为暴力基础，以大资本集团作为经济基础。同时还要把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下层小资产阶级作为意识形态和人力基础.如果忽略了这些复杂性，简单的说只有两大阵营的对抗，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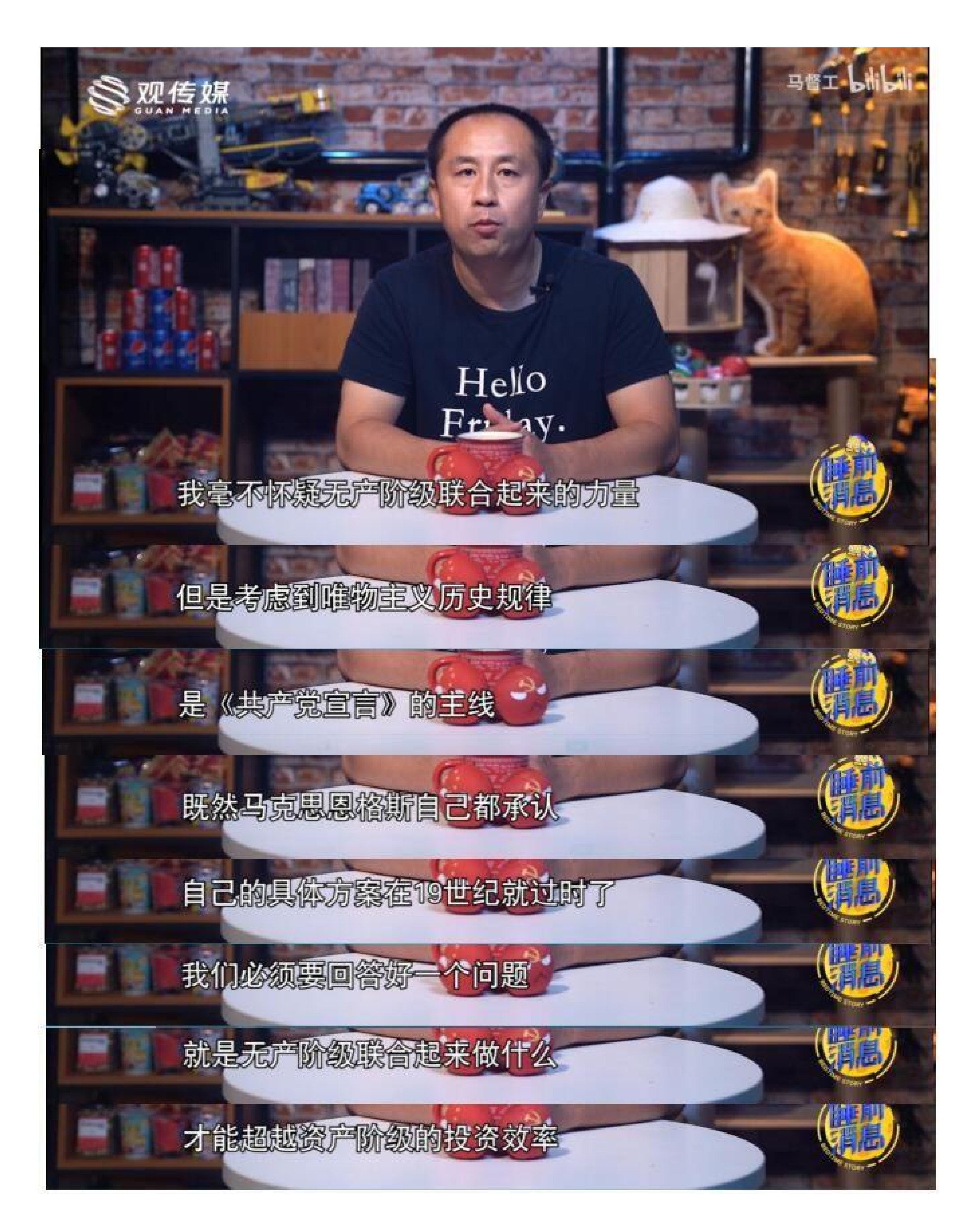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 2700 字，**《共产党宣言》都在赞美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文字充满激情，是有史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最高评价，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读到资产阶级的赞美诗，这是一件听起来很矛盾，实际上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事情，读两段原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的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资产阶级历史上因为革命性而接管世界，未来也必须不断革新生产关系，保证自身的生存，这是 1848 年的判断。在 173 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考虑一件事，就是资产阶级是不是保持了自己的革命性，是不是做到了持续革新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应该说它的确做到了不断自我革新。1848 年的时候，就算在传统资本主义惯性最强的英国，工党也已经稳定的上台执政了，而且宣称要建设福利国家。这个曾经支持列宁在俄国搞革命的英国工党，在 1848 年的资产阶级看来，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1848 年到现在，资产阶级又学会了一批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很熟练的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切换。连 2008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能控制住，至少现在还没有崩溃。你可以说这是资产阶级苟延残喘给自己续命，但能续到今天，还做出了互联网经济这种新事物，**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还能继续推进生产力进步，还能主动去调整生产关系**。更进一步说，《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并不是特指资产阶级，只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来考察资产阶级，上面读的两段原文，完全可以切换到无产阶级身上。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进行革命，否则只能看着资产阶级主导社会。如果无产阶级的目标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那等于主动让出社会的主导权。注意这里的用词，是“革命”而不是“破坏”，**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创造更进步、更有效率的社会。仅仅抵制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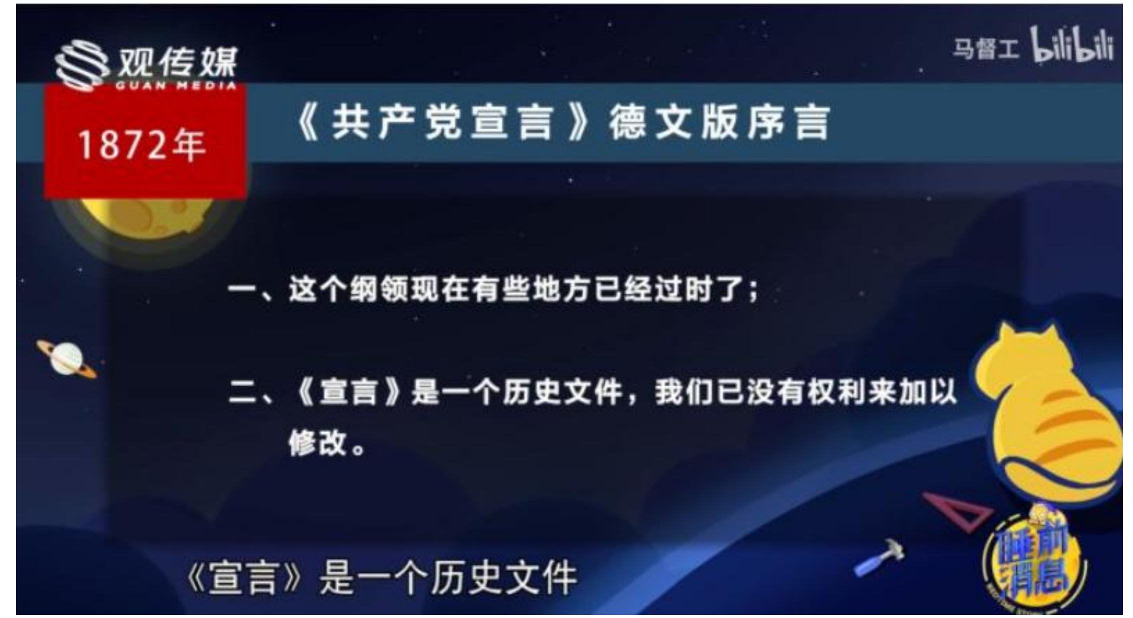
（驳）马前卒的生产力和效率崇拜

苏沈

尽管视频长达 34 分钟，但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复读文本。当然，在当今时代，网络视频中复读文本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事情。但我们更应该去探究一下，马前卒在这个视频中最想表达的个人核心观点。



这段话显然是马前卒个人观点的要害。即“无产阶级必须创造出一个生产力超越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制度，才能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尽管马前卒没有讲清楚，他所谓的超越，是指无产阶级先“空想”出一个制度再去推翻，还是要先构建完成这个制度，再去推翻。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二者都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既不可能真空幻想出一个完整的制度，更不可能在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前提下创造出一个生产力超越当今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我个人很久没有关注马前卒，对他的一些变化和立场改变不甚了解。但很多地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以贯之的。如他过去认为“中苏过去的制度没能在生产力上超越同期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条路线走不通。”
我们大可不必先批判这种试错演进论的历史观，尽管这可以表明马前卒依然受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但在这个回答中，我们要讨论的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承认，自己的具体方案在 19 世纪就过时了”这句话。
那么马前卒认为到底是什么方案“过时”了呢。



在视频一开始，马前卒就把 72 年的序言中这两句特别列出，并且强调。在整个视频也可以看到他对这两条的反复重复。然而这个引用，甚至不是不联系上下文的，而是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没有引全：
由于最近 25 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共产党宣言》
经历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之后，认为 1848 年提出的纲领有些地方过时当然是准确的，但把这一前提条件割去不提，很显然马前卒并非是基于 1872 年的总结来批判 1848 年的过时，因为在他看来，1872 年也已经是“过时”的了。基于法兰西阶级斗争产生的思想也是过时的了。
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很显然，由于马前卒认为工人阶级没能超越资产阶级的投资效率，所以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并不是革命的口号，而是破坏的口号了。革命不止是破坏，革命更是建设一个新世界。这话当然不错，但建设必须在破坏之后，无产阶级解放生产力，必须在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必须先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去讨论所谓“超越资产阶级的投资效率。”
而避免讨论这个前提的马前卒，在他那里过时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就很清晰了。这个具体方案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后续列宁为代表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那么既然这个方案已经过时了，在无产阶级提出新的，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案”之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可以搁置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应该维系的。
这就是马前卒基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得出的结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大概就是通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得出：正因为生产力没能超越，所以不应立刻推翻现存的上层建筑的结论。
然而生产力却并不属于经济基础：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不清楚马前卒最近有没有公开的讲过这个问题，但从他的视频中，很显然生产力不仅是目的，更是决定上层建筑最为关键的“经济基础”。而对于真正要害的生产关系，则淡漠的视而不见了。
马前卒在视频中的姿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视察历史，然而他的结论，再一次证明了在任何领域，所谓“超阶级的”“客观的”态度最终会滑落向何处。在我看来，这一视频的真实立场，已经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方了。

李必达

《工业党宣言》（×）　　　　《马克思改制考》（√）
说起来康有为早年也是不大看得上孔子的，可还是要打孔子的旗号：



马前卒这套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人的主体性。换言之，就是把人当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的异化”理论，指出“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被反过来用于控制和奴役劳动者自身。在工业化国家，这种控制和奴役表现为“羊吃人”和“济贫院”；而在发达工业国家，则表现为对内的消费主义、福利制度收买、意识形态灌输和对外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剥削（将金字塔底层转移到其他国家）。

所以，片面地强调社会的高生产率，忽视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利益和需求，实际上就是在强化而不是削弱资本主义秩序，是在加重而不是减轻资本对人的异化。

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未来机器人比人类的生产效率更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人类的存在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必须被消灭呢？

PS：比较讽刺的一点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马前卒工作室的生产效率和播放量情况都不如另一个自媒体团队。如果马前卒真的相信他这套理论，就应该向生产效率更高的自媒体团队学习。不过笔者估计，这时候马前卒就要开始谈理想和道德了。



已关注

321 人赞同了该回答

效率太高了，一天3000字深度输出，一周2.1万，基本上就是三期睡前消息文案的量了。

我这里，是差不多10个人一起弄出来的……



八里桥伯爵

这期名字应该叫《为什么马逆叫做马逆》

说是“重读马克思”，其实也不过是扛着红旗反红旗，观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比较接近 19 世纪 20 世纪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资产阶级进步派一边，或者笼统一点，可以称为左翼资产阶级或者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什么的，名字有很多，内容其实大差不差。可笑的是，马克思几乎一辈子都在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观点，现在他的名字却要拿来为这种观点代言。

其中比较暴论的一个观点就是“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持续推进着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没有打败社会主义，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总的来说有最重要的两点，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议会斗争的天生缺陷，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支持社会主义党派类似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的工党就不得不放弃激进的社会主义纲领，转而采取温和的、中间路线的政策，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议会斗争中，因为电视收音机等新技术的出现，资本和媒体在选票政治中有天然的优势，而社会主义政党很难找到与之匹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选民基础。而这一切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推进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上吗？但凡看一眼非洲、南美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这种话。西方议会制资产阶级

共和国是建立在对欧洲以外国家的经济殖民上的，你去南美洲看一看，资本主义推进了那里生产力怎样的进步？去非洲看一看，资本主义推进了生产力怎么样的进步？

第二点更是可笑，马克思确实说过，“工人没有祖国”，但同时，马克思也从未否定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性，当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投降，巴黎人民组织国民自卫军来保卫巴黎时，马克思就说过，法国人的战争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变成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战争。苏联时期的研究者比较系统性的说明，社会主义运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是拥有共同目标的。而马逆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帝国主义的沙文主义混为一谈，实属扛着红旗反红旗。

总之，马逆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和社会主义平等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拥有对未来的规划，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事实上这些都是通通没有的，资本主义是为剥削而建立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放在同一高度比较，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侮辱。

当然了，马逆说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那段批判还是不错的，特别适合用于他自己。

看了评论，大家都觉得“南美和非洲不算是资本主义国家”，我觉得这样的认知实在是太给资本主义面子了，不是资本主义的利得者，即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算资本主义，非洲南美的大多数国家早就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中，并且实行了非常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许多国家也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虽然非常不稳定），这样的国家难道不算资本主义国家吗？还是说发达国家才有资格算资本主义国家？这也太给资本主义贴金了点。

Mark Out

马前卒说的 80%是正确的。因为对于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描述，只要认真读过《共产党宣言》，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同时，这一期节目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或者时间去认真读《共产党宣言》，认真思考，认真将它运用于实践，从而把其中的方法论当作工具去考察整个社会。

因此，看到这一期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开心了。也很想看看马前卒怎么解读《共产党宣言》。

但是，观看这期的时候，有个问题不得不批判，不得不纠正。由于马前卒80%的内容都是正确的，因此这 20%的问题，就容易被人接受。

马前卒解读的《共产党宣言》与真正的《共产党宣言》最大的区别就是：

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前卒的解读，则是以为自己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科学的立场上，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解读《共产党宣言》。

因此，马前卒有关这方面的解读有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马前卒说《共产党宣言》2700 字都在赞美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原文其实是这样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显然，马克思的第一句话是“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后面的文字也可以看出，他只是客观的陈述资产阶级的“曾经”的“革命的作用”，根本谈不上赞美。

其次，马前卒引用中最重点的一句话是：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

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前卒表示，这段文字完全可以无缝切换到无产阶级身上。



因为马前卒的逻辑有一个巨大的前提，那就是“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这段话只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来考察资产阶级”。



但是，仔细读这句话，就能知道，对“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并且这导致了“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我不觉得“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一个什么好词，也不认为这代表马克思就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同样需要有这个资产阶级时代的特征。因此，马前卒这个解读是对马克思的原话的典型的曲解。

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说明马前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曲解。这个曲解使得马前卒直接走向了资产阶级的一方。

马前卒显然是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视频里面也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说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非常简单，已经算是老生常谈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

这里和马前卒说的一样，非常符合马前卒的逻辑，即新的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继续进步。但是，后面有另一段更加重要的话：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前卒谈到这句话，说的是公有制下的“资本”的投资的问题。但是，马克思的意思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换个角度说，如果马克思的观点仅仅到马前卒这里为止，那么马克思就只能像马前卒一样，提出“要不断变革生产方式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我们依然可以说“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改革，就可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避免灭亡的命运”。

如果没有这重要的一点，马克思绝提不出共产主义来。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却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地方。让我们跳出《共产党宣言》，来到《资本论》：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或者，我们转到更加简单的《反杜林论》上面来：

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

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这两段话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力的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直接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为生产力的社会化，其生产关系也必然要是公有制的。

马前卒不断地说明，要无产阶级不断革新，却忘记或者有意忽略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前提是生产力的社会化，而不是无产阶级从真空中发明了一种制度，可以比资本主义更能创造生产力。

联想到前面马前卒说的：如果程序员和外卖员不加班，不能做出另一个有竞争力的外卖企业，就说明现在的制度是对的，是进步的。我有理由认为，马前卒的这个忽略，是刻意的忽略，其目的是为给资本主义做辩护。

这里特别可笑的是，马前卒举了共享单车的例子，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优越性：





在我看来，共享单车的例子，不过证明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话：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有人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批判马前卒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要不断自我革命、自我鞭策、自我进步，这显然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作为掌握未来的阶层，当然要不断自我革命、自我鞭策、自我进步。这里并没有任何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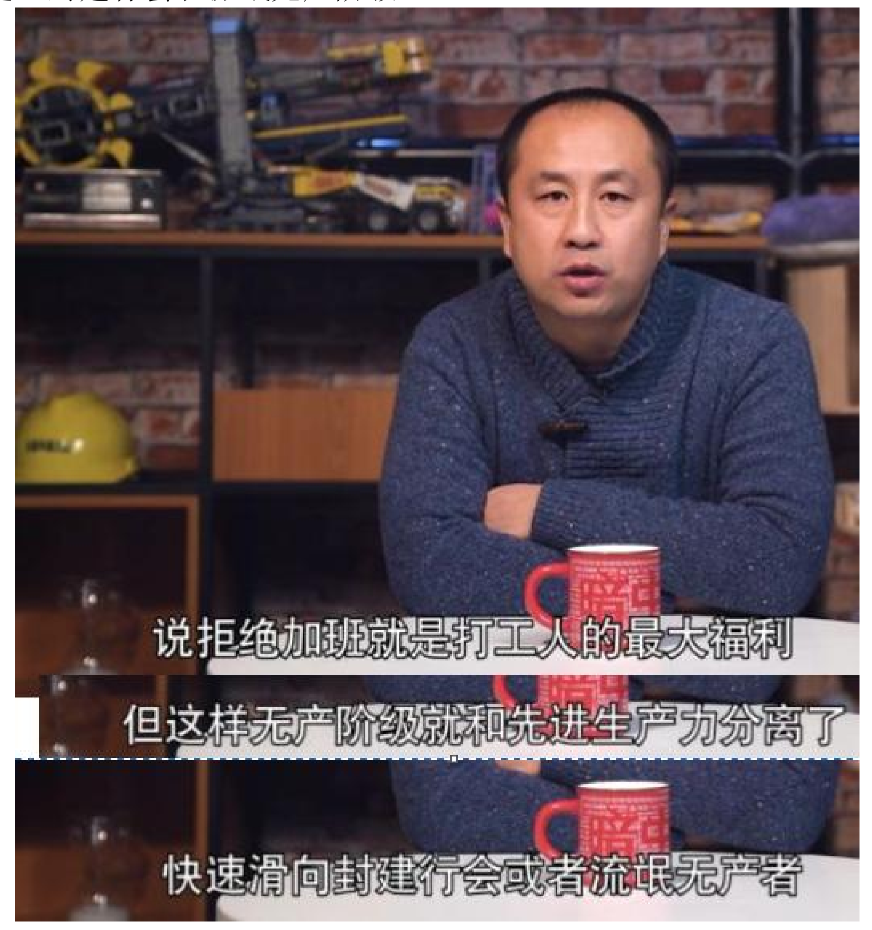
如果马前卒提出来的仅仅是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是作为《睡前消息》

的忠实观众，我很清楚，马前卒说的这个“无产阶级对自己要狠一点”到底是指的什么。

马前卒最先提出这一系列观点，是在《睡前消息》第 78 期。当时主要讨论的是纪录片《美国工厂》。在这一期，马前卒的观点还没有展开，还没有滑坡到为资产阶级说话。

接着是《睡前消息》的 219 期。从这一期开始，马前卒为资本主义制度说话了。因为这期开始讨论起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目前是加班制度。

马前卒在这一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加班制度效率更高，因此更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如果拒绝加班，就是拒绝了先进生产力，拒绝加班就是“封建行会和流氓无产阶级”。



但是在这一期，马前卒后面的重点都是提倡无产阶级的终身学习，因此巧妙地把自己的逻辑拉了回来。

后面的 282 期，马前卒的这套神奇的逻辑又回来了。这一期是在讨论“深圳改工资条例”。这次马前卒说得更加露骨了。



一句话，从他的角度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还能通过剥削劳动者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只有在没有剥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还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那么无产阶级就应该接受被资本剥削的命运，哪怕是希望减轻一些也不应该。

这才是马前卒说出“无产阶级要对自己狠一点”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正是因此，我才需要纠正这20%的解读的错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